

CHINESE WORK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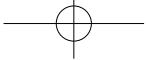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

时间都知道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邀君共饮这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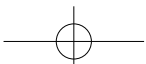
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





送给并肩战斗 9 年的过去时光
和
一定会更美好的未来日子

珍藏唯一版



目录

PART 1

无数的，唯一

2018_ 无问西东

热爱坚持一相逢，便创造奇迹无数。

10	人生何处不显峰
11	平凡着，闪耀着
12	所谓常识
13	创造一代
14	因为热爱，无问西东
15	时光如风，记忆如岩
16	大潮从不止息
17	追光者的歌
18	致敬来路再出发
19	讲好中国工人故事
20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2019_ 与时代同行

坚守初心，无愧时代。

22	与时代同行
23	名匠陨落与企业家“传奇”
24	100 条生命能够疼醒我们吗
25	见山见水见人
26	命运与时代
27	时间都知道
28	“爱心纠缠”不停歇
29	星河璀璨，筑梦家国
30	尽情骄傲吧！为祖国，为我们
31	国是千万家
32	这一年，又一年

2020_ 满怀信心

只要生活的信心不灭，希望的光就能照亮前方的路。

34	从技术的温度到精神的力量
35	记疫·记忆
36	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37	考验刚刚开始
38	五月的鲜花
39	民间烟火与国家高度
40	信心比金子更宝贵
41	第三种面貌
42	算法时代的劳动焦虑
43	我们的幸福
44	记忆里，憧憬中
45	改革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

2021_星辰大海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48	人为目的，并非工具
49	唯有勇气
50	“站出来”
51	星辰大海
52	历史的细节
53	改革的水位
54	这才是成长的样子
55	小小约定，重重承诺
56	不可辜负
57	奔跑吧，生活自有答案
58	为国牺牲，岂止在战场

2022_不止看见

每一次看见，都是哺育希望未来的空气和阳光。

60	大音希声
61	冠军以下
62	看见，不止看见
63	关山万千重
64	凡人之躯
65	工作着是美丽的
66	看见的力量
67	月亮与六便士
68	敬·十年
69	历史的耐心
70	时间从来不语

2023_ 答卷

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努力作答的每一天。

72	朴素的决心
73	衙斋卧听萧萧竹
74	听从你心
75	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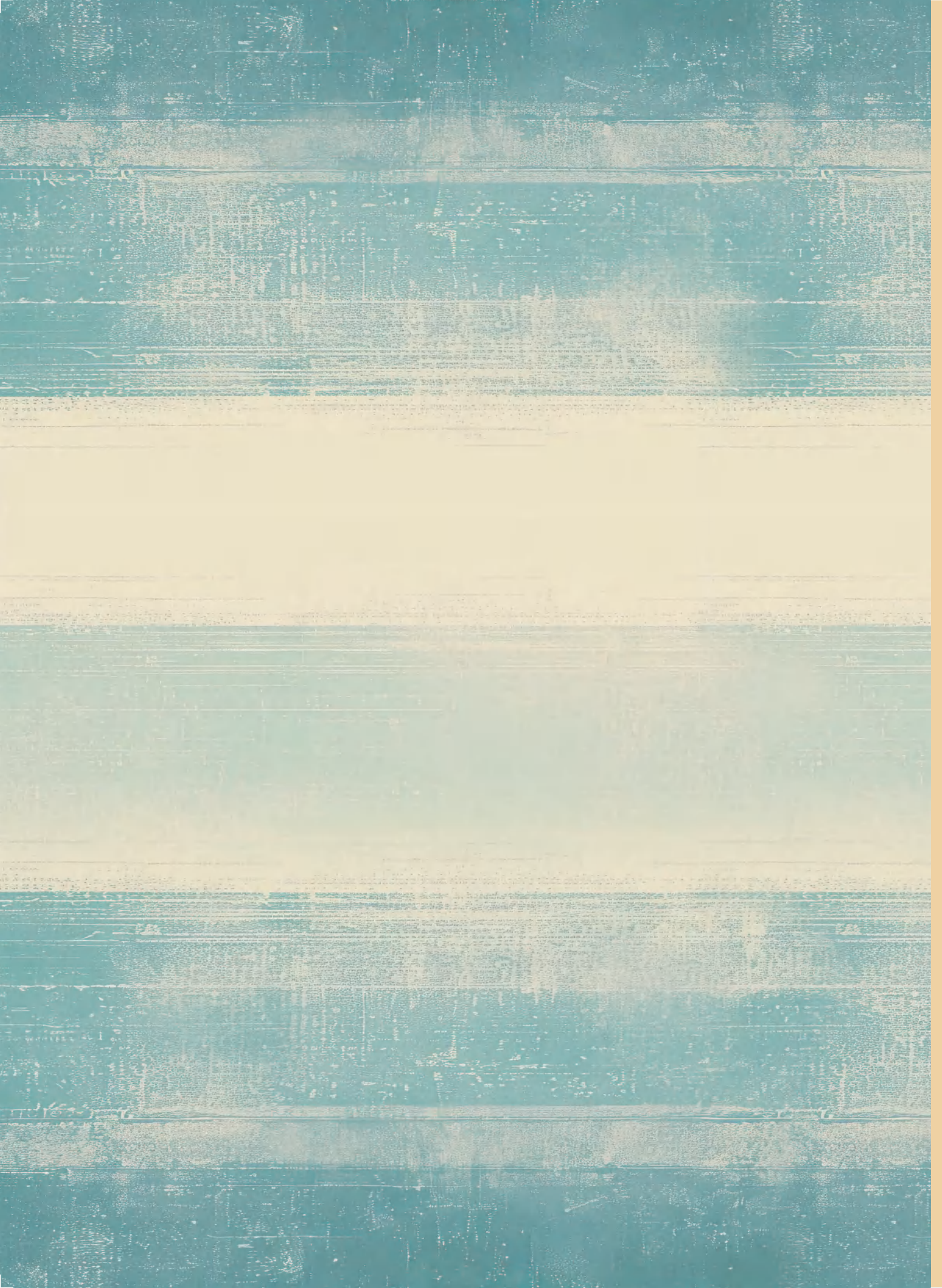
PART 2

理想的，行动

78	预见 2018：最是新春好时光
86	追光：2.8 亿人的利益表达
96	重返荣耀之巅：技术工人的奋斗时代来临
104	e 网情深：智慧工会时代的劳动者网络生活
112	1978—2018：中国农民工发展图谱
154	2015—2018：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纪事
161	你好，副主席——一线劳动者进入工会领导机构纪事
172	改革时间：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186	咱们的钱袋子——2019：工薪阶层迎接“政策大礼包”
194	工人议政简史：民主的细节和劳动者的力量
208	平凡者的史诗：那些逝去生命留给我们的爱
216	阅读点亮世界：全国职工读书活动重回鼎盛时代
224	工会出版简史——1949—2019：与党同行 70 年
234	新中国班组简史——1949—2019：当历史撞见未来
242	以职工为本：中国工会服务站点建设纪事
248	工声嘹亮：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表达
256	蹲点百日：一场从 50 人开始的改变
264	请让我来保护你——1993 — 2021：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困境与暖冬



无数的
唯一



2018

无间西东

热爱坚持一相逢，
便创造奇迹无数。

人生何处不显峰

当热爱与坚持相遇，即使身为工人，也能够一天天将自己打磨成工匠的样子，摘取那些曾经仰望的星，让自己也成为闪耀之星。

热爱坚持一相逢，便创造奇迹无数。

1月初，新一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两位工人——洪家光、黄金娟名列其中。

领奖那天，在一众科技工作者中，身穿工装的洪家光格外显眼，一位学者轻轻地拍他的肩膀问道：“你是一线工人？”

当得到洪家光肯定的回答后，对方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向他竖起大拇指。

可以想见，这惊讶的表情和竖起大拇指的动作背后，有对工人也能领取国家科技大奖的讶异，也有对一线工人站上国家科技大奖领奖台的钦佩。而这，恰是当下社会对工人评价最微妙的再现。

事实上，从200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中，首次为工人农民科技创新打开获奖通道，12年来，经全国总工会推荐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线工人，已经有15位。这一期的《中国工人》，在报道梳理这些摘“星”人时发现，尽管他们身处不同专业领域，但在技术精进之路上，却有着相同的执著。

洪家光，从进厂的第一天起，就和厂里金刚滚石轮加工这个“独苗工种”较上了劲。一旦有了机会，他不眠不休，只用了短短10多天，就把别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掌握的技术攻破了。

黄金娟，在全世界都靠人工检定电表的时候，“异想天开”地提出智能检定的概念，并用3年的时间，“死磕”难题，最终啃下这项在国际上都还未有先例可循的技术。

往回追溯，王洪军、杨建华、代旭升、赵林源、王康健、许杏桃、李斌、郭晋龙、高森、田明、王进、白伟东、朱洪斌……一个个早已大名在外的大国工匠名字，赫然在列。

果然，能担得起大国工匠之称的人，个个身怀绝技。然而，即便是“天生大才”也不可能省了日积月累、渐悟顿悟的过程。在一朝之间“花香四溢”“巧夺天工”，终要靠“面壁十年”“铁杵成针”的“修炼”。当热爱与坚持相遇，即使身为工人，也能够一天天将自己打磨成工匠的样子，摘取那些曾经仰望的星，让自己也成为闪耀之星。

人生是自己书写的一本书。打开扉页，每个人的开始都大相径庭，哪位从“工人”开始一步步修炼到“工匠”的人，不曾有过凡人一样的迷惘，却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拒绝平庸。

有这样一则故事——

炎炎烈日，一处建筑工地上，三个年轻人正在砌一堵墙。路过的人好奇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抱怨地说：“没看见吗？我们在砌墙。”

第二个人平静地说：“我们在盖一幢高楼。”

第三个人快乐地哼着歌曲，笑容灿烂：“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城市。”

10年后，第一个人依然在另一个工地上砌墙；第二个人成为设计楼房图纸的工程师；至于第三个人，他已经管理着这座城市最大的建筑公司……

你瞧，有梦想的人，人生何处不显峰，就像那些摘“星”的工人师傅们！



平凡着，闪耀着

随着群体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民工代表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逐渐畅通，新一代农民工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又是一年春来早。

三月，全国两会如期召开。

红色，是三月的颜色——广场上飘扬的红色旗帜，大会堂里红色的五星穹顶、红色的丝绒幕布，红色的代表证……

火热，是三月的主题——庄严的会场，激越的小组讨论；追逐的记者，被围采的代表委员……

10年前，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初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舞台”。在广场上，在红色的五星穹顶下，在团组讨论会上，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发声，都成为那个春天里最被关注的焦点。仿佛有一束追光，始终紧紧跟随，只是为了听清一个庞大群体的所有声音。

此后，从0到3，从3到31，再到今年最新的数字45。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身份代表人数变化的背后，是一个关乎2.8171亿人的庞大群体的利益表达。随着这一数字不断增长，那束依旧会亮起的追光下，相信这一群体权益的表达会更加从容。

10多年来，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农民工代表们早已学会了如何通过权力机构表达群体利益。随着群体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民工代表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逐渐畅通，新一代农民工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10年前的朱雪芹还会青涩地躲避记者，那么，早已参与到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余雪琴代表，就显得更为成熟而从容。不同个体身上的细节变化，恰恰是一个时代不断进步的绝佳缩影。

说到从容，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已经4年的李超，从最初获得荣誉时的惴惴不安到如今能够淡定面对掌声鲜花，却依旧保持着温和又不失力量的一面。只因初心不失，坚持着一个工人的本分——将技术看作立身之本，视创新为一辈子的追求。

三月，也是女性之月。

本期杂志，我们关注二胎时代职场女性的生育焦虑。妈妈们吐槽生活中琐碎缠身、职场里升职的无奈、身份切换间如何狼狈，这些都是女性的现实困境。然而，生还是不生，难道只是个体选择吗？

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12.43‰这一人口出生率，竟然比日本还低。更有专家预测，今年将迎来人口塌陷式下滑。出生人口一旦雪崩，“生”与“升”的焦虑，就绝不会只是个体焦虑了。从这个角度考虑，如何善待女性，为她们的生育减轻负担，已经刻不容缓，因为，它事关民族未来。

三月，意见建议声音主张在充分释放，振奋欣喜自信期待积聚着能量。

三月，天如此蓝，风也轻暖起来，百花次第开放，美好的季节不可辜负。

无论你是谁，在哪里，正如诗中所言，“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人都可以平凡着，却闪耀着。



所谓常识

生活中,很多时候的无知并不表现为拒绝获取,而是不求甚解带来的知识碎片,进而形成认识上的不足或偏见。

“我们4月报道一下张国华吧。”

“他是?”

“做帘子布的大工匠。”

“帘子布?是窗帘吗?”

“不不不,没有那么简单。”

选题会时,编辑第一次向我介绍张国华和他所从事的岗位——卷绕工。这个工种每天都在与尼龙66工业丝打交道,这种工业丝可以制成浸胶帘子布,成为汽车、飞机轮胎的骨架材料,有的则会成为神舟系列飞船返回舱降落伞的主要材料。

瞧,工匠手里翻飞的手艺技艺,还能为多少我们意想不到的重要领域提供基础性支撑,这显然超出了我的一般性常识。

常识与无知,并不是绝对反义词。你的常识或许就是我的无知。无知并不可怕,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

生活中,很多时候的无知并不表现为拒绝获取,而是不求甚解带来的知识碎片,进而形成认识上的不足或偏见。比如,偶有不了解工会的人,会在我面前将工会的职能简单地与“发福利”等同。

诚然,福利很重要,事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也是职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捍卫”职工福利并就此屡屡发声,受到职工如潮赞许,恰为最好说明。但工会的职能不单单囿于“发福利”,这种偏见的形成,正是发问者碎片式见闻与不求甚解后形成的一种认识偏见。

以此次《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出台为例,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京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直言,“全总深度参与了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措施的研究制定过程”。

“深度参与”四个字背后,包含着工会人与广大一线职工的无数次面对面恳谈,深入企业的细致调研和专业研讨,以及与相关部委交换意见、协商协调,其中细节,正是工会深度源头参与的生动例证。

再比如,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改的声音一度占据舆论主流,理由大多认为现行法律造成了“企业负担过重”和“用工不够灵活”。两会前夕,有记者追问《劳动合同法》什么时候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的回答值得玩味——“用人单位解聘人方便就是灵活?这种考虑是片面的,有关部门跟工会之间相互看法不一致,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你瞧,理不在声高,工会代表广大职工持有的态度和意见一直被党政看重和认真对待。

黑格尔说过,所谓常识,往往不过是时代的偏见。要超越这个时代的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阅读当然不止书本,还有人生的见识广博。曾经的记者曾鹏宇,17年遇见过34次死亡。那些逝去生命教会给他的事,相信在你我读完那些逝去生命的故事后,也一定可以体味到些什么。



创造一代

比起偶像养成类综艺的火爆，对于正在聚焦中国制造2025的我们来说，则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耐心和投入，去养成一个又一个大国工匠。

5月，劳动是最鲜亮的主题，第六季《大国工匠》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位位大国工匠的故事被更多人熟悉。

这一季，《大国工匠》节目以“创造力”为主题，选取的大国工匠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特点：高技能、富有创造力，也拥有扎实的创新成果。比如，洪家光、黄金娟，都是最新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他们，也在《中国工人》的报道中出现过。

所谓创造力，指的是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

如何激发创造力，专家们的观点就众说纷纭乃至大相径庭了。

有研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企业为创造力提供的激励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创新。但丰田公司却声称，每年大约70%的想法和建议都是员工提出的，员工的创造力比估计的要多得多。

有人沮丧地说，最伟大的创新，是沾了一种难以定义的“仙”光，你没法把它放进表格里来研究投资回报率。但更多的企业和国家，还是对创新创造之路始终孜孜以求。

尽管在学术研究领域，可以观点各有不同，但从众多大国工匠成长成才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同的因素。比如说，个体肯钻研、爱动脑、不服输的品质，与所在组织对员工岗位创新的支持鼓励环境相遇，最终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事实上，任何一位技术工人最后能够被称为大国工匠，哪个不是经历了10多年乃至20几年的积累。而所在企业对个体员工的支持投入，也有一段漫长的时间。

本期《中国工人》报道的大国工匠洪家光，工作20年，完成了200多项技术革新，这样的成绩让他拥有了“小车工也能攀登世界高峰”的自豪；大国工匠孙丽，从事机械设计24年，经她之手设计出的4000吨级履带起重机被称为“世界第一吊”。

套用当下流行概念，这就是大国工匠养成系实例。比起偶像养成类综艺的火爆，对于正在聚焦中国制造2025的我们来说，则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耐心和投入，去养成一个又一个大国工匠。

与大国工匠们用时光熬出的伟大相比，那些搭建起工业体系最厚重部分的上亿中下层普通技术工人，还需要更多政策照拂。尽管《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3月正式印发，但在我们最新的采访中，依然有一线工人直言：“好政策还要让我们尽快享受到。”

除了政策落实还需要各级、各部门的步伐再快点之外，在生活压力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面看，正视一个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当我们还在为大国工匠而骄傲时，一个现实的尴尬或许将长久存在，那就是——以后谁来当工人？

5月，有关劳动的讨论正当其时。各地也在纷纷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们走进校园与孩子们近距离接触。

面对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希望大国工匠们的故事能够在幼小的心中种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今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怀有一颗去制造美好，去创造未来的奋斗之心。

与之相应，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正视一点，以荣誉为牵引，以兴趣为驱动，在鼓励孩子加入工匠队伍的价值引领之外，还需要将真正的平等、尊重、体面、光荣，落实体现在一位又一位技术工人的个体生活感受之中。唯其如此，创造一代，未来可期。



因为热爱，无问西东

当下有太多诱惑太多途径，让人可以快速获取快乐。也会因名望、地位、回报的比较之心，让人产生迷茫。

5月初，在大连金普新区举办的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中，大国工匠方文墨与职业技工院校的学生们之间的问答环节，让人感触很多。

一个学生问：“您平时那么忙，怎么能看完400本专业书？”

方文墨答：“我每天就睡5个小时，到现在连网购都不会，更不会玩游戏，微信也就去年刚装。”

另一个学生问：“您练功的时候，有没有过枯燥乏味的感觉？”

方文墨答：“没有感觉枯燥过，因为我喜爱。每一次训练中，零零几毫米的提高，都是很快乐的事情。”

简单的回答里，传递出两个信号：专注与热爱。

在手艺人傅军民那里，热爱的表现是，拧着劲儿要把景泰蓝食盒做成不掐丝工艺，最终耗时800多天；一把玫瑰椅设计几个月，打磨七八个版本；一张桌子上漆100次，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

这样的傅军民，连他自己都在反思“是不是过于理想了”，但下一次，他还会忍不住在朋友圈里吐槽那些在工艺上“糊弄”的同行。

不管从事工业生产还是传统家具制造，方文墨和傅军民本质上都是“手艺人”，也是“守艺人”。外界对他们所无法理解的部分，恰是当下最为稀缺的东西。譬如甲之枯燥方文墨之快乐；乙之性价比傅军民之没法糊弄。只是傅军民偶尔的自我怀疑，让他少了一点从容笃定，在坚守匠心的过程中，便少了那么一点纯粹的快乐。

诚然，当下有太多诱惑太多途径，让人可以快速获取快乐。也会因名望、地位、回报的比较之心，让人产生迷茫。这样的动摇，其实再正常不过，这种内心的徘徊，也正是一个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整个5月，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就像学生们对方文墨的提问一样，也会有很多学生向大国工匠们提出相似的问题，这不正是青春少年对真实自我的一次追问嘛。但愿，孩子们能够早日找到真实的自我，在热爱的驱动下，笃定前行，变成自己想成为的人。

最后，用马德老师的一段话结尾：

我慢慢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

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它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实现呢？

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静坐听雨，雪中听琴，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时光如风，记忆如岩

今天每一位劳动者为城市添加的砖瓦，都会是城市明日之骄傲。
为劳动者树碑，为劳模立传，所谓精神，便是如此传承。

眼下，各种劳动和技能竞赛如火如荼。选手们为职业荣誉而战，总会有人脱颖而出，也总会有更多的人埋下不屈的种子，卧薪尝胆，为了来年再战。

技能竞赛就像劳动者的运动会，通过不同级别大赛的层层选拔，技能高超者终将站上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奖台，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

每一位富有理想的技术工人，都要走上这样的奋斗之路。一位又一位平凡者的故事，汇聚而成的是平凡者的史诗。一位又一位技能顶尖的“做工的人”，共同构成的是中国工业的强大基石。

在每个人的记忆里，一次职场中的光荣绽放，足以构成人生最宝贵的回忆。那么，对于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来说呢？

幽深巷弄与高楼林立交错，历史印痕和时尚潮流遥望，那些在时间长河里留下过巍峨背影的风流巨匠，无意间拨动过历史齿轮的无名之辈，都是一座城市不可磨灭的记忆。

酷暑之时，《中国工人》的采访组走访了三座与劳模记忆有关的城市。

上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摇篮之城，70载大江大海的巨变之中，劳动者书写的历史，以不同方式镶嵌在6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走访徐虎，为他个人经历与时代变化间的比照而感叹，更为坚信“徐虎精神”永远都会是高高飘扬的劳动旗帜。我们走访包起帆，为他愈老弥坚的持续创新惊叹，同时也更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总能引领历史的原因所在。

沈阳，带着东北风云浓厚印记的城市，不仅是“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更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有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如此强大的工业环境，滋养诞生了一位又一位名震中国的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无边界的新工业革命步伐不可阻挡，“东方鲁尔”也需要一次华丽蜕变。这一切，都离不开匠人匠心的点滴铸就。

北戴河，中国最特别的海滨小城，海浪沙滩，帆影绰绰，渔人晚归，惬意处处。这座小城与政治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1898年，清政府宣布北戴河“准允中外人士相杂居住”，政要显贵出入成为寻常。直到新中国成立，工会组织劳模海滨休养，才让这个北方避暑胜地有了更多平凡又绝不普通的“人民”到来。尤其是诸多工人疗养院临海而建，接待了千千万万的一线工人，留下了一个国家对劳动至高敬意最生动的画面。

一座城的生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劳付出。一座城的记忆中，理应有劳模的重要位置。我们撷取的上海、沈阳和北戴河，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劳模记忆、劳动记忆的生动缩影。更多的劳模街、劳模墙、劳模馆和劳模公园，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处的城市里传递着“劳动光荣”信仰，这不仅仅是记忆，也是活的历史。

时光如风，记忆如岩。

今天每一位劳动者为城市添加的砖瓦，都会是城市明日之骄傲。

为劳动者树碑，为劳模立传，所谓精神，便是如此传承。

这些永不磨灭的记忆里，每个人虽不过是沧海一粟，汇聚起来却是一个国家的荣耀。



大潮从不止息

如果，农民工群体40年来的变化是一面镜子，不可否认，它照出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生动而丰富的进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人们从不同视角回顾40年来社会变迁时，很难忽视一个群体——农民工。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而丰富变化的诸多事物中，农民工群体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位至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总是与权利、法治、公平、正义、文明这样的词汇息息相关。

几十年来，农民工一开始被称为“盲流”，后来被称为“民工”，之后是“农民工”，再后来，有声音认为这一称呼不够尊重，于是改称“进城务工人员”，一段时间后，“农民工”重现媒体。直到现在，这个称谓在人们心中逐渐仅作为表达身份的中性词出现，这个群体才接近其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尽管，这种平等无论在制度还是实践中，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我的个体记忆中，与农民工这个群体相关的词汇先是蛇皮袋、塑料桶、扁担；后来是建筑工地、流水线、工伤、欠薪；再后来，留守儿童、积分落户、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兼职工会副主席……

“一个民工进城了。他和这座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

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青年报记者以这样的开头来描摹民工潮时，回力牌白球鞋这个细节，给10年后初入媒体就职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这之后，接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采访过无家可归的农民工、被欠薪的农民工、流水线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飘在北京心怀梦想的农民工子女。这几年，采访较多的还要数农民工代表、农民工兼职工会副主席和农民工劳动模范等。

如果，农民工群体40年来的变化是一面镜子，不可否认，它照出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生动而丰富的进步。

最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民工4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刊以缩编的形式奉献给读者。作者以大量的历史资料、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缜密的思考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翔实的农民工40年发展图景。如今看来，有些历史依然触目惊心，但每一次引爆社会关注的事件后，政府作为紧跟其后；有些国家政策“破冰”意义浓厚，但它们所激发出的社会连锁力量不可小觑。

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个群体以最顽强的努力为中国社会转型注入“推进剂”，也必然以最终融入城市文明为象征，完成自己的“马拉河之渡”。

农民工，既是主动挺立改革大潮的“弄潮儿”，更是始终参与改革的“赶海人”。他们，是改革大潮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如今，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进行中，大潮从不止息，2.87亿农民工群体阶层迁徙的力量依然蓬勃。



追光者的歌

一个阶级的故事，需要有人讲述，被人倾听；一个阶级的故事，更需要有人书写，被人尊重。

舞台上，追光灯下，站定，深呼吸，“大家好……”

一场场讲述“中国梦·劳动美”的职工演讲比赛，在全国掀起一浪浪高潮。直至7月，64位佼佼者来到北京，深情讲述中国工人阶级的故事。

决赛前夜，来自安徽的选手还在一遍遍地推敲演讲稿。我问她，怎么这么紧张？她回答说，虽然讲述的是自己的个人经历，但却是代表乡村教师的奉献精神，这故事的深意希望能表达得好。

来自河北的选手郭娜，是保定汽车总站“郭娜陆地航空班”的创建人。比赛前夜，她专门找了老师来辅导，那要强的劲头，一下子就让人懂了，这位基层一线普通职工，是靠什么才能一步步走到“党的十九大代表”的位置上。

尽管比赛最终的得分有高低，只有12位选手能够站上总决赛的舞台，通过央视的画面，向全国人民展现风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64位选手讲述各自精彩故事的精神内核：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一个阶级的故事，需要有人讲述，被人倾听；一个阶级的故事，更需要有人书写，被人尊重。

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已经接近尾声。南京、沈阳、宝鸡、郑州，在4站共6个工种的比赛场上，一群工匠正在书写故事，改写个人命运。

陕西宝鸡是数控加工和数控维修两项工种的比赛地。在一场长达6个小时的实操比赛中，组委会把盒饭送到赛场，没有选手舍得花时间去吃口饭。第二天，组委会改送红牛、巧克力、香蕉等补充体力的东西进去，能吃两口的选手还是寥寥。有选手结束考试后，甚至身体瘫软，必须要有人搀扶着才能回到驻地。大赛组委会成员说，“看着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工匠，心疼啊！”

然而，在赛场上，聚光灯下，他们是令人倾佩的技术高手。认真专注的面庞上，满是汗水，在一双巧手之下，被细心加工出来的作品，堪称完美。这是制造之美，更是劳动之美。

而在这赛场之外，经年累月的技术磨练，要付出多少时光和汗水，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只有这些工匠自己清楚，从有资格参加选拔赛，到一路拼杀进入全国决赛现场，机会得之不易，所以一分一毫都不能浪费，唯有全力以赴，才能写好属于自己的那章故事。

有人最终站上领奖台，荣光一夕写就。有人在内心埋下一颗种子，直待3年后再战沙场。

无论比赛结果如何，但我们深信，追光的人，自己也会身披万丈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对于一支有着近4亿人数的职工队伍来说，讲好自己“中国梦·劳动美”的故事，便是讲好了一个国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言语诉说出的，而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用双手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劳动中有付出，也有收获；有苦涩，也有甜美；有心酸，也有幸福。劳动者以劳动故事，言说劳动之美，在感动他人赢得赞美之外，或许还应有更为广阔的期许，那就是全社会的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可以成为也应当成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基石般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财富。

这世界，每个人都要为一道光而活。

我们都是追光者，你的故事在讲吗？



致敬来路再出发

对《中国工人》，对中国工会，乃至对一个党、一个国家来说，历史的幽光中，有理想，有信念，更有我们要去的方向。

中国工会十七大即将召开。每五年一次的盛会，都是一次总结，更是一次全新的启程。

2013-2018年，回望5年来路，“改革”二字占据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3年前，由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发轫，以全国总工会和上海、重庆市工会开展群团改革试点为发枪，中国工会聚势谋远，守正出新。

对工会而言，要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要的不仅仅是方法论，更需要一份与党的使命高度一致的责任同频，和拥有敏锐感知职工群众冷暖需求的情感共振。

工会人的这种同频共振的责任与情感，又该从何而来？

如果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一个世纪来，中国工人运动图景徐徐拉开。从96年前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中国工会始终坚定紧随党的脚步，凝聚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初心如磐，使命如山，最终才迎来辉煌，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段段丰碑历程。

当我们梳理从一次劳大到工会十六大的16次大会史料，重温历史的细节，重新理解每一次大会的成果，以及它对未来的影响时，才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历史从不欺人，历史的细节中，掩藏着教训甚至是鲜血，更蕴含了经验甚至是宝贵的财富，只有了解我们从何而来，才会理解我们该向何去。

令我们惊叹的是，探寻中国工会历史的“旅途”，也成为一次寻找《中国工人》初心的觉悟之旅。这本诞生于1924年10月的红色刊物，已经悄然走过了94年的沧桑岁月。

据《中国工人》第一任主编罗章龙的回忆，“1923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1924年，中央再次做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综合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

可以说，《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舆论阵地的光荣使命。那些发黄的老杂志里，铅字留下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光芒，记录着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书写着工运先驱的呼号呐喊。

从1924年创刊，到1928年复刊，再到1940年延安的二次创刊，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几番曲折，无论命运如何兴衰跌宕，它前行的轨迹始终清晰，那就是坚定地与党同行，永远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一步一步，深深地留下一份红色刊物的历史足迹。从杂志创刊、复刊、二次创刊等几番命运跌宕中，也能一窥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之路的艰辛不易。

那一天，当我们从全国总工会位于8楼的资料室里，小心翼翼地捧出珍藏的26册老杂志，轻轻拂去发黄纸张上的尘埃，内心充盈着满满的骄傲。旋即，一份责任感慢慢升起，一点点加重，再加重。那是看清来路后油然而生的使命感，责无旁贷。

对《中国工人》，对中国工会，乃至对一个党、一个国家来说，历史的幽光中，有理想，有信念，更有我们要去的方向。

向来路致敬，这是拨开岁月尘埃，一路寻找初心后，那嗡嗡作响着的巨大共鸣；携使命出发，这是回望近百年足迹，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必须持有的自觉与骄傲。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在这改革浪潮迭起的季节，让我们致敬来路，再出发。



讲好中国工人故事

伟大的故事总是具有现实意义，能在长时间里不断获得新解释，因为其中的人性是那么丰厚，每一个新的一代都能够从中观照到自己。

这两天，全网都在为“丢了快递”暴哭20分钟的上海快递小哥心疼，虽然经核实，并未发生快递被偷的情况。但这段视频从侧面映衬了一位普通劳动者生活中的某个“至暗时刻”，打动着很多人。如潮水般的评论里，满满的都是对快递小哥的安慰。这其中有巨大善意的释放，也有曾经面对过类似情景的共鸣。

这样的故事，网络上并不少见，尽管三不五时地会刷屏一次，但人们却并无审美疲劳，每每都会加入围观行列。那些能够轻易俘获人们目光的，总是最平凡劳动者的善良、努力、勇气，甚至辛酸。比如，环卫工张景和与小孙女的温情一刻；地铁里不好意思坐在座位上的农民工；雪地里，一边带孩子一边检修的电力工人……

鲜衣怒马，年少轻裘，是很多人所愿。但大多数时候，如果注定我们只能做一个普通人，也希望能够活出普通人的尊严，做一个平凡不平庸的人吧。平凡却不平庸，原本也是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的人生愿望吧，但守着那颗不平庸的心，却逐渐走着走着，成就了自己的不平凡。

1982年，郭明义进入鞍钢，成为一名生产汽车驾驶员；比他早两年，高凤林刚刚技校毕业，成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211厂工人；彼时，巨晓林还在老家宝鸡，在泥瓦匠、油漆工、电影放映员的临工里打转，直到1987年，才得到一个偶然机会，进入铁道部电化局成了接触网工。对他们三位而言，轨道一旦选定便从此再也没有换个地方，一步一步，走好踏实的每一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让自己的人生闪耀着劳动的力量，最终成为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中国工人》反复报道他们，与他们成为真挚的朋友，因为我们相信，讲好他们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里，探寻人性这一永不过时的主题，就是讲好中国工人的故事。

已经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5年之久了，郭明义参加中国工会十七大，依旧还是一个蛇皮袋装几件简单的衣物；参加活动的巨晓林，大方朗诵起自己9年前写的诗歌《咱们的农民工》；在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7个月前，高凤林尽管已经荣誉等身并且家喻户晓，却没有任何政治身份。但在一次技术工匠的聚会中，他带着刚刚下班的疲惫乘地铁赶来后，坐在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几位省级工会兼职副主席间，谦虚有礼，却心如止水。

伟大的故事总是具有现实意义，能在长时间里不断获得新解释，因为其中的人性是那么丰厚，每一个新的一代都能够从中观照到自己。

《中国工人》致力于记录下由劳动者创造的伟大故事，记录下这个时代里，劳动者奋斗着的样子、散发着职业魅力时的瞬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时刻。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尝试拥抱新媒体，利用多种途径和平台，将中国工人的声量放大。我们与火山小视频合作，为“故事”加持“技术”的力量，让工匠的魅力征服更多人。我们尝试运用AR技术，用虚拟现实玩转趣味互动。未来，我们还将探索多种传播渠道，运用多种手段来挖掘传播好中国工人的故事。

此时，正值一年一度的《中国工人》征订季节，写下这些“宣誓”般的文字，是我们内心充盈的热望，更是向还愿意打开杂志的每一位读者的诚挚邀请，一起见证中国工人的故事，与《中国工人》一道，向中国工人致敬。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邀君共饮这一杯，也娓娓道来你的故事吧。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当伟大还未到来之时的义无反顾与坚守执着，当伟大已来时依然能够守拙而清心的生活态度，才是改革时间最值得珍视的精神力量。

戊戌岁尾，北京。国家博物馆西侧广场的巨型花坛上，“伟大的变革”5个大字巍然矗立。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祝活动，正在进入高潮。

40年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中国社会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笨重的方盒子到纤薄的液晶面板；通讯工具从固定电话到移动电话，从板砖似的大哥大到集纳生活所需方方面面的4G智能手机……这是个体生活最容易看到的变化，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我们的国家名片也从长城、黄河变成了航天、高铁、超级工程。

伟大的变革，是思想的变革，是技术的变革，更是解放生产力的变革。

1978年，中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29.5%的劳动者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40年后的今天，中国从业人员早已突破7.7亿，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超过70%。

一组数字的对比，象征着一个阶级的伟大变迁。前所未有的改革持续引爆各种潜能，而劳动者的潜能一旦被释放，便迅速长大成为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

40年的时光如同流水，记录下那些闪耀伟大劳动品格的前行者的最后人生故事。

马恒昌怕浪费国家钱财，病重中坚决离开医院；邓稼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13天后，因放射性侵害而全身大出血辞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93岁的吴大观依靠0.3的右眼视力，将中国喷气发动机和涡扇发动机送上世界前台……

这些曾经感动中国的劳动榜样，就这样悄悄离开了沸腾的生活。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开往富强美好的列车，他们已经无缘欣赏愈加绚丽的风景。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勇气，迎接改变中国的凤凰涅槃。

40年的时光如同天幕，映射着那些恪守初心与良知默默劳作着的身影。

8.6元，这是孔繁森留给母亲的所有财产；47根扁担，放弃了1360个休息日的杨怀远，用它们服务了素昧平生的万千大众；20年，王顺友相当于在雪域高原上走了21次“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些淡漠物质与欲望的人，就这样把自己羸弱的肩膀挨在一起，与躁动和迷茫反向而行，传递温暖的善意，唤醒社会的良知，让中国改革开放航船上的每一个人，温暖相拥。

这一期，我们推出长篇特稿《改革时间》，试图用31位劳动者在40年时光中的人生片段，再现他们所代表的亿万劳动者怎样影响着我们的时代。毕竟，当伟大还未到来之时的义无反顾与坚守执着，当伟大已来时依然能够守拙而清心的生活态度，才是改革时间里最值得珍视的精神力量。

40年，伟大的变革中，有些人因引领变革而伟大，有些人却因坚守而愈显可贵。人最终磨砺的都是内心，一时的快乐易得，长久的喜悦一定需要精神的感召才能获得。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征。我们奋斗的样子，我们散发职业魅力的瞬间，我们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刻，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印记。31位劳动者背后的芸芸众生和无名之辈，共同融合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中国工人故事成为时代交响曲中最打动人心的旋律。

淘沙见金，改革不惑。

致敬来路，带着心中燃烧的希望继续出发。

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时代。



2019 与时代 同行

坚守初心，无愧时代。

与时代同行

本刊编辑部

《中国工人》面向广大职工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反映广大职工主人翁精神风貌。

时光呼啸，却从不爽约。2019年如期而来。

岁首回望，刚刚过去的2018年，在祖国的苍穹下，那么多大事要事历历在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落实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年来，全国各族职工积极参加“中国梦·劳动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筑牢思想根基、汇聚奋斗共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踊跃投身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参加“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劳动和技能竞赛，努力掌握新知识、增强新技能，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在全国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各级工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10·29”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国工会十七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加强对职工的政治引领，深化工会改革创新，积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切实加强维权服务工作，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工会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宏大的时代命题里，从不缺乏像你一样努力着的人们。过去这一年，一个又一个模范劳动榜样人物，在重大工程、国家重器、劳动竞赛等机遇中脱颖而出。港珠澳大桥贯通时，人们记住了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的名字；中国大飞机C919展翅蓝天时，人们记住了用手打磨了很多“前无古人”全新零部件的高级技师胡双钱……

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里，变革与没落同在，进取与焦虑共生。但是，正如伟大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世间一切伟大的壮举总是默默完成的，世间一切智慧总是深谋远虑的。”那些能够守住本心的人，总是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惊人之作。

挥别2018，拥抱2019。“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铿锵话语言犹在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里，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发蕴藏在职工群众中的巨大创造力。新时代的中国工人，也必将在奋斗中寻找幸福，在幸福中体味梦想生根开花的伟力。

2019年，《中国工人》也迎来自己的95周年。自1924年创刊以来，这本由党创办的工人读物，始终没有更名且出版至今。95年，几次断续，几番调整，却始终不忘“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的初心，面向广大职工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反映广大职工主人翁精神风貌。

坚守初心，无愧时代。《中国工人》愿始终与全国广大职工群众同行，一起携手与时代同行。

名匠陨落与企业家“传奇”

那位高龄再创业带着“褚橙”横空出世的企业家也走了，一时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与此相比较，顶级工匠离世引发的诸多惋惜与哀荣，网络声量就显得太小太小了。

李斌走了。

吴吉林也走了。

一位是技术创新的大国工匠，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为工人权益发声，影响并推动《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出台；一位是第一届最美职工，在生命的尾声，他捐献眼角膜，选择将光明留给世界，用生命来阐释何为“最美”。

顶级工匠陨落，接触过他们的人，内心都无法平静。有人记得，李斌每年来参加两会时，西装总是大一码，“有点邋遢”，发言声音不高，惜字如金，语调平缓却字字铿锵；有人知道，石油工人吴吉林为什么要坚持自驾去大庆油田瞻仰王铁人，因为那是一位石油工人的朝圣之旅啊，一辈子总要去一次。

不可否认，近些年随着各种制度保障、荣誉奖励、媒体宣传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上对于工匠的认识和关注度明显上升。尤其是2018年度大国工匠人物发布，掀起了又一波崇尚劳动致敬匠心的热潮。然而，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构建，除了个体获得认可之外，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才是检验社会价值取向的“客观温度”。

也是在本月，那位高龄再创业带着“褚橙”横空出世的企业家也走了，他一生跌宕而充满争议，却也享有不少赞誉乃至被称为“传奇”，一时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与此相比较，顶级工匠离世引发的诸多惋惜与哀荣，网络声量就显得太小太小了。

究竟什么样的事件容易引起人们集体关注？传播学中的乐池理论认为，一个人说我能解决中东问题，另一个人在演出时不小心掉进了乐池，谁更容易引起关注？谁更容易成为网络的热点话题？显然是后者。所以，注意力和传播力大小，往往并非由事件的重要性决定，而是由事件的戏剧性程度决定的。毕竟，人们喜好跌宕的故事，喜好创造财富的刺激，喜好美丽外表带来的愉悦。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有着非凡技艺的工匠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工匠的社会地位，与其他人群相比，仍旧不高。如李斌一般，在本职岗位为企业创造了可观财富，获得荣誉无数，身处上海月薪却也从未过万。本月采访一位大学教授，他在谈到尊重劳动的时候就曾直言，“给点实在的，把收入先提高上去，社会地位自然就高了”。这位已经花白头发的教授记得，自己八级工的父亲收入比工程师都高，在厂里人人羡慕。

听过一位著名大国工匠的收入故事：某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追问这位大国工匠收入几何？现场有官员脱口而出“年薪30万”。官员并未说错，因为在呈报上来的材料里写着，已经为这位大国工匠提高了收入待遇。可官员不知道的是，这项政策始终都只停留在纸面上。直到这次新闻发布会后，才倒逼企业落实了年薪30万的规定。

这故事让人听来无奈，却又是工匠人才待遇制度落地难的真实写照。

今年两会，李斌的位子空了，一位为工人权益持之以恒发声的人走了，但工人议政的步伐从未停歇，工人代表为群体利益年复一年、一届复一届接力“代言”的声音依然铿锵。这让我们看到了工匠的未来，更光明的日子并不遥远。



100条生命能够疼醒我们吗

如果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之后，无法带来一次革新，哪怕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工业园、一家企业的安全革新，那些在安全生产事故中逝去的工人生命，只会永不瞑目。

这是一份我们不愿罗列的安全生产事故清单——

3月21日，江苏盐城响水一化工厂特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同日，江苏扬州一工地脚手架坠落，致6死5伤。还是这一天，成都双流机场飞机滑行道桥项目钢筋倾倒事故，致4死13伤。

3月29日，山东青州一车间液化天然气泄漏导致爆炸，致5人死亡。

3月31日，江苏昆山一工厂室外场地上存放废金属的一个集装箱发生一起燃爆，导致7人死亡。

4月1日晨，上海一二八纪念路爱辉路有一仓库着火；4月1日下午，安徽马鞍山一化工厂突发爆炸。所幸两起事故无人员伤亡。

……

响水化工厂特大爆炸，举国震惊，各方高度关注，却并没有让灾难停止发生。短短11天，连续的安全生产事故，经由新闻媒体报道的死亡人数就达到100人。

响水化工厂特大爆炸甫一发生，全国各地的安全生产检查紧随其后。比如有报道称，安徽马鞍山爆燃发生的那天上午，安全检查小组刚刚撤离。

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之后，我们见过太多痛心的表态、太多舆论的鞭笞、太多媒体上的问责。然而，它们嗖地来，忽地去，总有新的事件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谁还记得，江苏昆山在2014年也曾发生过一起粉尘爆炸事故，当天就造成75人死亡。爆炸的疼痛，一定让江苏警醒过，2018年全年安全生产事故统计中，发生在江苏的化工事故减少了12起，是全国化工安全事故减少力度最大省份。然而，为何这一态势没能延续，响水一声爆炸一下就将安全生产的记录拉回了5年前？

保持安全生产，究竟靠什么？

2014年，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许振超委员针对如何落实劳动者监督安全生产、拒绝违章指挥的权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有没有权利？有权敢不敢用？”5年过去了，这句话问出的问题，不知在现实中改善了多少？

有关安全生产问题，政府一直很焦虑，但为什么没有预期的效果呢？

一位化工行业专家一语中的：我国化工产业规模世界第一，但整体的化工安全管理理念和技术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这就是无法完全杜绝重大事故的根本原因。

11天，100条人命之后，除了问责治罪，更需要有人“咬定青山不放松”，推动在安全生产领域来一次全面的反思与系统治愈。

1996年，香港嘉利大厦火灾造成41人死亡80人伤。这场大火烧疼了香港，大火调查委员会用时9个月的两份调查报告，暴露出旧式商住楼宇的防火标准过时与市民防火意识不足的真相，并由此开始了全面革新香港消防细节的历程。

与香港一座城市的消防改善相比，全国化工行业的系统性“治愈”显然过于庞大与复杂。然而，如果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之后，无法带来一次革新，哪怕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工业园、一家企业的安全革新，那些在安全生产事故中逝去的工人生命，只会永不瞑目。

从事故中汲取教训，从灾难中反思成因，我们的发展才能跳脱原地反复走到上升发展的通路上。

11天，100位劳动者的生命，能够疼醒我们吗？

李健

见山见水见人

见山见水见人，
对劳动者来说，
构建着个体通往
伟大世界的道路；
见山见水见人，
对书写者来说，
是看见平凡并
体悟伟大的必
经之路。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5月，是劳动的季节，也是歌颂劳动的节日。新一届全国五一劳动奖揭晓、全国最美职工发布，各地各级工会推出一批选树的工匠典型人物，在各类大大小小的媒介上传播。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创造者，像一个个最美丽的音符，共同谱就五月激情澎湃的劳动赞歌。

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典型宣传，面对过一位又一位劳模、工匠，我们探究今日之前的那个普通劳动者的人生故事，真实的用意，不过是想努力去体悟，平凡与伟大之间那丝丝微妙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种探究，有时会失败，有时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理解，却始终距离洞幽烛微有着不少的距离。

上个月，我去西藏采访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国土调查。当踏上高原的那一刻，缺氧让脑袋昏沉，及至行进到海拔4450米的那曲，昏沉发展成脑袋炸裂、呕吐和低烧，眼前的蓝天白云、壮美山川没了颜色，顿时间对测量队队员们去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双湖县无人区，用双脚丈量记录国土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

在采访中，我们的确听到了不少缺氧环境和特殊地理情况下队员遭遇的种种“危机”。有人连续呕吐到吐出粉色泡沫，依然誓不下一线；有人外出作业，被藏獒撕咬，甚至与狼群擦身而过庆幸命大；有人经验不足，开车遇险……

这些故事和险境，在他们的讲述语气中早已云淡风轻，从不见跌宕的情绪。任务面前，从来没有小我，高原极地，遇到什么都有可能，所以，遇到了什么也都不稀奇，没人会轻言“我要下去”。

这些细节，听者唏嘘。然而，最打动我的，却是他们艰苦条件之外的精神世界。

我们喊他“任哥”——一位参加过2005年珠峰测量的“大人物”。一天，他的手机铃响起，是一首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有90后记者打趣道，“任哥这么怀旧”。任哥不好意思起来，说起自己是金庸迷。

“年轻的时候，在西藏野外作业，手机没信号，只好看书。就是那时候成了金庸迷。”任哥说，这首怀旧的歌响起的时候，都会瞬间将他拉回当年看星空、山川的情境。

人的记忆需要锚点。对于任哥来说，外人看来的艰苦时光，他却自有一番精神世界旁人无法体会，那是震撼、是辽阔、是愉悦，而这些，只需要一首歌作为引线，便可以瞬间唤醒、筑牢日日在这震撼、辽阔、愉悦中构建起的价值观、世界观。

任哥的话不少，但从不说大词。他只会反复说，“第一大地测量队没人会在任务面前讲条件。从来不会！”

任哥表达的这层意思，在另外一位队员口中是这么说的：“国家召唤，随时听命。”

他说这句话前，我们刚刚闲聊了他退役转业前执行汶川大地震救援时经历极度生死的故事；听了他到测量队后憋了9年终于第一次上西藏参加任务“得偿心愿”的兴奋；以及作为最年轻的司机，他愿意在西藏待到任务完成的最后一刻的态度。

“国家召唤，随时听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我看到了一群平凡的伟大者。

见山见水见人，对劳动者来说，构建着个体通往伟大世界的道路；

见山见水见人，对书写者来说，是看见平凡并体悟伟大的必经之路。

命运与时代

如果将劳模、工匠的个体命运放在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就会发现，今天的时代，对于产业工人来说，就是最好的时代。

中美贸易摩擦还在胶着，这是中国发展必须要走过的关口。

国家与国家间的政经交锋，波诡云谲。生活中的平凡者尽管无法左右局势，却也又一次明白了那句“落后就要挨打”的真实含义。

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知识技术领域的落后，角力便会处于被动。同样，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技术本领永远都是促使其命运发生逆转最强大的因素。

这一期《中国工人》的深度报道，我们将视角再次投向那些如今家喻户晓的劳模和工匠，复盘他们的人生轨迹，探究个体命运与社会时代发展之间的叠加效应。

何谓命运？即宿命和运气，是指事物由定数与变数组合成的一种模式。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命与运组合在一起，即是时空转化的过程。

事实上，在工匠们的故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叫作“坚持”的品质。他们坚持对技术的探求，坚持对手艺的尊崇，坚持对匠心的恪守。显然，这种坚持便是被称为定数的命，一旦与时代风向、现实机会的“运”相遇，命运反转便是必然。

如果将劳模、工匠的个体命运放在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时代，对于产业工人来说，就是最好的时代。

被网友尊为“中国第一焊工”的高凤林，早在1999年就“火”过一次。然而，最火爆的电视节目并未让他的命运发生巨变。此后近20年，高凤林既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也不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全国两会期间，许振超领衔的工匠劳模代表“民间小聚”，高凤林总是下班后匆匆搭乘地铁赴约，默默地坐在一旁。直到2018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七大，他直接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生活才骤然发生变化。

然而，高凤林用时间长度累积出的命运转折，却在另一位炼钢小伙子周文涛身上，用一种急剧得让他自己都有点吃惊的速度得以实现。从2017年第11届模拟炼钢挑战赛世界总决赛的冠军，到河北五一劳动奖章、河北大工匠、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人大代表……短短两年时间，一顶冠军头衔为周文涛打开了全新的世界，他不仅拥有了荣誉，更成为技术工人群体利益代言人，肩负责任与使命在国家最高议政场建言献策。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推崇技术、大力建设产业工人队伍的时代，这样的速度是不可想象的。

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精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正健步转向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为产业工人的成长成才创造了良好环境和上升通道。

毫无疑问，这是每一位技术工人都可以因坚持而改变命运的时代。

这个月初，我去新疆坐在上百位一线工人面前，分享交流国家连续出台的针对产业工人利好政策。这个时候，我在他们充满希望的神情背后，还是隐约感受到了藏在内心深处的地位困惑与成长困惑。相较于已经“浮出水面”的工匠佼佼者而言，这样的困惑或许才是产业工人最真实的心理写照。而这种现状也在催促着我们，要让《中国工人》这本拥有95年历史的杂志不断放大自己的声量，让更多一线劳动者看清并且坚定地走上那条国家为他们铺就的成长成才之路。

与中国工人的命运相伴前行，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时代使命。



时间都知道

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你无法想象，没有文字与记录，人类的精神世界该如何匮乏，中华文化又如何传承。

71年前，瘦小的张百发跟着父亲离开河北香河农村，一路步行到当时的北平城谋生。这个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穷孩子，两年后成为新中国建筑工地上的一名钢筋学徒工。

1954年，由张百发和11名青年人组成的张百发青年突击队诞生。19岁的他打着队旗转战京城，从友谊宾馆到人民大会堂，流遍辛劳的汗水，留下巍峨的建筑，最终成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被尊称为北京亚运场馆建设的功臣。

2019年7月5日凌晨，张百发在北京病世。全国劳动模范，这是这位84岁老人最珍视的荣誉，因为里面融聚着工人阶级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的初心。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7月是属于初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回顾历史中看见初心，重温初心，自然会更加清晰前行的方向。

《中国工人》是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10月创办的刊物，寻找我们的初心，必然需要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运历史。面对300位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员干部，浙江大学研究红船精神的教授，讲到了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被国民党军警乱刀砍死的细节，这让我们想到更多中国工运史上的先烈。比如，曾经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更为当年的《中国工人》写过许多重要文稿的邓中夏，1933年就义时只有39岁。45岁的工人运动先驱王荷波惨遭杀害的地点，就在距离《中国工人》杂志社不足800米远的安定门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些工运先驱的悲壮故事，是建党初期无数共产党人牺牲奉献的缩影。重温他们创造的工人运动历史，我们的初心更加清晰，我们的使命更加牢记，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定。

还是在这个7月，中国工人出版社迎来了自己建社70周年的日子。《中国工人》本期深度报道，回顾了这家服务亿万职工的出版机构从草创到根深叶茂的历程，试图展开一幅工会出版与党同行70年的历史画卷。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出版，宣告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也显示了毛泽东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清醒；《把一切献给党》的广泛传播，让中国保尔吴运铎的故事家喻户晓，感召着一代代青年投身祖国建设；《中国工会读本》用600余张珍贵图片，记录着中国工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足迹……一个个藏于显赫书籍背后的编辑故事，一处处充满沧桑和变革的岁月之痕，包裹着一代代工会出版人的不灭理想与执著追求。

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你无法想象，没有文字与记录，人类的精神世界该如何匮乏，中华文化又如何传承。当我与一位编辑探讨什么才是出版最好的时代时，他脱口而出，“现在就是出版最好的时代”。

是的，每年50万种图书出版的繁盛表达，就是最好的时代。只是，对出版人来说，与时代同频，依市场而生，不仅要有一颗拥抱真理真知和美好的火热之心，更需要拥有一颗耐得住寂寞、坚守价值判断的冷静之心。“丧与热血并存”，这是真实的编辑人的世界。

7月，张百发离开了我们，又一位全国劳动模范的故事合上了厚重的书页。

7月，我们的编辑部里来了新的年轻人，为这座鼓楼桥畔的出版大楼注入了盎然的生机。

时间都知道，初心永远在那里，使命永远在那里，信仰的灯塔永远在那里。

李健

“爱心纠缠”不停歇

城市很大，人海茫茫，来自陌生人的爱或冷漠，会激发出什么样的戏剧结果，再高深的理论都无法精确计算。

不经意间，我们办公楼的一楼门厅多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了几本户外劳动保护知识小册子、几小包茶叶和两壶热水，一个小小的户外工作者爱心驿站就这样搭起来了。

大家进进出出看在眼里，并没有激起太多涟漪。直到有一天，一位身着橘色工装的环卫工人走进来，倒了一壶热水稍作歇息后离开的背影，被偶尔路过的同事拍了下来，发到办公微信工作群里。

“感人。”

“真好。”

还有一连串竖起的大拇指符号。

对我们这样一个单位而言，搭建这样一处爱心驿站并不费力，也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偶尔进来的环卫工人，得到的不过是一杯水、片刻凉，看上去都是很细微的小事。然而，在户外劳动者享受片刻宁静歇息的同时，我们却收获了夏日里难得的内心清凉。这种素昧平生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关爱，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更是陌生人社会最有价值的温暖。

清扫街巷的环卫工人，跑了一头汗的外卖小哥，风雨无阻的快递员……这些城市生活须臾不可离的户外劳动者，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他们自己却陷入喝水难、如厕难、热饭难、歇脚难的窘境。户外工作者爱心驿站的出现，正是这个社会理应做出的善意回应。

陌生人之间的关爱总是能打动最多人的内心。就在几天前，51岁的杭州外卖骑手陆继春，在送餐途中摔成重症颅脑损伤，不幸离世。他没有送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外卖，却在离开人间后送出了自己的所有能够救人的器官。今天，它们在4个陌生人的身体里，代替陆继春好好活着。

如果不是这样一次捐赠，或许没人记得陆继春的姓名。他只是杭州980万常住人口中的一份子，只是那家外卖平台超过300万位注册骑手中的一个。他的日常，就是平均每天送出接近40份外卖，跟每一位陌生客人的交流，仅仅限于“您好”“对不起”“再见”。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当几个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后，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经综合成为整体性质，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纠缠。对人类社会而言，每个人就是这样的粒子，个体的行为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全貌，我们彼此作用彼此影响。即便是陆继春这样看上去卑微的生命，最终依然能以震撼人心的方式反哺社会。

城市很大，人海茫茫，来自陌生人的爱或冷漠，会激发出什么样的戏剧结果，再高深的理论都无法精确计算。但对他者投射了什么，却是每一个人可以自行决定的。哪怕只是一声简单的“谢谢”“辛苦了”，都能让辛苦奔波的人们有一丝温暖的欣慰。这份欣慰的后面，又会续写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无法设想，却期待良性的情感循环。

今年夏天，高温一浪接着一浪，好在已经立秋。当然，秋天到了，冬天就又要来了。夏日的一袭清凉，冬天的一隅温暖，对于户外劳动者的关怀，不会停止，还要继续。

今天下班的时候，我会在大厅的爱心驿站放一本《中国工人》。所有经过这里的户外劳动者，欢迎来我们的编辑部做客，聊一聊你的故事。



星河璀璨，筑梦家国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
因为我们跳动着一颗中国心，
共拥中国情，共筑中国梦，
中国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

从山东东营的港口出发，去往胜利油田海上钻井平台需要航行两个小时。原本以为会有些无聊，意外的是，渤海湾内，大大小小的采油平台密布，好不热闹。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薄云遮日，海上无风。海轮扎好锚，大家被软绳笼平稳地悬空吊上平台，一睹海上石油工人的工作与生活。这是中国最先进的钻井平台——“新胜利五”海洋钻井平台，空间狭窄，设施却一应俱全，生活餐食保障水平不低，只是，对工人来说，工作20天倒一个班，让海上的日子忙碌也单调。

和一位技术工人聊天，话题自然绕到了付出与收获上，那个与收入有关的数字并不惊艳，工人师傅说：“我们很多人都是油二代，对油田有感情，这样的收入已经生活得很踏实了。”

短短的采访时间很快来到尾声，回程的船上，脑海里全是平台上工人们的身影。大海常常与“茫茫”相连，而这里却有着并不逊色于陆地的繁忙，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愣愣地望着这片海域上的繁忙，思绪开始翻飞：青藏高原极地里的测绘队员、北疆林场里的护林职工、南沙岛屿上的气象“观天者”、东海之滨工厂流水线上的青春面庞、中原大地建设者黝黑的脊梁……短短的记者生涯里，我走过的、见过的、书写过的以及还未曾到达的劳动“风景”处，便是托举起这繁荣盛世最坚实的基石。那一刻，我开始理解，我们赞美劳动时常常与“磅礴伟力”这个词汇相联系的真正含义。

群星闪耀的精英之于历史进程，固然有着丰富的戏剧性影响，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蜕变的百年历史，个体劳动者汇聚起来的力量，才是最终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遑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波澜壮阔奇迹频生，无劳动，无巨变。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1949-2019:70位中国工人的家国记忆》专刊，是我们献给祖国的一份小小礼物。它是在时光的隧道里，撷取的家国故事片段；它是对一个阶级的奉献，给予的小小纪念。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中国工人的家国记忆里，家国相依，缔造奇迹。中国工人的家国故事里，写满了平凡与伟大的辩证，一瞬与永恒的哲学。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

如果这是一句疑问句，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精彩回答。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

如果这是一句反问句，相信不同的人在其语气中都会饱含着最浓的情与爱。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

因为我们跳动着一颗中国心，共拥中国情，共筑中国梦，中国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

敬万水江海，敬山峦叠翠，拜朗朗晴空，拜渺渺浩宇。星河璀璨，共筑家国，一个阶级与他的祖国，躬身共戴这举世荣光。



尽情骄傲吧！为祖国，为我们

爱国情，是种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血液里的，无须刻意记住，只需被触发引燃，便会自觉地引领着我们去捍卫、去动情、去骄傲。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祝氛围，在国庆当天达到高潮。

从前一天夜晚开始，静谧的街道便开始酝酿着欢庆的分子。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满长安街，庄严时刻正式进入倒计时。“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随着童音天籁唱响天安门广场，这场隆重庆典正式拉开帷幕。

56门礼炮70响轰鸣回荡在广场，标兵战靴踢踏在石板上发出清亮的声响，受阅战士雄姿英发，受阅机群轰动全场，花车上展示着成就，人群中孕育着希望……这里是中国，这是一个民族从筚路蓝缕终至蔚为大观的集中展示；这里是中国，这是一个国家从满目疮痍里创造出繁花似锦的浓缩呈现。70年，如果这是一篇宏大叙事的华章，那么，这一定就是她最精彩的一幕。

爱国情，是种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血液里的，无须刻意记住，只需被触发引燃，便会自觉地引领着我们去捍卫、去动情、去骄傲。

这是祖国的高光时刻。托举起这高光时刻的，始终离不开亿万人民时时刻刻的劳动付出。

为了装扮这份喜庆，花艺师郑君已经忙碌了两个多月。当百万株鲜花在长安街娇艳盛开，人们满怀热情地在花坛边拍照留念时，郑君的喜悦溢于言表；

为了献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段先军，已经奋战了4个春秋。当人们被新航站楼内充满科幻感的曲线美所折服，纷纷前来“打卡旅游”时，段先军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

为了见证这庄严而热烈的一天，全国劳模何汉明从新疆塔城出发，辗转了30多个小时，终于来到北京。观礼台上，欢呼、呐喊、激动的情绪，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这份为祖国骄傲、为祖国自豪的心情，何汉明也同样带回塔城，带回坚守在老风口的道路养护班，感染着边疆最普通的劳动者身边。

从子时开始，日晷标尺走过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十二时辰，中华大地上，无处不见劳动者的身影。他们是男人女人，他们是父亲母亲，他们是儿子女儿，他们是拥有各种各样身份的职业人，他们用勤劳的付出创造着小小家庭的美好生活，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着一份力量。正如本期呈现的劳动者十二时辰的镜头所展示的，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画面里，蕴藏着无比巨大的能量。

涓涓之流，积成江河。磅礴伟力，创造奇迹。这，或许就是劳动者的时时刻刻与祖国的高光时刻之间的内在关系吧。“献礼国庆，我在场。”这现场，是欢庆的此刻现场，也是属于亿万劳动者的每分每秒劳动现场。

尽情骄傲吧！为我们的祖国。尽情骄傲吧！为我们自己。

国是千万家

无论前路如何，当他们迎接变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们都确定地知道，一份稳稳的社会保障就在身后，一份原有企业温暖不息的支撑依旧在发挥作用。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巨变与进步，体现在哪里？

回答可以是宏大叙事的，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二，比如百姓可感可知的生活便捷、高楼林立、网络发达，比如那些让我们骄傲的神舟飞船太空飞行、蛟龙号刻下的中国深度、高铁飞驰的中国速度、奥运场上屡屡奏响的国歌时刻……

然而，在山东能源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8万多名职工面临转岗分流平稳过渡的微观故事中，我们却真切感受到另一种维度下的进步，那就是任何一种改革都首先保障普通劳动者基本利益与基本权利，即常说的“以人为本”。

洗煤厂职工尹立芳在转身成为金牌月嫂月入上万元之前，一定有过对未来不确定的忐忑；职工党红霞在萌生创业念头之前，一定有过对成败的思量。然而，无论前路如何，当他们迎接变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们都确定地知道，一份稳稳的社会保障就在身后，一份原有企业温暖不息的支撑依旧在发挥作用。

早在3年前，人社部就曾预测，仅煤炭、钢铁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涉及180万职工分流安置问题。短短3年过去，180万个尹立芳式的分流转岗故事悄然发生，180万颗或许也曾悬着的心虽有志忑却也始终有阳光相伴。政府承诺的“妥善安置”成为现实，“零震荡”的背后体现着全新发展理念的精神。

如果一种发展，需要以最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这一定不是真正的进步。宏观意义上的发展历程，可以用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三个阶段概括。微观故事里的发展，在一个社会如何对待人的基本权利上，体现着发展理念的变化与进步。从20多年前的下岗，到今天的分流，同样是工人群体面临变化，但个体所需要承担的阵痛与烈度却截然不同。当我们为宏大叙事中的数字所振奋之时，更应该为微观故事中的这种进步感到温暖和骄傲。

著名的木桶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所处水平高低，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见物不见人”的狂飙突进到脱贫攻坚不让一个人掉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确立与实践，我们所处的国家，正在一点一点补齐那些不够长的木板。毫无疑问，个体拥有物质数量的差距正在变小，当每个人上可自由追逐梦想、下可被保障大网给予安全，那个曾经因信仰而奉献牺牲的先烈们所追求憧憬的美好新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一年，又一年

独一无二的2019年，每一位努力奔跑着的人们啊，是什么让你如此拼尽全力？

不知不觉，又走到一年的终结时候。

时光如梭，年复一年，又一年不同于一年。

2019年，属于《中国工人》编辑部的时光，就在一期一期出刊的忙碌中度过。那些我们曾经投去关注的人们还好吗？

这一年，我们去了西藏那曲，体会缺氧带来的身体不适，也对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和守护青藏铁路的职工有了多一层感同身受的理解。茫茫高原，匮乏的自然物质馈赠，对应着的却是人们更为丰沛的精神世界；

这一年，我们去了渤海湾的海上采油平台，在石油职工们默默无语的一餐安静午饭里，窥得一丝丝海上作业枯燥无聊的日常寂寞。于人来说，经历大风大浪是一种考验，总是无风无浪也是一种考验，人的精神世界与什么抵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构建一个自洽而自得的世界；

这一年，我们去了南国城市佛山，与外来打工者一起，在文化宫里参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一种叫作融入融合的东西，正在这个群体中微妙地发生着化学反应，故乡与他乡的界限在变得模糊，人们的精神世界总归需要找到一个归宿；

这一年，我们的办公楼大厅里，建起了一个小小的户外工作者爱心驿站，不管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凛凛，偶遇进来歇脚喝水避寒纳凉的环卫工人、外卖小哥，都难免会暗暗地小小骄傲一下，这份爱的传递所能带来的人心向暖，持续不断。

当然，这一年，我们难过地送走了可称为“传奇工人”的劳模李斌，他所执著追求的事业在他的徒弟们手中传承，而新一年度的“大国工匠”人物又即将诞生。这是生活的如常，也是希望的相承。这一年，我们听到过守护玉龙雪山的林业职工“再艰苦也要守好家园”的旦旦誓言，也追逐过因脱口秀而一举成名的车间女工赵晓卉的世界，我们在大国工匠们的平凡坚守中探寻背后的力量之源，也在共享单车运维员老许的日常工作中窥见时代之变……

这些追寻的足迹，是沿着中国工会的视线而出发。这些带回来的故事后面，流淌着全国850万专兼职工会干部的日日付出。而这些，或许工会以外的人很少会注意到。工会人搭起的舞台上，最璀璨的从来都只是职工；工会人经年累月织就的一张扶助网和普惠网，最期待的不过是职工群众的一句肯定。

属于我们的2019年，在圣地延安，站在杨家岭上《中国工人》编辑部旧址前，95年与党同行的革命出版历程，时刻提醒着我们，正是那份坚定的初心让这本杂志顽强地在近一个世纪的沧桑流变中多次创刊、复刊。如今，带着始终不变的使命，在新的时代里再出发亦要让它熠熠生辉。

独一无二的2019年，每一位努力奔跑着的人们啊，是什么让你如此拼尽全力？

这一年，又一年，念念不忘的，矢志不渝的，必然源自内心深处的一份热爱吧。



从技术的温度到精神的力量

那些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的，始终都是人们在劳动中迸发出的伟大精神力量，这面精神的旗帜，终会历久弥新。

把拖拉机“开”上1元人民币的梁军，走了。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的逝去，引发人们对开国一代劳动模范的深情缅怀。

人们记得，1950年6月，以梁军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1959年，国产首批13台“东方红-54”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梁军第一次看到中国制造的拖拉机时，按捺不住激动，跳上“东方红”，兴奋地兜了一圈儿；2013年4月，在全国总工会的6楼会议室里，84岁高龄的梁军对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年龄大了，可我是有高级职称的拖拉机手，说不定还能开着大马力拖拉机垦荒呢……”

现在，一代巾帼奋斗不息的一生，在90岁时画上了句点。那伴随着梁军一起登上1元人民币、曾是国人心中农业机械化的形象代表的拖拉机，已经不知演进到了多少代，东方红大型拖拉机就在梁军逝世前夕，再次帮助中国一拖集团进入“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榜单。

劳动者与劳动生产工具密不可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步，为新一代的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的同时，他们也共同推动着这个国家不断向前的脚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岁末年初时，到位于安徽黄山市境内的昌景黄高铁一个标段采访。在中铁八局的这个项目部，两台机械“大家伙”威武地吸引着大家的目光。了解后得知，这是目前国内较为先进的三臂凿岩台车，可替代放炮工、风钻工在隧道掌子面施工，提高施工效率，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危险系数。唯一遗憾的是，这种设备在全国施工中的使用率还不高，设备大多依赖进口。

当记者这些年，去过不少正在施工中的隧道，也采访过不少一线劳动者。记忆深刻的是一位风钻工的手，有很多黑色的伤疤点，那是打钻时泥浆蹦出的小石子在他手上留下的永久印记。掌子面放炮更不必说，技术不过硬的，超挖欠挖带来工效低下不说，更给生产中人的安全带来极大风险。如果更多先进的凿岩台车大面积投入施工一线，这些对一线劳动者的伤害便会极大地降低。

这个状况，不禁让人想起了盾构机刚刚被引入中国的情景。2002年，北京建工从德国引进全国第一台盾构机，还亲昵地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芭芭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从低端盾构机制造到高端产品输出，已经占据全球2/3的盾构机市场份额。国产盾构机的奇迹之路，藏着中国制造崛起的秘密，也造福着千万处于施工一线的重体力劳动者。有了盾构机国产的成功先例，凿岩台车的未来想必也并不会例外。

科技水平推动装备制造的进步，装备制造的全面升级，又在反向要求劳动者的技术技能水平。这样的相互作用，小到一个行业的天翻地覆、劳动从业者的整体技能技术水平的提升，大到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备升级，这些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

梁军虽然走了，但她钟爱的拖拉机还会继续迭代，正如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之路不会停止一样。然而，那些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的，始终都是人们在劳动中迸发出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梁军这样一代代劳动模范身上不断注入新的内涵，这面精神的旗帜，终会历久弥新。



记疫·记忆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读过了那么多悲伤的故事，我们感动过那么多人的感动。疫情过后，情绪的疲惫是否会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忘记，不再提起？

提笔写这篇刊首语时，武汉封城已经26天。

疫情实时报告显示，全国累计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达到70645例，死亡1772例，治愈11230例。

每日晨起，总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打开“新型肺炎实时动态”，红着眼眶再退出去。每增加一例，就是一个家庭陷入磨难！

当然，数字的变化里，也藏着好消息——全国非湖北省份报告病例已经实现“十四连降”，神农架林区确诊病例全部出院，率先在湖北实现“清零”。

这些天，我们惊恐、紧张，我们关注、压抑，我们疲惫、期待。终于，开始有一条又一条好消息出现，总算让人重拾久违的轻松感。尽管专家判断的拐点还未到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天已经不会太久。

曙光似乎就在眼前了，复产复工的步伐让正常生活在逐渐回归，战“疫”胜利迟早会到来。当生活回归如常，当重新拥有的幸福感涌来，当赞歌响起的时候，一个一个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故事，相信都会被一一提起——

我们不该忘记，那么多医护人员勇敢挣扎在第一线，明知防护残缺从未退缩，3万余人逆行增援的悲壮，至少1716人遭受感染的惨痛，徐辉、刘智明、柳帆等不幸逝世者的名字，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丰碑；

我们不该忘记，勇敢投入保障一线抗疫的志愿者们，特别是那位志愿接送武汉医护人员而染病逝去的司机何辉，他们原本可以选择退避却挺身而出的身影，就是这个时代的平凡英雄。

历史给人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黑格尔说过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读过了那么多悲伤的故事，我们感动过那么多人的感动。疫情过后，情绪的疲惫是否会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忘记，不再提起？毕竟，17年前的非典疫情并不遥远，但我们17年来真的很少会再提起那场公共卫生危机，我们甚至忘记了那群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当年也曾像今天这样冒死赴“疫”过。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句话，在过去的26天里，也曾被自媒体文章屡屡引用。值得欣慰的是，政府迅速出台针对一线医护人员的保障政策，国家两部门直接回应符合条件的因工作感染新冠肺炎殉职人员应评定为烈士。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从灾难中吸取教训，这不仅应该是人之本能，更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必须要做的事情。记住这场疫情，更长久地记住这场疫情如何发生，如何失控，如何遏制，如何转折，记住我们曾经付出过那么惨痛的代价，记住那么多留恋人世的生命和那么多家庭的欢笑戛然而止，然后更好地在未来防范危险，应对危机，这应该成为国之本能，这也是我们可以从一场不幸的灾难中得到的唯一万幸。

2月15日，武汉下雪了。一位武汉博主说：我爸昨天复查CT，说是比之前好很多了，应该是快要出院了，这么多天，终于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

你看，每分每秒，那些数字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命，连接一个家庭，他们正在遭遇一场变故，无论是劫后余生，还是生离死别，当经历的故事变成回忆时，希望会有曾经温暖过他们的人和事，让伤痛抚平。

站在风暴中央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中，或许包含着对无常的无奈、选择面前的高贵、死别当中的无愧、勇敢背后的大爱担当。如果将他们的名字一一罗列出来，想来又会是一枚重磅催泪弹。

但我仍然希望，有一天，在某一处，那些因这场灾难而失去生命的人、那些为众人抱薪者，他们的名字会永久地镌刻在纪念碑上，时时提醒我们，敬畏自然，敬畏科学，敬畏生命，敬畏所有为同胞生命而奋战过的平凡者的伟大。



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克制是美德，更是对逝者的尊重。至少，我们不该用胜利的喜悦覆盖曾经有过的惨烈，用表彰的喜庆掩埋还未解开的谜底。

地球果然是一个村。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鏖战，3月12日，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和情况，仿佛一部电影倒带了40天重演了一遍，一切都似曾相识。就在本期杂志付印的时候，国外当日新增确诊病例4456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45486例，超过中国累计确诊人数的一半，正在经历着我们曾经的“至暗时刻”。

如此全球化的世界，哪里有什么远方的哭泣和眼前的哭泣之分。在病毒的袭击中，中国与外国，不过只存在了小小的时差而已。所以，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告诫说，现在中国疫情的结束，不再取决于国内，而是取决于国外！

对中国来说，疫情流行高峰过去，意味着正常的生活很快就会回归。大江南北，已然春风拂面。江南的花早已开，江北的芽正在抽。小区广场上，孩子们的嬉闹声渐渐增多。早晚高峰的城市，车流已经开始拥堵。毕竟，再多眼泪，再多悲伤，生活总要继续前行。

事实上，生活从不止息，而记忆却往往容易淡漠。17年前的非典疫情，我们如今又还曾记得多少？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选择实时记录，在我们还未忘记的时候，让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发生的事，立此存照。

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截取中国社会与病毒作战的40天，记录从惊醒到无措，从无助到有序，从悲恸到希望的这一段日子，尽可能描摹出方方面面的反应与行动。我们将更多视角投给普通劳动者，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抗疫物资保障线上的劳动者，他们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以最坚韧的品格扛起战疫大旗，以最朴实的劳动书写民族精神。

40天当然不是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战的全部与全貌，它只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一段艰难时光。死亡是它的沉重底色，3173条生命逝去，全国至少4万余医务工作者驰援，全国停工停产社会流动降至最低，这场代价的深远影响还未可估量。

当然，希望之光永不磨灭。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虽然灿烂又侘寂，却也成为一种象征。逆行者曾经的悲壮与决绝，同时带给过我们巨大的力量和勇气。全国60%左右的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街市上行人渐渐增多，生机就在喧闹中一点点回来了。

从非常到如常，我们要的不过就是这样的日子罢了。

当如常回来，罹难者却再也回不来了，这将成为中国社会永远的痛，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即便生活都回到了从前的模样，曾经目睹过的一切，曾经亲历过的一切，曾经的惊恐、无助和慌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消化到如常之中。

当如常回来，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完结符的到来？胜利可以是伟大的，但我们必须时时记得，一切战争的胜利中，都一层一层写满了悲剧；庆祝可以是严肃的，但我们必须永远记得，曾经有人用生命为代价，不断敲响过危险的警钟。克制是美德，更是对逝者的尊重。至少，我们不该用胜利的喜悦覆盖曾经有过的惨烈，用表彰的喜庆掩埋还未解开的谜底。

劫劫长存，生生不息。这世上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既敬既戒，惠此南国。这世上也该有不曾忘记的勇敢和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的戒律。



考验刚刚开始

对于中低收入劳动者而言，越是在困难时，越需要一份切实的帮助。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国家保障网络全面启动运转的同时，中国工会正在努力为劳动者送去温暖和关怀。

磨难当下，环球同此凉热。

截至北京时间4月15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200万例，新冠病毒更夺走了12.5万人的生命。医卫专家依然在不断发出警告，新冠病毒不会犹如17年前的非典一样快速消失，我们可能在未来的一到两年时间都要与它共同生活。

人类历史上，遭遇过不止一次疫病的大流行。尽管新冠病毒总有终结的一天，但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必须成为我们当下需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面对疫情推倒的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的“多米诺骨牌”，可能带来的另一场巨大考验。

海关总署公布，3月出口额同比数据突破外媒早先预期，只下降了3.5%，依然达到了1.29万亿元。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受疫情影响主要来自3月开始，那么，4月或二季度进出口的数据，才是让人更应该担忧的。当下，一些身处外贸行业中的劳动者已经面临着真实的就业压力。这一期《中国工人》杂志里，接受我们采访的蒋开玲每天都在担心失去自己的岗位，因为他所在的外贸鞋厂的订单正在不断被取消，今天还在一起上班的同事，或许明天就要离开。

国内消费市场的回暖依然需要时间，甚至还很漫长。疫情之下，除了游戏、网络教育等极少数行业获得爆发式增长，更多的行业都在阵痛中挣扎。只要病毒阴影不散，人际流动无法恢复常态，饭店、影院、商场等场所即便大门打开，也难再现熙攘热闹的往昔，徘徊在生死边缘的这些中小企业，便很难维护劳动者一份安稳的收入。

如此不确定性高发的年代，需要为每一个人留住长久的稳定。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劳动者而言，越是在困难时，越需要一份切实的帮助。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国家保障网络全面启动运转的同时，中国工会正在努力为劳动者送去温暖和关怀。

希望您能注意到这一期《中国工人》杂志里的那些简短的资讯。或许它们仅有寥寥数行，但一字一句都是中国工会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这一基本职责最具体的阐释。比如，全国总工会开通就业服务平台，短时间内已经有1.5万家用工企业提供5万余条用工需求；湖北工会为返岗农民工发放交通补贴、食品和防护用品；江苏省总工会宣布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

又一个“五一”就要到了，这是属于劳动者的节日，我们要像以往一样去纪念和庆祝它。不同的是，今年的“五一”节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95周年的纪念日。192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当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中明确提出：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经过95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份初心始终未曾改变。今天，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工会基本职责，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适应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

这一期的《中国工人》杂志，我们用近40页的篇幅推出纪念专题《创生1921-1925——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我们当然知道，和95年漫长的历史相比，这组专题无法详细涵盖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的所有细节，但这些“故纸堆”里默默流淌着的沸腾热血，依旧激励着今天的我们。

重读历史，再温初心。

每一时，每一刻，我们始终血脉相连，澎湃依旧。



五月的鲜花

历史承认那些
为共同目标劳
动因而自己变
得高尚的人是
伟大人物，经验
赞美那些为大
多数人带来幸
福的人是最幸
福的人。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有了长达5天的假期。因为疫情防控依然不可松懈，原本热闹的庆祝集会和游园联欢都不再举行。这样难得的安静时光，倒也让我们能够沉淀下自己的心情，重温这个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的由来，回望历史深处栩栩如生的细节。

说起来，关于劳动的历史一直就在那里，就像五月的鲜花每年都会盛开一样。譬如，八小时工作制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就离不开1922年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三年后的“五一”节，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创生的日子，这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将近4年后，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现可谓水到渠成。这样一段中国工会的沧桑历史，显然需要告诉更多的人。

5月1日，“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刚刚推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生故事，便有热心的朋友悄悄提醒我，早在1920年上海就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器工会。我明白，这位朋友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出现与其他地方和行业工会的出现混淆成了同一个概念。其实，正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联合统一的组织，中国工人运动也从各自为政迈向纵横合力，从此推动历史潮流浩荡向前。你看，经历了95年的漫长时光，历史依然就在那里，不淡不逝，影响着我们的今天，最终成为今天的样子。

在以劳动为主题的五月里，我们需要重新体味劳动之于劳动者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几乎从100天前开始，我们以大面积停工停产停止社会流动为代价，与新冠病毒进行了一场殊死斗争，如今终于吹响了全面复工复产的号角。回看那一段“史上最长的停工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内心深处重新解读劳动的价值。对于需要物质基础的个人而言，劳动是必要的生活来源，劳动意味着活着。然而，对于所有同样需要精神生存土壤的人民而言，劳动又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更是融入人的社会属性里，实现了个体与社会的紧密连接，让我们在形形色色的劳动过程中，担当起定位迥异的社会角色，在价值创造中获得精神层面的极大满足。

刚刚过去的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诞辰202周年。在劳动者备受压迫的19世纪，他用自己的思想影响着数不胜数的革命者和后继者，极富前瞻性地提出“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还在大学校园，即便成为媒体工作者，依然对于劳动带来的精神愉悦缺少足够的感受。直到参与编辑《中国工人》杂志的工作中，才逐渐和工匠、工人成为朋友，逐渐走进更多劳动者的内心世界，深切认同劳动之于劳动者的精神需求，确乎如马克思所言，终有一天会超越对物质需求的价值。

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原本“五一”前夕进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延期了。这样也好，我们可以积蕴起更多的热情与敬仰，让今年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赢得澎湃潮水一般的欢呼。它将再一次印证马克思说过的另一句话——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那些复工艰难的劳动者。比如一些外贸企业的订单正在慢慢消失，就像水流旺盛的管道逐渐收窄了水柱，从涓涓细流变成滴答水花。还有那些再也没有打开铺门的街边小店，每一处的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劳动者家庭的无助和无奈。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五月的鲜花，需要变成看得见的温暖，让所有劳动者的心中都洒满希望的光。



民间烟火与国家高度

所谓管理，本来就是在约束与释放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坦白地说，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管理者的温情，需要保留那些正在挣扎的民间烟火。

谁也没有想到，全国两会总理招待会上有关流动商贩的表态，一下子点燃了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摊经济。“地摊儿”才刚刚飞了一会儿，热热闹闹的商街夜市便鸣锣开张，绘声绘色的摆摊攻略更是一时纸贵。

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复产复工进程里，一个小小的地摊儿被从不同视角进行着诠释。从“城市温情”到“底层生活”，从“文明经营”到“民间烟火”，都是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生活压力人群的利益表达。

世界疫情蔓延不退，北京疫情死灰复燃，都在为全球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带来复杂的不确定性。一座西部城市的3.6万个流动摊贩，一夜之间新增10万人就业，这组数据显示出底层经济生态的巨大能量，让更多焦灼生计的劳动者看到了希望之光。

我们当然知道，还有很多对地摊经济的不同声音，有些理由也不无道理。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复杂性就是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的常态。人们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不同城市的特点和定位难免迥异，那种一刀切式取消流动摊贩的管理思维早被诟病。这样看来，撕破地摊经济这一窄小的切口，显然是清除管理沉疴、激活民间能量的艰难一步。疫情拖累经济的倒逼之下，如何在保证公众健康和城市秩序的前提下，让社会经济运行拥有更生动的民生温度，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勇气和智慧，更考验着他们有没有把民间疾苦真正放在心头的良知和天职。

所谓管理，本来就是在约束与释放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坦白地说，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管理者的温情，需要保留那些正在挣扎的民间烟火。在一位电影院员工的讲述中，为了随时迎接影院复工，她和工友一次又一次给影厅消毒，把保持安全间隔的座位用胶带封住，但却始终等不到重新开业的许可。她哭着问，几个小时航程的飞机可以照常售票，两个小时的电影为什么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焦灼发问，也是全国上百万影院员工共同的疑问。这群人面临的困顿，也同样需要管理者投入更多温情的目光。

说起平衡的艺术，让我想到8位登顶珠峰的高程测量登山队的队员。150分钟的停留，架设在峰顶的觐标，是他们在5月27日把中国高度亮相给全世界，创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的新纪录。3个月后，最精确的珠峰高度将被他们重新“定义”。

每一次成功登顶的高程测量，都是平衡艺术的成功。从选拔到集训，从大本营集结到登上峰顶，每一位成功登顶的队员背后，都有众多无名之辈的默默付出。其中来自国测一大队的精兵强将，在个人无法登顶的遗憾与集体成功登顶的荣耀之间，平衡着放弃小我与成就大我的辩证关系。有的人甚至不得不在突然而至的家庭变故面前，做出可能余生懊恼的艰难选择。然而，当个体内心的风暴归于平静，闪耀在他们眼中的无畏之光，依旧紧紧盯住峰顶的目标。

一年以前，我曾经去西藏采访过国测一大队。他们在祖国的山川大地奔波，日月星辰见证着每一时的坚持和每一刻的付出。这是中国工人的高度，也是中国的高度。他们和那些地摊经济中起早贪黑的劳作者一道，让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登高峰者，我们要送去欢呼和赞美。摆地摊者，我们要送去温暖和关怀。这样，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有小小的平凡梦想在发芽，都会有让人流连忘返的民间烟火。

生于斯，长于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民间烟火里的平凡梦想，就这样支撑起中国的高度。

李健

信心比金子更宝贵

与其说我们关心数字，关心有关市场的一切，不如说，我们真正关心和在意的是构成这一切的人们。那些与经济相关的数字和现象背后，是一个个像吴桂春一样生动的个体。

农民工吴桂春最近上了两次热搜——

第一次，因为疫情影响工作，准备回老家吴桂春，临走前到东莞图书馆退读者证时写了一则留言，“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这段留言被上传网络后感动全网，吴桂春也上了热搜。因为热爱读书，他很快便拥有了一份新工作，留在了东莞。

第二次，农民工吴桂春热爱阅读的故事，成为东莞这座以“世界工厂”闻名的城市文化建设成效的一种象征，他被东莞市总工会聘请为东莞职工书屋公益代言人，再次刷屏网络。

在东莞，有太多像吴桂春一样的“候鸟”，每年在老家和打工城市之间来回漂泊。而让吴桂春喜欢上东莞的理由却很简单——这里“有厉害的图书馆”。的确，文化可以涵养一个人，也可以涵养一座城。遍布在“世界工厂”里的653个图书馆，正在改变着这里万千像吴桂春一样的人们，而这些人们也在一点点改变着这座城市。东莞文化新城的发展成果，就显现在一个又一个吴桂春的身影里。

吴桂春的“被”留下，让人感觉温暖。这场持久而此起彼伏的疫情，影响着太多人的生活，当社会投射给吴桂春这样偶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小人物以如潮涌般的关注和善意时，还有太多像他一样的群体，期待困境被看到、被改变。至少，吴桂春的生活转机给予更多还未能顺利开工的人们以希望，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会抛下任何一个困顿中的人。

希望会驱走所有悲伤。停工半年之久的电影院，终于等来“复工令”。在全国各地电影院复工紧锣密鼓进行时，成都和平电影院率先开启网络预售，短短几个小时，复工当天的电影票全部售罄。这样的“业绩”，是全国影院从业者期盼已久的，它像一剂强心针，为电影从业者带来重见往日繁荣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在北京疫情响应级别降至3级当天，进出北京机票搜索量瞬间暴涨7倍中，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信心，在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3.2%的数字中，更能感受得到……中国经济在“深蹲”之后的“复起”，显示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也值得我们相信，“上扬”就在进行中。

与其说我们关心数字，关心有关市场的一切，不如说，我们真正关心和在意的是构成这一切的人们。那些与经济相关的数字和现象背后，是一个个像吴桂春一样生动的个体。如果我们像遇见吴桂春一样去遇见每个人，那么就能在每个人的真实故事里，看到一些鼓舞人心的感动。这一切，就像隧道尽头出现的亮光，带给人希望和信心。

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认真地把日子过下去吧，满怀信心，即便未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还会出现，但只要生活的信心不灭，希望的光就能照亮前方的路。



第三种面貌

在公众娱乐生活里走红的鹅厂脱口秀大会，她又成为观察工人阶级时代影响的一扇窗口。人们送给她的每一次掌声，都是中国社会向工人和工厂生活的致敬。

最近，《中国工人》被人“吐槽”了。

一年以前，腾讯视频播出的《脱口秀大会》节目里，来自广东一家汽车工厂的脱口秀演员赵晓卉，穿着富有个性标志的连体裤，把一幕又一幕车间生活的喜剧讲述出来。戏说“工友父亲”的幽默，向往“车间爱情”的心情，这些源自工厂生活题材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粉丝，也吸引了《中国工人》记者的采访。

今年7月，赵晓卉在新一季《脱口秀大会》突围赛表演时，将这次访问编进自己的新段子中——“我很羡慕其他演员，总能接到时尚杂志的采访，拍大片、聊什么喜剧的边界……我也接了一个采访”，有意片刻停顿后，她说出了“《中国工人》杂志”。显然，这个埋下的“梗”炸响了，观众一片笑声。

采访同行的是时尚杂志，采访自己的却是《中国工人》，这种反差鲜明的“自黑”形成了娱乐场上的“笑点”，流露出表演者的自信，也暗含着几分酸楚和无奈。在太多人的潜意识里，“工人”和“工厂”的人与事，与“时尚”和“高级”相隔万里。动辄上亿次播放的综艺语境中，猝然出现这样的“工”字标签概念，不仅带来出乎意料的哄然一笑，也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柔弱角落。

这一次被“吐槽”，更让我们坚定了当初采访赵晓卉的初衷。对我而言，将近2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始终是与“工人”和“工厂”相连的，因为这些，我清楚地知道公共话语中的“工人”和“工厂”所承受的认知分裂。一方面，他们是主流宣传语境中的中流砥柱，有大批值得称颂的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社会视角中的“失落人群”，被时代甩下过，被流水线工具化过，被同情过也被忽视过。尤其是后一种“描摹”，往往既不能完全认同，但又难免无力反驳。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车间女工”赵晓卉。在她的段子里，工人故事和工厂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洋溢着另一种生动和真实。这样的故事和生活与完全的正能量或充满晦涩的负能量完全不同，它促使我们从更加普通而平等的角度，去感知今天的工厂和工人。因此，《中国工人》杂志记者对赵晓卉的采访，不仅仅是报道一位喜爱脱口秀的劳动者，更重要的是试图探讨和传递工人、工厂在大众语系中的形象塑造。或许这样的初衷过于理想化，但我们依旧希望在《中国工人》所展现的时代视野里，工人和工厂的生活能够被描摹出更真实的第三种面貌。

毫无疑问，赵晓卉只是亿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因为在公众娱乐生活里走红的鹅厂脱口秀大会，她又成为观察工人阶级时代影响的一扇窗口。人们送给她的每一次掌声，都是中国社会向工人故事和工厂生活的致敬。作为一本属于中国工人的杂志，《中国工人》的主角永远是缔造大国重器的荣光一代，永远是中国制造流水线上的辛劳面孔，永远是匆匆奔跑时刻不歇的外卖骑手，永远是默默坚守着劳动岗位的每一个人。我们最大的媒体理想，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呈现更多元、更真实的中国工人形象，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有其所有，得其所得，被平等相拥，被温柔以待。



算法时代的劳动焦虑

和当年万众齐讨富士康的尖锐声音相比，平台企业道德耻感的低下令人齿冷，监管部门出手整治的觉醒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震慑。

中国的700万外卖骑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被关注。

网络热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仍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反而引来更多的专业学者相继介入，这在话题频繁更迭的公共舆论场里并不常见。

平台算法“压榨”、骑手50分钟违章6次、上海每2.5天就有一名外卖员伤亡……这些新近引爆舆论的事实和问题，从外卖骑手这一新兴就业群体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但是，在AI技术越发成熟的今天，外卖骑手试图寻求喘息的灰色地带被挤压得越发稀少，冰冷的数据直接连着严厉的惩罚，一个新兴就业群体的劳动焦虑终于升级成算法时代的公众焦虑。

面对外卖骑手的困境，有的声音把“算法”当成了“背锅侠”，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把问题的核心从价值观淡化成了信息技术。不消须臾，理智的反对声音就已经出现——技术没有价值观，但技术背后的人必须要有。在花哨的新词汇新概念背后，逃不脱的还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张与保护。

平台经济的兴起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并不会彻底解决一直处在合法与非法边缘的劳动权益问题。在“算法”的“压榨”下，外卖骑手头顶高悬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街头狂奔，不得不把自己一次又一次置身于危险的隐患之中。与政府高度关注的工厂安全生产隐患相比，它们并没有过多的差别，都是在用更大的事故几率“兑换”效率的提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唯一不同的是，工厂没有办法推脱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更没有办法逃脱严厉的法律惩罚，互联网平台却可以做到这一切，仅仅承担相比起来微乎其微的责任，有时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外卖骑手的每一次“生产事故”，都是这些奔忙求生者自己的疏漏和过错。

一方面是门槛聊胜于无的就业大门让外卖骑手几乎找不到个人的存在感，另一方面是平台寡头霸占着“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如果再加上劳动法律、政府管理、商业伦理道德这样的第三方约束既低效又散漫，最终使这场有关互联网时代劳动权益的博弈变得毫无悬念。就像在这场有关外卖骑手困守系统的讨论中，媒体学者的批评洞察深邃，平台企业的表态却轻描淡写，最能强硬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府权力，反而有些欲说还休。

84年前，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在他的代表作《摩登时代》中，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现了工业初时代的工人生活，让人们记住了单调重复的机械作业导致工人患上精神病的场景。10年前，富士康员工“××连跳”悲剧的发生，显露出劳动者真实生活的残酷的一面。10年后的今天，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化过程中、平台经济浪潮下外卖骑手的困境，几乎就是当年流水线工人无奈挣扎的翻版重演。但是，和当年万众齐讨富士康的尖锐声音相比，平台企业道德耻感的低下令人齿冷，监管部门出手整治的觉醒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震慑。

在媒体的描摹里，如今的外卖平台巨头的那位创始人，曾经也有过温暖芸芸众生的情怀。他看着北京五道口的熙攘人流这样说：“做互联网创业的人，很少考虑怎么去帮助这些人，这些普罗大众。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机会。”今天，属于创始人和资本的机会变成了漂亮的财报，当初帮助普通劳动者改变命运的情怀，还有多少余温？

尽管舆论场里热闹非凡，骑手与平台，这场数字时代的劳动博弈，胜败结果显然毫无悬念。但是，在席卷社会生活的信息时代大潮里，如果无人能够解救“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我们奋力奔跑的目的和意义，又在哪里？



我们的幸福

如果岁月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深深地打上时代特色烙印的劳动模范人物，就是这条河流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谱系不断丰富记忆锚点。

假如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五年一度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肯定早就结束了。在充满不确定的这一年，原本应该5月盛开的鲜花，或许将在深秋过后才能开遍原野。这样也好，因为涌现出那么多在抗疫一线经历生死考验的劳动榜样，整个中国社会都会把最真诚的敬意献给今年佩戴上劳模奖章的劳动者。

劳模大会是对劳动者的最高礼赞，也是对社会价值坐标系的又一次重申——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劳动，早已写进它一路走来的历史中，镶嵌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制度里。

87年前的春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召开了一次劳模表彰大会，5天的会期里，领袖和劳动者心手相连，传播模范精神，推广生产经验。正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预演”一样，1933年的这次劳模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劳模表彰制度的起点。

历史是一道曲曲弯弯的时间长河，不变的是浩瀚星海的灿烂光芒。从1950年到1960年这10年间，4次劳模群英会推出的时代领跑者，直到今天依然是鼓舞中国社会的精神财富。从孟泰、时传祥、王进喜、吴运铎、李四光、赵梦桃、郝建秀到倪志福，他们的精神代代相传，深深印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从改革开放的春天开始，劳模评选制度日臻完善。1980年，《劳动模范工作暂行条例（试行）》发布；1982年，奖励劳模写入宪法；1989年起，全国劳动模范评选表彰工作基本形成每五年一次的固定届次，随着时间推移，进城务工人员、民营企业家等群体又逐步进入劳模评选范围。这些时光留下的足迹，构建并延续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坐标。

劳模评选活动，伴随着生产活动而生。劳动模范的评选和表彰，也与时代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如果岁月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深深地打上时代特色烙印的劳动模范人物，就是这条河流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谱系不断丰富记忆锚点。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自我奉献牺牲的精神，他们的面孔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相亲相爱相扶的面孔。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中国。

5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回荡在人民大会堂——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从那时到现在，劳动之光闪耀中华大地。高铁加速发展，大飞机启航蓝天，“天眼”探秘光年之外……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在劳动者的手中一点点建设起来。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到工匠精神，这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丰富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涵，把每一位平凡岗位上的无名之辈，都变成了用脊梁撑起共和国厚重基石的人。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说过，将无法实现之事付诸实现，正是非凡毅力的真正的标志。对于《中国工人》杂志而言，我们96年的沧桑历史，就是始终与中国社会亿万劳动者相随而行的历史，就是记录每个时代劳动榜样的理想、坚守、热情、奉献和创造的历史。陪伴着这些最伟大的力量成长，就是我们的幸福。



记忆里，憧憬中

记忆里的工人文化宫是黑白的，满满的时代气息。憧憬中的工人文化宫是彩色的，盛满了工会干部的情怀。

“我们工人文化宫见吧。”

和三五好友相约，学舞蹈，打灯谜，参加各类技能培训，陪伴孩子课外辅导……几代人的记忆里，工人文化宫都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尽管场地或许大小各异，但在文化场所匮乏的年代，能够昂首走进工人文化宫的大门，不能不说是“工人老大哥”的骄傲。

岁月轮转，市场经济浪潮扑面而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城市生活渐趋丰富的同时，记忆里热闹的工人文化宫却渐渐陈旧衰败。即便有些工人文化宫照样霓虹闪烁，里面的商业气息却越来越浓，从高档餐饮、贵族按摩到豪华商场，昂贵消费的门槛拦住了工薪阶层，“既不见工人，更没有文化”。有的城市的工人文化宫，甚至被拆除用作地产开发，再也找不到曾经的踪影。工人们说，没有工人文化宫的日子，没有滋味，不是滋味。

如此尴尬的状况，不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让工人文化宫的管理经营者如芒在背，突破政策窠臼的呼声此起彼伏。“以文为主、多业助文”，成为工人文化宫总体发展思路，并且延续了长达20余年的时间。由此开始，困难重重的工人文化宫事业渐有亮色，“以商养文”增强了“造血”功能，一些老牌工人文化宫恢复了职工文化活动，重新为劳动者打开大门。然而，作为一项服务职工的公益服务，工人文化宫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没有源头上的根本解决，仅有社会合作的运营市场化，肯定走不快，当然也走不远。

终结迷茫的那一刻，出现在5年前的夏天。2016年8月，全国总工会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工人文化宫管理的意见》，要求工人文化宫坚持公益性发展方向。3个多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工人文化宫明确了法律地位和政府保障责任。工人文化宫的改革大潮动地而来，如同一池活水，在各地工会的各场场馆激荡起变革的浪花。

今天，在百度搜索输入关键词“工人文化宫”，瞬间呈现的2140万个网页中，有了太多工人文化宫“重装归来”的消息。短短5年时间，各级工会组织坚守公益性的前提，强化人员和资金保障，曾经深受工人欢迎的“学校和乐园”回来了，曾经冷清凋落的工人文化宫“活”起来了。工人们说，“我们的生活又开始变得有滋有味”。

这一期《中国工人》的封面报道，选择了工人文化宫。我们试图用文字和影像表达出足够的关注，让工人文化宫进入人们的视野。面对全新的社会生活场景，今天的工人文化宫应当有什么特点？最受职工喜欢的工人文化宫是什么模样？应该给新生代劳动者留下怎样的工人文化宫记忆？一个又一个“时代之问”，留给每一位倾力工人文化宫改革发展的工会人。

记忆里的工人文化宫是黑白的，满满的时代气息。

憧憬中的工人文化宫是彩色的，盛满了工会人的情怀。

从鲜明的身份认同到趋弱的群体观念，从情趣相同的文化需求到更具特性的生活格调，今天的劳动者正在被时代的变化所改变，正在被社会的变迁所改变。依然没有变化——并且永远不会变化的是，工人文化宫对于劳动者的存在意义，无论是它的引导，它的感染，它的启发，都在塑造着社会中坚力量的文化底色。

工人文化宫改革发展的蓬勃生机，让未来的场景充满迷人的想象。



改革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

中国工会需要以锐意改革进取的新姿态，把准改革发展之脉，谋定守正出新之策，再启攻坚突破之局，善为精准发力之举，继续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同频共振。

每年“五一”前的“劳动群星闪耀时”，这一次推迟到北京的早冬，给渐增寒意的日子带来了炽热的力量。就像5年前一样，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依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最高规格。当《义勇军进行曲》在人民大会堂响起的那一刻，1689位全国劳动模范和804位全国先进工作者名至实归，接受着整个中国的致敬和欢呼。

“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功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劳动模范的最高赞赏。在全文4000多字的重要讲话里，先后9次出现的“改革”依然是振奋人心的主题。从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到队伍壮大，这些与改革相连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措施，继续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寄予殷殷期望。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让这样的社会风尚真正蔚然成风，离不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获得真正的尊重，离不开亿万劳动者凭借自己的双手拥有美好的生活。这就意味着面对“明天谁来当工人”的尴尬，我们其实已经别无选择，“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更不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唯有改革，才能让劳动的价值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为劳动者的未来留下充满荣光的希望。

与产业工人相连的“改革”，发轫于2017年2月。其时，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一时之间，“产改”成为热词，“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成为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目标。然而，改革的字典里，从来都没有“容易”两个字。打破既有格局必然遇到阻力，调整既有利益必然遇到难点，产业工人队伍的利益分配、素质能力和政治待遇，更是牵动着方方面面。或许，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都是对改革推进者的提醒和告诫。

这一期的《中国工人》，我们用24个页码的重磅篇幅“解码江苏产改”。从苏北到苏南，4路记者分赴南京、徐州、泰州、扬州、无锡、南通、苏州，行走在工业园里，驻留在流水线旁，观察出现在产业工人生产和生活中的点滴变化。我们试图通过宏观改革布局与微观改革成效两把标尺，努力客观描述江苏工会所经历的阵痛与领悟，为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分享“江苏经验”，提供“江苏模式”，贡献“江苏智慧”。

行走江苏大地的采访，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充盈在产业工人心中的获得感，更是那些为产改殚精竭虑的“燃灯者”。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省级产改试点之一，江苏工会参与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彰显决心，实施改革的方式与路线鲜活适用。它以对产改意义的生动宣讲，点燃广泛参与、群体呼应的改革热情；它以推进点线面的全方位试点，破局规则不清、难题缠绕的改革困境；它以问题导向促动改革的务实之风，发酵星火燎原、层层传递的改革成效。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中国工会需要以锐意改革进取的新姿态，把准改革发展之脉，谋定守正出新之策，再启攻坚突破之局，善为精准发力之举，继续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同频共振。

绵绵不息，久久为功。改革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

2021，你好。

2020，再见。





2021 星辰大海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
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人为目的，并非工具

人，永远只应成为发展的目的，而非发展的工具。这是理想，也应该成为共识。

2020年12月29日，23岁的拼多多新疆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半下班途中猝死，没有等到每一位年轻人都热盼的新年。

7天后，拼多多官方社交账号“谁不是拿命换钱”的冷漠发声，彻底激怒大众，引发“舆论海啸”。无论这一句辩白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苦加班久矣”的社会情绪终于有了一次集中释放，一个青春生命的消逝把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话题推向焦点。

搜索新闻，以“996”和“过劳死”为关键词的资讯超过100万条。在一家全球声名显赫的超级公司，“员工22个月无休猝死”；一天配送48单的外卖骑手，家属指称“过度劳累独自在出租屋去世”……类似这样的惨痛个案，让人们有理由怀疑我国每年60万猝死死者中，究竟有多少人可以和“过劳死”联系起来，发出“时代必然还是法制乏力”的诘问。

统计显示，从2019年开始，第三产业已经在中国产业结构中跃居第一，GDP占比达54.3%。这一产业的从业者身份繁杂，既有站在经济潮头的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也有伴随新经济业态而生的快递小哥。表面上看，有的人出入于俯瞰城市的豪华大厦，有的人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巷尾街头，但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往往是相同的。一些管理极端的企业无视国家法规，恣意漠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致使类似“深夜下班路上猝死”的悲剧接连发生。尽管今天不再是制造业独领风光的时代，“富士康14连跳”的悲剧却没有终结，因为劳动者和资本的天平依然需要真正的平衡，依然需要强大的力量去约束资本的欲望。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向拼多多这样的互联网服务企业。这些依托于手机移动端和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最终还是离不开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完成“最后一公里”，其中就包括那位猝死的拼多多员工。从制造工厂到互联网公司，劳动者面对资本时的弱势和无助少有区别，新经济时代的资本甚至用更具鼓动性的所谓“企业文化”，为漠视劳动法规的“企业规章”披上“员工自愿”的合法外衣。上市敲钟的资本盛宴，难免隐含着畸形“加班文化”之下，劳动者付出的生命和健康代价。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盛行一时，企业却不能用慈善捐助去代替对员工劳动权益的尊重。标准工时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惠民成果，已经融入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任由某些互联网巨头企业随便践踏。我们需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生活繁荣富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奋斗的时代里，企业之间的竞争狂奔可以把忽略个体权益当成垫脚石。如果资本的欲望出现失去控制的苗头，我们就必须同时用道德和法治的力量为它勒上缰绳。

2006年7月29日，沃尔玛在中国的首家工会组织在福建泉州诞生。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这家向来抵制工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低下了高傲的头，以平均每天一家的速度在各地分店成立工会。与沃尔玛相比，拼多多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没有任何底气可以挑衅法律。它们如果坚持继续这样做的话，劳动者最终会“用脚投票”做出取舍，劳动执法者也一定会变得更加刚硬起来。

对于正在创造自己生活的年轻员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但绝对不会是“拿命换钱”。梦想实现的感觉，本就该是幸福的滋味。

人，永远只应成为发展的目的，而非发展的工具。这是理想，也应该成为共识。

当它真正成为共识的那一天，漠视共识的企业必将成为历史的过客，劳动者的生活一定会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唯有勇气

在自然科学的世界里,再一次重新认识到需要尊重自然;在社会人文的历史中,再一次发现人类面对绝望拼死抗争的宝贵品质。

辛丑年的春节,因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需要变得不寻常起来。政府号召,百姓响应,这个从虞舜兴起延续的岁时节日,有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打开方式。那些就地过年的“原乡人”,少了很多老家亲友拜年团聚的热闹,却有了七天的长假去培养对于工作地的情感认同,这就是哲学里说的“事物总有两面性”吧。

对于我们而言,这已经是第二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事实上,除了没有那么声势浩大的人口流动,今年的除夕光景充满了平安与祥和。只有出现在央视春晚直播里的抗疫医护人员照片墙,才让人想起我们付出过的艰辛与苦难。

去年的除夕,央视春晚像往年一样的太平喜庆,在猝然而来的险恶疫情面前尴尬失色。那一夜,电视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武汉已经“封城”,用鲜血写下请愿书的白衣天使正在紧急集结,运送救援物资的空军飞机穿梭在疫区上空。

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中国社会不得不放弃所有的正常秩序,不顾一切地与病毒赛跑。那一夜,多少泪水交织着责任,多少恐惧伴随着勇气,为那些被病毒阴霾惊恐颤栗的人们,送去一束照亮未来的光。从此开始,一批又一批平凡英雄挺身而出,一群又一群无名之辈默默奉献,一道全民抗疫的坚强防线坚不可摧。

从抵御到抗击,从阶段性胜利到接受与之共存,病毒的传播无意间成就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民科普。我们学着改变生活方式,我们开始适应新的社交习惯,我们从恐惧中走出来,开始尝试学习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翘首以待科学与技术再次发挥拯救世界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免费核酸检测,一轮又一轮疫苗免费接种,都让我们的勇气变得更有底气!

从恐惧到出击,从赞美英雄到痛击偏见,新冠病毒的传播又一次成为检验人类文明的试金石。正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敏锐洞察到的一样,瘟疫会改变社会,包括丧葬习俗和宗教仪式,更包括法律与道德。

我们解读这一次带来太多痛苦和死亡的全球超级疫情,必然离不开两种维度——在自然科学的世界里,再一次重新认识到需要尊重自然;在社会人文的历史中,再一次发现人类面对绝望拼死抗争的宝贵品质。如果科技注定是一场智者个体对人类群体的拯救,那么,在科技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前,平凡之辈赴汤蹈火的巨大勇气更值得被赞美,更值得被永远铭记。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在抗击新冠病毒一周年之际,这一期《中国工人》推出《战疫这一年》特刊,通过“记疫”“改变”“共存”“希望”四幕历史,全景回顾中国社会刚刚经历的365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希望用人类最传统的纸张印刷方式,真实记录那些在死亡威胁面前挺身而出的面孔,向那些拥有向死求生勇气和品质的无名之辈致敬!

塞内加说过,勇气通往天堂,怯弱通往地狱。塞万提斯则说,有了勇气便能粉碎厄运。蒙田更是认为,在全部的美德之中,最强大、最慷慨、最自豪的,是真正的勇敢。在人类的历史智慧之中,勇气一直在改变着人类的命运。

这一次,勇气改变了中国。

让我们带着勇气出发,哪怕未来依然需要面对大自然的磨难。

让我们时刻感恩生活,赤诚勇敢,爱的人,都喜乐如常,盼的事,都归于心上。

“站出来”

即便在诉求表达更加便捷的信息化时代，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依然需要工会组织“站出来”，实现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效表达和强力支撑。

舆论场里，从不忽视关注劳动者的声音。全国两会的参政议政场，更是如此。一条来自政协委员“对一些企业超时加班进行监管”的建议，便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这样的问题持续出现，在诸多行业中以互联网企业尤为明显。倒在新年钟声之前的那位拼多多加班女员工，显然是畸形加班文化的牺牲品。

超时加班成为社会痛点，它对劳动者经济权益和健康权益的侵害，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就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在代表团讨论中直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对这些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陈刚的这一发言，最早发布在北京官方新媒体“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就在我们这一期杂志发稿时，这一条短视频获得的“点赞”，至少高出同时发布的其他“两会同期声”6倍以上，转发量更是达到18倍。社会大众对于工会“站出来”的支持和期盼，由此可见一斑。即便在诉求表达更加便捷的信息化时代，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依然需要工会组织“站出来”，实现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效表达和强力支撑。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这是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工会曾经一次又一次“站出来”，以亿万职工“娘家人”的姿态，成为那些一时遭遇工作和生活困境的劳动者的“保护神”。“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这不仅仅是28年前工会送温暖活动的主旨，更由此衍生出“送温暖工程”，一直延续到今天。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每一个温暖的细节都会被沉淀下来，留在历史的深处，默默记录着曾经的那份柔情。打开搜索网站，键入“饺子+春节+工会”，能够查找到中华全国总工会2002年发出的一份通知，新闻报道的主题是“决不让特困职工因生活过不去发生意外”。这样的表述，显然有着当时的特殊事态，“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帮助人”的定位，则显示出一个“站出来”的工会形象。

19年后再看这份通知，让人动容的是“保证每一户特困职工家庭过年都能吃上饺子”这一庄重承诺。和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套话连篇的文牍相比，关于饺子的19个字平实无华，既不排比，也不铺陈，却让我们在时光穿梭那么久以后，依然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工会坚定而温暖的意志。老工会们都记得，就是在那一年，全国各地工会公布了热线电话，在烟花璀璨的除夕，工会干部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带上饺子赶到那些有需要的特困职工家中。这样的一幕，有多少温暖，就有多少力量。

如今，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工会参与城市精准扶贫的成果斐然，不再需要大年夜去送饺子了。但是，工会“站出来”的使命和责任依然还在，劳动者期待工会为自己仗义发声的目光和需求依然还在。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剧了劳动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深度关注并积极维护互联网衍生职业者的合法权益，需要中国工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因地制宜地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服务机制，让工会的心和劳动者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这是数千万互联网衍生职业者的寄望。

这也是你的寄望，我的寄望，亿万劳动者的寄望。



星辰大海

迄今评选出的3万多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汇成一道熠熠生辉的璀璨星河。正是在他们的榜样感召下，更多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聚合起来，改变山河，创造世界。

北京天安门东侧，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太庙，这个五一节成为劳动群星璀璨生辉的地方。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百年劳模图片展，浓缩了118位劳动模范奉献生命的时光印记，静静地接受着参观者的敬仰和尊重。

与故宫一道红墙相隔，太庙的人流远远比不上那边的熙熙攘攘。然而，从那些定格历史瞬间的图片里，人们却获取了更多的精神力量。在展览结束的展厅位置，主办者细心地放置了一本“留言簿”，上面写满了不同字迹的感动与感慨——

“向共和国的劳动功勋致敬！”

“劳动者是创造世界的英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最光荣！”

“加油，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们！”

……

所有这些留言都是自发的，来自那些被榜样精神深深打动的内心。我能够想象出来，促使他们——职工、学生和孩子——写下这些留言的，是那些在平凡岗位默默攀登山峰、跨越河流的劳动身影。我还能够想象出来，当他们走出太庙大门的时候，一定已经悄悄注满了前行的信心和勇气，要在人生之路上成为事业的强者。

能够为这次百名劳模图片展做一些事情，让《中国工人》与有荣焉。整个展览最终遴选出的118位榜样人物，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百年历程。118个人的故事，共同汇聚成中华民族自立图强的奋斗历史；118个人的面孔，清晰印刻着时代浪潮奔流涌动的脉络方向。主办方希冀通过这些至今感动中国的名字和影像，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与党同行、栉风沐雨、开创伟业的壮阔画卷，展现出亿万劳动人民“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的肺腑心声。

在太庙的这次展览，浓缩着中国劳动模范表彰制度的发展沿革。1934年，劳动模范的称号首次在中央苏区的生产实践中出现，那些第一次接受表彰的优秀劳动者，每人得到了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9年以后，习仲勋、王震等22人当选劳动英雄，每人获得一份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奖状，奖品则是一条毛毯。到了今天，劳动模范获得的物质奖励已经是真金白银，但比不断增加的奖金更有价值的还是那枚金光闪闪的奖章。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中国劳动模范表彰制度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实现宏图伟业的历史，就是亿万劳动人民把真干作为本分、把实干作为责任、把苦干作为追求的历史。迄今评选出的3万多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汇成一道熠熠生辉的璀璨星河。在低矮潮湿的昏暗巷道里，他们是集聚光亮的黑色粉尘；在杳无人烟的苍茫林海里，他们是孕育希望的伐木号子；在漂洋过海的漫长航线上，他们是期望美好的思乡情感……正是在他们的榜样感召下，更多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聚合起来，改变山河，创造世界。

红五月的这一期《中国工人》，我们用64页的篇幅全景展现百名劳模图片展的内容，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向118位劳动模范致敬，向所有在劳动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无名之辈致敬。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对未来的最好期待，就是担当新的使命。

梦想为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奋斗作桨，这是我们的时代。



历史的细节

时间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却将历史的细节悄悄地沉淀下来。重温党的早期岁月，便会发现这些细节在角落里散放着智慧的光，触摸它，感受它，顿悟之感油然而生。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了。

在浩瀚无边的历史中，100年或许只是惊鸿一瞬。但是对于中国大地而言，中国共产党用100年时间重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德国小镇特里尔的一粒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伴随着红色的激流汇入东方的黄土地，革命的巨澜托举起震惊世界的东方日出。

有人曾经把我们的党称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从第一批50余位共产党员起步，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建立起属于人民的一个新国家。就连挑剔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时间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却将历史的细节悄悄地沉淀下来。重温党的早期岁月，便会发现这些细节在角落里散放着智慧的光，触摸它，感受它，顿悟之感油然而生。

90年前的红色苏区，戎马倥偬的毛泽东“三进才溪”，到底层的社会去探寻政权治理的“密码”。他来到乡里的列宁堂，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围坐在长桌旁，每一次调查会都开得欢声笑语。其后的一个初冬冷夜，一盏马灯陪伴毛泽东伏案疾书，写出了《才溪乡调查》。

如果没有真正彻底的蹲点调查，断然不会有这样详实的数据——“才溪乡16至55岁男子共1310人，出外参加红军的多达1011人。”当然，更不会有这样智慧的论断——“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毛泽东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

10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程，为的是始终恪守历久弥坚的初心，譬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再譬如“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就在这期《中国工人》即将付印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正在策划采访分散在15个地区蹲点调研的全总机关干部。从5月中旬开始，50名工会干部背起行囊，离开北京长安街边的机关大楼，走向最基层的区乡镇街工会组织。他们的使命，就是到基层寻找经验和解决办法，突破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他们的担当，就是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变成“浮桥”或是“断桥”，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变成“空中飘带”。

如今，这些来自全总机关的工会干部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劳动人民之中。在革命老区，他们调研新就业群体的生存状态；在西部古都，他们为促动跨国公司建立工会殚精竭虑；在改革开放前沿，他们努力面对不同利益的纠结交汇，不同观念的激荡交锋。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阵痛与欣喜、僵持与突破之中，探悟厚植工会根基的现实逻辑和实践路径。

7年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过汉代王充《论衡》里的名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借以表达告诫，为政者要把自己融入最底层的百姓。从这一意义而言，正在基层蹲点的50位全总机关工会干部，正在书写着50份传承党的调查研究传统的全新答卷。

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工人》杂志也已经问世97周年了。1924年那份创刊号的朴拙样子，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里的谆谆勉励，延安杨家岭东山上的《中国工人》编辑部旧址，都让我们今天这支年轻的编辑队伍，时刻感受到沉重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

请允许我们为党送上赤诚的祝福。

时代不会辜负我们，我们同样也不会辜负时代。



改革的水位

中国工会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持续改革,把已经被实践印证有效的组织建设和服务方式,从标准劳动关系群体向非标准劳动关系群体扩展,才能让“站出来”的结果遍地开花。

中国的每一天,都是改革的新一天。

2020年8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正式公布了“2亿”这个数字。

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李忠直言灵活就业是解决低收入群体就业的重要途径,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规模在2亿人左右。

2021年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审议现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表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2021年7月12日,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美团(上海)公司建工会了!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申工社”发布的消息甚至不到500字。但是,对于集纳了大量灵活就业群体的重点平台头部企业而言,美团(上海)公司迈出的这一步,与15年前沃尔玛在福建晋江成立在中国的第一家工会相比,几乎产生了同样强度的震动。

从陈刚的“站出来”到上海(美团)公司建会,中间仅仅相隔了120余天。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只是惊鸿一瞬。但是,在维护灵活就业群体的征途上,它显然成为充满温度和力量的“工会时间”。从此开始,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家政人员为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有望快速挣脱“弱从属,无保障”的尴尬窘境,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权益维护将被进一步推到前台。

毫无疑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二元化需求应当得到正视,这就使得灵活就业者成为相对特殊的劳动者群体,难免可能游走在资本和法律的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工会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持续改革,把已经被实践印证有效的组织建设和服务方式,从标准劳动关系群体向非标准劳动关系群体扩展,才能让“站出来”的结果遍地开花。就在本期杂志付印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印发,这意味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工会的重点任务,久久为功,以促进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履行好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

美团(上海)公司建会倒计时之际,《中国工人》派出采访组奔赴上海,聚焦这座国际化超大城市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课题,解剖在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都市街巷织密工会服务职工网络的生动实践。我们走进企业、楼宇、园区、街镇的劳动者中间,努力辨析上海工会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推进的路径,捕捉工会工作者们维护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的创新智慧。

这一期《中国工人》,我们用22个页码推出深度报道《激活基层工会的上海之策》,正是为了最详细地展示上海工会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如何实现覆盖并服务灵活就业群体、劳务派遣工、农民工、非公企业白领职工,为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提供可资借鉴的“上海经验”和“上海模式”。美团(上海)公司建会背后的工会改革创新理论和基层组织建设逻辑,相信可以在这样一组全景追踪的报道中完整呈现。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救济工人”被写入总章。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又一次提及这一历史深处的细节,勉励所有工会工作者为实现亿万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时间就像星辰大海,慢慢抬升着改革的水位。

中国工会的改革步伐,壮阔波澜,从未止歇。

中国工会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关注,始终坚定,一直温暖,总有力量。



这才是成长的样子

对于今天从事群众工作的工会干部来讲，便是要到劳动生活的实践课堂中去，沉下身，安下心，真正读懂“一口热饭、一张床铺”对劳动者的珍贵，真正做到“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在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骤然升级的时刻，《中国工人》派出的七路采访小组分别驻留深圳、西安、抚州、宁海、合肥、石家庄和天津，和基层蹲点的全总机关干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这一期，我们用20页的篇幅，全景展示正在继续进行的全总机关基层蹲点活动，集中刊出50位蹲点干部的照片和感言。杂志清样上的那一张又一张面孔，就是他们正在基层努力融入劳动者的模样，就是他们正在泥土中机床旁烈日下成长的样子。

在我的手机里，一直留存着江西蹲点工作组组长孙涛发来的一条微信——“记者和我们一起进工厂，下车间。今天，正赶上高温天气，温度在三十五六摄氏度的生产车间里没有空调，不要说干活儿，就是光站在那里，就是一身汗。”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派去和江西蹲点工作组一起劳作的年轻记者，早已经用更感动的心情描述过自己在那里见到的一切。

发生在江西蹲点工作组的这一幕，是散布全国各地的15个机关蹲点组的生动缩影。“站在仓库里靠在马路边，与司机一样顶着烈日”“和骑手一起吃饭聊天”“穿上蓝色工装，与职工一起吃食堂、住宿舍、干在基层一线”……无论是从哪一个蹲点工作组采访回来的记者，都能如数家珍地历数打动自己的细节。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从改变50人到改变更多工会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蹲点实践。他们离开长安街边的全国总工会大楼，进园区，进车间，在街巷，和他们服务的职工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聊在一起，从“近距离”到“零距离”，慢慢实现了与一线劳动者的同频共振。蹲点的每一天，都是淬炼的每一天，都是陶冶的每一天，都是升华的每一天。

古人常谈“功不唐捐”，大抵可以解释为“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白付出，必然有所回报”。南宋诗人陆游晚年亦曾写过七言绝句《冬夜读书示子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14个字，由宋至今代代相传。这些古词语的意思糅合起来，对于今天从事群众工作的工会干部来讲，便是要到劳动生活的实践课堂中去，沉下身，安下心，真正读懂“一口热饭、一张床铺”对劳动者的珍贵，真正做到“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历史硝烟中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数年后就要迎来成立100周年的辉煌时刻。刚刚发布的《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走向未来的路线图。面对更为复杂的对象、领域、任务、方式和环境，让传统的线下型、单向型工作方式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让工会的手臂更长地延伸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亟需工会干部深入一线掌握最新情况，研究破解之道。当这些走出北京的蹲点干部回到机关大楼，相信长安街边会有更多“泥土的味道”。

那天晚上，在陕西蹲点工作组的驻地，我们的记者听到了一首《你鼓舞了我》的歌曲。歌词是：“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是的，在全总机关干部基层蹲点活动里，50位蹲点干部好比50粒种子，在火热生活的沃野上生根开花，从生产一线的劳作里汲取力量，时刻鼓舞着自己去奋斗，去奉献。

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就这样又迈出了扎实一步。

中国工会与亿万职工更加水乳交融的时刻，就是更加充满活力的时刻，就是更加坚强有力的时刻。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小小约定，重重承诺

约定，承诺，践行。塞罕坝的故事，蕴含着党的领袖和中国工人水乳相融的深沉情感。

“有时间我一定要上你们那儿，走一走看一看。”

“欢迎您，我们盼着您的到来。”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会场。习近平总书记用温暖的话语，在此和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领奖代表安长明许下约定。

178天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站在海拔1900米的月亮山眺望茫茫林海。安长明骄傲地站在总书记的身边，感动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次约定，竟然这么快就成为现实。

这是一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一线劳动者的践约之行。这更是党和政府对于一代又一代林场职工传承“塞罕坝精神”的最高褒扬。

一次约定的背后，浓缩的是林场职工艰苦奋斗的漫长时光。

从1962年开始，包括骨灰被撒在马蹄坑大会战旧址的王尚海在内，成千上万林场职工苦守荒山，啃窝头、喝雪水、住窝棚，让一片草木难生的蛮荒之地，终于成为郁郁葱葱的万顷林海。

我想，这何尝不是林场职工践行“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的明证，又何尝不是亿万劳动者践行与党同行、为国分忧、为民族挺起脊梁的郑重承诺的缩影！

约定，承诺，践行。塞罕坝的故事，蕴含着党的领袖和中国工人水乳相融的深沉情感。

“去一次塞罕坝”，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林场职工的小小约定。它的背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是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的郑重承诺。从小小约定到郑重承诺，它显示出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也显示出生态文明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要素，更显示出亿万劳动者在党和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量。

《史记》有言，“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成语“一诺千金”由此流传。在中国发展的宏大命题里，安长明和塞罕坝林场职工的身影毫不起眼，但无数普通劳动者构成的中国工人群体却伟大而有力量。他们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次约定”，有理由成为《中国工人》杂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进行精神回访的开篇。

今年8月底，《中国工人》的采访小组驱车北上，走进了塞罕坝的历史。我们看到，那张斑驳的黑白照片上，最早一代林场职工的笑容，穿透漫漫岁月的尘埃，依然传递着信仰的光芒。我们看到，“六女上坝”的发起人陈彦娴不再青春，从黑发到白发的人生融入了塞罕坝的绿色。我们看到，每15分钟汇报一次瞭望情况，3个月才下山一次，驻守在月亮山望海楼里的刘军王娟夫妇，念念不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打开自己家里冰箱的那一刻。

精神的力量，可以把黄沙变成绿洲。

时间的力量，可以在分秒中塑造着更好的世界。

我们冀望，习近平总书记与职工朋友们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能够激励亿万中国工人在新时代的历史征途中，前进，前进，再前进。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不可辜负

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连接的是今天，绵延不息地流向未来。

十月，又是一个新的发行季，编辑部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作为一份1924年创刊的红色杂志的传承者，我们时常面对前辈们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沧桑文字而感到惴惴不安，唯恐因为自己的懈怠而辜负这份刊物的初心使命和素未谋面的读者们。这份不安，源于对历史的敬重和怀念，因为岁月的味道和痕迹，便是那些不能遗忘的慷慨激昂的鲜血，便是那些穿越时光长河依旧弥漫的硝烟。

历史一直是有分量的，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变得虚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千古名句能够流传至今，显示出人们对于充满家国情怀的慷慨赴死者，从未忘却，始终怀念。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悲壮战役的电影，“神速”打破14项中国影史记录，表面看上去有些出人意料，其实是时下社会心理的必然显现。整个民族历史记忆的觉醒，让回望过去的故事有了真实的温度，触摸着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连接的是今天，绵延不息地流向未来。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回望的不仅仅是极度严寒天气下的一场惨胜，还需要回到历史风云的原点，在斑驳模糊的旧地、旧事和旧景里，寻找那些最终改变国家走向和民族命运的初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逢五逢十”都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逢百”更是如此。这期《中国工人》，继续推出“中国工运红色足迹”系列报道。从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到武汉，从延安到哈尔滨，我们试图在细致描摹6个工人运动重大事件发生地，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回到历史现场。《中国工人》的新媒体则用“云游长辛店二七革命旧址”的直播活动，在网络时代以现代视听的形式还原历史，瞬间刷屏的4万“留言打卡”，至少代表着被历史打动、向先辈致敬的4万颗心。

不忘历史，这是后来者无法放下的责任。因为一段战争历史的再现而喷涌的爱国情怀，不应当仅仅是一时一刻的感动。那些在影片结束后面向银幕抬手敬礼的人，那些为蹒跚观影的志愿军老战士鼓掌欢呼的人，那些走出影院重回太平盛世忍不住泪流满面的人，都需要把刹那间的感动延续下去，自觉成为传承历史的践行者。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英雄的最好纪念，就是把英雄视作人生的榜样。

在历史写就的生活教科书里，无数如同你我一般默默劳作的无名之辈，构成了人民、国家和民族，让这些原本概念化的词汇鲜活起来。就像城市里那一块块“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标语，让每一位行经者在每一次注目的时候，不由得去思考更为博大的含义和逻辑——只要人民抱有坚定信仰，就能抱团成为力量无穷的国家，整个民族就会始终拥有希望。

回望过去，驻足现在，面向未来。

历史和英雄不可辜负，时间和努力不可辜负，理想和初心不可辜负。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奔跑吧，生活自有答案

诚意值拉满，浪漫值拉满，氛围值拉满，温暖值拉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通过努力去增加自己的确定性。

深秋与初冬交接之际，新一轮疫情蔓延开来。

就在这一期杂志行将付印的时候，新一轮疫情已经波及20个省份。这里持续出现确诊病例，那里升级为中高风险地区……伴随着这些揪心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再一次变得缓慢起来，打乱了人们预定的行程计划。

这些接踵而来的变数，即是生活中的无常，在科学里同样有定律式的表述。94年前，量子力学主要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论证粒子的位置、速度与普朗克常数的关系时，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粒子位置的不确定性，必然大于或等于普朗克常数除以 4π 。这一概念引入生活，便有了“若你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以，一切都不确定，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的解读。

这意味着我们在人生的巨大不确定性面前，需要学会接受，彼此宽容，分享艰难。因为新冠疫情的存在，我们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突然陷入糟糕和窘迫。一位快递员只是送货，偏巧赶上了十万火急的疫情封闭，就这样被困在陌生的住宅小区。但是，不确定性的“糟糕”，最后被他变成了确定性的“美好”——成为服务小区居民的防疫志愿者。

快递小哥再次成为新闻主角，让人回想起，即便在2020年初疫情突发的艰难日子里，他们都没有给自己按下“暂停键”，一直在用自己的奔跑镇定着整个社会的心。城市的街头巷尾，快递小哥的奔跑始终是确定性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生计奔波的平凡者，他们的样子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的样子——对生活充满希望，危机来临时勇敢承担责任，在被击倒之前不停奔跑。

庆幸的是，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磨炼了我们今天不再慌张的沉稳，疫情的磨难塑造了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这种自信是上万人核酸检测现场的绚烂烟火，是短视频平台上赞美英雄的童声版《漠河舞厅》，当然也是如期而至的“双11”消费热浪。仅仅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全国揽收的快递包裹就达到5.69亿件。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离不开时刻奔跑着的300万名快递小哥。从城市到乡村，他们送出的每一单快递，都是一桩心愿，一盏心灯，一处光明。

同样庆幸的是，就像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样，快递小哥在自己最忙碌的日子里，正在收获我们这个社会的更多尊重与关爱。快递运费“涨价”，人们可以平静接受，因为它意味着始终奔跑的快递员迎来了“涨薪”。就连充满老牌文艺范儿的《诗刊》，都开始跨界联手物流平台企业，共同打造诗意浪漫的文化项目。如果在街头见到物流快递箱上印着的诗歌文字，那一定是赞美快递小哥的一抹温柔。

这样的时刻，中国工会当然要显示出坚定不移的国家力量。在杭州桐庐的主会场，全国上百个分会场的景况出现在大屏幕上，5万名快递员在网上集体宣誓入会。在北京长安街边的工会大楼，“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正式启动，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应声而行，送思想文化，送身心健康，送平安保障，送温暖关爱，送工作岗位，送技术提升，让工会的声音听得见，让工会的行动看得见。

诚意值拉满，浪漫值拉满，氛围值拉满，温暖值拉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通过努力去增加自己的确定性。

向每一位向着美好奔跑的劳动者致敬！

奔跑吧，生活自有答案。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为国牺牲，岂止在战场

和平年代，国泰民安，无需牺牲，牺牲却又无所不在。很多危险，很多不测，原本就写在劳动者的职业字典里，考验着生命的韧性与刚强。

忙碌让时光如同流水一样，不经意间已经就要付印今年最后一期《中国工人》了。即将结束一年劳作的轻松，忽然被云南哀牢山4位地质队员因公殉难的消息击得粉碎。编发这条新媒体内容的时候，编辑平台上的每个人都沉默着，就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

张金榜，杨敏，张瑜，刘宇……这是4个普通不过的名字，从25岁到32岁的青春年华。他们留给亲人的最后影像，或许就是抖音刷屏的那一段监控视频。出发之前，他们在食杂店里买了100元的食品。他们最后倒下的地方，距离调查样地仅有1.85公里的直线距离。

生命脆弱而无常。日复一日丈量每一寸土地的人，也有他们走不出的大山，也有他们抵达不了的远方。两年以前，我曾经在西藏那曲采访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们吐得几乎清空了五脏六腑，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然而，他们还是不会从牙缝中挤出半个字的放弃，还是每一个清晨平静地走向旷野。如今回想，那样的坚持，不就是在与死亡较量？每一次出发，不都是在与死神同行？

静水深流，潜伏着看不见的危险；安谧岁月，意外还是有可能比明天提前到来。即将结束的2021年里，我们在安徽亳州失去了消防队员陈建军，这位24岁的年轻人为了营救跳楼轻生女子不幸坠落。我们在新疆喀什失去了全国劳动模范拉齐尼·巴依卡，这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护边员，拼力把落入冰窟的小孩托举出水面，自己却沉入了冰冷的湖底。我们在云南大理失去了整整一个火灾救援机组，机长刘洪、飞行员李凯涛、空中机械师刘超和孙中杰，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直升机洱海取水的那一刻。

和平年代，国泰民安，无需牺牲，牺牲却又无所不在。很多危险，很多不测，原本就写在劳动者的职业字典里，考验着生命的韧性与刚强。往往只有在牺牲的那一刻，人们才会真正关注到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唏嘘守护他们用生命丈量过的林海山河，怀念传承他们用生命塑造出的精神品质。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中国工人》从1924年创刊开始就恪守的使命。时光荏苒，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但这本杂志的根基依然要扎在工人阶级的丰沃土壤里。所以，我们的记者钻进低矮昏暗的矿区深巷，走入杳无人烟的苍茫林海，爬上几十米高的输电铁塔，为平凡者塑像，为劳动者立言。我们和《中国工人》的使命，就是永远陪伴在这些平凡者的身边，陪伴着这种伟大的力量成长。

每一段生命旅途中都会有风暴，每一种职业尊严里都写满沧桑。同样是命运打开的生活大门，潦倒者看到残酷，激扬者看到光明，失意者看到败落，乐观者看到希望，畏缩者看到虚无，勇敢者看到未来。那些把生命定格在2021年的牺牲者，则用自己最后的光亮汇聚成大江大河里的航标，鼓舞我们继续前行，永不停止奔跑。

再见，2021。

你好，2022。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2022 不止看见

每一次看见，
都是哺育希望未来的
空气和阳光。

大音希声

《中国工人》正在选择用这些故事恪守着自己的理想，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这是新年的第一期，很高兴我们能够和即将迎来98岁生日的《中国工人》一道，与你又一次相逢。

此时，空气清冽，天空很蓝。

祝愿灿烂的阳光打在你的脸上，心里漾出长长的温暖。

祝愿长长的温暖照进你的生活，日子充盈浓浓的幸福。

时光荏苒，光阴无言。西安的疫情终于在那么多令人揪心的真实故事后渐显平复，河南和天津又开始了与奥密克戎和德尔塔的拼死抗争，就连严防死守的北京也在平静的周末骤然打响了“遭遇战”，再次拉响了与新冠病毒作战的警笛。

在这悄然与轰然并行的时代里，生活中最大的确定性或许就是不确定性。每一个人最渴望得到的诚意祝福，莫过于万水千山，岁月静好。

2021年过去了，我们很怀恋它。

我们用12期《中国工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劳动故事，描绘着一张又一张劳动面孔。在阳光照射的地方，他们手捧鲜花，胸佩奖章，是坚韧的英雄，是创造的榜样。转过身去，掌声退潮，回归生活的磨砺，他们是负重前行的无名之辈。

我们竭尽所能，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和图像，去陪伴所有这些平凡路上的有趣灵魂。我们发现故事，相信在荒芜的地方拥抱审美的灵魂，可以自行配制解药；我们讲述故事，相信在喧嚣的世界秉持信仰的精神，可以自行建造田园。

2022年走来了，我们很期待它。

一如既往，我们带着这份98岁老刊的新面貌，再次踏上寻找、发现、记录的全新旅程。

就在新年的第一期，我们记录全国职工演讲比赛，动容于一段又一段用人生历程写就的奋斗感悟。我们探访冬奥建设者的内心世界，惊叹于每一次创新背后竟然闪耀着那么绚烂的智慧火花。我们走进货车司机的漂泊生活，分享他们或惊险或温暖的公路故事，更希望把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推向社会的聚光灯下。

如果，《中国工人》正在选择用这些故事恪守着自己的理想，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那么，我们希望与你的相见能够地久天长，希望用时间酿造的文字，让你看到一个深情的《中国工人》，一个敏锐的《中国工人》；一个温暖的《中国工人》，一个坚定的《中国工人》，有勇气凝视艰难困顿，始终向阳而生。

新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工人》的采访小组从北京奔赴浙江。正如我们在2021年9月刊承诺的那样，在北上探访塞罕坝林场职工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次约定”后，我们开启了沿着领袖足迹进行精神回访的长途。

12年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传化样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注中享誉全国。12年后，传化样本标杆依旧挺立，面向共同富裕的未来再次起航。我们同样希望，历经战争、建设、改革，《中国工人》能够在新时代里不负98年的历史，不负那些在觉醒年代创办这份启蒙刊物的前辈。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新的一年，你在，我在，我们都在。

新的一年，一边回望，一边期待，满腔热忱，大音希声。

李瑾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冠军以下

今夜，我们为冠军欢呼，同时向所有冠军以下的默默奉献者致敬！

一跳漂亮的绝杀，问鼎最高领奖台，为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斩获第三金。

这一天，超级巨星谷爱凌横空出世，收割相关热搜百余个，抖音账号一天涨粉500万。爆红，说的就是这样刹那间璀璨的成功。

人们实在太爱这个爱笑自律真实的女孩了，因为她的身上时刻洋溢着乐观坚韧的特质。很多家长更被养育出人见人爱孩子家庭的教育理念所折服，仅仅一个“让孩子睡足觉”的细节，就让那些“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励志故事相形见绌。难怪有网友发出羡慕嫉妒恨的感叹：上帝究竟为谷爱凌关上了哪扇门？

谁都喜欢看上去轻松开挂的人生传奇，我也一样。但是，回到真实的现实社会当中，回到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故事里，哪有什么随随便便的成功。从泥沼似的生活中，经历沮丧、挣扎和绝望，承受艰难涅槃的磨砺纠葛，磨掉一层又一层皮，伤透一次又一次心，直到最后蹒跚地站上自己的巅峰，这才是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

北京冬奥的赛场上，为祖国夺得首金的速滑团体里，范可新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人生。当她和队友站上最高领奖台以后，黑龙江七台河市政府的100万元重奖，满满的是家乡父老的骄傲和自豪。然而，我很想知道，此时的这位奥运冠军，会不会想起自己曾经因为买不起冰刀鞋而黯然落下的眼泪？

在谷爱凌快乐烂漫的童年背后，是妈妈每周开车8小时带她去训练的十年时光。于范可新而言，一直默默站在她背后的人则是矿工出身的孟庆余。在七台河那样偏远冷清的地方，一个月工资的微薄寥寥可想而知。但是，这位献身中国冰雪运动事业的启蒙教练，免费送给了范可新一双冰刀鞋，这相当于这个喜爱滑冰的孩子全家一年的生活费。

北京冬奥会燃爆的国民关注，让孟庆余走入了更广袤的公众视野。生活在七台河的这位普通矿工，滑冰只是业余爱好，偶然参加运动会拿到速滑冠军，由此成为当地体工队的教练。他当然知道，当时教练的工资比矿工还要低，但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滑冰。将近30年的漫长岁月，清贫苦涩，困难重重，孟庆余一直撑了下来，硬是将这座北方小城打造成“中国短道速滑之乡”。

2006年，孟庆余在送小队员参加训练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永远离开了他眷恋不舍的冰面。16年后，这位矿工的故事再次感动中国。冠军挥舞着红旗在赛场骄傲奔跑，冠军以下被深深掩埋的时光，则是倔强不息的理想在独自闪耀。

在疯狂追求成功的年代里，理想成为了社会的奢侈品，无时无刻不在面对世俗的侵蚀。因为如此，理想的守护者便是我们最需要的人。一旦承担起守理想使命，在璀璨辉煌的成功背后，大抵都会有理想的寂寞，理想的沧桑，理想的殊死挣扎，理想的永不言败。

整整98年前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工人》在理想者的觉醒中诞生。如今，这一代理想者的名字，被我们镌刻在记录杂志历史的展板上。他们的理想，由更年轻更青春的团队传承下来，赓续不息。

今夜，中国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第8枚金牌。

今夜，我们为冠军欢呼，同时向所有冠军以下的默默奉献者致敬！

与无名相伴，辅王者上路。

只有最终成为王者的人知道，寒夜漫漫，有你，就有光，便可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看见，不止看见

一个人没有被看见，他的情绪就不会被关注，他的感受就不会被认同，他的付出就不会被尊重。

每一部现象级影视作品的热播背后，总是离不开对于当下社会心理的深切回应。譬如，把工人家庭的沧桑命运推向前台的《人世间》。

八级工周志刚一家五口的故事，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从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国企改革、经商热潮到棚户区改造，中国社会走过的每一处路口，都让时代之风吹曳着生而普通、命定平凡的人。这个工人家庭里发生的一切，终究会在落幕过后成为中国百姓命运史的缩影，渐渐汇入历史的漫漫长河。

《人世间》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了自己曾经的样子。那个从木材厂到酱油厂再到出版社的人，就是追逐时代浪潮蹒跚向前的我们。那个死命守护国家财产的人，就是甘愿把青春和热情留在生产线上的我们。那对为孩子默默忍耐所有苦涩的患难夫妻，就是一生善良的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人世间》让整个社会再一次看见了真实的中国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无论怎样窘迫，依然温暖。他们的理想无论怎样遥远，依然坚定。他们的岗位无论怎样卑微，依然充满热爱。这样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陪伴着他们承受减员、下岗、分流的阵痛，向着命运的阳光处拼力奔跑。

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的名言。理解和接纳的前提，就是“看见”。一个人没有被看见，他的情绪就不会被关注，他的感受就不会被认同，他的付出就不会被尊重。让那些做工的人始终被看见，才真正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遗忘，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理解和被接纳。

让人欣慰的是，社会与时代滚滚向前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那些用脊梁撑起民族命运的平凡者。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那些犹豫在工厂门外的平民子弟被看见了，那些紧张劳累却收入清贫的无奈困顿被看见了，于是有了“建立‘新八级工’制度，重塑工人荣光”的呼吁。全国政协委员李守镇建议“劳模只从一线职工中评选”的视频，仅在《中国工人》抖音号就播放了200万次，点赞网友超过10万人。

看见，不仅有温度，更有力量。2021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走进了北京街头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同年3月，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发声，“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由此开始，中国工会的关爱和温暖，涌向成千上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这是最好的时代。每一次看见，都是哺育希望未来的空气和阳光。我至今记得，包括许振超、李斌、徐强在内，来自一线工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持续建言，呼吁加大对产业工人队伍的导向性政策激励力度。正在提速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就是党和国家在看见之后的深切回应。

1924年，《中国工人》创刊，让在黑暗中摸索的民族看见了一个阶级的不屈与顽强。躬身自省，秉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为办刊宗旨，我们这一代《中国工人》的传承者，更要继续关注劳动者的付出和价值，不负时代的使命和担当。

看见，又不止于看见。

人世间的温暖，就该如此。

李斌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关山万千重

为技术工人举办
创新交流大会,当
属新中国的第一
次。这样的尊崇
之举,既是中国工
会的创新而为,也
是中国工会的使
命延续,注定将要
融入中国工人阶
级进步壮大的历
史长河。

来自中南海的一封沉甸甸的贺信,成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高光时刻,更让千百万优秀技术工人感受到最深切的关怀。

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4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五一”前夕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称赞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292个字的贺信,字字千钧。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宣读了这封贺信。北京主会场和全国各地81个分会场里,每一位聆听贺信的人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贺信宣读的时候,我和《中国工人》的工作团队正在深圳会展中心外面等待。因为北京突发的疫情,以近乎强行突击的方式完成3D沉浸式巡馆摄制后,从北京来到深圳的工作团队再也没有被允许进入1.8万平方米的大会展区,足足准备了两个月的导播和主持人成了重点防范对象,一位家住北京朝阳区附近的同伴甚至被送到当地的集中隔离点。

但是,北京主会场弥漫的振奋和荣耀,鼓舞着千里之外的我们去面对各种复杂的不确定性——按时上线3DVR智慧展馆,应变完成3天全程大会直播。130万条职工网友的互动留言,挤爆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平台的评论区,彰显着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巨大影响力。

虚惊一场,久别重逢,失而复得,通常被称为人生的三大幸运之事。在我看来,如果放在更大的人生格局里,更幸运的是能够和最智慧的人成为朋友,能够从最有力量的人身上汲取激情,能够在影响时代与社会的关键节点上,出一份微薄之力,发一缕萤火之光。

疫情反复带来的阴错阳差,让《中国工人》成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参与者,从3DVR展馆到全程24小时直播,简直可以用“天选打工人”来比喻。线头多得数不过来,年轻的团队忍不住哭了一次又一次。变化多得猝不及防,即便是经历过大事的人也经历过从梦中惊醒。

艰难时刻,支撑我们坚持到底的是那些来自亿万劳动者的力量。巨晓林、高凤林专程来到“中国工人蓝沙发”特别节目的现场,直播间里的互动留言出现了更多优秀工匠的名字。尽管疫情防控把现场观众压缩到4000人的规模,工匠红地毯和工匠技能秀也被取消,但是所有交流区的搭建依然一丝不苟,800余件现场实物有序就位,550位工匠的事迹熠熠生辉。

为技术工人举办创新交流大会,当属新中国的第一次。这样的尊崇之举,既是中国工会的创新而为,也是中国工会的使命延续,就像1920年沪西小沙渡工人学校的烛光,就像1932年苏区工人改良斗笠的热情,就像1952年全国工会扫除文盲的运动,就像1983年振兴中华的职工读书竞赛,就像2016年开始叫响做实“大国工匠”品牌,注定将要融入中国工人阶级进步壮大的历史长河。

时光川流,传统不息。这一次的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选择深圳举办象征着工人阶级壮阔成长,采用线上办展则象征着工人阶级走向智慧时代的未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时代的接力棒就这样传到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手中。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

唯有奋斗的征途,已经树起通往明天的路标。

让我们一起出发,拥抱充满希望的星辰大海。

李强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凡人之躯

每个人的岗位，
皆是舞台。在这
里，凡人拒绝平
庸，就是通往英
雄的路。

在朋友圈里刷到D2809次旅客列车发生脱线事故的消息时，我正坐在北京通惠河边一路林荫下的长椅上。整个京城阳光灿烂，享受端午假期的人们开始感受到这一轮疫情正在退去，生活即将恢复平常的样子。

但是，我知道，对于D2809次列车值乘司机杨勇的亲人们来说，生活已经再也回不到从前了。20年新闻记者的从业经历，让我有机会进入过列车司机室，山峰、悬桥、隧洞，压迫感迎面而来。D2809次列车突然遭遇泥石流时的无助与绝望，闭眼可见。

幸好我们还有镇定面对死亡的勇敢者，杨勇在危急时刻撂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把闸，让所有的乘客在D2809次列车900多米的生死滑行中，与死神擦肩，用一个人的悲壮诀别，换来一车人的平安回家。“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互联网上频频出现的这一句留言，便是天南海北素不相识的人们共同的敬仰和痛悼！

那些灾难时刻挺身牺牲的人，我们无法补偿他们以生命，但可以用最庄重的仪式感去表达尊重。比如，有关D2809次列车脱线事故的新闻报道，从“D2809殉职司机曾5秒内紧急制动”，到短短2小时后出现杨勇的名字，细节之处隐藏着这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我深深以为，给予挺身罹难者崇高的敬意和缅怀，也是在润育更多人内心深处的善念。

平凡岗位，心怀山海，极致之处，便是英雄。很多时候，死亡总是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追问，去思考“如何过好这一生”。这样的发问，犹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答案万般错落。在我看来，每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回答，都离不开对职责的恪守。

这一期《中国工人》，我们编发的江苏省泰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耿晓利的故事，便是工会工作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着怎样让自己的工作更有价值这个时代命题。工会面向新就业群体推出的免费体检福利，为什么很少有网约车司机来领取？疑惑之余，耿晓利花了400元钱注册开上了网约车，真正走近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动上的水乳交融，带来的是情感上的相知相通，让泰州工会的服务举措变得更加“接了地气”。

同样恪守职责的，还有《中国工人》的记者马梦婕。再过几天，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就要前往广西桂林，成为她曾经采访时希冀成为的样子——做一名基层蹲点的工会人。源于2021年5月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干部下基层蹲点行动，步入常态化制度化的新一年。10个月前，我们用《一场从50人开始的改变》的深度报道，全面呈现首批工会蹲点干部的故事。正如当时我们观察到的，只要深植泥土，这个致力于服务亿万职工群众的群团组织，就会焕发永不褪色的活力。

祝福我们年轻的记者在蹲点的日子里快速成长，为已经创刊98个年头的《中国工人》注入新的生机。我们愿意用这样的行动，向觉醒年代与劳动者相濡以沫的《中国工人》前辈们致敬，同时把《中国工人》的根基牢牢扎在劳动者的沃野。

今天的北京，街边餐馆的服务员在门前迎客，闪送员则在重新喧闹的街巷里飞奔，生活的烟火气正在慢慢回归。等候外卖的美团小哥哼着《孤勇者》的歌词：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

是的。聚光灯外，英雄皆可辈出；与平凡对弈者，皆是英雄。

每个人的岗位，皆是舞台。

在这里，凡人拒绝平庸，就是通往英雄的路。

马梦婕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工作着是美丽的

疫情带给他们的磨难，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抚平，但他们是生活的真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流着眼泪依然一直向前奔跑。

十多年前，去过大西南险山恶谷里的一处铁路隧道工地，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工棚里，我看见一本翻卷了边角的书。书的主人显然是匆忙上工去了，匆忙到只用一根草叶塞在刚刚读到的地方。平淡泛黄的封面上，书名朴实而直白——《工作着是美丽的》。

当我忍不住默念这个书名的时候，工棚外猛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破声。这一刻，我知道书的主人马上就要屏住呼吸，冲向昏暗的隧洞前端，清理那些散着烟尘的碎石。一个班次下来，鼻孔肯定是黑的，脸上自然也会蹭上泥污，但我能够想象出他回到工棚时的快乐，因为又可以翻开塞了草叶的那一页，继续读那部翻卷了边角的长篇小说。

时间如流水般逝去，很多往事变得渐渐模糊。直到这一期《中国工人》，“工作着是美丽的”成为深度报道的主题，又让我记忆起那一处工地、那一声闷响和那一本书。随着行程卡星号取消，今天的城市正在加快恢复生机的步伐，那些为能够找回熟悉的工作状态的复产复工者，那些带着感恩之心将躬鞠得更深的迎候第一位堂食顾客的餐厅服务员，像极了在险山深谷里清理爆破碎石的隧道工人。在他们的心里，无论怎样苦累脏差，工作着才是美丽的，工作之美才是最灿烂的生活之光。

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学会珍惜。比如拖着满身疲惫奔波在不同城市的业务员，也许曾经在内心深处有过一丝厌倦；每天循环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操作工，也许曾经在某个时刻忍不住抱怨过生活；摆起街边小摊养活一家老小的自谋职业者，也许曾经在生意冷落的时候想到过放弃挣扎……但是，在整座城市“静默”的一日又一日，人们才顿然发现那些厌倦和抱怨多么微不足道，再辛苦的工作都值得珍惜，因为它是通往明天的路，让每一个今天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跑线。

新冠疫情的反复无常，冲击了太多的职业、企业和岗位，就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成了奢侈品。一些撑过了春天的小微企业在夏天倒下去了，波及的不仅是一个困顿无望的小工商业主，还有每一位雇工背后的孩子和家庭。因此，在付出巨大代价回归正常生活以后，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回到工作岗位，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身不能至，心已往之。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全国总工会围绕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工作持续深入进行调研。从推进疫情防控到复工复产，从安全生产到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再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北京和地方的视频连线充盈了工会对劳动者的拳拳关爱。湖北、浙江、广东、上海、北京、河北、吉林……各地工会接连出台的纾难解困措施，让那些被急难愁盼问题困扰的劳动者，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温暖和力量。

这一期《中国工人》记录了不同行业重返工作岗位的劳动者。整个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是对工作的眷恋，这是太多劳动者经历艰难以后对生活对工作的全新领悟。疫情带给他们的磨难，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抚平，但他们是生活的真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流着眼泪依然一直向前奔跑。

正值7月，1076万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成为新时代的劳动者，祝福他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一位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里，用苏轼的《定风波》鼓舞自己的学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中国工人》想要说的，却只有7个字——工作着是美丽的。

你我共勉，一路同行。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看见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社会，太需要把那些默默劳作的无名之辈推向公众的视野了……

就像让人瞠目的高温红色预警一样，这些天来的微信朋友圈接连曝出“奇闻”，反复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底线，比如高调炫耀身世背景的“周公子”，还有被“实力坑夫者”晒出8万月薪的“93年员工”，当然还要再加上一个撕裂阶层共识的“二舅故事”。

纷扰鼓噪的信息多了，同样需要关注的新闻就容易被淡漠起来。全球在变暖，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在扩张，绝热增温效应由此而生，让动辄40℃的天气成为常态。当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空调释放出的冷气时，那些在闷热的酷暑里不得不继续操劳甚至奔跑的人，又能够去哪里寻求从身体到心底的清凉？

在我的手机里，收藏着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一条微信推文。打动我的是里面的一张海报——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交通警察仰头喝水的图片，“阳光很烈，你们很美”是大字主题，旁边一行小字——让我们用一瓶水敬你们。

这条充满温度的推文，报道的是“一瓶水传递爱”活动的第一站，期待的是爱心企业和人士能够捐出一瓶水，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洋溢浓浓暖意的同时，推文的阅读量多少显出几分窘涩，远远比不上什么“周公子”和“93年员工”，更比不上真真假假的“二舅故事”。

《增广贤文》有这样几句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那些高温下辛苦劳作的劳动者，在很多自媒体的舆论场里被遮蔽，因为能够刺激公众神经的事件更能吸引眼球。对于劳动艰辛的熟视无睹，传递到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里，也必然会蛊惑出这样或是那样的荒唐之事。就像一年以前的郑州大雨，那位遭遇“全网封杀”的劣迹艺人的照片，竟然被“代捐”追星的粉丝贴在援助灾区的应急物资上。

“你的奋斗，跨越山海”。今天的中国社会，太需要把那些默默劳作的无名之辈推向公众的视野了。惟其如此，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感受劳动的神圣，感受劳动的艰辛，悲伤劳动者的悲伤，幸福劳动者的幸福。炎热夏日，送给外卖小哥的一句“你辛苦了”，捐到善款基金的一瓶冰水，都是带着温暖的清凉，都是能够抵挡热浪的善意和爱。

看见，才会关注。关注，才有力量。

在中国南方到处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日子里，我们的年轻记者赶赴广东，住进了打工者闷热的宿舍，近距离观察流水线上的年轻人，记录时代浪潮下的星辰大海里，那些蜷缩在螺丝、机器和电路板里的枯燥单调，那些为艰难生计蹒跚前行的困惑挣扎，那些拼力想要安放在自己未来幸福图景里的心。

让劳动和劳动者被看见，这是《中国工人》烙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使命。

同样，只有深深融入劳动者的海洋，正在走向创刊百年的《中国工人》才能永葆生机。

2021年开始，《中国工人》每期都会出现在全国各地2700余家户外劳动者驿站。我们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劳动者在打开杂志的那一刻，彼此感受，相互触摸，如同浪拥抱着浪，光簇拥着光。

愿每一位劳动者，在这样的相遇中，都能感受到被看见的温暖和力量。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
一个代表理想，
一个代表现实。
总有一些人，亲
手摘下了心中的
月亮。

很想当面向韩利萍说一声抱歉，为了一次我们没有完成的采访约定。再过几天，这位航天特级技师的生活与理想，原本应当出现在首届大国工匠论坛的大屏幕上。然而，千里之外一座油田之城的突然“静默”，让《中国工人》的10人拍摄团队根本无法登上十几个小时后的航班。

从沈阳、无锡、株洲、上海到大庆，从田桂英、何光华、易冉、姚启明到刘丽，在红色高温预警席卷中国的日子里，我们的团队沉入到这些巾帼工匠的生活深处，试图探寻她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为的是在用镜头展现她们多么刚毅的时候，不刻意撕去女性标签，还原她们原本就有的爱与温柔。直到猝不及防的疫情，让这次近距离跟拍6位巾帼工匠的“特别之旅”，不得不戛然而止，留下“长治、韩利萍”的遗憾。

这样的故事，像极了我们拍摄的这部短片《她们的征途》。片名里的“她们”，指的是包括韩利萍在内的千百位巾帼工匠。她们的征途，通向的是星辰大海，走过的却是坎坷崎岖。只不过她们所面对的变故与无常，远远不是我们常人所遇到的几天“静默”，而是没有星光的暗夜，无处躲避的狂风，寂寞无助的绝望。唯有恪守住自己宁静的心，不嗔不怒，不怨不躁，才能让玫瑰的嫩芽浸透牺牲的泪泉和血雨，才会有幸福来临之时的明艳与芬芳。

2022年的中国，“工匠”无疑是声量最强的热词之一，这当然缘于全国总工会接连推出的重磅举措。“五一”前夕，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在深圳揭幕。短短四个月后，首届大国工匠论坛又要在长沙举办。既然是“首届”，那就意味着大会和论坛都将成为中国工会的“保留项目”，意味着每一年都会有中国技术工人的高光时刻。想象那一幕，当声名显赫的87位大国工匠人物全部聚在一起，那就是一座令人仰止的山峰，即便他们散入茫茫人海，依然能够用精神的光芒在天幕上勾勒出璀璨星河。

从创新交流大会到大国工匠论坛，《中国工人》杂志有幸承担若干琐事与小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有荣焉。这一次拍摄《她们的征途》，走进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的家中时，92岁的老人早早在自己的胸前佩戴上满满的勋章。那一刻，我们冀望时间能够停止，把历史的气息清晰地留存下来。还有那个北京最热的正午，我们蜷缩在憋闷的新闻电影资料室里，从70年前的影像里一帧帧寻找田桂英、赵梦桃和梁军的青春，那是一代人的青春，那是一种精神散发光芒的开始，多想沸腾的时光可以从头再来。

100多年前，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道：“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月亮与六便士，一个代表理想，一个代表现实。在中国，每一位职业女性的月亮与六便士，抬头与俯首之间，没有对错，只是选择。总有一些人，就像竭力流动向前的溪流，寻找到越来越多的同伴，一起奔入时代的大海，成就了彼此的壮阔波澜，亲手摘下了心中的月亮。

向我们的时代致敬。

向每一位巾帼工匠的生活与理想致敬。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敬·十年

正是亿万平凡
个体的奋斗和
拼争，让中国
社会永远青春
蓬勃，永远笃
行不怠。

时光如梭，十年一瞬。

我们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吗？也许已经人到中年，也许刚刚青春年少，但每一个人都在冀望着梦想花开，生活美好，亲人平安，梦想十年后的自己像快乐温暖的阳光。

日子像风一样，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多少？我们的生活变化了多少？我们的心还有多少前行的冲动？

回答好这些问题，可以很简单。在时光的维度里，涵盖人生变化的标尺可能就那么直接——买房了、升职了、成家了、离别了……即便是十年之路，依然用几个词就能涵盖。

回答好这个问题，也可以很难。回忆如潮，奔涌而来，曾经在哪里跌倒，曾经在哪里绝望，曾经在哪里忍不住放声大哭，曾经在哪里下决心从头再来。只要生来平凡，哪一个人不是在这样的曾经中爬出生命的低谷。即便时光能够给出答案，依然会一时语塞，欲说还休。

于我而言，个人的变化与时代的浪潮相比，显然要慢了许多。但是，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让我有幸结识了那么多辛勤劳作的强者，走进去观察他们的内心，走出来记录他们的生活，并且在接下来的漫长日子里，注视着他们的变化。

十年，高凤林从身无一“职”变成了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这位为航天火箭焊接“心脏”的焊工，如今是名动天下的大国工匠，互联网上被追崇膜拜的“焊武帝”。大国重器、超级工程、未来科技，让一大批优秀产业工人走上时代的前台。十年里的每一日，他们都在用一点点缩小的精度，一次次大写着中国智造向世界之巅的跃进。

十年，朱雪芹从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变成了一家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这位当年被采访全国两会的记者疯狂追踪的“议政明星”，如今是生活在国际化大都市里的“新上海人”，早已没有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但是，十年里的每一日，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奋斗迁徙的漫长征途里，她的名字依然被不断提起，她的传奇依然是鼓舞无名之辈的力量。

十年，刘阔从23岁的打工者变成了33岁的快递员，甚至在百度百科里有了自己的个人词条。这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小伙子，在北京开启了自己的“开挂人生”——在前门石头胡同快递点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握手，在万众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出场“护旗”。十年里的每一日，都有更多像刘阔一样的年轻人，向着生活的光亮处不停奔跑。

同样是十年，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成为《中国工人》这份百年红刊的传承者。在时代巨幕的每一段时光刻度里，我们愿意记录劳动十年的忠诚、勇敢、高尚、尊严、正直、无私，我们愿意记录劳动十年的坚定、宽容、友爱、善良、简朴、忍耐，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正是亿万平凡个体的奋斗和拼争，让中国社会永远青春蓬勃，永远笃行不怠。

十年仰望。十年出发。十年抵达。

我们向更高处的脚步，从未停止。

回望来路，为我们逝去的年华敬杯酒吧。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

眺望前程，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敬杯酒吧。一杯敬未来，一杯敬希望。

敬，这十年。

祝福新的十年，民富国强，你我安康。

李瑾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历史的耐心

每一段光阴酝酿的故事，蕴含的都是历史的耐心。支撑这份耐心坚持到底的，则是在每一个细微却坚定的行动里，对于未来的信心。

这一周，存置已久的应急预案派上了用场，我们的办公楼陷入了“静默”。

一位新冠确诊患者在食堂里的两次出现，让那一天所有去过食堂的人进入了非常状态。周边的便利店和美发厅，匆匆贴出了“暂停营业”告示。那家刚刚开业的“三秦五味”陕西餐馆，豪情万丈的老板肯定也多了几分清醒和理性。

生活就是如此充满着不确定性，整个中国与新冠疫情的艰难抗争，则把这种不确定性变得确定了下来。很多人心生慨叹，再过两个月就要3年了。很多人心存迷茫，还会不会再有一个3年。这样的时刻，我们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6年前，我曾参加过李斌、高凤林、许振超的一次劳模小聚。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李斌，说起他在习近平总书记面前的8分钟发言，他大声疾呼的是“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当时，高凤林强烈表达自己的共鸣：“现在还有多少工人，愿意自己的孩子继续当工人？”

6年过去了。刚刚结束的党的二十大，一线工人党代表郑志明这样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咱们国家出台了打破天花板的政策，我刚评上特级技师，还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党的政策让我们职高毕业的工人，也有了好出路。”

6年很短吗？当然不短，李斌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6年很长吗？当然不长，高凤林依然那样朝气睿智。

然而，就在6年之间，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浪潮迭起，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提升地位的路线图，大国工匠已经有了浩若繁星的同行者。

每一段光阴酝酿的故事，蕴含的都是历史的耐心。这份耐心，离不开“事”与“是”两个字。“事”是耐心的“对象”，需要把清醒认识并接受困难的存在当成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是耐心的“源头”，需要站在时光的视野里，淡定面对哪怕已经乱如蓬草的棋局。支撑这份耐心坚持到底的，则是在每一个细微却坚定的行动里，对于未来的信心。

看到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到延安的时候，我想起的是延安时期的《中国工人》。

1940年2月，这份党在1924年创办的红色刊物，又一次艰难重生。或许是知道它在黑暗年代挣扎出版的不易——在上海创刊后出版了5期，1928年复刊后出版了8期——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这个报纸（刊物）好好地办下去”。

“好好地办下去”，这样平实的6个字，同样充满着历史的耐心。这份耐心，沉淀在近百年前《中国工人》的那些文字里，让人读来时时产生被击中的感觉。就像1924年《中国工人》第一期中的预言：“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在中国将来的历史上比任何阶级要重大，担负中国真正的革命事业的，创造中国将来真正的新社会的，只有她有这种魄力。”

穿越光阴，抵抗彷徨。一个当时只有几百名党员的政党，能够平静地这样预言未来的中国，凭借的是对主义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贞，对光明的向往，让历史的耐心有了最顽强的力量。

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大抵都是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就像我们从来没有预想到，这一期的《中国工人》要在远程状态完成编印一样，还会有更多让人猝不及防的状况出现在眼前。更加多元，更加复杂，更加模糊，这或许就是时光长河的面孔。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保持希望，洞穿纷杂，坚定而不迷茫，冷静但更热爱。

历史的耐心，不会辜负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

历史的耐心，正在慢慢浮现献给未来的答案。

李斌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时间从来不语

机器总要重新轰鸣，钢铁总要重新坚硬，街巷总要重新繁华……

几乎每个人都以为将要进入“严防死守新一年”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正在挨过的凛冬之日，竟然是最后决战一般的短兵相接。

办公群里，出现了第一个感染者，之后，一个接着一个……居家办公，不会客，不堂食，戴口罩，勤洗手，念念不忘顶级医学专家的提醒，依然没有躲过狡猾的奥密克戎。烧了，疼了，“哑”了，经历了所有的病程以后，终于重新看见了照耀生活的光。

最痛苦难熬的那一瞬，突然想起了三年前疫情袭来的时光和记忆：让人揪心的武汉，隔离病房里的医生，奔跑在街巷的快递小哥，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筑工人。那时的病毒一定比现在更凶猛，那时的恐惧一定比现在更未知，那时的每一分勇敢，都像在用破烂的衣裳去堵命运的枪。

三年过去了，记忆中那个被我们称之为“正常”的生活，正在艰难地重新启动。

通信行程卡正式下线了，比我们预想得要快了很多。不止一家网站直播这个查询量数百亿次的IP走向终结，朋友圈里刷爆了“再见，再也不见”的留言。

遍地的核酸检测点消失了，我们甚至都来不及留下一帧合影，去记录酷暑寒冬暗夜的风里雨里雪里的无奈和无助，去祭奠曾经每天打开健康码时不安的心。

生活的烟火气，开始挣扎着想要回到我们的城市。它是站在餐馆门前企盼食客的望眼欲穿，它是终于归乡叩拜年迈高堂的喜极而泣，它是不再隔着屏幕抚摸亲友的真实拥抱……即便还有黎明前的至暗，但又有什么能阻挡住蓬勃的日出？

忍不住找出2020年3月刊的《中国工人》。在那一期的文字里，我们记录了一个民族与新冠病毒作战的40天。那一段日子，死亡是它的沉重底色。3173条逝去的生命，堆积出留在历史深处的凡人冢；4万名医务工作者的星夜驰援，留住了灾难面前最后的勇气和力量。

就像我们当时说的那样，当生活一切如初，罹难者却再也回不来了，这将成为永远的痛，警醒着每一个人。如有可能，当我们终于翻过了新冠病毒这座山，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应当向每一位倒在这灾难中的人，献上一朵洁白的小花。如有可能，我们应当向每一位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人，长长地鞠上一躬表示无尽的感谢。

旧幕落下，新幕开启。机器总要重新轰鸣，钢铁总要重新坚硬，街巷总要重新繁华，就像每一份快递还会送到你的门前，就像每一座城市还会重新敞开怀抱。

这一期的《中国工人》，“奔跑2022”成为年度报道的主题，我们通过8位劳动者或劳动集体的365天，记录那些在疫情夹缝中拼力向前的人。我们知道，他们远远不是所有值得记录的平凡之辈，但我们依然愿意用他们的生活，致敬重新恢复自由呼吸的时代。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你知道的，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再见，2022！

你好，2023！

李瑾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2023 答卷

现在的每一天，
都是努力作答的
每一天。

朴素的决心

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无论何时何地，只有日拱一卒，才会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20年前，一场持续了8个月的非典疫情，终于在夏天之前归复平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这是瘟疫第一次逼进城市中心。

在死亡数字让人窒息的日子，我和同伴进入北京和平里宾馆采访，那里是救治一线人员的隔离休息区。ICU手术室里的紧张和无助，面对感染不测的淡定与坦然，医护人员的讲述还原了生死边界的现场。没有被批准进入那样的现场，是我记者生涯的最大遗憾。

20年后，又一场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在骤然出现海啸般的全民感染之后，开始把生活的主宰权还给我们。

机器重新轰鸣，钢铁重新坚硬，街巷重新繁华，道路重新拥堵，一扇扇紧闭三年的大门重新打开，飞奔着夺回在停滞和静默中失去的时光。可惜，那些永远“埋”在这个冬天的人们，再也不能重新醒来。这应当就是生活的苦难吧，知道至暗将尽，却等不到黎明日出。

20年，历史的惊鸿一瞥，人生的坎坷一途。无力与韧性，顺应与自救，苦难与乐观，渺小与伟大……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把原本平淡的日子变得刺痛一般真实起来。就像文学家们说的那样，病毒起到了“揭露的作用”，让我们看见了社会的裂缝，意识到要用自己的肩膀扛起需要全力奔赴的生活。这一期，《中国工人》特别刊出《奔跑！向着光的方向》，用重新跑入滚滚生活洪流的5位年轻一代，向过去三年里的停滞和静默“告别”，冀望和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见”。

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总要保持奔跑的姿态，因为只有前方才是光明和未来。对于已经创刊99年的《中国工人》而言，同样需要不停向前奔跑，跑过上海和武汉的白色恐怖，跑过延安宝塔山的盎然生机，跑过新中国百业复兴的沸腾年代，跑向创刊百年的全新历程。

刚刚过去的2月7日，《中国工人》学习强国号正式上线。我们试图用这样的“仪式感”，向83年前的2月7日致敬。正是在那一天，《中国工人》在延安再次创刊，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他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

这是我们的初心。秉持初心，《中国工人》正在拼力拥抱日新月异的时代，把99年前粗陋排印文字里的精神气质，延续到一切都在数字化的智慧空间，永远不会停止自我革新的步伐。

就在本期杂志付印之际，《中国工人》联合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和学习强会推出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平台的访问量，已经悄然突破5.4亿次。更早之前，《中国工人》承建的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3D虚拟沉浸式展馆，同样悄然打开了构建工会“元宇宙”的小小窗口。在奔跑的2023年，《中国工人》还将持续推出新的融媒体知识产品，积水成渊，聚沙成塔。

从笙管琴瑟的袅袅余音，到万里铁轨的铿锵巨响，再到茫茫林海的寂寞守望，有中国工人的地方，《中国工人》的记者就要出现在那里，以笔墨和影像记录时代。惟其如此，当这本1924年创刊的红色杂志迎来100年的历史节点，我们才能有勇气告慰革命烽烟里的先驱前辈。

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无论何时何地，只有日拱一卒，才会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这是我们的决心，朴素的决心。

李瑾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衙斋卧听萧萧竹

如果没有真正融入社会底层的生活，“想劳动者所想，急劳动者所急”就是空话。哪怕在办公室里忙成“996”，类似超龄农民工禁入建筑施工现场的“清退令”，依然会接连不断地出现。

静悄悄的午休时间，编辑平台却忽然热闹了起来。原来，正刷手机的小编们发现，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呼吁打破“35岁职场门槛”的提案上了微博热搜。

小编们的惊讶与关注，当然不仅是因为一条热搜，更多是因为吕国泉的工作身份来自全国总工会。或许正是这样的身份，让他和更多工会界委员的提案有了浓浓的“工”味。

在我看来，来自工会界委员们的提案故事里，浓缩着中国工会的历史标签。比如他们收到的那封署名“大龄青年”的“群众来信”，仿佛回到了工人把心里话都说给工会的沸腾年代。再比如他们直言35-39岁年龄组的职工，竟然有94.8%感觉有压力，像不像电视剧里敢于为职工利益拍案而起的工会主席？

这一次全国两会，耸人听闻的“雷言雷语”几乎绝迹了，为社会大众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发声越来越多了。有人提出监管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道出的是工薪阶层陷入超时工作、无偿加班之苦。有人提出强制实施带薪年假，呼应的是制造业职工想要“休息一会儿”的强烈渴望。

在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频频传出这样的呼声，让人想起了清代诗人郑燮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能够把最底层的民心民意带到人民大会堂里，空守在自己的衙斋里是不行的，那样也只能听到竹叶的萧萧作响。缺乏调查研究的谋略定策，纵有千般好意，仍有可能适得其反。

这些天的朋友圈里，热转过“知识分子”微信公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她们反对延长产假》。为什么女性没有为延长的产假众口叫好？为什么强制延长男性产假反倒会对女性有利？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回答的。如果没有真正融入社会底层的生活，“想劳动者所想，急劳动者所急”就是空话。哪怕在办公室里忙成“996”，类似超龄农民工禁入建筑施工现场的“清退令”，依然会接连不断地出现。

“好心办不成好事”的背后，潜藏的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新任总理李强在首次记者会上的那句话——“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相同意思的警句，近百年前也曾被毛泽东说过——“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

就在李强总理记者会的第二天，全国总工会正式发布了启动县级以上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的消息。全总机关率先派出8个蹲点组，26名干部离开北京开始蹲点生活，感悟“高手在民间”的智慧。屈指算来，基层蹲点已经是第三轮了，少了一些仪式感，多的则是形成制度的规律化。这样才好，一件事情只要认真做下去，总会功不唐捐，必有回响。

期待26名全总机关蹲点干部的故事，他们读懂劳动者渴望“一口热饭、一张床铺”的故事，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故事。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万物万事，皆是此理。

李强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听从你心

在释怀一切之时，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自己的心，因为我们需要长出自己灵魂的牙齿。

一场细雨，几次沙尘，北京的春天飞一样地来了。很多因为疫情被迫关闭的店铺重新有了蓬勃的生机，人潮汹涌来得比想象中的更快。

当然，比旅游者更先涌进北京的，还是打工的人。大都市的诱惑总是吸引着那些心怀梦想之辈，他们蛰伏在杂乱喧嚣的街巷，在内心的角落默默构筑只有自己知道的未来城邦。

签发这一期《中国工人》的稿件时，忍不住抄录了清洁女工王柳云的几行自白。在我看来，这样的自白应当是从充满磨难的生活孕育出来的，然后久久地留驻在她的内心。

“智慧高的人你就走在高层，平凡的人你就走在平凡的路上。我怕我的灵魂死掉，所以不停地读书、画画，‘喂饭’给它。”

“人生的起点各不相同，我们也许逃不过苦难的宿命，但不要因此心灰意冷。要继续前行，还要偶尔驻足，欣赏路边的花。”

让我惊讶的是，王柳云已经56岁了，6年前开始学习画画，现在漂在北京的一幢写字楼，每天清洁厅堂廊道。空下来的时候，她寻到一处卫生间的隔断，摆进自己的画板、画笔、颜料和调色盒。我能想象出她在那里独自作画时的快乐，因为我知道，哪怕是低到尘埃里的人生，也挡不住想要开出花朵的灵魂。

生活如斯，幸福如斯。命运给王柳云的前半生泼洒了黯淡的色调，但她坚定地选择用鲜艳的颜料重涂未来。她感恩鼓励自己画下去的那个人，说那是她的一道光；她喜欢漂在北京，因为不必理会身边的一切，只需安静地过好自己的日子，看守好自己的灵魂。她每天开心地笑，仿佛想要告诉这个世界，属于她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这样一位清洁女工的故事，像极了真实版的“月亮与六便士”。王柳云不会是简单的个案，还会有更多的“王柳云”挣扎在城市的茫茫人海，或在泥水之间，或在塔吊之上，或在井隧之深。相同的是，他们都如春笋般挣扎着向上生长，活成自己理想的样子，活成独立自主的灵魂。他们是无名之辈，他们更是生活巨幕里勇敢的所在。

内卷与躺平并存的时代，焦虑与妥协如影相随。有的人选择接受囚徒困境式的无限消耗，穿上了破旧的红舞鞋；有的人选择接受热血沸腾后的心灰意冷，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但是，只要内心还有困惑和挣扎，“卷”与“躺”的纠结就不会停止。何况，时代的变化还在收回很多人的选择权，AI开始抢夺劳动者的饭碗便是例证。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喧嚣与浮躁，让我们更加喜欢王柳云，喜欢这个尘埃里开出花的人生故事。她和她的理想告诉我们，治愈苦难的从来都不是时间，内心的释怀才是真正的解脱。我们可以对压力和焦虑释怀，可以对冷漠和孤寂释怀，但在释怀一切之时，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自己的心，因为我们需要长出自己灵魂的牙齿。

这一期《中国工人》出刊后，我们期待王柳云能来杂志社做客，把她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同事。办公楼四层的职工书屋，阳光温暖，有咖啡有清茶，是一个作画的好地方。至少，我们可以在那里摆一幅王柳云的油画，提醒自己在每一次彷徨的时刻，叩问灵魂的答案。

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生活留给每一个人的未来都充满着不确定性，那就沿着不同的生命之途向前走吧。所谓的顺其自然，归根结底都是接受了内心的决定，都是“听从你心”。

李健



扫一扫
关注“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答卷

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努力作答的每一天。

是的，我们的办公平台最近异常焦虑。

一边是上年启动的重要图书采写事项推进艰难，滴答滴答的时间压力正在积累到爆炸；一边是陷入多线工作交错杂糅的团队疲惫不堪，任务图上的未结项目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很努力，但“胜利”似乎还很遥远，焦虑的情绪不受控制地在心底滋生蔓延。

一个团队的慌乱状态，或多或少地投射出一点复杂的社会心态。专家说人口红利没有消失，只是变了内核，但是35岁的职场困扰还未消失，大厂收缩扩张后的裁撤消息又接踵而来。日渐明显的向下兼容中，新一轮选择与被选择里藏着洞见、认知和人性。

幸好，我们的社会并不总是迷茫和犹疑。不管怎样，信仰的光依然明亮，理想主义澎湃而具体，价值观的表达敏锐而坚定。

大英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晚清百态”，在抖音里满是博主发出深感“屈辱”之后的民族复兴誓言。一位叫“法老”的说唱歌手创作出了《小河淌水1952》的歌曲，并公开宣布永远为底层劳动者唱歌，还真的捐出了去年上百万元的演出收入。脱口秀演员的恶劣段子触碰的底线，是被买票寻找快乐的“人民群众”披露的。它告诉我们，不管有多少抹黑和歪曲，社会的良知永远都牢不可破。

世界如此丰富，焦虑与坚定同在，迷茫与确信共生。仔细想来，这一代人的焦虑可能源于不确定性的加剧，但焦虑不应成为生活的常态。这个红色的五月，人们依然在寻找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安宁，底层劳动群体的诗歌骤然繁荣，那些从尘埃里绽放的诗句，带来太多的讶异、感动和欣赏。我们有多坚强，我

们的未来就多有希望。

世间万物的变化中，总有一些规律可循。能够洞见规律的人，才会不为变化所焦虑。在时代的潮水涨落中，我们需要锻炼跟随潮水方向的敏锐，更要拥有长成参天大树的定力。

这一期，《中国工人》开始了新一次改版。我们依然会坚定“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的使命，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锐化这一立场的同时寻求新的改变。我们更坚定地助推劳动榜样闪亮登场，也更确信我们有责任让无名之辈进入公共视野；我们更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更确信我们所有的表达都是源自于亿万劳动者的内心世界。

每一天，《中国工人》都在努力保持成长的姿态。在出版杂志的同时，我们试图交上一份新时代的融合答卷。即将推出的“工途——中国红色工运地图”，考验着这个年轻团队的专业能力、学习能力、审美能力和应变能力。尽管我们为此产生了那样多的焦虑，但它们不过是持续进步持续蜕变持续向上的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伴生物。

时代给了我们工具，就看我们是否拥有强大的学习吸收能力去用好它。正如我们已经在学着使用人工智能，提高各类融合项目的工作效率。正如我们每一天都在吸收新知，在一次又一次解题的痛苦中不断变好。

时间不停，责任在肩。

从1924年创刊到2024年创刊百年，《中国工人》会交上一份怎样的答卷？

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努力作答的每一天。

我们的征途，依然是星辰大海。



扫码关注
“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

李健



理想的 行动



预见2018

最是新春好时光

——关于劳动者生活变化的八大猜想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这

是新时代的中国。2018年的时光大门徐徐开启，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置身于恢弘的历史长卷之中。

这是中国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不仅描绘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发展蓝图，更坦诚列出“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这些老百姓最关注的焦点。

世间万事，民生为大。当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更多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亿万职工群众的生活必将发生更美好的变化。

—猜想 1—

国家的“钱袋子”， 劳动者的新实惠

2017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家“钱袋子”的“掌门人”，财政部长肖捷在部署2018年财政工作时，频频释放出国家“钱袋子”致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全新信息。

《中国工人》注意到，从“坚决托住基本民生需求的底”到“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支出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依然被置于重中之重，这显然标志着公共性、公平性已经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底线原则。

依照此次财政工作会议的部署，教育仍然是2018年发展的重点。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都将让关心自己子女教育的工薪阶层享受到实惠。

与此同时，直接涉及劳动者幸福指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亦将在新的层次上得到加强。2018年，政府将继续促进农民工和去产能职工实现多渠道就业创业，进一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开展个人所得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加强对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兜底保障。

当然，财政资金还将更多投入到那些与老百姓生活须臾相关的领域。无论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还是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无论是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还是加快水污染防治，这些促发展与惠民生相结合的有力举措，一定会让投下去的“真金白银”，变成劳动者的新实惠，让亿万职工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猜想 2—

重点群体增收， 咱劳动者要涨薪了

2017年12月，北京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激

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分别对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有劳动能力的困难居民等七类群体，提出了8个方面27条差别化的收入分配激励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提出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一年以后，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增收计划，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

尽管表述方式有所差异，对重点群体实施精准激励依然是各地增收计划的核心要义，利好措施可谓清晰而明确。在北京，网络商户从业人员可以享受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低保人员就业可以享受就业奖励和救助渐退，技能人才工资增



寒冷冬日里，北京城建集团工人在北京新机场主航站楼顶部建设施工 雷声/摄



让劳动者的收入增速不要“跑输”GDP,这是实现“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关键前提。

速可以高于其他岗位。在上海,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力度将明显加大,政府鼓励企业采取协议薪酬、持股分红等方式,试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

让劳动者的收入增速不要“跑输”GDP,这是实现“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关键前提。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连年下降,却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所有这些,使得“区分群体、分类施策、促进增收”的行动愈显急迫。

2018年,还会有更多的省份出台相关增收计划,为广大劳动者“造船”“搭桥”“建网”。其中,“造船”是打造能容纳更多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搭桥”是为摩擦性失业和劳动能力不足的群体提供“过渡带”和职业能力培训,“建网”是建立为困难群体兜底的社会保障网。这些政策“红包”越来越多,工薪阶层的钱包自然会越来越鼓。

—猜想 3—

启动中央调剂,基本养老金“十四连涨”

进入2018年,我国失业保险总费率将继续执行由2%阶段性降至1%的优惠政策,失业保险金的标准亦将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实发工资藉此微幅增加,失业人员也将领到更多的失业金。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人均失业保险金从707元增加到1051元,年均增长10.4%。此次确定逐步将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的90%,旨在进一步保障公民失业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效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人员还有相应的医疗、丧葬抚恤、就业服务等待遇项目。

2018年,尽管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形成一定支付压力,但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启动,加上部分国有资本被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基本养老金的“十四连涨”却几乎不会有任何变数。

《中国工人》注意到,为了确保从2005年开始的这一连涨趋势得以延续,相关部门正在不断出台一揽子政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以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明确宣布,2018年将先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藉此调剂余缺,均衡地区之间由于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流动导致的抚养比差异过大带来的养老保险负担。

毫无疑问,接连推出的这些完善基本养老金的积极措施,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避免由于政策形成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减轻下一代人的养老负担,通过国有资本收益给养老金制度“输血”,更将有效保障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化解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猜想 4—

结束“试行”,劳动者迎接“第二金”

在试行了14年以后,《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终于被经过修订完善的《企业年金办法》正式代替,并将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从2018年开始,“五险一金”将加快向“五险二金”转化过渡,越来越多的职工有望得到保障自己生活权益的“第二金”。

有关专家在接受《中国工人》采访时表示,企



安徽淮南市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大厅里，工作人员整理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审批表格

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每个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均将建立个人账户。其中，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2%。

依照《企业年金办法》的规定，如果没有规定的例外情形，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的企业缴费及其投资收益，将在最长8年的期限内完全归属于职工个人，并在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亦可全部或者部分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领取待遇并享受相应的继承权。

2018年，“有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将成为劳动者寻找就业单位的重要条件。毕竟，在原有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企业年金可以另外增加一份养老积累，进一步提高退休后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拥有这样完整的职工薪酬体系，企业才会有人才吸引力，让劳动者安心地奉献智慧，共同进步，实现“双赢”。

—猜想 5—

花钱有“道”， 正常福利一个都不会少

2017年岁末，全国总工会就员工福利发放做出新规，首次明确提出职工婚丧嫁娶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金，职工退休离岗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原本属于工会内部规章的《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骤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中国工人》注意到，《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旨在明确指导基层工会如何把握涉及职工各项开支的政策界限。依此办法，工会经费用于集体福利支出时，可以在新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并可结合实际采取便捷灵活的发放方式。基层工会还可以在工会会员生日时，发放生日蛋糕或指定蛋糕店的蛋糕券；在工会会员结婚生育生病住院、退休离岗以及本人或直系亲属

去世时，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金。

由工会发放的这些职工福利，其实并不是企业全部的职工福利。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清理整顿违规福利的进程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恶意搭车”，趁机减少甚至取消了原本正常的职工福利，从而形成了普遍存在的职场“福利饥渴”。从这一意义而言，基层工会为自己的会员明确“福利主张”，力挺职工拥有正常福利，难怪引得那么多工友们的“喜大普奔”。

在任何时候，劳动者的正常福利都应该得到最充分的保障。这既是公共常识，也应该是市场惯例。在工会经费可以用于职工集体福利支出得到再次明确之后，那些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动者还是赶快递交入会申请，争取早日成为工会组织的一名会员。只有这样，自己该得的正常福利，才能一个都不会少。

—猜想 6—

根治欠薪， 农民工工资实行“月薪制”

困扰农民工收入权益的欠薪问题，有望在2018年得到有效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此前印发《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在工程建筑领

域加快推行农民工工资按月结算，并在2019年12月实现全覆盖。这意味着从201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将要享受到“月薪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年领一次”。

《中国工人》在多处建筑工地采访中发现，“月薪制”让农民工们感到心里更踏实。由于现行的工程款结算方式，建筑业农民工往往是每月只能支取生活费，春节返乡前才能拿到全年的工资。与此同时，“包工头式用工”带来的层层转包和劳务分包，也使得一些实力不足的企业把“一年领一次”当成缓解资金周转压力的手段。

事实上，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已经明确规定“薪酬应当以货币方式按月付出给劳动者本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应当是刚性的法律条款，往往被那些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恣意“架空”，把拖欠工程款与拖欠农民工工资搅成一笔“糊涂账”。因此，面对2020年彻底完成农民工薪酬无拖欠的最后期限，在工程建筑领域全面实施农民工“月薪制”堪称是“终极大招”。

除了农民工“月薪制”，国家有关部门还将在2018年推出一整套“组合拳”，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集中发力。一是建筑行业实行实名制，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的工资卡账户中。二是启动政府信用管理体系，拖欠工资的建筑企业不仅要接受处罚，还会被纳入“企业失信黑名单”。三是农民工试用期10天以后必须持证上岗，月底由农民工签字核对考勤工资表后再进行工资发放。

—猜想 7—

执法年来了， 职工健康有了“护佑神”

通常来说，防止矿井坍塌或者设备爆炸，都会被视作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置于工作场所的粉尘危害，往往不会被企业经营者放在心上。然而从2018年起，全国安监系统将组织开展力度前所未有的“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狠查严惩存在尘毒等重点职业病危害的企业。

《中国工人》从全国职业健康监管监察工作会议获悉，2018年已经被列为“职业健康执法



2017年4月20日，西安农民工展示领到的工会会员证

年”，重点检查尘毒危害严重超标的企业，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暂扣吊销证照、联合惩戒、停产整顿、关闭取缔、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李兆前同时强调，到2020年基本实现尘毒等重点职业病危害的有效遏制，到2035年职业病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现实生产中，由于安全投入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相当一部分企业漠视粉尘危害的存在。安监部门在山东一家特种水泥有限公司发现，现场操作人员普遍没有佩戴防尘口罩，患上肺部疾病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在有的员工体检中发现双肺存在可见散点状小阴影后，企业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即便是员工本人也觉得“不打紧”，缺少必要的职业健康常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开始的“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愈显重要，有望让那些尘毒危害严重超标的企业曝光天下，让劳动者工作场所的职业健康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目前，各地各级安监系统已经全面行动，加大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工作的执法力度，启动省市异地互查等强硬措施，推进尘毒危害治理，切实改善员工作业环境，有效维护员工职业健康权益。

— 猜想 8 —

技能走俏， 迎接更猛烈的机器换人浪潮

当机器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流水线上的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终究都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技术能不能跟上浪潮的激流”。

2018年，对于亿万产业工人而言，新的一次迭代大幕已经拉开。《中国工人》在采访中发现，麦肯锡研究报告已经得出结论，45%的人类活动工作可以由机器来替代。科大讯飞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更是直言，人工智能比想象要来得快，2018年超过300万员工要向机器人老板汇报工作，“这完全有可能”。作为最早推广机器人工业应用的地方，广东省东莞市将在2018年建成1-2个

机器人产业园，同时在全市80%的工业企业实现“机器换人”。

如果一切顺利，阿里巴巴集团打造的第一家“未来酒店”将在2018年投入市场运营。按照这家智能化酒店的设计，客房服务的物品完全由机器人运送，这位不需要小费、不知道疲倦的员工可以自行决定搭乘哪部电梯，到达哪个楼层，敲响哪间客房的门铃。对于拥有250万间客房的中国酒店业来说，劳动者未来面临的冲击不难想象。

不过，即便工厂里的机器人再多，最终依然抢不走技术工人的“饭碗”，因为“机器代替不了人的创造性”。特别是在发现问题、流程再造等方面，技术工人的优势不可替代。可以预见的是，从出大力、流大汗到拥有更高素质和更多智慧，2018年将成为亿万产业工人的“转型之年”，紧跟时代脚步，努力攀登世界制造业的巅峰。



2017年2月22日，江苏省太仓市伍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自动化焊接车间内，60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生产线上焊接汽车横梁

世间万事，民生为大。
当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
更多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亿万职工群众的生活
必将发生更美好的变化。

摘自 NO.1 2018《预见 2018，最是新春好时光》

毫无疑问，

身份、岗位和生活上

存在的不平等，

必然带来认知歧视、使用歧视、

管理歧视、经济歧视和人格歧视。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

农民工就处于权益表达的盲区，

成为资本和劳动力

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



争先

2.8亿人的利益表达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创生与成长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8

年2月的第一个早晨,一份刊登在广东主要媒体的名单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此前一天,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依法选举产生162名代表广东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在这份共有162个名字的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6位农民工的名字赫然在列,分别是米雪梅(女,43岁,籍贯甘肃)、苏荣欢(34岁,籍贯广东)、李先兰(女,34岁,籍贯湖北)、杨飞飞(33岁,籍贯江苏)、余雪琴(女,34岁,籍贯江西)和曾香桂(女,39岁,籍贯湖南)。

……

这是广东最近四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

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0人;
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人;
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人;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人。

出现在广东政坛的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各个行政区域。

今天,当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8171亿人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也将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

无论还有多少稚嫩和忐忑,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不同社会阶层的政策博弈,正在因为他们的出现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

尴尬的0

这是1995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1月,苏北睢宁,田野大地上的一个普通早晨。

朱雪芹决然地扛起铺盖,在父母追随的目光中渐行渐远。她的蛇皮袋里,除了最简单的生活用品,还有更多对外面世界的无限遐想。

这一年,朱雪芹18岁。和她一起走向人生远方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农民工。

这一年,发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农民工流动大潮,已经进入到第17个年头。这

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正在希冀中经历磨难,在嬗变中等待淬火重生。

这一年,在农民工居留最多的广东省,一个通常被称为“六不准”的严限政策正式出台,包括用工单位一律不准新招收外省农民工,甚至包括返乡探亲的农民工不准携带新民工就业。

这一年,在广东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有限公司,为了惩罚一位在工作台累到打盹的“违规”女工,外商女老板喝令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120多位农民工下跪。当工友们流着泪水屈辱跪倒一片时,来自南阳的孙天帅宁死不跪,在女老板的辱骂声中丢掉了工作。

以今天的眼光看,1995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似乎匪夷所思。然而,这样的场景却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

今天,当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8171亿人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也将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

毫无疑问,身份、岗位和生活上存在的不平等,必然带来认知歧视、使用歧视、管理歧视、经济歧视和人格歧视。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农民工就处于权益表达的盲区,成为资本和劳动力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千千万万农民工就像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野马,奔向每一处哪怕最微弱的希望之光,进而以超大规模的群体形态流动在经济活跃之地。

在打工女孩朱雪芹来到上海的11年后,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1.3181亿人。

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调查时间截至2006年末,被视为官方最新最

权威的中国农民工总量统计。它同时显示，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依然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这将意味着中国农民工的总量还将持续增长。

此时，艰难的博弈仍在进行。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承认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第一次要求城市政策把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相关问题纳入政府管理服务范围。

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40条政策措施。

……

然而，理想有多么丰满，现实就有多么残酷。在宏观政策不断为农民工开放绿灯的同时，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引发的恶性事件依旧接连不断。

2004年6月，《法制日报》公开披露新疆一处砖厂对农民工实施“集中营”式管理，个人物品统统没收，不许外出，不许交谈，每天只有两顿饭，每顿只有一个二两重的馒头。

2005年5月，宁夏石嘴山，农民工王斌余被拖欠的5000元工钱只拿到了50元，备受欺侮、数次讨要无果后，他向工头举起了刀，连杀4人，被判处死刑。

2007年6月，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窑奴工”事件曝光，情节极为恶劣。农民工们早上5点开始上工，一直要干到凌晨1点，才被像赶牲口般关进没有床的黑屋子里面“打地铺”，门外有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整整一年多时间，30多位农民工没有领到分文工钱，一位甘肃农民工甚至因为动作慢被铁锹猛击致死，尸体用塑料布裹住埋在荒山中。

这些持续发生的恶性事件，引起整个社会的深刻反思。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既是新的社会阶层，又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着超负荷劳动，薪酬水平偏低且常被拖欠，社会保障缺失。但是，由于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工作地

分离，他们的公民权利无处行使，政治权力和话语平台陷入盲区，无从依靠政策博弈改变自己的弱势命运。

2007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正在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

共有7个部分的说明大约2000字，第6部分“关于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名额”更是只有208个字。但是，它却意味着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0的尴尬”即将结束，亿万农民工实现自身权益表达的一天即将到来。

盛华仁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包括朱雪芹在内的农民工们，即将迎来表达自身权益的那一天。

从0到3

十一届全国人大组成人员“应有农民工代表”的消息，犹如巨石击水一样，迅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引起连锁回应。

此前，在个别农民工高度聚集的县市和乡镇，农民工当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新闻已经偶有出现。在中国小商品集散地浙江省义乌市，早在2001年便有农民工当选为所在地区的乡镇人大代表。一年以后，11位农民工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

然而，农民工走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大幕，还是从2007年3月真正拉开。

2007年下半年，各地省级人大换届工作正式启动，并将在新一届省级人大首次会议上选举出本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7年11月14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开透露，十一届广东省人大将有6名农民工代表，分别

产生自广州(2名)、深圳(2名)、佛山(1名)和东莞(1名)。作为拥有超过2300万农民工的中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这将是农民工第一次当选省级人大代表。

“农民工”与“人大代表”的身份融合,就这样成为这一轮省级人大换届的最大亮色。

在北京,2名农民工正式当选十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在上海,2名农民工正式当选十二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在重庆,51位农民工正式当选三届重庆市人大代表……几乎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农民工当选省级人大代表。

2008年1月,《人民日报》更是以《浙江省人大首位农民工代表开始履职》为题,报道了保洁员徐辉代表的两份议案,分别涉及环卫工人安全和农民工享受廉租房优惠政策的问题。

至此,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现,已经水到渠成。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过3天,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此时,那个13年前闯荡上海的打工妹朱雪芹,已经从缝纫工成长为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她的名字和习近平一道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当朱雪芹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时,老人喜极而泣。

十一届全国人大共有代表2978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字,最终定格在“3”。

从0到3,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历史的一小步。

从0到3,这是中国农民工阶层走向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步。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2008年3月16日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左)、胡小燕(中)和康厚明在大会堂合影。

预备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上海代表团驻地。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更好地反映所代言群体的心声。

胡小燕说,“我这两天主要是学习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酝酿最终的建议”。康厚明则说,自己与胡小燕有着相同的想法。最年轻的朱雪芹也感到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人大代表就是要替人民说话,我们代表了一亿多农民工,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聚光灯前,难免有几分稚嫩。讨论会上,多少有一点忐忑。但是,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依然努力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第一次亮相全国人代会,朱雪芹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仗义执言——

“现行的社会保险政策规定,职工必须累积缴纳社会保险金满15年后,才能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农民工流动性大,今天在这里打工,明天也许就会到别的城市。建议有关部门建立综合保险全国联网机制,让一张卡内的保险金可以进行

累积，并可以在异地使用。”

第一次亮相全国人代会，胡小燕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问题发声——

“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今天开工明天就走人，对外来工讨薪很不利。这种情况下能否让企业交保证金，就算老板跑了，打工者也有收入，不用等工厂的固定资产拍卖再收工资，因为这样时间拖得太长了。”

第一次亮相全国人代会，康厚明为农民工住房困难问题建言——

“这些年来，政府建的廉租房总量太少，并且首先满足当地居民，能够住上的农民工非常少。政府每年可以按土地供应总量的一定比例来建廉租房，让更多买不起商品房的农民工也能有栖身之所，不要让廉租房成为花瓶。”

一个细节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工友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同样有趣的是，温家宝总理参加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认真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后，转头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胡小燕在农民工眼里成了更耀眼的明星，甚至有人找她索要温家宝的电话。在北京开会的十几天里，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胡小燕，竟然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

事实上，从当选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刻开始，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验的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生活已经注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胡小燕取消了原来每天两小时的午休，开通了博客，公布了QQ号码，征求农民工对政府的意见，甚至还和好奇的美国领事馆官员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座谈。那段时间，每天预约采访她的电话超过20个，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所以，我要尽全力做一名合格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胡小燕的心声，也是康厚明和朱雪芹的共同心愿。

从3到31

从2008年开始，每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人们

都能惊喜地发现，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作为仅有的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3个人的成长就是亿万中国农民工成长的象征。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胡小燕坦言自己从未担任过乡、县、市、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甚至“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面对美国记者“当选人大代表后的下一步打算”的提问，她的回答更是不无朴实——“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很快，面对同样的问题，无论是胡小燕、康厚明还是朱雪芹，都会给出更为成熟的回答——“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31位农民工代表名单

(按姓氏笔画)

北京市	巨晓林	朱良玉
天津市	薛海英(女)	
山西省	董林	
内蒙古自治区	薛志国	
上海市	朱雪芹(女)	周振波
江苏省	曹勇	
浙江省	吕华荣	许忠明
	杨晓霞(女)	陈腊英(女)
安徽省	刘丽(女)	
福建省	谢利英(女)	谢智波
山东省	王钦峰	陈雪萍(女)
	周惠(女)	
河南省	王刚	王馨(女)
	张全收	
湖北省	孙东林	
湖南省	张晓庆(女)	
广东省	叶国先	易凤娇(女)
	曾香桂(女)	
重庆市	刘钟俊	
四川省	樊萍(女)	
云南省	阮永川	
陕西省	胡春霞(女)	
甘肃省	康仁	

名单为《中国工人》通过媒体公开报道整理。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农民工养老及完善劳务派遣等，“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成色十足。

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党和人民的大考”。面对中国农民工阶层日益壮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普遍共识。

2013年3月，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开幕。大会发言人傅莹在介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时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

从3到31，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了更多农民工的存在。

彼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收入、住房、社保、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障碍，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距。

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朱雪芹当选连任。

胡小燕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打开。

康厚明的身影依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只不过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代会的会场。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26位农民工党代表中，就包括康厚明。

中国“草根阶层”的权利保障，呈现出高层次、多样化的鲜明特点。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

环卫工王月清，保安员朱良玉，保洁员陈腊英，营销员张晓庆，物业管理员曾香桂、洗脚妹刘丽……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无论是在全国人大会议的会场还是驻地，农



2010年3月5日下午，胡小燕参加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并作了发言。中间被省委书记打断过几次，提了几个问题，胡小燕回答得既流利又干脆。



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开始前，来自重庆代表团的农民工人大代表康厚明步入会场。



2013年3月10日下午3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回答记者提问。

无论是在全国人大会议的会场还是驻地，农民工代表都是最容易被认出的人。

民工代表都是最容易被认出的人。

依照《工人日报》的描述，周振波说话嗓门大，声音沙哑，交谈时习惯把对方称为“老师”；康仁皮肤黑红，总被误认为是来自藏区的少数民族，说话一口甘肃会宁乡音；王月清看起来内向沉默，脸上满是常年东北户外工作留下的痕迹。

这些与众不同的印记，没有影响31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为自己的群体“代言”。从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培训到养老，农民工关心的问题都能在他们的建议和发言中找到。

2015年，中国的高龄农民工总量达到4685万人，最早进入城市的外来务工者开始被称为“打工爷爷”。这些人背井离乡干着最苦最累的体力活，缺少相应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甚至为了躲避有的地方对农民工年龄的岗位限制，不得不专门染黑了头发。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多位农民工代表为“打工爷爷”的境遇集体发声——

王馨代表提交建议，呼吁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

谢利英代表呼吁立法保障高龄农民工的权益，希望有关部门对那些不给高龄农民工交社保的单位严肃查处；

曾香桂代表提醒，政府部门应当注意到高龄农民工的生活保障非常脆弱，要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保障和薪酬，不能干最苦最累的工作却拿着最低最少的工资；

朱雪芹代表直言高龄农民工学历不是很高，只能靠力气吃饭，维权时很弱势很艰难，政府应该在政策上给他们更多关爱，提供一定比例的岗位优先录用；

刘丽代表希望能公共资源均等化，政策一定要切合实际，不能专家学者领导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去想，要能够满足高龄农民工的需要；

……

从3到31，这意味着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会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群体的多

元化成为重要社会特征，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诉求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参与，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一旦它真正成长起来，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天平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倾斜，法律和决策的制定将会进一步公平和公正，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

0的未来

时光荏苒，又一个5年过去了。

2018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庄严开幕。

此前，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所增加”。

消息传出，波澜不惊。今天，人们已经接受并习惯农民工出现在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

3人变成了6人，广东选出的新一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人数翻了一番。

显然，今年3月的北京，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已经形成一个远远超过31人的方阵。

直到今天，这些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上，依然保留着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当选那个年代的印记——出身农村，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岗位起步，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

然而，与当年的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截然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拥有了更高的议政能力和知识素养。尽管他们还是身处一线生产岗位的劳动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站在整个农民工阶层的高度，更善于运用民主的力量实现自身群体的利益表达。

互联网的海量数据，记录下11年前那些对于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质疑。

2007年，天涯社区有过一篇《且慢为农民工将成全国人大代表欢呼》的热帖。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参政议政绝对不能走向娱乐化，全国人大

代表要有为人民说话的意识，还要有为人民说话的表达能力，“谁能保证农民工代表具有相应的参政议政能力”？

其时，恰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二审”。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措辞强硬，指责有关维护工人权益的条款将会增加成本，倘若不予修改将重新考虑在华业务的布局，这被普遍视为“以撤资相要挟”。

面对资方这样强大的组织优势、资源优势、知识优势以及表达优势，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有多少进行政策博弈的资本？怎样才能为农民工阶层构建起均衡的利益表达格局？

所有这些疑惑，时间都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没有调研经费，没有工作助手，有的只是一颗和农民工仅仅相连的心。最艰难的日子里，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努力撑了下来。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年，胡小燕在媒体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结果只能用一个“爆”字来形容。每天，来电上千次，短信上千条。最多的时候，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4000多人等待加为“QQ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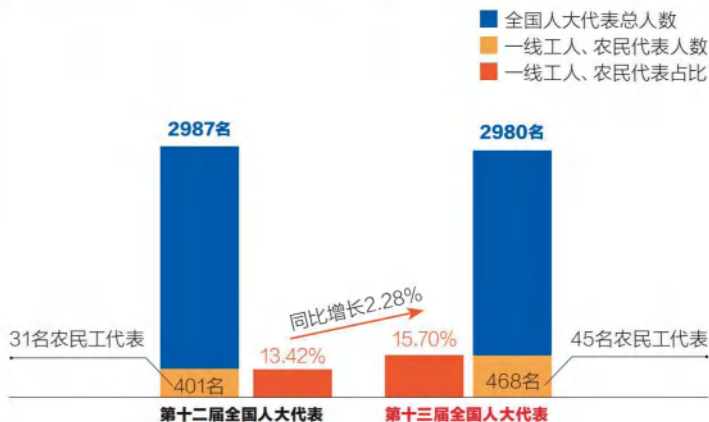
人数虽少，依然需要团结产生力量。朱雪芹说，她和胡小燕、康厚明联系密切，沟通各自关注的农民工权益问题。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从农民工社保异地转移、劳务派遣人员利益维护、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恶意欠薪入刑到建立欠薪追讨机制，背后都有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力推动。

无论是否还在参政议政的岗位上，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都被深深打上“农民工代言人”的烙印，这让他们未来的生活已经无法离开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

今天，胡小燕落户佛山，康厚明落户重庆，朱雪芹落户上海，都完成了自己人生通道上的身份转型。但是，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更多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走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平台。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95后”的农民工代表已经开始出现。在亿万农民工向上流动到工人阶层的历史进程里，这些农民工代表将会深切地表达自身群体的

第十三届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对比



利益诉求，借助政策和体制的力量，致力实现农民工阶层与工人阶层的“无缝对接”，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整合与稳定。

农民工，这一农民与工人两种身份嫁接而成的名词和阶层，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而壮大，并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完成而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或许，就在不远的历史转角处，千百万农民工都将像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一样落户城市，成为中国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那么，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未来呢？

未来，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还将会越来越多。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2.8171亿中国农民工仍然需要自己的利益表达。

然而，历史潮流浩荡无边。

“尴尬的0”，这是利益表达的空白。

“从0到3”，这是微弱声音的响起。

“从3到31”，这是群体力量的强大。

但在更远的日子，我们一定会合上厚重的历史档案，庆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0的未来”。因为那一刻，“农民工”和“工人”的身份将不再泾渭分明，而是真正水乳交融在一起。

是的，那就是“0的未来”，光明而闪耀。

因为，它更是属于中国农民工的最好未来。C

当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
拥有 2.8171 亿人的
庞大劳动者群体，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也将成为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
重要力量。

摘自 NO.3 2018《追光：2.8 亿人的利益表达》





重返
荣耀之巅

技术工人的奋斗时代来临

文|本刊记者 李瑾

2018

年3月22日，北京。

各大新闻媒体接收新华社电讯稿的专线电脑上，突然跳出一份关乎亿万中国技术工人的文件——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全文如下。

……

第二天，这份全文接近4500字的文件，出现在《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报纸的头版。

依照惯例，此时正是全国两会通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的密集发布期。与《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一同出现在报纸头版的，便是新一届政府谋划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

“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进行发布，足以显示出它的份量！”多位接受《中国工人》杂志采访的工会界人士说，“它抓住了技术工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的高度。”

事实上，《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的第一句话——“为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同样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

参与《意见》起草会稿的相关人士对《中国工人》表示，《意见》作为产改方案的配套文件适时发布，标志着党和政府正在不断推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全新举措。“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技术工人的奋斗时代来了！

辉煌时光：沉淀历史角落

在年轻人热捧的“知乎”网络社区里，有这样一则提问——“什么叫八级工？”

被网友顶赞到最前面的回答，读起来竟然让人有一丝莫名的感伤。

“爷爷以前是某国营厂八级工，据说，困难年代一个月工资一百多。依稀记得小时候出去踢足球，爷爷骑二八大杠自行车送我去，从出门到球场一路都有人和我爷爷打招呼。当时的六级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八级工基本上就是扫地僧的存在。突然好想我爷爷。”

今年62岁的俞晓群是中国著名的出版人，编印的图书从内容到装帧都堪称精美，这显然与他年轻时当过工人的经历相关。

那段岁月里，八级工是俞晓群最崇拜的人：

“老师傅们技术一流，别人解决不了的事情，他们往往能手到病除。所以，晚辈见到大工匠，都会恭恭敬敬，连厂长、车间主任也会敬他们三分。”

翻开历史，八级工的出现和八级工资制直接相关。

1956年，按照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的熟练程度，企业里工人的工资被分为八个等级。不同的是，有些技术比较简单的工种，最高的工资只能到四级或者五级。只有那些需要复杂技术的工种，最高的工资才可以评定为八级。

由此开始，可以拿到八级工资的工人，就成了备受崇敬的八级工。以当时的采油工人为例，一级工资标准为31.0元至43.2元，八级工资标准则是104.56元至131.76元。

参照当时每月伙食费不足10元的物价水平，八级工的工资令人羡慕不已。可以佐证的是文化老人季羡林的回忆——“当年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至2元，菜汤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工人日报》退休记者顾威的记忆中。那时，沈阳市多数重工业企业里，一级工的工资33元，八级工的工资108元，中层正职干部的工资99元。

顾威记得，邻居“王眼镜”是八级焊工，将自行车改装成摩托，动静很大，每次听到摩托的声音，父亲都说“王眼镜”回来了，口气中带着恭敬。

在企业工会当干事时，顾威曾被工会主席讲过的一件事深深触动。这位工会主席曾经是六级铸造工，每月工资加上补贴能有八九十元。后来，组织上调他当干部，他不愿意去，因为收入少了一大块，但又不肯不听组织安排，结果哭了一场。

“后来就不一样了，最大区别就是‘师不如长’。”在接受《中国工人》杂志采访时，顾威直言工人的收入早已不能和中层干部相提并论。“沈阳市一家全国闻名的企业，首席技师月收入一般也就5000多元，中层干部月工资加上年终奖现奖，全年下来可达二三十万元。”

岁月流逝，八级工慢慢成了传说中的“扫地

1956年，按照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的熟练程度，只有那些需要复杂技术的工种，最高的工资才可以评定为八级。



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社会时，毫不犹豫地把“当工人”列为最后的职业选项。

2007年，一组来自上海的调查数据令人震惊。面向4000户居民进行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成为最受追捧的就业意向。

其时，《中国青年报》就此发表评论，直言“99%的人不愿意当工人，这是现实教育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偏低直接相关。

9年以后，令人忧虑的状况依然存在。

2016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线工人代表李斌在上海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又披露了一组新的调查数据——

针对17个省市、41家企业的2577名职工调查发现，6.07%的受访者认为产业工人在当下享有较高社会地位，61.62%的受访者认为地位不高，32.31%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地位，只有1%的人不介意当工人。

相隔9年的两次调查，在“当工人”的态度调查中，竟然是丝毫不差的1%。还有多少人愿意当工人？显然成为全社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以八级工为代表的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中国工业发展不得不面临技能短

板带来的挑战。

技能短板：制约产业升级

今天，八级工的概念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它所折射的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一直让人们念兹在兹。

毕竟，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华丽转身，离不开生产一线技能的快速提升。

2017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李守镇委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做大会发言，提醒全社会关注中国工业面临的严峻现实。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史，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李守镇说，“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李守镇委员引用的数据，让整个会场陷入沉思：“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以2015年为例，中国单位劳动产出731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18487美元，而美国是98990美元。”

“简单地说，1个美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

我们13个人创造的财富,这也是我国工业制造‘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守镇分析说。

此前,由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已经发出中国劳动力供需严重不匹配警告。

这份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提供或制造的产品也逐渐向高附加值产品过渡,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还将不断上升,技能缺口的问题亟需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麦肯锡公司也公开提醒说,到2020年,中国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届时将面临22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在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背后,是收入分配与社会地位的失衡。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承认,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偏低,各项待遇保障比较弱,导致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企业对技能型工人短缺的问题反映非常强烈。

相比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技术工人的培养,着实值得我们效仿借鉴。

作为技术创新大国和制造业强国,德国技术工人的待遇得到了充分保障。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甚至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工业技师”。

数据显示,德国技工的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技校毕业生的工资几乎普遍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不少行业的技工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甚至高过大学教授。由于技工的工资高,每年有65%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如果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就被企业“订购”成为企业的准员工,企业要按规定向学生每月支付600欧元至800欧元的学习津贴。

在美国,技术工人的收入待遇同样得到保障,每月大多可以拿到3500美元以上的工资。每周工作40小时以外算加班,按照平时收入标准的1.25倍至1.5倍计算。从第51个小时开始,便要支付双倍薪水。

“当然,除了亟待提高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

水平,中国企业更需要提高的是对技术工人培养的重视。”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山东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说,“相当一部分工厂过多考虑眼前利益和投资风险,只想使用现成的技术工人,热衷互挖墙脚,舍不得在技能培训方面进行投入。”

事实上,培养一个高级技工需要不菲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以机床生产企业为例,培养一名初级工至少需要半年,把一名初级工培养成高级工则需要8至9年,期间需要大量的设备费用和培训费用。如果再算上5%~8%的成才率,技能人才的培养成本是一个大数字。

“摘桃者多、种树者少”,使得技术工人短缺问题日渐严重,危及着中国工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活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在访问北京时,特别提到中国应当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必须尽快解决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

海克曼列举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国家的GDP里,中国人力资本的投资仅占2.5%,美国则是5.4%;中国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占30%,美国则是17%。中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甚至低于印度(3.3%)和泰国(4.1%)。

“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很低,只靠他们不停地生产,肯定会有问题。”这是海克曼作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发出的警告。

“摘桃者多、种树者少”,使得技术工人短缺问题日渐严重,危及着中国工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活力。



要建立健全培养、考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在关键岗位、关键工序培养使用高技能人才,提高相应待遇,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国家行动: 出台激励计划

今天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持续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全力提速推进,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产业工人整体素质水平承受重压。

今天的世界,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浪潮刺激新技术持续涌现,直接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和工业结构调整。

经历过国际金融危机的磨难,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以美国为先导,世界工业强国相继从“去工业化”向“再工业化”转变,不断推出刺激制造业发展的庞大计划,争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战略制高点。

新的一次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就这样迎面而来。

技术工人有力量,中国企业才有希望。

中国企业有希望,中国制造才有未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才瓶颈和技能短板,尽快提升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素质迫在眉睫。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提出:“素质是立身之基,技能是立业之本……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

最高决策层的运筹帷幄,铺就了新时期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通途。

2017年2月6日,中央深改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这一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组长

李玉赋称,《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从5个方面提出了25条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提升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水平,是改革重点所在。

李玉赋强调,要建立健全培养、考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在关键岗位、关键工序培养使用高技能人才,提高相应待遇,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要建立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研究创新激励方式。

毫无疑问的是,《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提高中国技术工人待遇的政府决策呼之欲出。

依照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安排,人社部牵头研究提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措施。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度参与,组织专门力量配合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广泛听取一线技术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会签上报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的送审稿。

最终公布的《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让亿万中国技术工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汤涛透露,作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这份意见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聚焦企业人才瓶颈,突出激励提升,强化问题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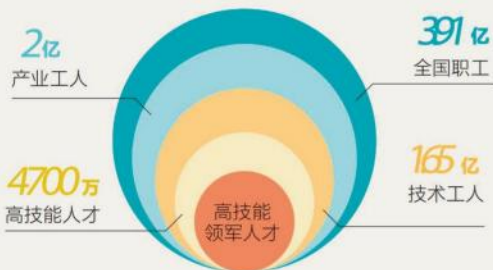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阎京华则表示,加强技术工人队伍的建设,依法维护技术工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国工会的职责所在。在实施工资激励计划、强化评价使用激励工作、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的通道等方面,中国工会将通过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方式发挥监督作用,确保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落到实处。

此间人士注意到,在致力提高技术工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同时,《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一图秒懂《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的协同作用,完善技术工人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保障等措施,实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



突出“高精尖缺”导向

服务保障

各地要设立高技能领军人才服务窗口,负责协调落实相关待遇政策,并结合实际制定支持政策。

政治待遇

探索实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工会等群团组织中挂职和兼职。以多种方式对高技能领军人才进行特殊奖励。定期组织高技能领军人才国情研修考察、面向社会进行咨询服务等活动。提高其在职工代表大会中的比例。

经济待遇

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和年资(年功)工资制度。试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鼓励所在单位根据其在项目中的实际贡献给予绩效奖励。破格晋升技术等级。

社会待遇

研究探索对高技能领军人才在(租)住房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考虑高技能领军人才落户需求并放宽落户条件限制。保障高技能领军人才稳定就业,对其未就业配偶、子女,推荐就业岗位。

技术创新

增加高技能领军人才参与全国创新争先奖等奖项的推荐名额;支持参加创新成果评选等活动。支持高技能领军人才参与所在企业(地区、集团、行业组织)的职工教育培训,发挥骨干作用。多渠道组织参与国际大型工业展等海外交流活动。宣传高技能领军人才先进事迹,树立宣传典型。

实施工资激励计划

——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完善符合技术工人特点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

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对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术工人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鼓励企业建立针对技术工人的补助性津贴制度,提高技术工人津贴水平。



建立企业技术工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要向高技能人才倾斜,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应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



探索技术工人长效激励机制

制定企业技术工人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鼓励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方式。

构建技能形成与提升体系

——支持技术工人凭技能提高待遇



加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定技术工人培养规划和培训制度。提供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为参保职工提供技能提升补贴。探索“互联网+”远程职业培训新模式。



深入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重点实施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师培训。加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建设力度。支持高技能人才“师带徒”。



加大校企合作培养技术工人力度

积极发展职工培训和学历继续教育。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促进产教融合。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统筹规范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

强化评价使用激励工作

——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道



完善技术工人评价工作

健全技术工人评价选拔制度。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策。拓宽技术工人晋升通道。



加大劳动和技能竞赛选拔技术工人工作力度

制定出台全国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建立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积极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对优秀选手给予奖励和荣誉激励。



完善技术工人平等享受待遇政策

建立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比照认定制度,制定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或认定的政策。鼓励企业对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学习进修、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比照相应层级工程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落实好技术工人休息休假权利

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建立优秀技术工人疗养制度,定期组织、分级实施疗养活动。



广泛宣传技术工人劳动成果和创造价值。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展示优秀技术工人风采。继续办好“技能中国行”等品牌活动和“大国工匠”系列专题宣传。

——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对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术工人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鼓励企业建立针对技术工人的补助性津贴制度；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要向高技能人才倾斜，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应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

——制定企业技术工人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鼓励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激励方式；

……

“目前，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在3000元以下的占比达48.8%，有21.1%的职工2014年以来没有涨过工资，技术工人工资总体偏低且增长缓慢。”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李滨生在《人民政协报》发文称，“只有突出技术与非技术、高技术与低技术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待遇差别，才能激励技术工人不断提高素质，与时俱进。”

技工加油：重返荣耀之巅

2018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完成了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职工总数已达3.91亿左右，70后、80后仍是职工队伍主体，90后职工大幅增加，00后也逐渐进入职工队伍。

这支平均年龄37.1岁的劳动者大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比5年前的上一次全国调查提高了0.6年。

然而，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相比，中国的技术工人缺口依旧巨大。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说：“在工业领域，正常的人才结构是1个科学家、10个工程师、100个技能人才。”

科学家可以引进，工程师可以引进，大规模引进技术工人却在全球尚无先例。缺少足够的技术工人，从原料生产到制作加工就无法形成闭环，一个工序出问题就会满盘皆输。

“设备易得，技工难求”。急欲实现产业链条从末端上移的中国制造业，就这样把前所未有的际遇，推到亿万中国工人的面前。

今天，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正在白热化，技术工人开始成为高价争夺的人才资源。

《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凭借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术技能型人才可以落户南京。在宁波，技术工人也被纳入到人才落户范畴。在佛山，更是全面放开了对技术工人的落户限制。

即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一线城市，也同样向技术工人敞开大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公开表示，上海的发展既需要金领、白领，也需要蓝领。广州公布最新政策，大力吸引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各类人才。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光明之季，这是希望之春。

2018年3月，《中国工人》杂志邀请大国工匠顾问团成员高凤林、许振超、李斌相聚北京，共同谋议中国技术工人的未来。

中国航天一院211厂发动机车间班组长高凤林说：“新时代的技术工人必须要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仅有助于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更能让技术工人在社会中找到自我认同。”

山东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说：“不懂技术的工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当代工人。作为技术工人，知识和技能非常重要，做就要做第一，做第二也是落后，也是跟着别人跑。技术上没有自己的杀手锏，永远形不成竞争力。”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总工艺师李斌说：“技术工人不可能‘一夜成名’，肯定要经过漫长的学习积累。路在自己脚下，创新也在身边。”

……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可以想见的是，有了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顶层设计，更多细化的制度安排即将到来。

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正在蓬勃而起。

我们眷恋的“八级大工匠”，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出现在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的流水线上。

加油，每一位立志岗位成才的劳动者。重返荣耀之巅的日子，不再遥远。

中国技术工人的春天，全新开启，永不落幕。

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正在白热化，技术工人开始成为高价争夺的人才资源。





智慧工会时代的 劳动者网络生活

从网上入会、网上维权、享受普惠服务到学习技术、提升技能,各级工会组织搭建的网上服务平台,让劳动者弹指之间,便可获得工会会员的各种服务。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和便利的智慧工会,已经成为中国工会打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举措。

今天,网上网下深度融合、互相联动的服务职工新格局,已经成为中国工会组织的共识。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8

年3月19日,西宁,早春初至。青海高原电子职工书屋全覆盖启动仪式现场,来自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走上前台,接受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卡。

由此开始,青海全省百万职工正式进入“每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的新时代。

这样一幕场景的出现,源自一年以前印发的《青海工会“互联网+”行动计划(2017—2019年)》的整体布局。正是在那份《行动计划》里,青海省总工会决意打造“网上职工之家”,让百万青海职工“看得见、找得着、进得去、用得上”。

类似的《行动计划》或《规划纲要》,如今已经成为各地工会的“标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一线劳动者像这些青海职工一样,畅游在网络生活的海洋,享受着愉悦与便利,塑造着全新的自己。

畅销书《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说:“历史和社会不会爬行,它们会跳跃。”

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中国工会正在筑力编织智慧空间,把对劳动者的深情关爱“E网尽现”。

找到工会找到家

2017年10月,在全国总工会成立网络工作部一年以后,《互联网+工会:移动互联时代的改革创新思维》经过修订,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第二版。与此同时,一本以农民工为第一视角、模仿《小灵通漫游未来》体例的工会网上工作普及读物《龚晓农漫游“互联网家”》与读者见面了。

在这两本关于智慧工会构建的书中,包括张晓莹博士在内的作者团队“异想天开”,虚拟了一位叫“龚晓农”的农民工,以各种职业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工作场景里。

周末,龚晓农去网吧打发时间,路上看见一条标语——“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禁不住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工会与游戏里的“公会”有何区别?

在网吧玩游戏的间隙,龚晓农搜索打开了宜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网。按照提示,他点击进入“我要入会”模块,简单填写了个人信息,提交后又继续打游戏了。

星期一上班时,让龚晓农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



职工使用电子职工书屋

生了。街道工会干部找到了他,递过一张表格,让他办理登记入会手续。

原来,就在龚晓农向“我要入会”模块提交申请信息的同时,宜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网已经把他的个人信息导入市总工会职工服务平台系统,后台管理员当即分派处理到了他打工区域的工会组织。

由于龚晓农打工的企业还没有成立工会组织,他的工会关系被暂时挂在街道工会,成了一名“直属会员”,从此成为了有组织的人。当然,这家企业也很快成立了工会。

尽管龚晓农只是一个虚拟的名字,但一线劳动者像他一样“找到工会找到家”的故事,却每天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申工社”APP“线上入会”的火热上线,点燃了上海职工“找娘家”的热情。当天,APP后台收到300多名职工的在线入会申请。

不到两个月,825位上海职工通过APP线上申请,正式成为工会会员。首批线上入会的13名职工代表更是受邀来到上海市总工会,讲述自己寻找“娘家人”的故事。

此前,单位没有建会却想要加入工会的职工,往往找不到入会的渠道。上海工会通过“申工

毫无疑问,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和便利的智慧工会,已经成为打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举措。

社”APP在网上打开大门以后,职工只要点击首页“我要入会”的按钮,填写提交完整的入会信息表格,15个工作日内就会有工会干部主动联系,帮助职工正式加入工会。

这些网上加入工会的会员里,有一位来自上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海归白领”。这些事务所常年拖延建立工会,很多员工心有不满,不过为了工作只能无奈接受现实。得知网上有可以个人申请入会的渠道,这位“海归白领”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提交了个人资料。

今天,“网上申请入会”已经成为智慧工会建设的“新常态”。

与上海咫尺之隔的浙江省城杭州,智慧工会平台正式上线时,便推出了“杭工e家”APP,同时和当地市民卡公司签订协议,在市民卡上建立工会会员识别标识。

由此开始,无论是杭州本地职工还是外来农民工,只要在“杭工e家”APP或市民卡上提交加入工会的申请,经过后台审核,即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二维码,成为有了“娘家”的工会会员。

在龚晓农故事里提到的宜昌市总工会,通过“宜昌工人”微信公众号或登录职工服务网提交的入会信息,都可以同步在网络监控大厅得到即时处理,基层工会主席马上就能在线上进行审核办结,为推动劳动者由“要我入会”到“我要入会”提供了网络这一便捷通途。

截至目前,整个宜昌已经建立了包含82万多名会员的动态实名数据库,职工线上入会转会超过5.3万人。包括货车驾驶员、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和保安员在内,以新“八大员”为重点推动职工入会全覆盖的工作,正在智慧工会的助力下全速推进。

毫无疑问,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和便利的智慧工会,已经成为打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举措。

服务职工,前提是联系职工。

联系职工,前提是找到职工。

最近一期全总党组中心组学习由全总书记处书记赵世洪主讲,他的观点是:“中国工会正面临职工队伍数量、构成和诉求的前所未有的巨变。如何认识、跟上并及时应对这些变化与挑战,是新时代工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今天,新的科技革命正深刻改变着产业构成、产业形态,从而深刻地改变着职工的职业构成、技能需求、劳动关系,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队伍迅速扩大,流动持续加快,利益诉求分化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需要找到职工提供服务,职工需要找到工会寻求帮助。有效利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红利,运用网络渠道实现服务覆盖职工,不仅是工会深度掌握职工具体需求的基本途径,更是亿万职工找到工会找到家的通达路径。

找到生活找到爱

一旦网络把职工和工会连在一起,正在日益增多的工会普惠性服务项目,便会让职工的生活充满温暖。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更容易吸引市场和社会力量,促使合作制互助性的各类服务“绽放”,这让工会提供即时服务和精准服务成为可能。

神情沮丧的龚晓农再一次找到工会。这次他被公司欠薪了。

龚晓农想过辞工不干,但又怕一旦辞职,钱更要不回来了。他想到过冲到老板办公室武力解决,

从“医”到“食”，从“助”到“行”，从“乐”到“享”，从“惠”到“聚”……在全国各地工会争相搭建的会员服务平台上，只要有心，工会会员总能找到自己需要的生活服务项目。

还考虑过要不要去爬塔吊吸引注意，但最终都觉得不妥当，还是找工会靠得住。

工会的工作人员接待了龚晓农：“别着急，咱们讨薪已经有了便捷渠道。”说话间，龚晓农的手机下载了“智慧工会”APP，在“我要维权”栏目里点击“法律援助工作室”。

从网上填写维权信息到专家律师介入协商调解，短短一天时间，曾经满不在乎的老板低头服软，主动找到龚晓农表示歉意，当场支付了拖欠的工资。

龚晓农由此发现，原来在自己平时打游戏、扯闲天儿的互联网上，工会已经建起了那么多服务职工的空间，让自己可以轻松地找到生活找到爱。

龚晓农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在电脑上打开北京12351职工服务网的首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六月活动主题——初夏快乐周末”的导图窗。

整个6月的每个周末和端午节前，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将累计提供590间免费客房。只要是北京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持卡职工，都可以登陆12351职工服务网或通过“北京工会12351”手机APP客户端进行预订，预订成功后即可免费入住，享受海滨风景。

如今，随着互联网应用普及度的提高，北京工会“一网”打造服务职工的网络平台，持续推出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项目，让工会会员在手指之间尽享工会服务。

李丹丹是密云区的一名职工，自诩是“北京工会12351”手机APP的“忠实粉丝”。自从下载了这款APP以后，她每年都会通过手机客户端享受七八次工会服务，免费理发、免挂号费就医，还有免费洗车和免费看电影。

2018年春节前，李丹丹还在网上抢到了免费

逛庙会的名额，就近在密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领票。带着一家人跑到北京城里逛庙会，这让平日身在远郊的她感受很好。

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就医难”是普通职工的苦恼问题。然而，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搭建的网络服务平台上，工会会员却可以直接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市海淀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6家知名医院进行预约挂号。

“即便是不方便使用电脑上网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通过海淀园工会微信公众号，按照医院、科室、职称、专业进行预约，确实非常方便！”多位海淀园辖区企业职工这样表示。

从“医”到“食”，从“助”到“行”，从“乐”到“享”，从“惠”到“聚”……在全国各地工会争相搭建的会员服务平台上，几乎都设置了提供这八大功能的板块。只要有心，工会会员总能找到自己需要的生活服务项目。

“通过调研发现，婚恋交友是职工最需要的工会服务之一。”河南省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王志军没有想到，这项他们原本以为归于妇联或共青团的服务项目，居然是工会会员“点”得最多的一道“菜”。顺理成章地，他们由工会“定菜单”向职工“点菜单”转变，通过“豫工惠”平台推出职工婚恋交友服务，短时间内注册会员18768人，组织活动500多场，9000多名职工找到心仪对象。

在云南，省总工会倾力搭建职工心理服务微信平台，通过和云南省心理学会、云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深度合作，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供减压冥想的音频和视频，帮助职工化解压力和放松心情。平台开设的心理咨询互动功能，更可以直接

与专家团队进行沟通交流。上线短短5个月,平台关注用户便突破4万人。

在上海,上汽集团工会开通“上汽职工之家”微信平台,“达人帮”志愿者互动成为鲜明特色。平台开设健身减肥、西点烘焙、养生保健、多肉种植、公益活动、手工皂DIY、英语口语、美食烹饪、电器维修、摄影摄像、视频剪辑和母乳喂养等10多个板块。邀请有特长的员工出任版主,为员工在线答疑解惑,鼓励员工之间互相提供贴心服务。

……

“实际上,从2016年以来,全国各级工会都在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及互联网等新技术因素提升对基层职工的服务。”在全总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总宣传教育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晓峰表示,全国总工会正在推动互联网时代工会服务职工工作的转型升级。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工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王晓峰说,“要改造升级建会数据库,逐步建立会员实名制与普惠性服务综合管理系统,打造方便快捷、务实高效的服务职工新通道。”

从粗放转向精细,从“撒胡椒面”转向“点对点”……互联网上的工会普惠服务,正在为亿万职工送去体贴的温暖,让他们在网络生活里感受到

更多的关爱。

找到知识找到光

对于那些想要学习技术、提高技能的劳动者来说,互联网是浩瀚的知识海洋。

提供更多更好的技能知识服务,正在成为智慧工会最具魅力的服务项目之一。毕竟,“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拥有娴熟技术的职工,才能有稳定的岗位和满意的收入。

龚晓农又来了。

到了新的岗位,龚晓农感觉出自己的技术短板,涌起提高技能的念头。和往常一样,他去求助自己的“娘家人”,成为“江苏工会学院”的新粉丝。

点开这个职工在线教育平台,龚晓农惊呆了。平台里的内容多种多样,“网课商城”既有焊工、电工、计算机操作员等免费技能培训课程,还有班组管理、精益生产、医药养生等方面的讲座,如同进入了一个职工技能培训的“淘宝网”。

4年前,无锡市总工会开发的“搜搜课”上线运行,成为中国工会最早搭建的网络教育平台之一。更名为“江苏工会学院”以后,江苏全省职工有了自己的一站式技能培训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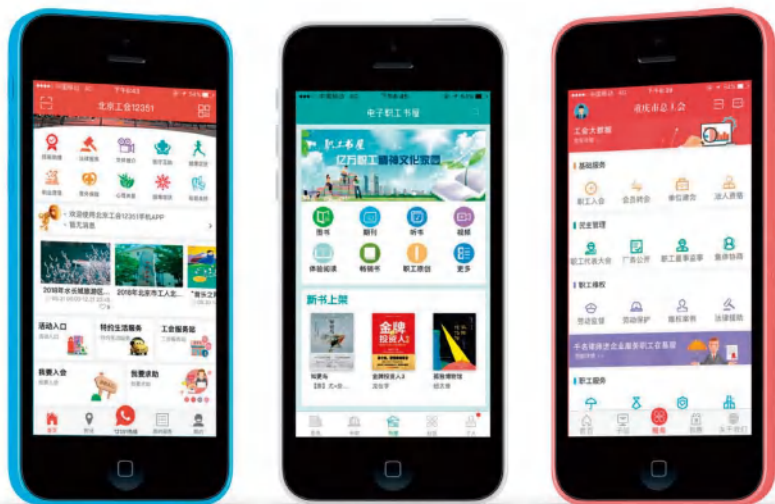
如今,在工会的技能服务线上平台学习岗位技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技术工人的“必修课”。

河北邯郸的一处普通办公房,是河钢集团邯钢工会职工网上练兵平台的运营中心。第11届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冠军周文涛,便是在练兵平台上的无数次鼠标操控中,默默提升自己的技能本领。

总决赛那天,来自37个国家的1479名世界炼钢工高手云集。他们被要求使用iPad进行触屏操作,在两个小时内采用转炉炼钢模拟系统生产出一个成本最低的钢种。

不到10分钟,周文涛成功地炼出第一炉合格钢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成绩,这要比其他选手快了足足20多分钟。最终,他的成绩定格在低碳钢吨钢成本220.19美元——冠军!

一个工作只有6年的青年技工,站上世界炼钢大赛的冠军奖台。人们把其中的重要动因,归于邯钢工会职工网上练兵平台营造出的浓厚氛围。这种把网络游戏与在线学习进行深度融合的技能训



北京工会12351

电子职工书屋

渝工娘家人



4月20日，在中建西安幸福林带项目工地上，20名新入会农民工会员代表集体宣誓，并扫码加入项目联合工会微信群

练模式，集知识性、趣味性、竞争性、实用性于一体。在三炼钢厂，练兵平台的每一次活动，周文涛总是第一个报名，闯关答题，乐此不疲。

练上世界炼钢冠军台的周文涛，无疑是工会为职工打造网络学习平台的耀眼成果。在他的背后，追光所至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技术工人从工会服务平台汲取知识的生动场景。

以邯钢职工网上练兵平台为发端，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在全国钢铁行业职工中开展网上练兵活动，同时推出职工网上练兵系统。

在这套系统里，网络风行的闯关游戏被应用到网上闯关学习中，设置不同的等级，吸引职工不断破解试题，晋升等级，积累知识，提高技能，有效激发了80后、90后技术工人的学习兴趣，成为工会服务职工技能提升需求的新鲜尝试。

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邮电工会致力建立网上与网下互补的“新时代工匠学院”，为职工即时学习和技能提升提供

有力技术支撑。

今天，更多富有时代特点的职工学习平台正在搭建中。

在《大国工匠工作法》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基础上，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在围绕高凤林、郭晋龙等顶级工匠的技术专著，研发适用于线上学习的课程体系，即将推出由大国工匠口传身授的技能学习平台。它让无论身处多么偏远地区的一线工人，都可以找到知识找到光，跟随顶级工匠进行零距离拜师学艺，构建有粘度有互动的新型师徒社区。

今年是《全国工会网上工作纲要（2017-2020年）》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形成网上网下深度融合、互相联动的服务职工新格局，已经成为中国工会组织的共识。依照“一体推进、两个覆盖、三网并用、四大建设、十类应用”的整体规划，更多工会服务职工的网络平台，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劳动者的“全天候伙伴”。

弹指之间，劳动者的网络生活丰富而多彩。

智慧工会，就是这样“E网情深”。

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
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
等石头开花，
小时候不期待结果，
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静坐听雨，雪中听琴，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摘自 NO.6 2018《因为热爱 无问西东》

致敬改革者

整整40年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另类长征拉开了序幕。上亿青壮年农民离开了田埂，踏上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征程。

起初，进城打工的农民还是三三两两的，但很快便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滚滚洪流：

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者势不可当。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是向南走的，统统被拦下搭乘。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人为止。

铁路上，各大火车站人头攒动。通往东南沿海各大中城市的客运列车上，人满为患，连厕所和车厢连接处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改革开放的强国之策是亿万农民工大流动的前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为亿万农民工大流动提供了渠道，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治国之道为亿万农民工大流动创造了条件，全面小康、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of 亿万农民工大流动提供了融入城镇的保障。

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与国家命运始终紧密相联：农民工因国运而走出田埂、走进企业、融入城镇、走向小康、奔向有产；国家命运也因农民工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拼搏奉献而繁荣发展。

农民工的爱岗敬业、勤勤恳恳，为“中国制造”注入了核心竞争力。农民工的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为“中国速度”注入了正能量。农民工的孜孜以求、传承创新，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2.87亿农民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依靠力量、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改革开放大潮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他们的迁徙改变着中国历史上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改变着中国的未来。

这是历史变局里的阶层迁徙。

这是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力量。

策 划 | 本刊编辑部
主文作者 | 盛明富
A-Z编写 | 李瑾
图 片 | 于文国

1978-2018年

中国农民工发展图谱

1978—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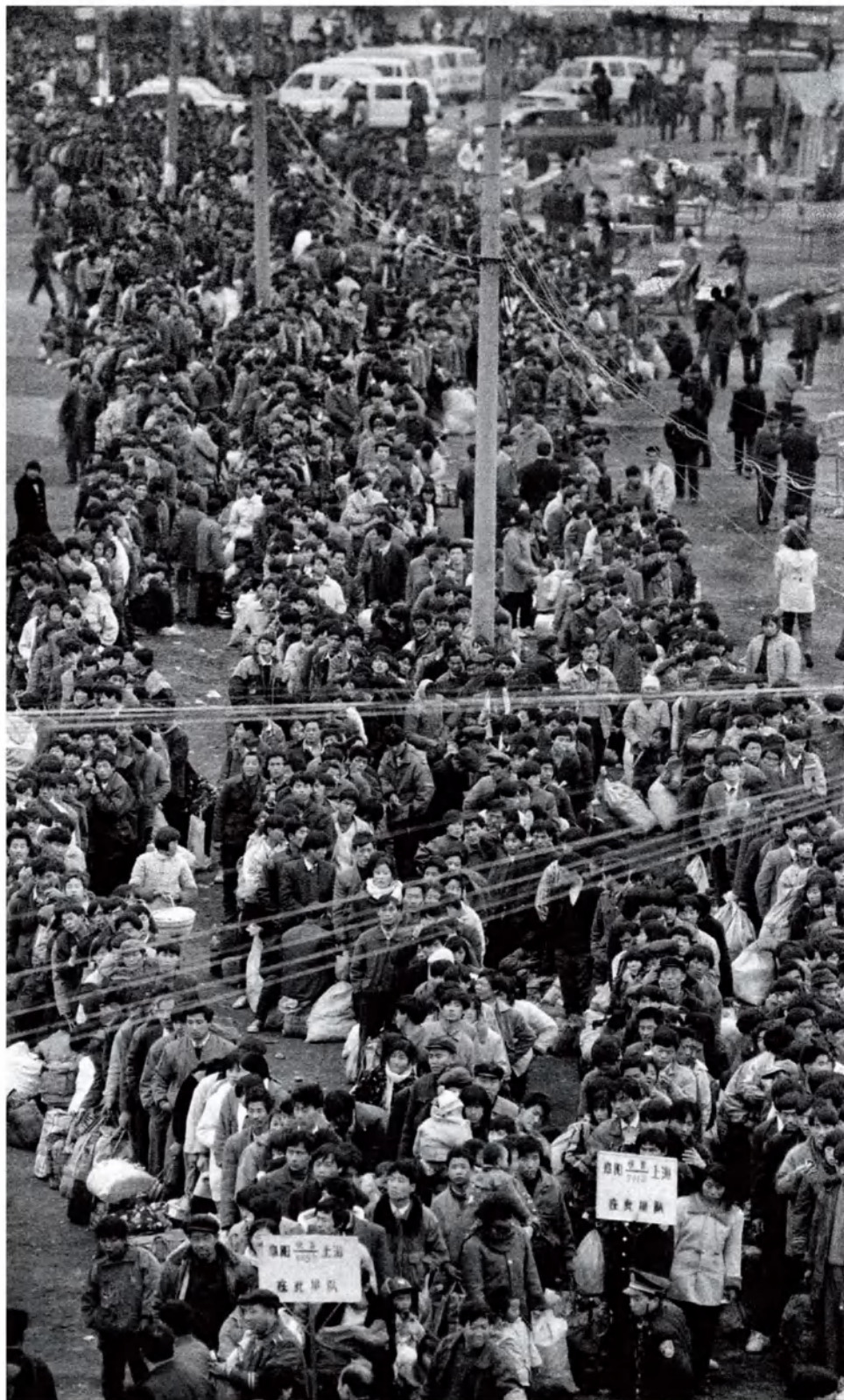
大潮涌起

阶层的出现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

如同生物进化要靠基因的传承与裂变一样，永恒的遗传与不变及其同一性，带来的只能是停滞与萎缩，只有裂变与差异才会带来进化和社会的进步。

阶层的出现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农民工阶层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转变的必然产物，是相对过剩的农业人口与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本结合中的必然结果。



1993年1月，大年初三，在全国四大民工潮源头安徽阜阳火车站排队的农民工

风起于青萍之末

自然界气流的变化带来了风霜雨雪、云聚云散。

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催生了社会转型、人口流动，工业化是人口流动的杠杆。

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思想解放大幕。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新时期基本路线。正是这条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份特殊的藏品——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由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亲手创造的。

1978年的小岗村，集体经济财产只剩下3间草屋、1头耕牛、1张耙和1架犁，一个劳动力辛苦一年的收入仅为18.2元。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走路的都讨过饭。全队近20户人家，有11户的门是用高粱秸扎的。

饥饿的逼迫下，18位农民偷偷签署了大包干协议。

这项秘密协议规定，18位农民各自得到部分土地，自由选择种植作物，“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

是自己的”，如果队长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活儿由全队包下来，他家孩子由全队养到18岁。

小岗村人是勇敢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产生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并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倡导，大包干没有以悲剧收场。

很快，“包产到户”有了社会主义的正式户口，并迅即在全国推广，由此掀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触角最深的当代改革大潮。

正是包产到户的政策和农村改革的杠杆，最终撬动了农民工的“魔方”。它从体制上实现了农民自身的解放。农民在“交够国家和集体的”之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1979年元旦刚过，一份由广东省委和交通部联合呈送的报告就递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中。报告提出，要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兴建一些船坞、码头和工业企业，利用国内价格较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建立工业区。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批示“同意”。

当年夏天，蛇口工业区的大规模开发全面展开。仅用了21个月的时间，2.14平方公里工业区内的基础工程和公用设施全部建造完成，同时从境外引进了14个工业项目，兴办了23家企业，一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陆续被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亦被大胆移植或借鉴。

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蛇口模式”在中国的经济舞台闪亮登

场。昔日的荒坡变成了工业园区，当地的农民“穿鞋进厂”变成了工人，异地招收的农村年轻劳动力虽然户口仍在农村，却不影响他们进特区打工，成为一名工人。

几年之内，蛇口工业区吸纳了3万多名外来打工者。这些从农村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即以农民的户口在工厂从事工人的工作。

他们论职业是工人，论身份（户口作为身份的标志）是农民。传统身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结合，让这些劳动者成了一个工农兼顾、城乡流动的新群体。

这个群体的产生是自发的，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种制度的自觉安排。但这个群体的产生又是必然的，当户籍管理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产生碰撞时，它是制度矛盾的必然结果。

这个群体是微弱的，一开始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其数量相对于农民和城市传统体制下的工人来说，显得微不足道，声音连工厂的围墙都穿不透。但这个群体又是巨大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当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发出的声音形成共鸣时，足以振聋发聩。

1980年8月26日，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到1983年年底，已有15万外来农民工涌入深圳。

就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交织在一起，从2.14平方公里扩大到327.5平方公里，再拓展到960万平方公里。

就这样，当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轰隆起步。

就这样，当代中国的农民工走上历史舞台。

城门开启与新阶层诞生

举国体制下，国家意志决定体制，体制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工业化、城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催生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也为农民进城打开了“一道门缝”。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10项政策》作为中共中央1号文件发布，标志着农村以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改革的开始。

如果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一次农村改革带来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的解放，那么，第二次农村改革则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重新分布，同时，也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允许农民工自理口粮进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首次在政策上出现松动。农民中的佼佼者正是借着这道“晨曦”，开始冲击城市服务业的大门。

最早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工，当属“修鞋族”“缝衣族”“弹棉花族”“保姆族”和“卖菜族”。正是这些掌握生活技能的能工巧匠，硬生生地把城市的大门挤出“一道缝”来，在改变自身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历史。

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一则报道称，在北方“有山必有城，有城必有江浙人”，主要是指散布于北方城市的修鞋、擦鞋、弹棉花和缝补衣服的江浙农民。这些人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吃苦耐劳精神，不畏世俗，走南闯北，活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发端于安徽的“保姆族”由老乡关系而逐渐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直接带动安徽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妇女进城当保姆，家属或亲戚便跟着进城卖菜。他们携家带口，奔走于北京等大城市的街巷，栖居在窝棚、桥洞甚至公共厕所。

来自江苏扬州的搓澡工和修脚

工，则是凭借“一条毛巾”和“一把修脚刀”闯天下。城市里的公共澡堂和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浴室，成为这些离乡谋生农民工的打工场所。

现在已经找不到1984年进入城市服务业的农民工的准确数据，但从当年媒体的报道中仍然可见一斑——“温州10万鞋匠和弹棉花郎走全国”“安徽10万保姆进京城”“江西10万斗笠闯天下”。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服务业的农民工人数虽少，却正在汇聚成涓涓细流。当这股细流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民工潮相交汇时，就变成了一股洪流。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城市的大门再也无法关上。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港口城市，再加上1980年确定的4个经济特区，沿海从北到南连成了一

阿里木

快乐的巴郎，在烟火缭绕的街市上大声放歌。苦难没有冷了他的热心，声誉不能改变他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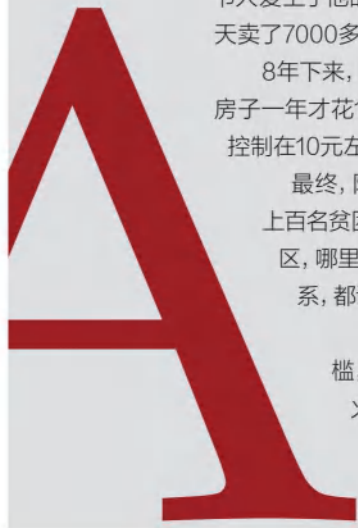
2002年，阿里木从新疆来到贵州，烟熏火燎，让越来越多的毕节人爱上了他的烤羊肉串。有一年春节，0.5元一串的羊肉串，他一天卖了7000多元！

8年下来，阿里木卖出30多万串烤羊肉串。然而，他在毕节租的房子一年才花1200元，家里的全部家当不超过2000元，每天花销控制在10元左右。

最终，阿里木把辛苦积攒下的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小学、中学、大学，在那个穷得要命的毕节地区，哪里都有阿里木捐助的穷孩子。甚至，在贵州大学的外语系，都设有阿里木奖学金。

崔永元说：“阿里木的义举告诉我们，慈善没有门槛，哪怕一米见方的铁皮家当，你也可以为慈善扇风点火。草根慈善，用人间烟火展现善良情怀。”

一位农民工最朴素的侧隐，就这样在人群中激荡起向善的涟漪。



北京户口

2014年4月，曾经深锁的北京户口，终于向农民工打开大门。

“北漂”13年后，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流管办管理员李高峰拿到了户口迁移证，“不到十分钟就办完了，没让跑二趟。”

当年3月，北京市总工会和市人力社保局、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农民工全国劳动模范在京落户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凡是在北京市被评为全国劳模、现仍为农业户口且有落户意愿的外省市农民工，均可视作落户对象。

2001年，李高峰进京打工，同时义务在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清理河道、捡垃圾和清除牛皮癣小广告。他本来打算离开北京，回老家照料15岁的孩子备战高考。从天而降的北京户口，意味着孩子能和北京孩子享受一样的待遇，“可以在北京高考了”。

个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国际舆论认为，“开放整个海岸，意味着实际开放半个中国”，这是“35年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明确指出“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如果说1978年是思想解放年，1979年是农村改革年，1984年是对外开放年，那么1986年则是企业改革年。增强企业活力作为中心议题被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劳动制度改革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继城门开启一道缝之后，国有企业的围墙也打开了一段栅栏，农民进入国有企业务工成为当时重大的体制突破。

资本不是施舍和慈善，那些当年“夹着尾巴逃跑了”的人又“夹着钱

包回来了”，他们看中的是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政策上的优惠。

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登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强大的推力；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进城提供了可能；农民对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欲望，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力。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民工自此正式加入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合唱”，拉开了改革开放“人口红利”的序幕。

在深圳，从1979年到1987年，外来人口从1500人猛增到80多万人，为原住居民数量的两倍多。

从全国来看，农民工的数字同样在快速攀升。

1984年，全国农民工的数量约

200万人。

1986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进城农民达480万人，未登记在册者更是超过1000万。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宣布，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8000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产业。

坦白地说，从1978年至1989年，中国并没有关于农民工的制度设计，从高层决策到体现国家意志的各类政策都没有涉及农民工问题。

但是，当户籍管理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巨大城乡差别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相碰撞时，巨大的撞击和反射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最终促成中国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政治上，他们没有特殊的要求，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打工机遇持朴素的感激心态。

在经济上，他们没有过高的奢望，虽然每个月的工资都比较低，但与农村种地相比，依然有比较强的满足感。

在生活上，他们没有多少福利保障，但农村留下的责任田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底钱。因此，他们虽然羡慕城市生活，却能以平和之心坦然面对。

在社会定位上，他们没有城市职工的优越感，却也没有农民的失落感，在与过去比、与农民比的过程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毫无疑问，中国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特殊阶层。

它的形成纯属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结果，不带有任何政治属性，但它作为“第三元”的存在，客观上又赋予工农联盟以新的内涵，成为新时期工农联盟的纽带。

欲罢不能的流动

人的解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也是一切改革和革命的动因。但人的解放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有时飞流向前，有时迂回曲折。

中国的农民在经历了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城的三次解放之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形成了一支空前的流动大军。这支大军既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力和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优势所在。

然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这支流动大军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接受程度也没有达到自愿的高度。在这支流动大军面前，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呈现出难以承载的疲态，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巨大的冲击。

1989年春节前，北京。

火车站人满为患，衣衫不整、操着南腔北调、手拎肩扛编织袋的农民工挤满了广场，以往排队购票的窗口变成了人挤人、人叠人的乱象。

好不容易带着一身臭汗挤上火车的乘客发现，车厢里早已被挤得满满当当，连车厢连接处和厕所都站满了人，站台上还有人从火车车窗往里爬。

几乎同一时间，安徽省合肥市的大东门汽车站也成为“乱战”之地。

开往安庆和阜阳的长途汽车成倍超载，尽管车上的人挤到连落脚都困难的程度，但还是有人硬拽着车门不

放。一些实在挤不上去的农民工转而拦截过往的货车，只要是四个轮子的都不放过。

事实上，1989年春节期间，全国多地交通运输告急。

广东——15天内，150万名外省农民工涌进广州。2月13日中午，3.7万名农民工聚集在广州火车站。

武汉——湖北及临近省区的数十万农民工停留武昌站，由此转车南下或北上。从武昌站发出的火车严重超载，车簧压死，不能正点开出。

……

2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首次出现“盲流”的字眼。

3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

闻和报纸摘要》公开宣称，百万“盲流”南下正制造着一堆堆“措手不及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广泛重视和关注。

此后，有关“盲流”的报道罕见地占据了中央媒体的主要版面和主要时段。这些声音指责民工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水平，造成了粮田撂荒，运输超载，城市交通、就业压力以及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农村在呻吟，城市在喘息。

恰在此时，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生产资料的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价格改革“闯关”前的“价格双轨制”带来流



1992年4月13日，上海市首次大型劳务市场，第一家外资企业招聘柜台前的一景

通领域的各种乱象,物价飞涨。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8.5%,经济过热已十分明显,经济紧缩政策出台。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接连发生严重自然灾害,1988年,全国农田成灾面积达2394万亩,比1987年的成灾面积增加20.9%,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城市的粮油副食供应不堪重负,粮食供应频频告急。

多种因素的叠加,导致向农民开启的城门又欲重新关闭。

1989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做好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工作。

通知指出,春节过后,民工大量集中于东北和广东等地,致使铁路客流暴涨、车站旅客积压、列车严重超员,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些民工到达上述地区后,因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头,大量民工的涌入也给当地治安造成了混乱。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外出民工的管理,控制民工外出。

1989年4月,民政部、公安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当地民工盲目外出。

1989年5月,广东省政府转批了省劳动局《关于整顿劳务市场秩序,加强劳动力管理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认真清退来自外省和农村的劳动力,清退的重点是外省民工和农村劳动力。招用民工应根据当地粮食生产、市场供应能力等方面的承受力,综合考虑,按照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省内后省外的原则,严格控制,统筹安排。

1989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要求企业需要临时工,原则上

春天里

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
.....

2010年,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在出租屋内即兴自拍的歌曲视频《春天里》,骤然爆红网络,点击量数以千万计,就连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也承认自己被视频感动得流泪。

这对农民工歌手在北京栖居的出租小屋,只有五六平方米。王旭干过搬运工,扛一个200多斤的麻包0.4元。为了多挣钱,他春节留守工地,一边流泪,一边唱歌,吼累了才能睡着。刘刚做过保安,摆过地摊,最穷的时候,把铝锅卖了2元,买馒头吃。

因为唱出农民工的生活辛酸,王旭和刘刚的生活变了模样。希望王旭还能记得自己和朋友说过的话——如果以后他死了,不要在他的坟头放哀乐,就放《春天里》。

《春天里》由摇滚歌手汪峰作词作曲,首发在一部名为《信仰在空中飘扬》的专辑。是的,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但是,信仰还会在空中飘扬。

在城镇招用;确需从农村招用时,应报经设区的市或相当于设区的市一级劳动行政部门批准。从农村招用的临时工,不转户口和粮食关系。解除劳动合同后,来自农村的应当返回农村。

1990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和搞好宣传教育,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对现有计划外用工,要按照国家政策做好清退工作,重点清退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使他们尽早返回农村劳动”。

至此,国家控制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已经传达到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城现象出现了拐点。

1989年,中国农村回流劳动力总量达1433万人,非农业劳动力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绝对减少趋势。

1989年,中国共关停并转300多万个乡镇企业,其中有350万农民工弹性复归传统农业。城镇清退计划外用工200万人,相当一部分短期临时工也返回到农村,劳动力逆向调节的效果开始显现。

从今天视角看。当年充斥媒体和文件的“盲流”概念并不能反映农民工进城流动的本质,反而暴露出社会对农民工进城流动的偏见和歧视。

中国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虽然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基础,却又始终与旧体制的改革和新体制的建立密切相关。只要体制改革的过程没有完成,中国农民工的大迁徙就必然会呈现出迂回曲折的特点。

尽管这一时期政府试图控制农民工的盲目流动,但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民工已形成滚滚洪流。或许在数量上因时因地有增有减,但这股洪流已不可阻挡。



1994年大年初一，位于上海市原吴淞区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港搬运工的单身宿舍里，来自山东沂蒙山区的农民工，因买不到火车票回家过年而滞留原地喝闷酒

1992—2001

“双潮”叠加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和工业化的加速，农民工流动呈现出狂潮奔腾之势。

经历了199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和1997年至2000年的国企改革攻坚，体制内的职工也出现了“下岗潮”。“民工潮”与“下岗潮”相碰撞，产生了各种波澜起伏的社会现象。

从1992年至2001年，工业化是发展的主基调，流动是农民工的主要趋势，与资本大鳄的博弈是农民工在迁徙征程中的主要社会特征。

从计划经济转向认识和驾驭经济规律，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力的较量并不平等。发展经济缺少资本，劳动力则供过于求，这就决定了农民工在与资本进行的原始博弈里，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残酷性可想而知。

在这场并不对等的对抗中，有的农民工成了资本这只机器大鳄的嘴中肉，为后来者画下了警示符；有的农民工用屈辱换得了生存，让人颇感无奈和悲凉；还有的农民工为了保住自己不肯放弃的一丝尊严，不惜退出这场改变命运的大迁徙。

流动狂潮与生存状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南方谈话内容公布后，举国上下精神振奋，以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去探索新路子，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外资企业的数量大幅增加。

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稍有延缓的民工潮再次掀起更大的潮头，并从此一浪高过一浪，再也没有停歇。

最能反映民工潮所带来的冲击的仍然是铁路系统的“春运”。

1993年春节前后，有关方面对乘火车进出广东省和广东省内的乘客实行火车票浮动加价的办法，但这仍然挡不住民工流动的潮流。

当年春天，《瞭望》周刊推出组合报道《民工潮——风起云涌又一年》，全景式反映了当年农民工的流动状况：

今年的民工潮不但来得早，而且来势猛。往年潮头主要涌向岭南，而今年潮势所向，波及西南、中南、华东、京津地区等大半个中国。南京、上海、武昌、广州、成都、重庆、贵阳、南昌、蚌埠……一条条交通干线上所有的铁路

枢纽站，几天之内都淹没在民工的海洋里。

如果说“春运”只是个窗口，只能反映农民工流动的现象，那么，数据则更能说明这股民工狂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据统计，1993年全国乡镇企业的职工人数已达1.12亿人，跨省区流动打工的有6200万人。其中，四川省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达1000万人，占四川农村劳动力的1/5，占全国流动农民工的1/6，“川军”的规模已成为各路流动农民工大军之冠。安徽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达500多万人，占当年

全省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0.66%。

如此大规模的民工潮，在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绝无仅有。

“春运”期间，湖南、广西、安徽等省区的地方政府甚至主动出面协调铁路和公路客运部门，有计划地调专列或开专车到农民工集中的沿海城市接送本地的打工者。

来自权威部门的调查和统计，更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农民工的主要流向。

据劳动部1994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状况调查》显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从业的主要去向以沿海地区居多。当年，农民工流入人数最多的5个省市依次是广东（18%）、江苏（10%）、上海（8%）、北京（8%）、新疆（6%）。

这种流向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基本一致。

对新生活的希冀，对城市生活的

断指

1999年3月31日，媒体惊爆“深圳部分外来劳工安全状况堪忧”，披露在1998年的12189例工伤鉴定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

当时，手外科医生张振伟刚刚来到深圳，医院所在的沙井只有3.3万户籍人口，却有近130万外来人口和5000多家工厂。

夜晚、男性、工伤、外地口音……张振伟的记忆残酷无比。断指多发在夜间，捧着断指或找不到断指的工人被送进手外科，“忙到不行”。

重压之下，深圳开始努力告别断指。从《安全生产法》到《工伤保险条例》再到《劳动合同法》，农民工的权利和劳动制度安排渐受关注。

曾经的工伤，是农民工为深圳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只有出过工伤的人，才会深切知道工伤将怎样颠覆自己的整个人生。

如今，张振伟终于喘了一口气，那段“拼命三郎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些至今和当年的深圳一样偏僻的地方，又怎样了呢？

向往,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让农民工开始向工业化和城镇化大进军。

然而,希冀总是与痛苦相伴。这些从“恋土”“盼土”到“弃土”“离土”的农民工,在客观上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同时,自身也经受着磨难、洗礼和裂变。

1992年至1993年,在沿海开放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场景让人唏嘘——

《工人日报》采访报道了珠江三角洲多家“三来一补”企业,包括一家制衣厂、一家皮革厂和一家制鞋厂。三家企业都为农民工提供集体宿舍和职工食堂。食堂的卖饭窗口,摆着一盆米饭、一盆大白菜和一桶漂着几根菜叶的汤。

正在就餐的农民工说,“天天都是白菜汤”,每周只有一次加餐,加餐时菜里会放一点肉。对于劳动强度很大的农民工来说,这样的伙食远远满足不了身体的营养需求。

珠江三角洲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提供集体宿舍供农民工居住,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放着6张双人床,12个人共居一室,一点多余的空间也没有。床下放满了脸盆和鞋子,衣服密密麻麻地挂在阳台上。

在虎门镇一家建筑企业里,农民工睡在建筑工地上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一排木板,10多张席子,一盏照明灯,什么电器也没有,灰尘大、不通风,苍蝇乱飞。

皮革厂和制鞋厂总体工作环境要比建筑业好一些。车间里的流水线上方有悬吊的电风扇,农民工可以在岗位上坐着劳动,但是整个车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异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外来农民工课题组在珠江三角洲进行的调查表明,受访农民工认为高

温情况严重的占33.7%,认为粉尘情况严重的占38%,认为噪声严重的占50.1%,认为工作毒性严重的占28.9%,认为工作场所通风状况不好的占39%。

1988年颁布实施的《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和1993年颁布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均明文规定,“职工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六日,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工人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但是,这些法规并未得到认真执行,超过50%的企业存在让员工过度加班的行为。

在20世纪90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情况都没有得到改善。直到1997年全国总工会进行农民工问题调查时,仍有45.2%的农民工在完成劳动定额后需要加班,延长工时或安排节假日工作不能得到加班工资的占30.7%。

有一些企业主提出,“要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鼓励和引导农民工加班加点。甚至有些企业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不加班要以旷工论处,被倒扣钱或除名,而加班工资则是任意施给,有的加班一小时只付几角钱。

由于长时间加班,很多农民工都疲劳不堪,往往是“走出厂房进了宿舍倒床便睡”,连看电视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即便如此,算上加班工资在内,月均收入只有300多元的农民工约占40%,月均收入500元的不到20%,月均收入500元以上的是少数,还有不少企业农民工的月收入不到300元。

珠江三角洲早期的“三来一补”企业女性较多,但这里对女性农民工的特殊保护却很少。企业招工时多选择未婚青年,多签订短期合同,基本不承担“四期”(经期、孕期、产期、

儿子

北京,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仪式。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走过来,黄久生急忙伸出手说:“我是河南来的……”习近平握住他的手:“我知道,河南来的农民工,了不起!”

黄久生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外出务工备尝艰辛,事业有成后知恩图报,回馈家乡父老乡亲,出资兴建了敬老院,成为家乡700多位鳏寡孤独老人共同的“儿子”。

敬老院里的宋青山老人说:“久生待俺们好得很,冬天来了送棉衣棉被,年关来了送大米猪肉,秋天来了送秋衣秋裤,夏天来了送背心汗褂。每次回来,俺们都舍不得他走。”

一个农民工就这样活出了不平凡的人生,用行动诠释了责任、奉献和大爱。

哺乳期)的各项负担。女性农民工进入婚育年龄后续签合同的仅占三分之一,有个别企业甚至在厂规中列有怀孕要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

农民工流动之初的这种生存状况,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的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的劳动关系特征。一方面,农民工流动的政策性障碍已经扫除;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农民工流动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做好准备,制度上缺少设计,管理上规范缺失,社会组织渠道不畅,劳动关系严重倾斜。❶

“葵涌大火”与《劳动法》出台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在资本积累严重不足和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起步的。

抓住机遇，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把人口众多的包袱转变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通过消化吸收实现自身的工业化，这是唯一可行的思路。

政府与资本强势结合，资金和技术稀缺问题迅速得以缓解，经济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与此同时，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也暴露无遗。

与“招商引资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建设、劳动关系的调节、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等问题进行制度设计。

利润和工资的“跷跷板”效应，让企业急于降低劳动条件和标准，压低工人工资，以此来获取最大利润。

尽管劳资矛盾频发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各地并未像重视资本那样来重视劳动关系。

直至1993年发生在深圳市的一场特大火灾，才对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波，把人们的聚焦点拉到了农民工身上。

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工艺品厂发生特大火灾事故，84人葬身火海，20人重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大的火灾事故，震惊全国。

虽然事故的原因很多，但诸多原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在一场不公平的博弈中，资本之手

借助火神之口吞噬了84位农民工的生命。

致丽工艺品厂厂区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东面全是生产用楼。一楼是仓库，二楼是流水生产线车间，三楼是制衣车间。这栋楼共有两个楼梯，东边的楼梯早已堵死，西边的楼梯也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厂房的四个大门有三个已被封死，这是怕打工妹偷东西和提前下班。

该厂主要生产工艺玩具，厂内放有大量的布、海绵、毛料等原材料，以及大量已制作好的儿童玩具。起火以后，厂房里喊声、哭声混成一片，300多名打工妹摸索着就往西边的楼梯口跑。她们不停地呼喊着自己的亲人、老乡，有的被烧死，有的被踩死，有的因中毒窒息而死。直到两个多小时后，消防队员用铁钳把窗户上

的铁条给夹断，幸存的打工妹才由二楼或三楼往下跳，而楼下是坚硬的水泥地。

一位叫王小芳的女工遇难前的一封家信，透露了她们的生活状况——

还是谈谈我工作的事吧，我将工资表示意如下，你们看一看。一共一百五十九元八毛七，不过工资的多少，还得由每月的货多货少以及价格的高低、做货的好孬决定，这个月我自己认真干，挣得了这点钱，我准备寄一百五十元回家。

在生活上，我已经习惯了，每天两餐，早上买三毛钱的东西吃，菜是白菜，有时改善一下是豆腐、豆芽，白菜里有一点肉，身体也好，只是有时发（上）火，也许是水土不服吧。不过，这个请你们不要担心，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葵涌大火的现实表明，在资本与农民工的博弈中，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在门窗被封的环境下劳动，其实质就是奴役劳动，也就是资本对农民工的奴役。



1998年农历大年初二，上棉九厂的厂房中，一位车间的管理者脚踩着已经砸碎的老纺织机器深思不语，春节之后，他将带领失去岗位的纺织工人参加培训，以便适应新的上岗需求

葵涌大火的残酷现实还表明,在资本所有者与农民工的博弈中,资本所有者处于主宰地位。相比之下,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一无所知的陌生环境,不得不接受最低的工资,面对雇主的侵害只能忍气吞声,处于毫无争议的弱者地位。

葵涌大火的残酷现实更表明,在资本和农民工双方的关系上,当时的政府部门没有足够重视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博弈环境,没有注重制定和维护博弈的规则,没有注重管理和监督博弈双方力量对比的均衡和博弈结果的公平。

有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认识存在偏差,转型时期制度建设滞后。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政绩,只重视招商引资,不重视劳动环境;只重视经济增长速度,不重视劳动关系的公平,甚至把农民工的低工资和不交

“三险”作为降低劳动成本和引进资本的优势,不仅没有在雇主与农民工的博弈中起到裁判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农民工在博弈中的劣势。

就在深圳市葵涌镇大火发生20多天之后,1993年12月13日,福州市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台资企业高福纺织有限公司也因劳资纠纷引发特大火灾,造成61人死亡。

频发的劳资纠纷,特别是接连发生的两场特大火灾,举国震惊,立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话题进一步升温。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同志指出,发生在深圳和福州的两起特大火灾事故,“充分暴露了少数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漠视安全生产,只顾赚钱,置工人死活于不顾的严重问题,也反映了一些企业基础工作

的薄弱和管理的落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首先要保护职工生命和财产安全。工会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1994年,厦门市一台资企业发生重大劳资纠纷,1700多名员工为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待遇举行集体罢工。

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首次将经济转型时期的劳动政策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

1994年3月2日,时任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劳动法(草案)》的说明,详细分析《劳动法》的出台与劳资矛盾的关系。

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国祥参加了《劳动法》的起草工作。他说,发生在深圳和福州的两起大火加速了《劳动法》的出台,如果再不立法对劳动者权益加以保护,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管付出多大辛劳、经历多少曲折,都要制定出《劳动法》。

毫无疑问,《劳动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这一法律的出台,把劳动关系的调整纳入法治的轨道,这是劳动关系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是劳动关系领域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起点。

1994年12月6日,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以及日益突出的劳资矛盾问题,劳动部出台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对涉及工资支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明文约束。

应当说,以《劳动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为基层和企业调处劳动关系提供了准绳和依据。但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叠加,使法律法规落地的概率大打折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比较普遍。

富士康

2010年4月7日17时30分许,富士康观澜工厂18岁云南籍宁姓女工从宿舍楼坠亡。

至少在这个晚上,谁也没有想到,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的打工者会用“连跳”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关注枯燥劳作背后脆弱的心理世界。

当年1月23日至11月5日,富士康先后发生14起员工跳楼事件,震惊中国。

2010年5月26日,富士康公司老板郭台铭公开道歉,宣称“要以非常诚挚而且非常慎重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社会大众”。

有媒体报道,富士康等级制度森严,一线打工者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还要忍受管理人员的辱骂甚至体罚,人几乎已经变成机器,自尊心几乎

完全被忽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最后难免会有冲突爆发。

“爱心、信心、决心”,这是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但是,形如人文沙漠的流水线,把“爱”变成了攫取利润的遮羞布。

生存与尊严

尽管农民工通过参与工业化进程,开始向城里人转变,但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差异,这种“转变”只停留在职业层面。

即便如此,身份不平等、岗位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生活不平等,必然带来认知上的歧视、管理上的歧视、经济上的歧视和人格上的歧视。农民工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在与不平等和社会歧视抗争。

其一,称谓歧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的称谓,或许在粤语的地域文化中并无贬义,但其一旦成为庞大的农民工这个阶层的代名词时,歧视的特点就暴露无遗了。

其二,流动歧视。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农民工自发性的、分散性的流动方式都被称为“盲流”现象,是劳动力“无序”流动的体现,有的人甚至主张靠围追堵截等办法使其实现“有序”。

其三,管理歧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凡是离开农村常住户口所在地跨地区务工经商人员外出前,须按规定在常住户口所在地劳动部门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目的地之后,须在当地公安机关和劳动部门办理“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雇佣无上述证件的外来人员。

其四,认知歧视。这一时期,城市社会对农民工普遍采取的是“经济吸入”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一

些城市居民潜意识里轻视、排斥农民工,有的甚至是歧视、欺侮农民工,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餐馆里,对农民工不是投以藐视的眼神就是避之唯恐不及。

诸多歧视在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更进一步损害着劳动关系。

1995年3月,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有限公司,为了惩罚一位因过度疲劳在工作台上打盹的女工,外商女老板突然让生产线上的120多名打工者跪下。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在犹豫中淌着泪水跪下了。

但是,来自南阳的打工者孙天帅却一动不动。

“跪下!”女老板向他咆哮。

“请问,我为什么要跪下?”孙天帅压抑住心中的愤怒。

“不跪你就滚蛋!”

“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在洋老板面前跪下!”

在女老板的辱骂声中,孙天帅离开了这个月薪1300元的难得的工作岗位。

“孙天帅不跪”的新闻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他甚至成了千万打工族传颂的英雄,许多企业表示愿意为其提供工作。

“孙天帅不跪”的深层含义实际上是资本与人本的对冲。打工者下跪是他们为了生存而对资本的屈从,资本与打工者的地位强弱由此凸显。在这起下跪事件之后接连发生的非法搜身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

2000年7月4日上午下班时,深圳

龙岗一台资企业弘扬手袋厂在清货时发现少了20多个小手袋,工厂负责人遂命令4名男保安对全厂500名农民工一个个搜身检查,不让搜身者就会被炒掉工作。

2000年7月28日,深圳市观澜镇一家玩具厂对数百名工人搜身,男女各排成一队,由工厂男女保安员分头逐个地搜身。该厂有的工人说,他们来厂半年了,每天都被搜身,已经习惯了。

2001年9月28日上午11时,深圳市宝安县松岗镇广田贴合纸业厂一名管理人员因丢失5000元原料款,其中三名来例假的女工还被搜身者拉开内裤,扯看卫生巾,以检查是否藏有钱款。

……

不懂中国法律,是很多发生搜身事件企业的老板常用的借口。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法律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显然不是。

那么,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管理者竟敢在中国如此藐视法律、侵犯劳动者的尊严?

从浅层次来看,这暴露出中国在监管外资企业用工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对外资企业违反《劳动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

从深层次来看,一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雇主能肆意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二是农民工与雇主博弈时,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发挥了负面的作用,加剧了农民工在博弈中的劣势。

如果一个地区或企业长期存在社会歧视,一旦当别的地区或企业出现新的就业机会时,那些饱受歧视的农民工很快就会流走,谁愿意长期待在一个连人格尊严都没有的地方?

珠江三角洲后来出现的民工荒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企业的老板们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了长远的代价。

回流、断指与社会之痛



2002年12月8日，在工会组织的干预下，福建泉州一位企业主提着水果登门看望此前在他的企业受伤不被赔付的农民工

外商的涌入和外资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催促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

但是，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越来越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从1997年起，国有企业职工人数连续5年大幅下降，从10766万人降到6924万人。依此推算，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总人数达3842万人。

与此同时，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也大幅下降，从1997年的2817万人降到2000年后的1000多万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下岗潮”，为进一步拓宽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通道，国家对使用外来农民工进行行政干预，以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农民工“回流潮”。

第一次出现在1994年，当时并没有全国性的宏观数据记载，但已经作为一个宏观社会现象引起广泛关注。

第二次出现在1997年至2000年。据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返回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0.546%，由城市返回农村的劳动力占返回劳动力的71%，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在城市就业空间持续缩小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仍显尴尬。

1999年3月31日，《工人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报道《深圳部分外来劳务工安全状况堪忧》，这是当时的主流媒体率先为伤残农民工发出的呼吁。

报道指称，深圳外来劳务工的劳动安全状况令人忧虑。深圳市7个法医

室1998年鉴定的12189例工伤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

深圳市劳动局官员同时透露，1998年深圳市工伤死亡达80多人。

综上所述，1998年深圳有这样两个数字：每天有31人因工致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因工伤死亡。

记者调查发现，出工伤事故的多是外来劳务工，这部分人群具有年龄小、流动性大、文化层次偏低的特点。工伤事故大多发生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里。

这篇报道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央有关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强调“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来换取外资引进和经济增长”，深圳等地关停了上千家安全不达标的私企及“三来一补”企业。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由于地方上政策执行的偏好以及政策的执行力问题，地方干部唯GDP论和劳动监管机制不健全，农民工在工作岗位的伤残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农民工的流动从一开始就非制度安排，而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在城市对农民工就业限制众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流向发生了变化，民营矿区变成了农民工争相赶去的淘金“圣地”。

在煤炭大省山西，300多万名农民工散落在全省的采煤一线。虽然井下采掘工作苦、脏、累、险、重，但每个月400~500元的收入对农民工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据199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国煤炭业排名第二的河南省，全省煤炭行业有70万名职工，其中，农民工总数为33.57万人，主要分布在井下采掘一线岗位，少部分在井下辅助岗位工作。

然而，采掘业并非都是农民工就业的“天堂”。在采掘业就业的农民

工,大多要经受社会歧视、奴役式管理和矿难的三重考验。

1997年,全国总工会对34岁的井下采煤农民工周树春的个案访谈相当典型——

我在亲属的介绍下,来到了矿山(河南省鹤壁煤矿五矿采煤二队),当了一名协议工。煤矿上是很苦的,自然环境让人难忍受,可自己上有老人下有儿子,要忍。

在城市里,我们到郊区租房,被问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正式工,还是协议工?”话语虽不多,却让我们受到了人格侮辱。

我们在矿山的工作时间特长,打疲劳仗,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敢怒不敢言。矿向队要任务,队向班要任务,为“任务”二字不讲协议工的死活。哪一个敢言,轻者当班不记工,重者停止工作,罚款开除,我们只有忍。

这种歧视,在乡镇企业尤其是个体和民营企业更加普遍。

在山西省太谷县任村乡东卜砖厂,中江民工全部被安排在制砖、晒砖、装窑等粗笨工序岗位。每天凌晨4点就得上班,晚上一般要到12点左右

才能下班。遇上停电,民工们可以休息,但来电后,他们必须通宵工作。

东卜砖厂对民工的吃饭时间也作严格限制,超过时限,下一顿就没饭吃。民工们不能打电话、不能发短信。有一人给家乡人打过一回电话,在三四人的监视监听之下,电话内容是“这里很好”。

如果说社会歧视、奴役式管理已经给农民工造成了巨大伤害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多发的矿难带给农民工的则是生命之虞。

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01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5965人,基本上全是农民工。

2001年7月17日凌晨3时许,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81名矿工遇难。

直到当天傍晚17时,南丹龙泉矿冶总厂负责人黎东明才第一次向分管南丹矿业的县委副书记莫壮龙汇报,请求县里不要上报,由龙泉自己处理。

第二天晚上,县委书记万瑞忠、南丹县县长唐毓盛等人碰头。万瑞忠最后“拍板”:一是事故由龙泉自己处理,县里不往上报;二是防止消息泄露,同时

密切关注社会上的议论;三是如果上级机关知道了,就说龙泉从没有正式的事故书面报告,把责任全推给龙泉。

7月27日,龙山矿里抽水时发现两具死难矿工尸体浮出水面。龙泉有关人员及两名民工悄悄将尸体连夜拉到外地火化,事后给每个民工360元,交代他们不要泄露。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起官商勾结。官员提供保护伞,矿主们输送利益,矿工们的生命仅仅被视为普通的“生产资料”。

频发的矿难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震怒。南丹矿难事故中,原县委书记被判处死刑,并先后对128名责任者进行了刑事追究或党纪、政纪处理。

南丹特大矿难以牺牲81位农民工的生命为代价,直接催生了《安全生产法》,成为中国农民工历史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与《劳动法》的产生背景相一致,农民工进城的历史、农民工流动中的重大事件,成为劳动法治建设的直接推手和动因。而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范和有序。❶

1995年3月7日下午3时,抓紧只有10分钟的工休时间,工人们趴在工作台上休息。突然,车间里响起韩国女老板的辱骂声:“工人排队跪下!”

这是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有限公司,为了惩罚一名女工的“违规”行为,120多名打工者被迫跪倒在地。

24岁的打工者孙天帅坚持不跪,在老板的辱骂声中丢掉了工作。

孙天帅后来回忆:“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死也不能下跪!因为我是一个有尊严,有人格和国格的中国工人!”

失去工作的孙天帅被郑州大学破格录取,进入国际企业管理本科专业学习。

15年后,孙天帅成为郑州一家都市媒体的发行区域主管,带领着200多名发行员,每天负责近7万份报纸的投递。

有一首诗这样赞美孙天帅——我们母亲的血液中,没有跪的基因!我们父亲的骨骼里,没有跪的骨髓。我们——对谁,对谁也不下跪!

跪



2006年，6月28日的三峡工地，完成施工任务后即将启程的湖北籍农民工恋恋不舍

2002—2011

前赴后继

2002年开始，随着国企改革攻坚任务完成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的农民工流动也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势头，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加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对农民工问题进行顶层设计，推动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展现出政策走向与农民工流动良性互动的特点。

革除束缚农民工流动的旧的体制、机制，建立引导和服务农民工迁徙的新的制度和政策，成为这一时期农民工迁徙的主要社会特征。

这一时期，既是前期劳资矛盾积累的显性化时期，又是中

央政府关于农民工政策出台的密集期。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呈现三大明确特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从微观上的事件处理转向宏观上的顶层设计，从管理为主转向服务和改善环境为主。

但是，由于旧体制的延后性、旧思维习惯的惰性、GDP考核指标和地方利益以及官员的腐败问题影响，中央政策落地依然有一个过程。再加上资本与劳动者的强弱状况并未发生大的实质性变化。

因此，劳资矛盾仍然不断发生，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成为农民工流动中不和谐的音符。

“讨薪风暴”与土地财政

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劳动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形式，既是对劳动者付出有效劳动的薪酬，也是劳动者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付出劳动，生产产品，创造价值，领取薪酬，这是市场经济条件的通行规则，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在此问题上概无例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却成了农民工的一道“坎”。很多农民工在付出辛苦劳动之后，并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

工资拖欠成了农民工的心头之痛，也成了发展市场经济初期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2003年年底，一场“讨薪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平地而起，肇始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途中一次行程安排外的“拐弯”。

“总理考察时经常临时决定停车，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卫兵回忆道。

2003年10月24日至26日，温家宝赴重庆、湖北三峡库区考察。

24日下午5时许，随行记者乘坐的面包车突然停了。“后边总理的面包车没跟上来，赶紧回！”

走过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路，记者们看到一处略显破旧的农舍前，温家宝总理正坐在木凳上和村民交谈。

打完猪草回家的熊德明向总理反映，丈夫李建民有2000多元的工钱已经拖欠一年，影响了孩子交学费。

“一会儿我到县里去，这事一定

要跟县长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一定要还！”温家宝总理做出了承诺。

当夜，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资。

这一年，熊德明被评为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人物，由此成了农民工讨薪的代表。

国务院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讨薪风暴”。

据统计，仅在首次发起“清欠风暴”的2004年第一季度，便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253.8亿元。其中，追回2003年当年拖欠的工资156.82亿元，超过当年拖欠工资总额的96%，此后，全国各地每年年底都要发动“清欠风暴”。

但是，在没有制度保证的情况下，原有的拖欠尚未清理干净，新的拖欠又接着发生。这种运动式的清欠方式，根治不了欠薪的顽疾，暴力拒付和暴力对抗讨薪接连发生。

2003年11月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某楼盘工地，讨薪的25名农民工被30多名身着便服的男子毒打，造成多名民工受伤。

2004年8月23日，在西安紫薇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多名农民工讨薪被打，其中多人受伤。

2005年5月发生在宁夏石嘴山市的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案，更是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新华网刊出的《死囚王斌余的道白》，剥开了恶性事件与恶性欠薪的关联——

我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刚开始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

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里面都是稀泥巴，我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胡振球

2004年，高中毕业的胡振球离开安徽宿州农村，先去扬州，再去上海，成为一名普通的装配工。

午休时间，胡振球缠着老师傅给自己讲解图纸。一有空闲，他就往单位的职工书屋里钻。

10年以后，拥有14项专利的胡振球跻身首批“上海工匠”。在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他的清扫车吸尘口避让装置发明专利更是荣获“金奖”。

创新改变了胡振球的人生。他晋升为管理100多名员工的车间主任，还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

胡振球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大国工匠”，把普通产品做到极致，推陈出新，追求完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奇迹和智慧。

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儿。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得干活儿。

我们的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跟我们说,晚上加班就多加8元1角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

今年5月,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了50元。

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

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元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

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像骂

爱情

I Love You

离乡土更远,却依然无法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陷入生活的怪圈。工作时间长、人群接触面小、行业从业人员性别组成单一,使得恋爱和家庭成为奢侈的精神需求。

一份调查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数据——

4.3%的人同意“爱情是婚姻的坟墓”,11.4%的人同意“婚姻是爱情的升级”,28.6%的人同意“婚姻是一辈子的承诺”,48.6%的人认为“婚姻是为了下一代”。

这样的数据意味着,爱情往往是农民工婚姻中的调味剂。

另一组惯有择偶标准的调查显得更积极一些——77%的人追求“志同道合情趣相投”,10.1%的人选择“懂得技术”,7.7%的人不选择“崇尚金钱”和“看重地位”。

但是,这并不能够阻止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奈感叹——回不去老家,找不到爱情。

狗一样骂我,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

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

王斌余讨薪杀人案说明,欠薪与讨薪已不再是企业或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的事,而直接涉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这起事件带给整个社会的反思是沉重和发人深省的。

一方面是中央高层不断采取措施制止欠薪问题,另一方面是欠薪问题不断发生而根治不了,不能不说这与当时

的体制、机制和发展背景密切相关。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头10年,城市建设大规模上马,“形象工程”“城市名片”成了一大特色,全国成了一个大工地。一个法国代表团来北京访问时曾感叹,“整个欧洲建设用的塔吊还不及北京市的多”。

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与疯狂的扩张规模速度显然不相适应。除沿海少数省市完成了早期的财富积累之外,中国城市扩张大多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同时推进,只能走土地财政和举债建设这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了债务链的顶端,政府欠开发商的钱和工程施工单位的钱,后者又把这种债务传导到二级和三级承包商,最后又都落到了农民工的欠薪上。

鉴于欠薪的复杂性和讨薪的难度,中央政府再次调整了彻底解决欠薪问题的时间表——到2020年,基本解决欠薪问题。

“孙志刚事件”与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

中国农民工历史中，“孙志刚事件”是关键的“拐点”。

尽管孙志刚本人并非农民工，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件与社会如何对待农民工有关，与政府部门如何管理农民工有关，与制度的存废与变革有关。

2003年3月17日晚上，大学毕业两年、任职于广州市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

3月20日，孙志刚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死去。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志刚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孙志刚家属和同学的反驳。孙志刚的父亲表示，从来不知道儿子有心脏病。法医尸检的结果，也推翻了院方的诊断。

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明确认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按法医的说法，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而且不止一次，因为“一次打击解释不了这么大面积的出血”，孙志刚被人殴打并最终致死已是不争的事实。

“孙志刚事件”之所以发生，收容遣送之所以激起公愤，与收容遣送站的恶行密切相关。

2002年，全国有700多个收容遣送站，每年都有100多万人被收容遣

送返回原籍。在一些地方，因收容而导致的死伤事件屡有发生，收容遣送站内打人、劫财行为屡见不鲜。

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管理混乱，公职人员失职、失察、失责所致，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专门收容农民工来牟取私利的黑色利益链条。

湖南省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费后放人。

据收容站内部人员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已经从一万多名农民工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

涟源市收容站的主要“致富”手段其实非常简单——和涟源市火车站订立口头协议，火车站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以收容“三无人员”的名义，把经过涟源的农民工扣下来，由收容站接走。联防队员每抓一个农民工可以得到5元，而火车站则可以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50元的回扣。

这些农民工被接到收容站以后，如果身上搜出的钱足够的话，就可以幸运地免受监牢之灾，只要留下钱，便能带着一张名为“生活费”的收据离开。如果身上带的钱不够，收容站就会向他家里拍电报，要求速带800元来涟源收容站接人，这叫“自保”。

收容遣送站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在“孙志刚事件”中，正是这些公职人员当起了打人凶手的“导演”，让先期被收容的人打后期被收容的人。

孙志刚的家属为了申冤，到许多部门上访投诉却无一受理，如果不是媒体的曝光，最后的结果很难预料。这种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对生命的冷漠，说明收容遣送站的性质已经异

他喜欢写诗，喜欢画画，更喜欢将工作中的经验方法记录下来。他的70多本工作笔记，洋洋洒洒230多万字，创新施工方法43项，创效600多万元。

1979年，巨晓林高考落榜，在家务农。25岁那年，他成为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一名“农民工”，开始面对纵横交错的电杆和接触网，还有犹如天书的图纸。

图纸、工具书、笔记本，这是巨晓林随身携带的“三件宝”。凭借钻劲，他攻克了太多技术难题，成为电力接触网施工的“工人专家”。

2016年1月17日，54岁的巨晓林以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媒体普遍认为，要使农民工市民化，首先要保证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同时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巨晓林的当选，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凸显意义。

巨晓林

化,已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相去甚远。

把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等同于把无暂住证和务工证的农民工涵盖在内,这是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来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要素流动。

把农民工按在土地上,通过限制流动来维护社会秩序,不可能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工的流动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尽管流动过程会对原有的社会设施和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但这种冲击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更高层次上的有序的必经阶段,最终结果必将是带来农民的增收、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无业流浪乞讨人员的减少。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往往把收容遣送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在农民工流动压力较大的地区,往往又进一步把它延伸为对付农民工的手段,“孙志刚事件”和“涟源违法收容事件”都是如此。有些地方甚至把收容当成有“油水”的创收,这就使收容遣送犹如一把利剑,让农民工时刻提心吊胆。

在孙志刚含冤离世3个月后,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废止。

2003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同年8月1日,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动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为亿万流动的农民工解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成

开胸验肺

通过人工手术方式把胸腔打开查验肺器官,这是“开胸验肺”的医学原意。

然而,在委屈求证的农民工张海超的身上,“开胸验肺”却是维权无路背景下的自我牺牲。它根本不是什么强硬和果敢,它只是无奈弱者的最后抗议。

2004年,河南打工者张海超进入郑州一家公司,从事杂工、破碎和开压力机等有害工作。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当地职业病防治所却坚持“肺结核”的诊断。

2009年6月,张海超主动爬上郑大一附院的手术台,不顾医生劝阻“开胸验肺”,揭穿了“肺结核”的谎言。同年7月,卫生部督导组介入,张海超被确诊为三期尘肺病,获赔61.5万元。8月,郑大一附院被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指责其“开胸验肺”违反《职业病防治法》。

在金庸小说《飞狐外传》中,恶霸凤天南冤枉百姓家的小孩偷鸡,穷苦人家的母亲只好破开自己小孩的肚子,自证清白。

曾经的那段日子,现实和小说一样残酷。

为中国农民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因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因制度改革而形成,因此,尽管在流动中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股社会前进的洪流,如何对待它也成为衡量管理制度进步与落后的标志。

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务院进一步废除了农民工外出务工办理证卡的有关规定,由此也开启了农民工流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全由市场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新时期。

在“孙志刚事件”以后,北京还发生了所谓“馋嘴民工”偷吃“天价葡萄”事件。

2003年8月7日,4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业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

萄研究园,偷偷摘食葡萄。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葡萄竟是投资40万元、培育10年的新品种。

2003年9月,北京市物价局评估确认“天价葡萄”价值11220元,4位农民工被拘捕。

此后,经过两次退补侦查,北京市物价局最终在2004年5月认定,被偷吃葡萄的价值仅为376元,农民工被免于起诉。

在这起事件中,尽管农民工偷吃葡萄是事实,但充斥都市报纸的“馋嘴”字眼儿,显示出部分社会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歧视。

更有甚者,南京《城市快报》在2004年曾有报道,大港区晨晖里农贸市场后一公厕外墙上,张贴着一份打印的标语,上面写着“禁止民工入内”六个大字。

族群的撕裂必然会带来畸形的发展,这绝不是社会发展的福音。❶

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一行赶赴山西洪洞，对查处黑砖窑进行督察。

到2007年7月底，山西全省共查处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砖瓦窑17户。解救农民工359人，其中童工15人，年龄最小的13岁。

在高层领导的重视下，这起震惊中外的山西洪洞黑砖窑事件中，共有69人被起诉，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人被开除公职，24人被撤职。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涉及农民工问题上被起诉和被问责人数最多的一次。

2007年6月22日，山西召开“黑砖窑事件”通报会，时任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向受害农民工家属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70余天后，于幼军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在小水泥厂、小砖窑遍地开花的同时，小煤窑带来的安全生产事故接连不断。

2002年，电煤指导价政策取消，煤炭价格完全市场化，社会需求日益旺盛，煤炭价格不断上扬，开始进入煤炭生产的“黄金十年”。

一些大型煤矿盲目扩张，矿井层层转包，一些小型煤矿低成本投入甚至“无本生利”。

2003年，全球产煤约50亿吨，死亡人数8000人左右；当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6.6亿吨，占33.2%，而死亡人数则达6434人，占80.4%。

2005年，中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接近3，这个数字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10倍，是美国的100倍。

2007年12月5日，山西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民营新窑煤矿发生爆炸事故，夺走了105名农民工的生命。据调查，“黑心矿主”对采煤业务层层转包，只求数量不问安全。矿工们

1994年，14岁的刘丽因贫辍学，离开安徽颍上县古城乡外出打工，省下每一分钱供弟弟妹妹读书。

命运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弟弟和妹妹都没有考上大学，刘丽多年的辛苦没了着落。“我自己想读书而没有读成，希望让别人有书读”，走出迷茫的刘丽，决意资助贫困学生读书。

从2000年开始，刘丽一直在厦门一家足浴城当足底按摩师，月收入3000元。其中，500元用于自己生活，再给家里寄一点，剩下的全部用来资助老家村里的20个贫困大学生。

刘丽的善举带动了更多的人。在众多网友的支持下，刘丽帮助上百个孩子圆了读书梦，被称为“中国最美洗脚妹”。

2010年，刘丽当选“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说：“一个瘦弱的姑娘，一副疲惫的肩膀。是内心的善良，让她身上有圣洁的光芒。她剪去长发，在风雨里长成南国高大的木棉，红硕的花朵，不是叹息，是不灭的火炬。”

刘丽

反映矿主要钱不要人命，到底有多少矿工下井根本不问，事发后竟找不到一份完整的矿工花名册。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又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造成277人遇难。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为，这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

2008年9月，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主管副省长被免职。

事实上，对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以及严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事件的处理，中央政府毫不手软，“政府问责”被高调祭起，从市长到先后两任省长请辞，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然而，在领导高度重视、农民工政策走向非常明晰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仍然对农民工采取漠视的态度，听任无良企业伤害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中国的煤炭行业，尤其是地方的一些中小煤矿，煤炭财富与权力的“联姻”由来已久，直接后果就是以

利益为纽带，将地方官员与矿主捆绑在一起。

2007年洪洞“12·5”矿难事后查明，以副市长为首的临汾三级煤炭行业管理官员，均在接受贿赂后放松监管，最终导致惨剧发生。

在煤老板的行贿记录中，市、县、乡均有煤炭行业管理官员的名字在案，三级煤炭行业管理官员与煤老板一起，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

当煤老板的“权力保护”需求与地方煤炭行业管理官员的“权力寻租”相结合时，利益至上被推到了极致，国家的资源政策、农民工政策、农民工生命安全通通被抛到脑后。

底线意识是整个社会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底线意识的缺失，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受害的一定是处在城市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

好在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使这一问题得到遏制，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土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开胸验肺与职业病“四问”

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里，对资本的需求和投资的饥渴几乎是全国性的，职业危害的门槛早被忘在脑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造业、日用化工行业以及医药行业的一些有毒、有害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这类企业在发达国家已不允许存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已开始向外驱赶，却在中国一些地方找到了生存空间。

2002年3月15日，《京华时报》记者祁胜勇报道的河北省高碑店市农民工苯中毒事件，使农民工职业病问题浮出水面。

浑身血斑，鼻子出血，口舌溃烂，牙龈的肉一剔就掉，牙齿一碰就倒；为了擦拭长流不断的鼻血，一个晚上竟用去两大篮子的卫生纸……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一家皮包厂打工的4名河南少女，无一例外地患上了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其中两人已被病魔吞噬。夺去这些青春少女生命和健康的杀手，是一种叫“苯”的化工原料。

在医院的登记表上，女孩赵小歌已于2月死亡。

一年以前，17岁的小歌和同村的伙伴一起到这家皮包厂打工。工作间的门窗封闭很严，胶水气味冲鼻，工人们整天头晕。她们是计件工，为了赶活儿，经常把材料拿到住室干，在床头刷胶水、粘皮包，许多胶水粘到了手上。

年底，小歌发烧到41摄氏度，浑身出血斑，牙龈溃烂。她害怕扣工钱，坚持捱到过年放假，回到家后一病不起，终至死亡。

原来，小歌加工皮包所用的胶水中，含有一种叫“苯”的化工原料，黏性强，挥发快，价格便宜。由于使用含有苯或纯苯的黏胶，作业场所的苯浓度超标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厂家却没有给打工者提供任何劳动保护。

2002年3月28日，朱镕基总理做出重要批示：“此案可能带有全国性（注：北京丰台区已发现类似事件）……对使用苯类有毒物质作为溶剂的胶粘剂、装饰材料等的企业，必须规定明确的劳动保护条件……”

总理有批示，调查有结果，处理有意见，整改有要求……发生在高碑店市的这起农民工苯中毒事件震动中国。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又一起恶

性职业病事件在福建出现。

在对89名从仙游县东湖村务工返乡的贵州籍农民工体检后发现，其中46人确诊患矽肺病。东湖村现有的201名外来农民工中，14人患矽肺病。

随后，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肃执法，对不顾工人生命安全的企业依法追究责任，并公开通报，以儆效尤。

连续两年，先后两任总理作批示，先后两次以国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报，先后两次要求在全国进行专项治理，重视程度之高，工作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

即便如此，职业病危害对农民工生命健康的侵蚀却并没有消失。

2004年5月27日，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透露，中国实际接触有害作业的人数、职业病患者累积数、死亡人数和新发病例数，都是世界上最高的。

2005年4月18日，卫生部负责人

民工局长

在县里，他是劳动就业局的副局长。但在鞋厂老板的眼中，他是带领80多位农民工的“工头”。

2010年，西南春旱，80多名云南曲靖农民工来到扬州宝亿鞋厂打工。担心大家受骗上当，陈家顺主动“卧底”当上“工头”，被分配到整理车间，负责打包卸运。

一个月后，陈家顺交出一份“卧底打工报告”，又有200多名曲靖农民工远赴扬州。

2007年，他在担任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时，曾经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5家用工企业“卧底”。核实用工信息和农民工待遇，跟踪维权。

主动为民生奔波，体恤民生艰难，小可帮扶一家一户，大则微而不弱，烛照未来。在农民工眼中，陈家顺是最值得信赖的“民工局长”。他乔装改扮，却藏不住心底最深的惦念。

在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透露,中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每年13.6万死于职业病的人中,大部分是农民工。

2007年,全国总工会在《第六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中指出,职业危害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迅速转移,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危害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其分布日益广泛,影响日益严重。

2009年,发生在河南的“开胸验肺”职业病事件,使农民工职业病维权以悲情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28岁的张海超是河南新密市刘寨镇农民,2004年6月,他到新密市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工作。

2007年下半年,他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咳嗽。当年10月,他辞职后先后到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

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进行检查,医生们都给出了一致的结论——尘肺。

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如组织机构代码、职工工作时间、从事工种等。振东公司不肯配合,张海超无法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鉴定。

此后,经过反复投诉,新密市信访局同意张海超到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进行鉴定。然而,鉴定结果竟然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

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6月22日,他不顾医生劝阻,在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手术。

胸部一打开,医生就发现了肺上的大量粉尘,肺部切片检验也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郑大一附院出具的诊断中,写明“尘肺合并感染”。

近两年的维权求医,张海超花费

近9万元,早已是债台高筑。开胸后,他找过新密市信访局,一位科长仍然坚持只认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结论。

尽管,张海超以“开胸验肺”的惊人之举,引发媒体和社会关注后,最终获得120万元赔偿,也仅仅是个极端个案。

地方利益取向和GDP至上是导致职业病恶性事件的首要原因。

为吸引投资,保护地方经济,一些地方政府对职业病危害把关不严,大量未经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未做到“三同时”审查的企业开工投产,导致大量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一些有毒有害、高粉尘的小加工厂、小作坊不闻、不问、不检查、不监督,放任不管,甚至姑息纵容,导致大量农民工长期在有毒有害和高粉尘环境下劳动,为职业病的高发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但在现实生活中,职业病检查和职业病鉴定却困难重重。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专门的职业病鉴定机构,本意可能是要强调或突出职业病鉴定的权威性,但指定的结果就是职业病诊断权的垄断。这不仅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规律,甚至在利益的诱惑下会带来腐败。

这一时期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的权益维护,基本上都按照“媒体曝光—领导批示—专项整治—调查处理”的路子来实现。它既说明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的权益维护要走向制度和机制保证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说明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包括职业病患者的权益维护客观上需要建立党政主导、工会运作、媒体监督的大格局。

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一代劳动力的健康为代价,这也是时代的警示! 

宁波守塔人

从1883年白节山等她建成开始,叶家五代人驻守孤岛,每日与大海相伴,成为守护一方水域平安的“宁波守塔人”。

1944年10月,为抢回即将被风浪卷走的补给小船,第二代守塔人叶阿岳冲进狂风暴雨,再没有回来。

1971年春节前,第三代守塔人叶中央的家人乘船来塔上团聚,途中遭遇风浪,妻子和5岁的小女儿遇难。

如今,第五代守塔人叶超群驻守在七里屿灯塔。

年复一年的守望,灯塔工要在孤岛上连续工作11个月,才有20来天的休息。这11个月时间里,只有海风,只见海水。

第五代灯塔工叶超群说:“如果有一天没有灯塔工了,希望自己能带着一同退役的灯塔去开一家以灯塔为主题的民宿。”

灯塔这两个字,就这样融进了叶氏一家五代人的血脉。

时代人物与有产追求



2008年3月12日，我国首次以农民工身份当选的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来到全国总工会职工维权中心考察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中小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这种状况近十几年来罕见。

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强调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中国政府首次为稳定农民工就业打出“组合拳”，包括在全国部署开展“春风行动”，强化就业服务，开展职业培训，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鼓励返乡创业。

这套力度空前之大的“就业组合拳”，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正式出台，进一步把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上升到法律层面。

与此同时，面对多年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问题，中国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200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现，一些用人单位为规避对劳动者的义务，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甚至不承认与劳动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30%左右，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内。

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一个月内，共收到各类意见191849件，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史上之最。

2007年6月2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历经4次审议的《劳动合同法》以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获高票通过。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系统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但是，由于它的出台和实施正好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来袭直接对撞，争议和规避迅速出现。

从2007年10月开始，华为集团安排7000多名工作满8年以上的老员工“辞职”，变成新人后再应聘上岗，职位和待遇基本不变，唯一变化的是再次签订劳动合同和重新计算工龄。为此，华为集团支付给“辞职”老员工的赔偿金额总计约10亿元。

为了突破《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的约束，一些企业不再直接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改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劳务派遣规模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很少有一部法律的出台能够像《劳动合同法》一样，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冲击波。究其原因，一是由金融危机引发小微企业倒闭潮，法律成了“替罪羔羊”，二是“资本优先”仍有市场，三是企业主和农民工博弈的平台不健全。

2008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布执法检查报告，证实没有一家企业因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而倒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动合同签订率上升，社会保险参保人数也大幅增加。

一方面，法律的完善逐渐为农民工群体权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农民工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2007年3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里，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时明确提出，“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毫无疑问，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此后3天，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打工妹朱雪芹的名字，和习近平一道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十一届全国人大共有代表2978名，农民工身份代表共有3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历史的一小步，却是中国农民工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大步。

5年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庄严开幕。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31位农民工代表。从3到31，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了更多农民工的存在。

无论还有多少稚嫩和忐忑，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

中国农民工经过改革开放40年

的洗礼，不仅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影响所及已经超出国界。

2009年12月16日，中国深圳的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李春英、邓涛、曹彬共7名普通打工者，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新闻人物。

《时代》周刊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执行采访任务的《时代》周刊记者承认，这几名工人只是普通的打工者，他并没有做过任何事先设定条件的挑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更能代表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

发端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建设力量。2008年，全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据《广州日报》报道，2007年，广东的外省农民工汇带回家的劳务收入达1300多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仅通过邮局汇兑渠道寄往各地的款项就超过700亿元。这些“打工收入”弥补了城乡差距，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加速了农村乡村文明的建设进程。

经过40年的淬炼，农民工不仅成为城市服务的主体和“中国制造”的支撑，更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不断成长，一部分人创业立业，从生产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或城市第三产业的普通服务人员成为企业家，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社会财富。

这些农民工中的佼佼者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已经蜕变了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他们不再是进城谋生的“打工者”，而是走向有产阶层的“领头羊”。

如何使这个阶层逐渐融入城市文明，如何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逐步变成有产者，既是对执政者的考验，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否有序和谐的关键。📺

偶像

无论生活多么枯燥艰难，散落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们，依然有自己的偶像世界。

对于孤独漂泊的这个阶层来说，偶像是工棚里张贴的明星海报，偶像是手机里默默关注的大V微博，偶像是每一个成功转型的农民工。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对称，拉近了农民工与成功者的距离。伴随着收入增长，他们的消费从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很多时候，他们成为偶像的崇拜者，甚至成为偶像经济的主要消费力量。

偶像对于农民工精神世界的影响，促成了新一代去中心化、个性化的价值观念，颠覆了以往管控社会代际话语权转移的模式。

“十二连跳”与新生代的困惑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是8900万人。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年纪轻,而且生活起点、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都与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大不同。他们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大多没有真正感受过生活的艰辛,更没有过从事农业的经历,对城市五光十色的时尚生活却耳濡目染,诉求已和先辈们大相径庭。

2010年3月至5月,全国总工会与多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形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的研究报告》。

《报告》披露,与老一代农民工改善家庭生活的动机不同,高达71.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为了“体验生活,实现梦想”。他们的就业选择不仅看重工资,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以及发展机会等软件。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准备将来“在打工城市买房定居”,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的生活愿望更强烈。

《报告》同时显示,在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公共服务权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维权态度由被动“恳求”向主动“抗争”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恋期和情感高依赖期,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有亲情和爱情在身边,可以交流思想,有困惑能够倾诉。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诉求

发生多方面变化的同时,与农民工关系密切的客观现实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羁绊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企业对农民工行政命令式和机器人式的管理方式没有实质改变;农民工仍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状况没有变化;农民工权益维护渠道不畅的问题也没发生实质性好转。

在这种变与不变的冲突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愿望与社会的客观现实碰撞中,形成了梦想与困惑的悖论。

全国总工会2010年3月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0家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比老一代农民工(1915.14元)还低167.27元。

另据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2010年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即使通过加班获得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他们的每月所得基本上只能维持其本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甚至要靠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社会的客观现实却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仍旧存在,附属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并未覆盖农民工。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既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又无法享有城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处于在市民与农民之间游离的尴尬状态。这种特殊的角色,导致他们很容易对未来产生无助和迷惘。

从2010年1月至5月,台资在内地

票

农民工大叔头戴安全帽,坐在大纸箱上,手里举着一块大红牌子,上面写着“求打包送回家”。

2017年春运前夕,这样的一幕出现在北京街头。一位草根艺术家试图通过如此荒诞的行为举动,影响社会公众关注农民工春运“抢票难”。

如果不是外出打工,人们很难想象一张回家的车票意味着什么。

不回家不行,妻儿老母正倚在村口守望。回家亦难,工厂放假的时间被严格限定,准许离厂的日期直接对撞客流最高峰,“秒光”的抢票状况让人无能为力。

没有火车票就骑摩托回家。没有摩托就走着回家。

这是最艰难的回家之旅。这是无法阻挡的亲情呼唤。

最大的投资企业之一富士康接连发生了12起新生代农民工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和中央高层的关注。

震惊中国的富士康“十二连跳”,暴露的是现代加工企业里劳动者所陷入的精神困境。

在物质层面,富士康待遇优厚。但在精神层面,企业缺少人文关怀,员工上班不能说话,工人必须找到别人代班才能上厕所,时间一久,容易产生与世隔绝的感觉。

由于企业内部层次划分非常明显,不同层次员工的工作性质及生活圈子截然不同。沟通的缺失,更加剧了情感的孤独。

与老一代农民工“改善生活”的愿望和诉求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农村,就是以改变身份和自我发展为动力。当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时,一些人便难免心灰意懒,诱发悲观厌世情绪。

与富士康“十二连跳”同时发生的,还有佛山的“本田罢工”事件,它带有更多劳资对抗的色彩。

2010年5月17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近百名员工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待遇差,停工一天。5月21日,因传言公司已赴湛江等地大量招聘新工人,公司不会给员工加薪,员工们开始第二轮停工。5月26日,本田宣布新工资调整方案,工人不接受,继续罢工。5月27日,本田公司发布消息,由于零部件供应中断,4家在华整车工厂均被迫停工。

本次“停工门”事件,参与工人最多时达千余人,且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有媒体称,事件起因是工人对薪酬体系不满,日本支援者的年薪与中国工人相差50倍。

“十二连跳”事件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人文关怀的精神追求与

机械式作业、封闭式管理之间的矛盾,是梦想破裂的绝望和逃避。

“本田罢工事件”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权利平等的追求与强资本、弱劳动的矛盾,是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抗。

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新生代农民工在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的过程中,面对现实的困境,往往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

要避免历史上每一个新阶层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剧烈社会震荡现象的发生,就必须拓宽制度渠道,调适政策措施,搭建发展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归属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未来。为他们的成长降低成本,为他们的融入减少代价,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契机,为他们的未来架设桥梁,这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绕不过去的坎。

政府层面拓宽制度平台,拆除计

划经济旧体制的樊篱,打造上升通道,给他们以希望,给他们以动力,这是迎接亿万新生代农民工走上历史舞台的根本。

拓展组织平台,增强组织力量,畅通诉求渠道,加强精准服务,这是迎接新生代农民工走上历史舞台的保障。

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入会率不高的现状,这一时期全国总工会提出了“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并组织实施了“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并参与整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开展为农民工送政策、送岗位、送安全、送健康、送文化等活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工会组织的“双向维权机制”。

国家政策走向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希冀和期盼相合拍,决定了农民工的融入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融入的过程还有迂回曲折,但融入的步伐将会加速,融入的方式将会多样,融入的方向不会改变。📺

全国劳模

2005年4月18日,23名农民工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公示榜上。

始于1950年的全国劳模评选,5年进行一次,是国家给予劳动者个人的最高荣誉。

55年来,这是农民工第一次登上榜单。他们的名字,和体坛明星姚明、刘翔并列。

媒体分析说,农民工全国劳模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在经济结构巨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的鲜明趋势。

全国劳模评选筹委会负责人则认为,农民工被纳入全国劳模候选范围,显示了国家对这个新兴社会群体的重视。

由此开始,农民工全国劳模终成常态。



2013年7月6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开发区的车间里，一位母亲带着女儿打工

2012—2018 走向融合

经过21世纪前10年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吸收和消化期之后，一度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已是波澜不惊。

从2012年至2016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呈逐年回落态势，增速分别为3%、1.7%、1.3%、0.4%、0.3%。“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并在劳动力供给上体现出明显特征。

从2012年到2018年，农民工流动的最大社会特征就是融入城市。经历了与资本和旧体制的博弈后，迁徙的目的地已近在咫尺，新的体制和政策正在为农民工融入创造条件。

2012年，中国经济的列车在连续20年保持两位数增速以后，终于矗立在世界经济的前台。7.8%的GDP增速，依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于前列，但前期高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开始显现，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发展呈现“换挡减速”和“结构调整”态势。

与此同时，举世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and 攻坚区。好改的已经改了，好革的也已经革了，改革的红利虽然仍在释放，但边际效应的递减趋势已经出现，亟须新一轮改革攻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牵引。

这是一个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也是中国农民工追求美好生活并加速融入城镇的新时代。

中国农民工在40年的迁徙过程中，迎来了融合的春天。

以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以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为支撑，以深化体制改革为动力，中国农民工开启了融入城市的新征程。

就像日夜奔腾不息的长江，当它即将汇入蓝色海洋时，得更宽阔、平静与和谐。

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的锻造



2009年11日，广东东莞一家通讯设备制造企业的生产线上，一位新员工因操作失误出了次品而流了泪

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式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中国农民工开始面临新的要求。

廉价劳动力既是“中国制造”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优势所在，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近20年来以两位数的经

济增长率增长的关键。廉价劳动力的主体就是农民工。

中国农民工体量庞大、供给持续性强、自身能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等特点，成就了3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制造”。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体，他们的维权意愿更强烈，维权方式更具有群体性和对抗性的特征，国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也逐渐完善，“血汗工厂”已难以立足。

与此同时，农民工的供给也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

尽管农民工总量由2008年的22542万人持续上升到2014年的27395万人，但年增长率却从2010年和2011年的高峰开始逐年回落。2012年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89%，2013年为26894万人，比上年增长2.41%，2014年比上年增长1.86%，“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在上述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时期。“三期”是指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首次明确了新常态的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旧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式生产方式的终结，也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变化。

产业结构调整 and 优化的加速，劳动力尤其是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滞后，必然会带来结构性的失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是老一代农民工的2.9倍。

技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现状，同

时制约了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苦力”的体力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当一部分只能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这种低工资的就业方式,既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发展,又不利于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的打造;既容易引发劳资矛盾和劳动关系的不和谐,又不利于消除社会的两极分化。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技能素质提升工程作为国家战略拉开了帷幕。

2012年开始,这项战略进入了顶层设计、密集推动和全面实施阶段。

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该意见要求对在岗农民工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对具备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将农民工纳入终身职业培训体系。通过培训补贴鼓励企业组织农民工进行培训,鼓励大中型企业联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建设一批农民工实训基地。

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首次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培训提出要求,督促各地要紧密结合返乡农民工等人员的创业特点、需求和地域经济特色,开发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并按规定给予创业培训补贴。

2015年,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纷纷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行动:人社部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春潮行动”;教育部开展岗位证书培训行动;科技部开展“星火计划”培训;住建部开展城乡建设行业农民工技能

培训;农业部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行动;扶贫办开展“雨露计划”培训行动;全国总工会开展技能培训促就业行动;共青团中央开展青年农民工培训;全国妇联开展女性农民工技能培训等。

从2015年起,我国每年培训农民工2000万人次,包括开展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对已就业的农民工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1000万人次。另外,从初级工到中级工,再到高级工乃至技师,开展技术人才培养100万人次。

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把打造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建设无疑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作为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描绘出中期愿景。

建设新型的产业工人队伍,让他们通过技能素质提升增加劳动的价值,提高劳动所得和收入水平,就可以为2.87亿农民工敞开劳动致富和走向中产的渠道。

没有2.87亿农民工的小康,不可能是全面的小康。

没有2.87亿农民工中的佼佼者率先进入中产行列,这个中产阶层就是畸形的。

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就必然会受到制约;如果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就没有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提升农民工的技能素质,培养一代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调结构、转方式、换动力的客观需要,也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造就中产阶层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劳动力大国走向劳动力强国的一把钥匙。

谁掌握了新型产业工人队伍,谁就掌握了中国的未来。



热线

1990年,只有初中文化的张家口菜农陈军到北京打工,在海淀区肖家河租下一块菜地。

与众不同的是,当身边的打工者忙于挣钱的时候,陈军关注的却是更多农民工的苦恼。

2003年,陈军开办“烦忧热线”,试图为农民工排忧解难。

开始电话没人打,陈军就手写了几百张小广告四处分发。

“烦忧热线”慢慢热了起来,3万多人次的来电内容,涉及婚姻、家庭、教育、劳资、抑郁症、维权信访和家庭暴力,陈军整理出的案例就达上百万字。

为了办好“烦忧热线”,陈军在北京师范大学旁听了心理学课程。他的梦想是写一本《我替农民说实话》,反映农民工的生活现状。

农民工的社保与社会公平

孙水林兄弟

哥哥孙水林在北京做建筑工程。每年春节前，都会给农民工结清工钱。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孙水林筹集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匆忙驾车返乡，途中遭遇车祸，一家五口全部遇难。

弟弟孙东林撬开撞得扭成一团的轿车后备箱，捆好的26万元现金还在。孙东林说：“我们家这个年是过不成了，但不能让跟着哥辛苦一年的工友们也过不好年。”

腊月廿九，两天未合眼的孙东林赶回老家黄陂，通知农民工上门领钱。

因为哥哥离世后，账单多已不在，孙东林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大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钱不够，他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亲的1万元。

像以前一样，60多名农民工在年前领到工钱。

言忠信，行笃敬。“信义兄弟”悲情接力，为尊严承诺，为良心奔波。雪落无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

中国的农民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产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而壮大。从1978年的改革元年算起，到2013年已历时35年。当年20多岁的青年人，如今已逐步迈入老年人的行列。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并没有做好迎接农民工老龄化的准备。

从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来看，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呈现出数量巨大和参保率低两大特点。

2015年，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约5000万人，而当年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只有17%左右。

考虑到此前农民工的参保率更低且参保的时间不长，高龄农民工的社保缺位和“社保拖欠”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并呈现出时间长、跨度大、人数多和阶段性的特征。

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工产生到1998年的20年间，农民工的社保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从1999年到2008年，各地因地制宜开始探索农民工的社保办法。2009年以后，才从地方到中央，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社保之路。

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中，养老保险为7.6%，工伤保险为21.8%，医疗保险为12.2%，失业保险为3.9%，生育保险为2.4%。2014年，这些数字分别为16.7%、26.2%、17.6%、10.5%和7.8%，增长缓慢。

毫无疑问，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对社保问题的态度。1998年，全国农民工的劳均年收入只有5807元，平均月收入480多元，其中的61%都寄回家或带回家，这种收入水平很难让农民工再从中拿出一部分缴纳社会保险。

即便到了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只有1747.87元，约为城镇职工的57.4%。低收入导致了农民工眼前利益（生活所需）与长远利益（养老）的矛盾，也导致了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工作的不稳定性 and 社保统筹层次低的矛盾。

没有外力的强制约束，企业不想也不愿为农民工的社保买单。况且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时间里，国家并没有制定统一和完善的农民工社保制度和法规，这也在客观上为企业不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打开了逃漏之门。

在各地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出台的过程中，伴随着农民工“参保一退保”的恶性循环，沿海地区的“退保”风波不断。

在珠江三角洲，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辞工退保成“潮”，有的地区退保率超过95%。以东莞市为例，2007年就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仅南城区社保分局，就有1.23万人退保，退保总金额高达2628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工厂经营不善倒闭、工厂搬迁市外以及春节期间“回家潮”等，都会造成大量退保。一些企业在有订单时招收大量工人，订单少就裁员，也造成很多集体退保。

退保费是农民工一笔重要收入，经济利益诉求也是退保的重要原因。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由个人和企业双方承担，个人缴费8%，企业缴费8%。但是，由于东莞市建立地方养老保险，企业还必须缴费3%，这部分费

替夫还债

对于辽宁本溪农夫武秀君来说，那个电话里的声音至今不敢回想：“赵勇出车祸了！”

赵勇是武秀君的丈夫，外出打工，一直做到独自接手建筑工程。2002年，他的突然离去，把270多万元欠款留给了武秀君，其中包括农民工的工资。

武秀君给所有的债主一一打了电话，承诺只要有钱立即就还。

刚上初中的小儿子知道母亲要省钱还债，偷着把自己的饭钱攒下来，饿昏后被送到医院。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妈，这是我攒下的308元饭钱，谁家买种子化肥用钱就先还给他们。”

2003年，武秀君一个人来到本溪，学着其他男人的样儿，竖起了一个小牌子，写上“油漆工”几个字，等着装修的业主挑选。按照市场价一半的价钱，武秀君揽下一桩活，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刮墙刷漆，10天后，拿到了5000元钱。接下来，她成立了装饰工程队，成了小包工头。

最终，270万元欠款还清了。

诚重如山，一诺千金。诚实守信，这就是武秀君对幸福的诠释。

用也划入参保职工本人的地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东莞市农民工参保满一年退保则可以退回缴费的11%，不够一年只退8%。

以东莞市南城区社保分局为例，退保的人以参保1年至3年者居多，按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960元计算，一次性退保后就能得几千元。有的人甚至为领取退保金而故意辞工，请求企业开退保单。

累计缴费15年，退休后才能拿到养老金，这个规定让打工者觉得“太遥远”。深圳市1987年起允许非户籍人员参加养老保险，15年后，能够享受养老待遇的仅有100多人。

这一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保不能有效对接。虽然国家规定任何地方都要无条件接纳个人养老保险，但某些地方还是设置了障碍，不接受从别市转进来的无常住户口人员的社会保险手续，因为外来人员在当地退休的越多，当地财政需要支出的养老金也越多。

农民工退保，所缴保险费的“小头”——个人缴纳部分由农民工一次性领回，“大头”——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充入地方社保基金。这也是各

地社保机构扩大参保面和办理退保时心照不宣的动力。

退休后养老金水平与缴纳年限、个人账户的联系紧密。农民工退保，虽然能拿到现钱，但几年甚至七八年的缴费年限将作废，个人账户将不存在，今后虽可重新缴纳，计发水平却降低。而流动退保，缴费年限达不到要求，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份保障。

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发布，第一次明确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对转移接续和制度衔接做出明确规定。

同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种制度的衔接和转换进一步做出规定。

养老金的统筹层次，一直是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在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和工作不稳定所带来的养老保险的累计缴费年限计算和跨区域转移接续以及在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转换问题的同时，高层决策者始终把提高统筹层次作为重要的政策考量。

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重新就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若干问题做出规定，以确保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的顺畅转接。

2018年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方案》，提出在不增加社会整体负担和不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基础上，通过中央调剂基金筹集、基金拨付、基金管理、中央财政补助，合理均衡地区间的基金负担，确保各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至此，国家层面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相关制度措施已日臻完善。

尽管农民工社保与城镇职工社保的整合统筹仍然存在政策不完善、一些险种统筹层次低、农民工参保率不高、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但是制度体系已经确立。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政实力的增强和政策及制度的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保制度将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一张“安全网”。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融入



2009年9月11日，深圳市一家制造企业培训员工的大课堂。2009年，亚洲金融危机。深圳制造业因订单断崖式下跌导致员工空闲。多数企业借此机会举办培训班，以提升企业实力和留住熟练工人

2012年之后，农民工的总量和流入地级以上农民工占比一直处于稳定提高的状态。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没有农民工的支撑，“中国制造”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名片。从农民工的供给侧来看，老一代农民工中约有10%的人不愿回家乡定居，而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在打工的城市定居。

既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又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意愿，户籍制度改革是让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保障如何公平化和均等化。随着农民工社保进程的加速，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逐渐衔接和融合，附着于户籍之上的福利保障开始减少，户籍所背负的压力开始减

轻，这就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

2011年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

这份文件第一次明确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与城镇化发展规律相联系，首次把农村人口转移的范围扩大到地级市，首次把“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作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的出台标志着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农民工融入城市已成为户籍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

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正式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系统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政策，在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中具有标志性

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此，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与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实现了同向的一体化进程。尽管有些政策措施尚需进一步完善，但体系化的进程已经开启。

从宏观上看，各省市自治区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聚焦于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

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之前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了户籍管理制度回归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截至2016年9月19日，随着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全国31个省份已取消农业户口，在“户别”栏不再有农业和非农业之分，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户”或“集体户”。

户籍管理制度的全面改革，最终形成了中国农民工流动的“第三次浪潮”。相比而言，“第一次浪潮”是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第二次浪潮”是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第三次浪潮”则是农民工“进得了城、回得了乡”。

但是，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第三次浪潮”还刚处于起势阶段，虽然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显示出诸多的不足。

从已经公布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来看，对于各类人才落户，所有的省市包括特大城市都是敞开的。但是，对于农民工户口迁移，绝大多数省市都仅限于本省市范围的户籍，外省流动农民工的入户控制依然比较严。

成都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曾被称为“中国最彻底的户籍改革方案”，不过，尽管成都明确提出市外人员也可入户，但到2016年，外省市农民工真

正在成都落户的仍是寥寥可数。

从社会现实来看,只有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才能革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实羁绊。

尽管早期进入城市并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形式开始出现,但相对于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居住形式,农民工自购房的比例非常少,到2014年才达到1%,而租房的比例则高居第一位。

从1978年到2018年,租房始终是在大城市从事服务业农民工的重要居住方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历史上具有商业和服务业传统和技能的浙江人开始大量流动进京,集聚于木樨园到大红门一带与南苑乡交叉的城乡接合处。1986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初具规模的城中村——浙江村,当年聚居外来人口达到1.2万人,1994年达到9.6万人,是本地人口1.4万人的近7倍。

“浙江村”的称谓从此广为人知。

此后,类似的城中村在各大城市相继出现,如北京的“新疆村”“安徽村”,南京的“固始村”“无为村”,广州的“南景村”等等。

尽管这些城中村正在渐次消失,但农民工进城的潮流仍在继续,农民工的融入是大势所趋。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户籍问题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教育密切相关,要使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初衷得以实现,破解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教育的困局就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尽管缺乏连贯统一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统计资料,但不同时期、不同渠道碎片化的统计数据仍然能反映这一特殊群体的规模。

2003年,北京市有10多万名适龄流动儿童,入学率只有12.5%,有87.5%的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公立学校。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打工子弟学校这一特殊的教学体制应运而生。

199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1993年,安徽六安人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1994年,当时在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在菜地里搭建了一个14平方米的窝棚,用一块抹了黑漆的三合板加上一本课本,以“私塾”的形式诞生了。

此后,在深圳诞生了铁皮房识字班,在广州出现了棚子“私塾”,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打工子弟学校。由于法律上没有依据,制度上没有安排,政策上也没有说法,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都处于“非法”状态,学校条件也较差,师资力量薄弱,大部分校舍由租用的仓库或工棚改造成。

2014年7月,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各大中城市都加快了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教育体系的步伐。

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起,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教育经费可携带,以适应新型城镇化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

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改革随迁子女就学机制,进一步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

至此,国家层面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政策体系已经非常明确,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城市的教育体系的趋势也很明朗,打工子弟学校这一由城乡二元体制衍生的特殊教育形式被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取代将不可避免。

2015年3月7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国人大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现场。

李克强总理的一段话,让整个会场陷入沉思。

李克强说,一群农民工“当着我的面流泪了”,因为他们觉得“心酸”,很难完全融入当地,很多待遇是不平等的,不只体现在社会公共服务,还有企业薪酬。

毫无疑问,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公平比黄金更重要。

户籍问题一度是公平的重要标志。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直言,农民工户籍问题不解决显失公平正义。

依照黄奇帆的算法,一个在城里工作30年的农民工,应当有上千万元的产值,只要拿出百分之几,就可以解决成本问题。何况,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成本,是社会必须承担的。

连年全国两会上,呼吁公正对待农民工的声音日渐强烈。

显然,只有加快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在生活中才能感受到更多公平正义。

Unbiased

公正的

诉求渠道与权益维护

从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为起始,雇佣性质的劳动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步发展,成为劳动关系的重要社会特征。

外商投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是农民工流动的主渠道。因此,农民工从初始阶段就开始了与资本的博弈。

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自发流动与供给富余的特征与资本的组织性与稀缺性产生正面碰撞,决定了农民工权益维护的脆弱性和畅通诉求渠道的紧迫性。

中国工会作为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和权益维护组织的责任和使命,就在农民工与资本的博弈中、在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的需求中产生和形成。

实际上,在农民工流动之初和雇佣关系出现之始,中国工会就一直担负着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在实践中,每一起重大侵权事件的处理都可以看到工会的身影。反映农民工诉求、维护农民工权益,中国工会在行动。

在畅通农民工诉求渠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实践中,“蛇口模式”最早取得突破。

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实验区,毗邻港澳,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边缘地带,外商投资企业多,内地涌入的农民工多。企业生死——开业或倒闭,职工进进出出——被聘用或被辞退,是这里的正常现象。

这种动态的、不稳定的劳动关系,客观上要求工会发挥调节阀的作用,既要鼓励外商“高高兴兴地投资赚钱”,又不能以侵害和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繁荣。

资本的拥有者从来都是以“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受到最小限度的制约”为目的。倘有可能,他们会排斥任何约束。

有鉴于此,蛇口工业区把组建工会作为前提条件写进《企业投资总协议》中,资方必须做出此项承诺,才能建厂招工进行生产。

正因为来自党政的强力支持和《企业投资总协议》的制约,蛇口工业区工会拥有了四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权力——

凡劳动争议归蛇口工会调处,在区内由工会履行仲裁的基本职能;

企业职工正式调入或入户口,必须经工会签署意见,并行使“一票否决权”;

企业辞退职工,必须经企业工会签署意见,除名职工,必须经企业和工业区两级工会同时签署意见,并行使“一票否决权”;

职工购买福利房出现异议或投诉的,必须经工会签署核查意见,并行使“一票否决权”。

这四项权力的运用,使企业感到没有工会不行,拖延建会对企业不利,没有工会参与制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和决策,执行时必会有挫折。

此后,“宝安模式”和“义乌模式”相继出现。

所谓“宝安模式”,是指在全国率先建立“小三级”(区、镇、村经济发展公司)基层工会组织网络,并以此作为农民工诉求的渠道和维护合法权益的平台。

所谓“义乌模式”,是指工会与司

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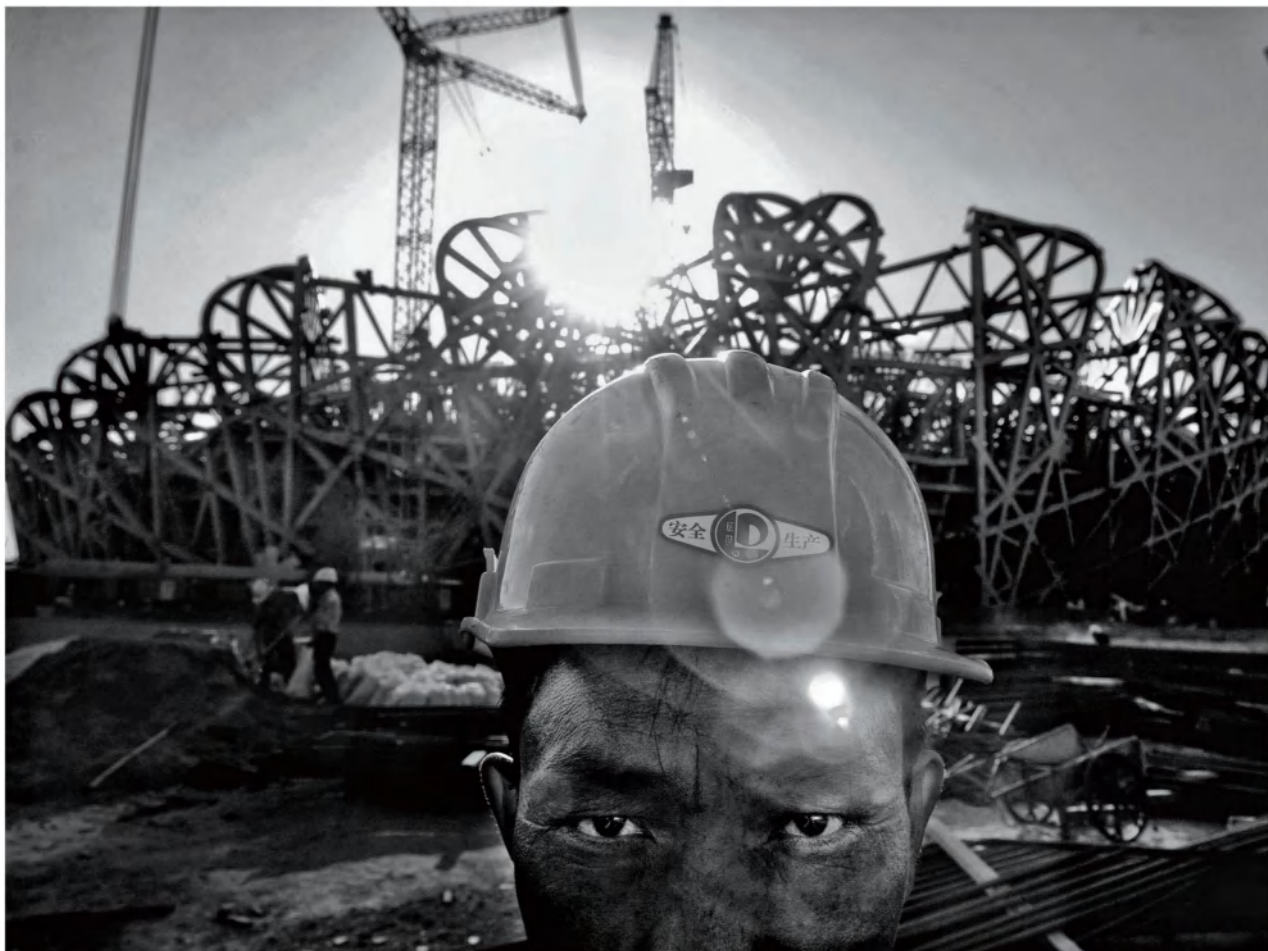
“用低廉人力成本进行大量生产的世界工厂”,这个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定论正在被慢慢颠覆。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因劳动力不足生产现场陷入停顿的情况时有发生”。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劳动理由中选择“收入”的人中,1960年代出生的人占76.2%,80年代出生的人仅占18.2%。

中国青年网披露的另一份调查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专注意度较高,但是精业水平欠佳,技能提升意愿不强。

越来越多外资企业经营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要求改善劳动环境、提高薪酬待遇的呼声日益急迫,很难像以往一样享受低廉人力成本所带来的好处了。

在一个充满机会和变动的社会里,价值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



2006年6月,这位来自河南省的农民工面对照相机的镜头略带胆怯

法、劳动、工商、卫生、安监、媒体和高校进行维权联动,形成社会化维权机制和三方协商机制及维权信息沟通机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从1994年至1995年的“蛇口模式”到1996年至1997年的“宝安模式”,再到2000年至2005年的“义乌模式”,中国工会对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的探索从未中断。

这种微观探索、实践突破的方式,对推动中国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对密切工会与职工的关系,凝聚职工跟党走,都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指出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解决农民工问题做出全面部署和统筹规划,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措施,这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央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问题的顶层设计,为全国工会系统的宏观推动创造了条件。

2006年12月8日,全国总工会十四届十一次主席团会议召开,首次

鲜明地提出“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为拓宽农民工诉求渠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把农民工打造成新时期的产业工人创造了条件。

这一年,中国工会叫响“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协助政府有关部门为279万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13.1亿元,排查数万处安全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隐患,在全国建立200多个流动电影放映队和31所农民工业余学校,开展农民工平安返乡行动。

这一年,中国工会先后突破了沃尔玛、戴尔、柯达、三星、富士康等长期拒不建会的“钉子户”,形成了突破一个

难点、带动一片的效应，创造出工程项目工会、市场工会、楼宇工会、社区工会等形式多样的工会组建形式，全年新增农民工会员800多万人。

2007年，中国工会全面推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10项工作机制建设，包括源头入会机制、双向维权机制、就业指导培训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社会保障促进机制、劳动安全卫生监督机制、帮扶关爱机制、民主权利保障机制、用工诚信评价制度和法律援助机制。

2008年，中国工会制订和推动劳动合同3年行动计划，全年培训400多万名农民工，为职工和农民工建设1000个全国职工书屋，新增农民工会员1000万人，全国农民工会员总数达到7000多万人。

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影响，中国工会开展“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从这一年开始，工会的农民工就业援助和农民

工技能培训从未中断。

2010年，全国总工会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状况的调研，加大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和权益维护。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总工会报送的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工会要继续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2011年，中国工会对100万名农民工进行了职业技能培训，为100万人进行了职业介绍，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行业、集体宿舍区建立了1000家“职工书屋”，为农民工获取知识和丰富文化生活创造条件。

2012年年底，中国工会农民工会员总数达到1.09亿人，农民工的诉求渠道不断拓宽，劳资博弈平台不断完善。

2015年6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工会系统进一步推进和做好农民工入会和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积极

推进“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把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建筑项目、物流（快递）业、家庭服务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作为集中行动的重点。

2016年1月，全国总工会印发了《关于推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的通知》，要求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

以此为标志，一些省市针对环卫、建筑等行业户外劳动者在就餐、饮水、休息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建立“爱心驿站”等服务措施，被推向了全国和各个不同的行业。

户外劳动者的主体就是农民工，“爱心驿站”和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建设，无疑是工会组织凝聚农民工和服务农民工的重要举措。

2016年9月，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农民工工作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应保尽保，到2020年年底，实现建档困难农民工全部解困脱困。

2018年2月，全国总工会提出，将在开展“强基层、补短板、增活力”的行动中，重点推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八大群体的入会工作，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维权服务。

工会改革3年来，农民工每年入会人数高达1500万人。

成果辉煌，前途漫漫。

今天，农民工中还有近半数没有加入工会组织，农民工融入城市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工会组织协调推动。

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增强工会组织的代表性和凝聚力，夯实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中国工会永远在路上。❶

吴菊萍

2011年7月2日下午，杭州滨江区一处住宅小区，一个2岁女童突然从10楼坠落。

危急时刻，正在楼下的吴菊萍冲了上去，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孩子。

女童得救了，吴菊萍的手臂粉碎性骨折。这一刻的冲力，相当于用手接住了一个335.4公斤重的物体。

“最美妈妈”的故事，瞬间燃爆网络。

24天后，全国妇联授予吴菊萍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当年年底，这位在阿里巴巴打工的农民工入选中国“十大草根人物”。

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市，从一次感动到一片赞美，从一种牵挂到一场洗礼，一位用双手托举生命更托举出真善美大爱的“最美妈妈”，感动了杭州，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农民工迁徙与中国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农民工流动从1978年思想解放为起始，由涓涓细流逐步汇聚成滔滔洪流奔腾向前。冲过险滩暗礁，最终融入现代文明海洋。

在这股洪流的牵引下，中国社会成功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长官意志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转型。

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7亿人。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入始终能在有序的社会轨道内运行，并通过撞击与反射的能量推动社会前进，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的全球经验。

那么，中国的农民工大规模迁徙为何没有带来大的社会震荡？

当代中国的改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古今中外无与伦比。

中国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始终与改革的进程相联系。在历经“离土不离乡”的短暂阶段之后，跨区域流动始终是农民工的主基调。

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大规模的农民工迁徙交织在一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似乎在所难免。

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圈地运动”和法国的工业革命，就曾带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与对抗，中国封建社会的变革与流动也往往带来朝代更迭。

唯独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农民工流动的碰撞带来的却是融合发

展。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迁徙因改革而形成，政策因迁徙而调整。在新旧体制转换的特殊时期，政府的宏观调控成了社会转型的“导轨阀”和“扳道工”。

回首中国农民工流动40年的历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的历史，是农民工流动与旧体制束缚冲突与解放的历史，是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历史，是二元体制走向一元体制以及农民工渐进式融入城市的历史。

这个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农民工的流量与流向都因改革导向和政策导向而变化；每一次农民工与资本的博弈和与旧体制的冲突，都伴随着新政策的出台与新体制、新机制的建立。

体制改革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劳资博弈构建了平台和规则，为社会转型构建了“导轨阀”，才使中国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社会变革与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相碰撞时，在不出现震荡的情况下和谐融入。

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构建的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为农民工大迁徙的波动性构建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托底”机制，为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构建了一张“安全网”，成为农民工大迁徙和社会转型的“海绵垫”和“调节阀”。

尽管农民工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已经“离土又离乡”，留在家乡的“九九三八六一”（老人、妇女和儿童）群体却在帮他们经营着承包地，即使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也不至



熊德明

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西南地区的一处农舍。

打完猪草回家的熊德明直言不讳，丈夫李建民2000多元工钱被拖欠一年，影响了孩子交学费。

“一会儿我到县里去，拖欠农民的工资一定要还！”温家宝承诺。

当夜，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资。

一个存在已久却被漠视的顽疾，被熊德明揭开了疮口。

最大规模的帮农民工讨薪运动在全国铺开。北京甚至宣布，凡是严重拖欠民工工资的企业将被赶出首都建筑市场。

一个普通的“背猪草的农妇”，就这样成为敢为农民工讨要工钱的标杆。

这一年，熊德明被评为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人物。

出名后的熊德明在家乡养猪，成立了“德明养殖专业合作社”，并注册了“熊德明”商标

于有生存之虞，随时可以回农村生活（主要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

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农民工流动大迁徙，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创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独辟蹊径。

中国工会建设性特征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

正是中国工会的存在和努力，为农民工与资本的撞击构建了一个“缓冲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缓了劳资双方的对冲，实现了劳资关系的“软着陆”，规避转型期的社会震荡。

希望激发动力，绝望产生对抗，这是人类行为科学的一般规律。

以2008年三位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起始，各级人大和政协舞台上都活跃着农民工的身影。

以2016年农民工代表巨晓林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为起始，各级工会机关领导机构都为农民工兼职副主席留下了位子，成为政治制度上的体制性安排。

以2016年全面取消城乡户籍性质区分为起始，城镇的大门终于对农民工全开放，虽然尚存一些困局待破解，但融入城市的渠道已经畅通，农民工进城已不再有制度的羁绊。

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这种横向扩展职业流动、纵向提升身份变迁的大迁徙，既为农民工迈入中产阶层打开了通道，又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在发展中实现了“动态平衡”。

“中国制造”为何能成为“中国名片”且经久不衰？

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从一

杨晓霞

1996年，江西省铅山县，初中毕业的杨晓霞离开土地，进入当地一所服装学校学裁缝。

两年以后，杨晓霞来到宁波，从一个缝纫工成长为技术能手，在公司“操作运动会”上连连夺冠，钻研出“杨晓霞质量法”，先后带出400多名“徒弟”。

2006年，从当选宁波市第二届十大外来务工明星开始，荣誉纷至沓来。

2008年，杨晓霞以农民工的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成为浙江10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中的第一人。

接到当选通知那天，平时话不多的丈夫开了一瓶啤酒：“来，我们干一杯吧！”

父亲杨为发这样叮嘱女儿：“你来自农民，不管身份如何变化，都要为百姓说话。”

杨晓霞则说：“我要尽职尽责地做好农民工的代言人，把农民工的声音带到北京去。农民工代表主张自己的权益，更直接，更有效。”

个工业化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产品一跃成为中国的名片。

中国农民工的特殊品质是“中国制造”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尽管廉价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中国农民工有着内在的特殊品质。

第一个特殊品质是特别能吃苦。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大多数农民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经常没有休息日。正是农民工的吃苦耐劳，奠定了中国制造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中国农民工的高强度劳动和低水平收入，就没有“中国制造”的走向世界。

第二个特殊品质是特别能忍耐。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务工过程中，都秉持“与人为善”“和气生财”和“以和为贵”的理念。当这种妥协性用于与资本的博弈时，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就能得到保持，从而客观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第三个特殊品质是特别能拼搏。

中国农民工独自外出打拼，是孤独的拼搏者；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人脉，是漂泊的拼搏者；到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谋生，是不断进取的拼搏者。或许他们的形象并不那么靓丽、举止并不那么文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及其劳动的伟大。

第四个特殊品质是特别具有工匠精神。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中国农民由此善于精耕细作，并把这种精神带到制造业的岗位，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这正是工匠精神的精华所在。当今工匠精神的稀缺，更加凸显农民工自发形成的工匠精神之可贵，也更加印证着中国农民工所拥有的工匠精神的底蕴和对“中国制造”的贡献。

中国农民工的四种特殊品质构成了中国农民工特有的精神。它来源于生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制造”就是农民工精神和农民工劳动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并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工。

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为何不会出

现“贫民窟”？

很多新兴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贫民窟”，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至今仍有“贫民窟”存在。

中国在实行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尽管形成了世界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工大迁徙，也曾出现过“城中村”，却始终没有形成“贫民窟”现象，这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土地保障”构成了中国农民工大流动的托底机制，客观上消除了产生“贫民窟”的基础。

中国的农民工大流动是以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前提的。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并不是在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进城的，进城的目的也不是留在城市，而是在城市比较利益的拉动下，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具有形成“贫民窟”的主观愿望。

对一些举家迁徙到城市的农民工来说，虽然在城乡接合部租房比例较高，居住也相对集中，但由于中国的城市极速扩张，城乡接合部不断变化，也难以形成稳定的聚集区。

二是中国的土地国有化在客观上消除了“贫民窟”产生、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尽管中国农民工的迁徙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一度形成不同区域的“城中村”。但是，随着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城市功能的疏解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这些“城中村”随之消失。

三是中国的工业化先于城镇化，为农民工在城镇寻找工作和稳定就业创造了条件，消除了“贫民窟”形成的充分条件。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客观上为迁徙的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进而使他们有了保障基本生活的收入，有效化解这一群体沦为赤

贫阶层的风险。

中国农民工未来将走向何方？

中国农工作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这一群体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而壮大，并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完成而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前提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身份的取消和职业与身份的统一。2016年年底之前，全国各省市已相继宣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取消城乡户籍性质之分，并纷纷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消除羁绊，打开通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前提已经具备。

中国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基础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尽管从2016年年底开始已经不再重新设置农民身份，但同年年底全国仍有超过2.8亿名农民工在城市打拼。虽然城市为他们的融入打开了“积分入户”的口子，但这个口子太小，能够即时融入的农民工太少，对两亿多农民工的消化吸收将仍然是一个过程，

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中国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中国在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差别是非常罕见的，即便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一些地方的城乡差别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机会、资源和服务仍然分布不均，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的脚步。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照这条路走下去，“进得去的城”的中国农民工，未来还会“回得了的乡”。

届时，中国农民工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奔腾几十年的民工潮将悄无声息地没于城市文明的海洋，农民工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农民工群体从产生、发展到融入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就是新体制、新法规、新政策、新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就是人（尤其是农民工）的不断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

中国农民工的未来，正在徐徐拉开新时代的大幕。

张全收

张全收家境贫寒，12岁因贫辍学，15岁外出打工。每当生活陷入困境，总有乡亲拉他一把。

1997年，张全收在深圳开了一家小吃店。两年后，他创办了深圳全顺玩具加工厂。再过3年，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成立，帮助河南等地的农民工就业。

全球金融危机那一年，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3500名农民工没有工作，张全收花费800多万元，包吃包住，按月支付工资，建造了一个温暖的“家”。

守望相助，有难必帮。如今，他的公司已经有各地农民工3.2万人，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60多家用工企业。

直到今天，张全收依然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愿天下所有的农民家庭都过上好日子，这是他的朴素心愿。

谋定 守正 出新 之策

2015-2018：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纪事

就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16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总工会开展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要求在两个月内制定出改革方案，争取在一年时间内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北

京, 2018年10月。

人民大会堂里,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盛会。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召开的盛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位工会十七大代表, 带来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显著成效和宝贵经验。

惟改革者进, 惟创新者强, 惟改革创新者胜。

起始于2015年的中国工会改革, 在这个金色的秋天向亿万职工群众展示丰硕成果, 在这个金色的秋天绘就未来5年的创新发展蓝图。

总是有一些特殊的年份, 改写历史深处的细节, 激活继续前行的力量。

改革“元年”

芳林新叶催陈叶, 流水前波让后波。

2018年9月7日, 《工人日报》推出记者郑莉采写的报道《工会改革开启党的工运事业新阶段》。

这篇1546字的消息里, 先后14次出现“改革”一词。开篇首句, 改革的气息便扑面而来——“2015年,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90周年, 这一年也被看作中国工会改革‘元年’”。

总是有一些特殊的年份, 改写历史深处的细节, 激活继续前行的力量。

2015年7月6日, 为期两天的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事实充分说明, 新形势下, 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

就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16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 决定在全国总工会开展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 要求在两个月内制定出改革方案, 争取在一年时间内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李建国同志的直接领导下, 全总党组迅速成立了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从强化思想武装、认真查找问题、深入调研论证、精心研提措施、广泛征求意见等5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制定了《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

10月22日, 中央书记处专题听取全总党组关于全总改革试点方案的汇报, 给予了充分肯定。

11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

11月11日, 全国总工会召开机关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李建国同志明确提出, 解决工会组织存在的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 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至此, 中国工会以锐意改革进取的新姿态, 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同频共振。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 一途不可以应无方, 刻船不可以索遗剑。

11月24日, 新华社以《勇于推进改革创新, 热诚服务职工群众》为题, 播发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就全总改革试点答记者问, 工会改革的谋篇布局清晰可见——

增强“三性”, 去除“四化”, 做强基层, 着力创新;

增强工会组织广泛性和代表性, 提高领导机构中职工代表比例, 整合优化机关职能和机构设置, 实行全总机关编制“减上补下”, 改进机关干部管理方式;

深化“基层工会建设落实年”活动, 坚持工会经费使用进一步向基层倾斜;

做强工会工作品牌, 改善劳动模范评选宣传和管理服务, 拓展职工职业技能培训, 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突出维护职工基本权益, 健全职工协商民主机制, 构建以精准帮扶为重点的服务职工体系, 提升农民工入会和服务工作;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在吉林东北工业集团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班组园地同职工座谈 新华社记者 鞠鹏 / 摄

深入研究劳动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及时调处劳动关系矛盾，适应“互联网+”发展，打造全国工会系统服务职工网络载体……

毫无疑问，这是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结合的整体谋划，这是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来思考和把握的战略布局。

北京复兴门外工会大楼的改革气息，让祖国大地每一位工会工作者为之振奋，凝聚着亿万职工群众充满期待的目光。

新的使命和担当——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就这样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方位。

以上率下

言必信，行必果。气可鼓，不可泄。

从2015年11月中央批准全总改革试点方案开始，用一年时间完成改革试点任务，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是全国总工会党组向中央立下的

“军令状”。

依照《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的总体部署，全总有序有力有效推进改革试点工作，以发挥全总党组领导核心作用为保证，增强工会系统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

2016年1月，全总十六届四次执委会议在北京举行，54岁的巨晓林以农民工的身份，当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职）。

敏感的新闻媒体以超出以往补选副主席的报道篇幅，把巨晓林的当选和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连在一起，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

北京知名时政新媒体“长安街知事”评价，“一位农民工进入全总最高领导班子并成为副主席，正是落实中央改革要求的生动案例”，并预见“未来会有各行各业的‘巨晓林’进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层”。

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田辉被

增强工会组织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仅需要改进工会领导机构人员的构成,同时需要优化全总机关组织架构。

推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挂职),12名劳模和一线职工被增补为全总执委,3名劳模和一线职工被增补为主席团成员,各驻会全国产业工会分别增设2名兼职副主席,王进、郑久强、邓建军、田双印等知名劳模的名字赫然在列。

增强工会组织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仅需要改进工会领导机构人员的构成,同时需要优化全总机关组织架构。

此次全总改革试点工作中,全总机关6个主要职能部门整合为3个,新成立了网络工作部和社会联络部,5个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事业单位由18个减少到13个。

机构整合过程中,149名干部进行了工作岗位调整,一周内全部到岗,高效平稳地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干部对接。精简下来的50个行政编制,补充到任务繁重、力量薄弱的县级工会,推动解决基层基础薄弱问题。

适应新常态,创新职工建功立业的载体和平

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建功立业。这是全总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试点以来,全总创新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领广大职工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设立职工创新补助资金,为职工创新争优提供了全方位的激励。同时,牵头研究起草和协调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为了叫响做实“大国工匠”品牌,全总与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中国梦·大国工匠篇”主题宣传活动,策划推出《大国工匠》纪录片、“大国工匠”专栏互动窗口等,推动更多工匠人才不断涌现。

2016年夏天,《互联网+工会:移动互联时代的改革创新思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中国首部专题研究互联网+工会的图书首印1万册,迅速销售一空,在两个月内进行了第一次加印。

毫无疑问,全总创建工会网上工作平台的改革之举,直接促动了更多工会干部开始关注智慧工会的建设,“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成为工会工作的热门词汇。

.....

增强工会工作政治性,增强工会组织先进性,增强工会组织群众性,夯实工会基层基础,推进工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翻开全总改革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一项又一项务实举措扑面而来,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的图景。

改革结出的累累硕果,让工会组织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今天,中国工会会员已经超过3亿人,党的工运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推进

群众性是工会组织的天然属性,也是工会改革的力量源泉。



2018年4月27日,《大国工匠》第六季播出

群众性是工会组织的天然属性,也是工会改革的力量源泉。检验工会改革成效的尺子,就是职工群众是否从改革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检验工会改革成效的尺子,就是职工群众是否从改革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伴随着全总改革试点工作不断取得突破,中国工会工作变得更加活力盎然。各地工会坚持自我革命,勇于攻坚克难,及时跟进对接全总改革试点,各项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

2017年3月20日,北京。中国职工之家C座3层的报告厅里,工会系统推进改革工作会议正在举行。发轫于各个省市工会的改革创新实践,显示出工会改革迎来了新的春天。

这是上海市总工会的改革——探索推进职工企业体制外单体入会,动员、吸纳未建会企业职工入会,倒逼体制外入会的职工所在企业建会。177家职工服务站遍布全市,线上受理、线下办理、一

键通达的全方位全时段服务体系正在打造。

这是重庆市总工会的改革——改革产业工会组织形式,实现民主化、扁平化管理。建设基层服务站160个,爱心妈咪小屋130个,重点打造基层群团服务站市级示范点14个,实现十大类“互联网+”工会专业化服务,基本形成“1网+1证+1卡”的服务职工模式。

这是广东省总工会的改革——建设一批村(社区)、园区工会联合会,建立一批职业化社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一批“会、站、家”一体化的职工之家。在职工集聚度高的园区、项目工地建立职工服务站,打通联系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

这是河北省总工会的改革——发放270.5万



2016年7月8日,北京市总工会创新建会模式,工会宣传走进大型商场、超市 彭程/摄



重庆一家企业工会设立“爱心妈咪屋”

张河北工会会员卡，以“一卡（工会会员卡）四功能（会员身份识别、工会服务、商家服务、金融服务）”为框架的普惠服务体系初步形成。试点建设300多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解决户外一线职工的实际困难。

与平时会议不同的是，参加工会系统推进改革工作会议的各地（部门、产业）工会负责同志，同时参加在中央党校举办的“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专题研讨班。

正是在被列入中组部2017年培训计划的这个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提出要求，各级工会要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千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不断扩大职工群众改革获得感。

显然，因循守旧没有出路，唯有以更大的决心去破藩篱，以更强的勇气去涉险滩，工会组织才能更加充满活力和坚强有力，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伴随着工会改革的持续发力和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18年8月27日，辽宁省总工会十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的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辽宁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服务振兴发展服务职工群众工作的实施意见》正式通过，由10个配套方案“保驾护航”的“双服务”大思路，成为辽宁

工会改革创新的方向。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辽宁省总工会主席杨忠林说：“任何事情计划得再好，不落实一切都等于零。现在，各项工作任务已经非常明确，关键在于抓落实。”

这种服务职工的理念，同样融入在湖北省总工会的改革创新之中。

如今，“智慧工会”正在成为湖北职工网上教育、服务和技能提升的平台，一张网正在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在宜昌，只要职工通过工会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提交入会信息，基层工会立刻就能在线上进行审核办结。

职工群众的获得感，离不开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维护。在湖北，如果职工发现自身权益受损，可以通过湖北职工服务网、工会微信、职工法律服务平台等各种网络渠道留言，与工会合作的调解律师第一时间就能为职工答疑解惑。

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

今天，工会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改革成果正在向基层延伸，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正在不断增强，彰显新的使命与担当。

走向未来

实践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当前，工会体制机制与劳动关系、职工队伍的新变化还不完全适应，还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工会工作载体和手段还不够丰富，运用互联网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还不够多；一些工会干部的改革意识和担当精神还不够强，做职工群众工作的本领有待提高。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创新”。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改革的决心更坚定，改革的思想才能更明确。改革的方向更清晰，改革的脚步才能更有力。唯有把准改革发展之脉，谋定守正出新之策，再启攻坚突破之局，善为精准发力之举，才能把工会改革进行到底。

上下联动，整体推进，这是更高起点的工会改革再出发。

——搞好顶层设计，加强与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衔接协调，强化优化职能，聚焦主责主业，破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9月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 王伟伟/摄

解制约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健全改革督查机制，强化跟踪问效，采取职工满意度测评、第三方评价等方式，完善改革效果评价机制，切实提高职工群众对工会改革的获得感、认同度。

积极打造建设智慧工会，这是网络时代的工会改革再出发。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工会工作，促进互联网和工会工作融合发展，在实体工会架构上建设网络工会和数字工会。

——加强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打通信息壁垒，建设实名动态、全面覆盖、安全共享的工会大数据库，统筹“互联网+”工会顶层设计，打造“工会e家”智慧工会新品牌。

大抓基层，夯实基层基础，这是立足职工的工会改革再出发。

——把工作力量、经费使用等进一步向基层倾斜，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

——健全小三级工会组织体系，推进建设工会服务职工站点，让工会在职工需要时能看得见、找得到、信得过、靠得住。

.....

初心如磐，使命如山。历史不容止步，关口不容徘徊，信任不容懈怠。

2018年9月19日至20日，全总十六届执委会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指出，要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把工会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一个更加清晰的坐标，必然会砥砺一段全新的征程。

岁月永流转，革新不落幕。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只有进行时，需要勇于突破“路径依赖”，更需要主动实现“模式创新”，把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新时代赋予工人阶级新使命，新征程呼唤工会组织新作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筑牢的坚实根基，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一定能够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的壮丽新篇。

你好,副主席

——一线劳动者进入工会领导机构纪事

文|本刊记者 李瑾

2018年10月25日,京西宾馆。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现场,又一次响起如潮的掌声。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第十七届执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

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的名字,出现在最终公布的15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名单中。

此前,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中国工会十七大唯一一场大会选举中,这3位来自生产一线的劳动者顺利入选由283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

毫无疑问,这是本次工代会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全总新闻发言人王晓峰就此表示,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当选副主席,将进一步增进工会工作的群众性。

从工会十六大到工会十七大的5年里,越来越多的一线劳动者进入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机构,成为中国工会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

历史一步

回看5年前的那一个日子，很多今天的现实或许在当初已经蕴含着答案。

2013年4月28日，长安街边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迎来了中国工运历史上的璀璨时刻——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走进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大楼。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走进六楼会议室，65名劳动模范激情澎湃，如潮的掌声瞬间响起。

新华社当天播发的新闻通稿显示，共有9位劳模代表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其中包括“当代雷锋”郭明义。

当时在场的相关人员向《中国工人》杂志记者描述说，习近平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同大家交流，座谈会气氛十分活跃。

在新华社记者李斌采写的座谈侧记里，有这样一段关于郭明义的文字——

“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与每个人的梦紧紧相连。我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做一名好工人，做一个有

利于人民的雷锋传人。”鞍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讲述起爱岗敬业、奉献社会、带动更多人的故事。

在他发言后，总书记关心地问：“明义同志，你这样献血，对健康有没有影响？”“目前看没有，去年还献了3次血。”总书记关切地叮嘱他“要注意身体”。

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习近平同时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能只当口号喊、标签贴，而要贯彻到党和国家政策制定、工作推进全过程，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此次习近平与全国劳动模范座谈前45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由161人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



中国工会十七大召开期间，同为一线技术工人代表的洪家光（左）与刘军（右）在人民大会堂外交流

2013年10月21日,经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一次执委会议选举,许振超、郭明义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当时公布的中国工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显示,许振超、郭明义均为来自生产一线的劳动模范。

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经理许振超,连任全国人大常委。

习近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工会系统引起强烈反响。4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

这份全文3600余字的通知,明确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工会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要用讲话精神统领工会十六大筹备工作”,充分体现党中央对工会工作的新要求。

2013年10月,中国工会十六大在北京开幕。许振超和郭明义的名字,出现在新一届执委会委员的候选名单,并顺利当选。

10月21日,经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一次执委会议选举,许振超、郭明义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

当时公布的中国工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显示,许振超、郭明义均为来自生产一线的劳动模范。

许振超为1950年1月生,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

郭明义为1958年12月生,时任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业务主管。

现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的谢春涛,当时曾这样评价许振超、郭明义的当选——他们成为工会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员,可以更准确、更直接地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诉求,进一步增强工会工作的群众性。

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后,许振超表示要加强学习,尽快熟悉和掌握工会工作业务知识,更用心地了解各行各业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为广大职工讲话,同时带

头示范,学习先进技能,提升自身素质,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

郭明义则说自己“心里沉甸甸的”,还是希望大部分时间能继续留在鞍钢工作,因为“鞍钢有我最亲爱的工友,有我的爱心团队,我要继续倾听职工最真实的声音”。

6天以后,前往鞍钢采访的记者在齐大山铁矿见到了郭明义,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穿橘黄色安全警示服,“还是以往的那身装束”。

但是,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而言,历史的一步已经迈出。

改革深化

在许振超和郭明义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那一年,51岁的巨晓林还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接触网六段一队613班组的技术员。

然而,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中,巨晓林显然是名声最响的人。从全国劳动模范、高级技师到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这位原本普通的农民工成长为知识型技术工人的楷模,直至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此刻,中国工会领导机构的大门,静静地迎候着中国农民工的代表。

2015年7月6日,为期两天的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他特别强调,要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更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物纳入组织。

16天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总工会开展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两个月内制定出改革方案,争取在一年时间内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很快,《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制定完成并审议通过。

11月24日,新华社播发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就全总改革试点答记者问。

在回答“这次改革对改进工会领导机构人员构成和全总机构设置有哪些措施”时,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明确表示,要“在本届全总执委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中,分别提高劳模和一线职工比例,全总领导班子中增设农民工兼职副主席和挂职书记处书记”。

工会大楼的改革气息,让巨晓林代表亿万农民工走上历史的前台。

2016年1月,全总十六届四次执委会议在北京举行。

1月17日,54岁的巨晓林以农民工的身份,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敏感的新闻媒体以超出以往补选副主席的报道篇幅,把巨晓林的当选和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连在一起,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

北京知名时政新媒体“长安街知事”称,“一位农民工进入全总最高领导班子并成为副主席,正是落实中央改革要求的生动案例”,并预见“未来会有各行各业的‘巨晓林’进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层”。

巨晓林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时,恰逢北京市人大会议召开。丰台区代表团首场小组讨论会开始前,会场最中间的位置被空了出来,区长冀岩主动坐到空位的旁边。

代表们疑惑之际,主持人建议全场鼓掌祝贺巨晓林当选为全总兼职副主席,并坚持邀请他坐到专门空出的显赫位置。

巨晓林当选以后,全国总工会领导班子中的劳模和一线职工、农民工达到3人。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劳模兼职副主席的作用,成为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环节。

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制度文件与释义》一书中,收录了全总2016年5月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全国总工会劳



肉孜麦麦提·巴克(右二)出现在党的十九大会场

模兼职副主席作用的暂行办法》。

《中国工人》杂志记者注意到,这一暂行办法共分13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劳模兼职副主席的总体要求,二是充分发挥劳模兼职副主席作用的有关规定,三是提供的相关保障。

暂行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劳模兼职副主席不脱离本职岗位,不配专职秘书、不配专车、不配专用办公室,永葆普通劳动者本色”。

暂行办法同时明确规定,及时向劳模兼职副主席送阅副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阅读的文件,每年安排参加两次跨省区、跨行业的调研活动,在全总机关安排集体办公室,安排专门人员做好服务工作。

据悉,这一暂行办法的制定,是根据全总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进行的,结合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届主席会议工作规则》等制度规定,并报全总党组会议审议通过。

至此,劳模和一线职工、农民工进入全国总工会领导班子已经形成制度,成为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的特色亮点。

新鲜气象

中国工会具有的完整组织体系,“以上率下”的工作机制,决定了劳模兼职副主席将在不同层

级工会的政治架构里普遍出现。

事实上，在就全总改革试点答新华社记者问时，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已经明确表示，要在本届各驻会产业工会全委会分别增设兼职副主席。

依据《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制度文件与释义》透露的情况，7个驻会全国产业工会全部配备了兼职副主席，总人数达到14人。

与此同时，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河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山西、甘肃15个（区、市）总工会配备了20名劳模兼职副主席。

2018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七大在北京召开，郭明义、巨晓林连任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高凤林新任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68岁的许振超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国工会领导机构。此前，在结束连续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任期后，他被全国人大任命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

就在中国工会十七大召开之前，全国多个省级工会进行换届，更多的劳模兼职副主席出现在省级工会领导机构中。

《中国工人》杂志归集整理的资料显示，第十七届全总执委会名单里，就包括安徽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许启金，云南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耿家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肉孜麦提·巴克。他们和高凤林一样，都是首次进入中国工会领导机构。

劳模兼职副主席的出现，正在进一步增强中国工会各级组织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他们参与工会领导班子集体决策，联系职工群众反映意见诉求，加强对职工群众思想引领。

这些特殊的工会领导人分赴各地进行的调研活动，也得到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依据《青海日报》的报道，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便在西宁会见了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对郭明义来青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青海的省情。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全总、全国产业工会、省级工会劳模兼职副主席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俨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新鲜气象，郭明义更是连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北京的新闻媒体曾经注意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画面显示，在总书记习近平参加的分组讨论中，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发言。

电视画面显示，郭明义坐在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身旁，穿着浅灰色工装，戴着眼镜，还准备了一份发言稿。

在中央电视台党的十九大的电视报道中，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巨晓林的镜头亦有出现。

其时，十九大“党代表通道”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举行。

有记者问：“您对如何维护农民工群体权益有什么想法？”

巨晓林回答：“工会组织一定要带头宣传好《劳动法》和相关政策法律，一定要多了解农民工的心声、意见和建议，一定要会同监督部门深入工地和企业做好监督工作。”

和郭明义、巨晓林一道出现在党的十九大会场的，还有更多来自全国产业工会和省级工会的劳模兼职副主席，包括何桂琴（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王进（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薛莹（中国国防邮电工会）、邓建军（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徐文华（天津市总工会）、李万君（吉林省总工会）、李斌（上海市总工会）、许启金（安徽省总工会）、黄久生（河南省总工会）、康厚明（重庆市总工会）和耿家盛（云南省总工会）等。

在全总十六届执委会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特别强调，要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工会改革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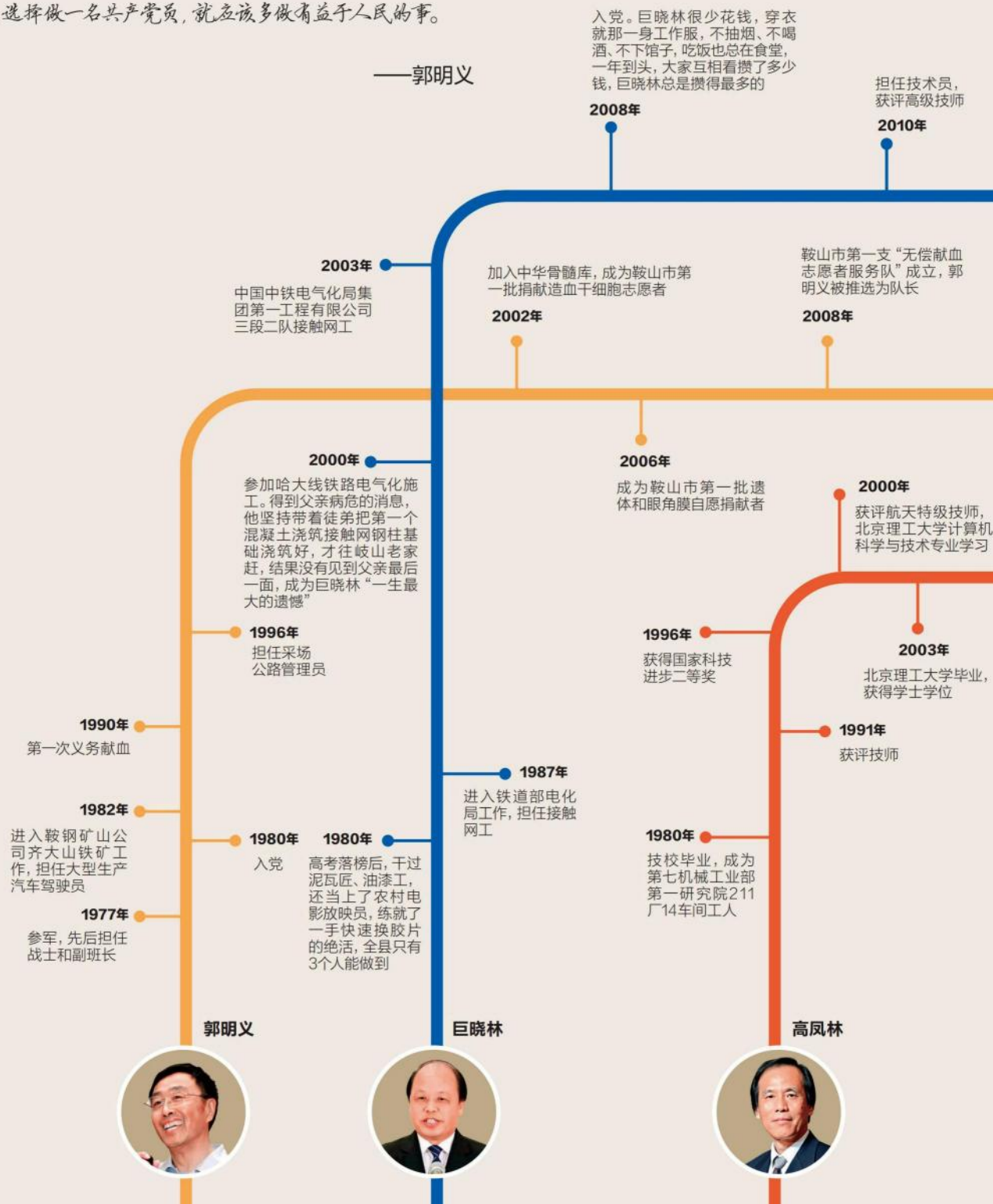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杂志同时注意到，在中国工会换届前后，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也先后完成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以“眼睛向下、面向基层”为方向的群团改革背景下，多位基层和一线干部进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领导机构。

由此而言，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看，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进入中国工会领导机构，意味着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正在继续深化。

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判断，在全国总工会开展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所取得的经验，正在进行复制和推广。 

有什么样的人生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选择做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郭明义



郭明义——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
巨晓林——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
高凤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

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企业为巨晓林添置了衬衫、领带、西装、皮鞋。这是巨晓林第一次西装革履，穿惯了蓝色工服的他，打着红白条纹领带、身着黑色西服，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2012年

补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4年

担任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第六项目管理（高铁）分公司技术员，补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

2016年

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授予“当代雷锋”荣誉称号

2012年

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共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2017年

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

2017年

2010年

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到2010年上半年，他累计献血6万毫升，相当于全身血液总量的10倍

2013年

担任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公路管理业务主管，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

2005年

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211厂14车间高凤林班组组长

2006年

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反物质探测器项目，因为低温超导磁铁的制造难题陷入了困境。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邀请高凤林相助。高凤林现场调研考证后很快指出症结，设计方案获得美国宇航局和国际联盟的认可

2012年

获聘中航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首席技能专家

2016年

高凤林服务的长征五号首飞成功。火箭发动机的喷管上，空心管线的管壁厚度只有0.33毫米，需要通过3万多次精密的焊接操作，才能把它们编织在一起。这些细如发丝的焊缝加起来，长度达到了1600多米，每个焊点只有0.16毫米宽，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仅为0.1秒

我还是更习惯别人叫我巨师傅，不习惯被叫做“巨主席”。

——巨晓林

每每看到我们生产的发动机把卫星送到太空，就有一种成功后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用金钱买不到。

——高凤林

郭明义：倾听最真实的声音

如同多位媒体观察人士预料的那样，郭明义顺利进入中国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续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文|本刊记者 李瑾

作为中国工会十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之一，结束5年完整任期的郭明义以59岁的年龄再度出任同一职位，成为3位兼职副主席排名最前者，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5年以前，一身灰色鞍钢工装的郭明义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继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后，这位来自鞍钢的“当代雷锋”又多了一个政治生活的新身份。

有媒体注意到，尽管工会十六大驻地会务组单独配备了车辆，郭明义依然坚持和代表们一起坐大巴。“一个人坐小车，就好像与世隔绝了。”郭明义说，这样才能多接触各地的代表，更多了解职工面临的困难。

从1982年复员转业开始，郭明义一直在鞍山矿业公司工作。当年，雷锋也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凭借着自己的感人事迹，郭明义获得了“当代雷锋”和“雷锋传人”的赞誉。

2010年，郭明义获评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当时的电视直播里，有这样一段关于郭明义的颁奖辞：

他总看别人，还需要什么；
他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什么。
他舍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
都滚烫火热。他越平凡，越发不凡，
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

有关郭明义的更简洁的评价是著名艺术家阎肃的一首诗：“谁言雷锋去？请看郭明义。盈怀热心肠，满腔浩然气！”

在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7天以后，郭明义回到了鞍钢齐大山铁

矿，还是那顶红色安全帽，还是那身橘黄色安全警服。

郭明义说：“我还是我，干的还是原来的活儿，在这采场修路是我的本职工作。”

当然，郭明义的多种政治身份，让他的名字出现在更多的重要场合。

2014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说：得知你们“跟着郭明义学雷锋”，用爱心温暖需要帮助的人，在服务社会、助人为乐、爱岗敬业中提升人生境界，感到很欣慰。

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后，郭明义曾率全总调研组到黑龙江鹤岗调研。他换上矿工服，跟着矿工下到550米深的掘进面，了解工人的工资发放、安全生产等情况。

《新京报》曾经援引鞍山文明网的内容报道说，郭明义当选兼职副主席后，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没变，每天提前2个小时上班的习惯没变，住房依然只有60平方米，女儿结婚时没有办一桌酒席。

但是，兼职副主席的身份，让郭明义开始从工会的角度思考问题。他说：“工会很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但要一件一件逐渐解决，解决得多了，就能体现出工会的作用，职工对工会的感情就会更深。”

在郭明义的心里，鞍钢始终是他的根。“鞍钢有我最亲爱的工友，有我的爱心团队。我要继续留在基层一线，倾听职工最真实的声音。”



巨晓林：人生又一个加油站

虽然这是第二次到中南海，56岁的巨晓林仍然像孩子一样，兴奋得几天睡不着，800多字的发言稿，熬夜修改了好多次。

文|本刊记者 李瑾

2018年10月29日，陕西宝鸡岐山农民工巨晓林走进中南海，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并向总书记汇报自己担任兼职副主席的工作情况。

当然，这不是巨晓林第一次来到中南海。

6年以前，作为中华技能大奖的获得者，他曾经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接见。

但是，这一次巨晓林有了更重要的“新任务”。在王东明、李玉赋、张工发言之后，巨晓林开始了自己向习近平总书记的简要汇报。

11月2日，巨晓林老家的工会媒体——《陕西工人报》独家报道了巨晓林的汇报内容。

巨晓林说，自己再次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这既是党中央、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对我的信任，也是对农民工的激励和鼓舞。今后，自己要将此作为新的加油站，当好党联系农民工的桥梁和纽带，绝不辜负总书记的信任和职工群众的期盼。

2016年1月，巨晓林的名字开始和中国工会紧紧联结在一起。在全总十六届四次执委会议上，他被补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巨晓林后来回忆说：“（2015年）12月初，公司给了我一张推荐表，我按照规定填好。直到选举结束后，我才知道自己被选为兼职副主席。”

在媒体的描述里，巨晓林一口地道的陕北方言，1米6出头的身高，见人总是笑呵呵的，就像他的微信名字“老好人”一样。

直到今天，巨晓林还是更习惯被称为“巨师傅”，丝毫没有“巨主席”的架子。但是，越来越多的政治身份，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他的生活。有一年，他先后参加了140多场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

巨晓林的日常生活里，时常接到来自农民工的电话和信函，反映的都是进城务工遭遇的各种问题。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他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一定要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把农民工与普通职工平等对待，另一个是公平共享社会资源。

当选兼职副主席的第一年，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委托，巨晓林带队调研农民工入会和服务工作，写出近万字的调研材料，转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作为兼职副主席，巨晓林没有秘书，没有司机，工资、奖金仍由企业发放，和过去一样还是6000余元。

在中国工会十七大前，巨晓林曾经接受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邀请，出席《中国农民工四十年（1978—2018）》新书分享会。

在这场特别选择在建筑工地举行的活动现场，这位中国最有名气的农民工朗诵起自己9年前写的诗歌《咱们的农民工》。

那一刻，巨晓林不仅仅是兼职副主席，更是一个抒发农民工壮志豪情的“文艺老青年”。



高凤林：平静握住那杆焊枪

他手里的那杆焊枪，不仅能焊接出世界上最高难度的工件，还能在中国工会和技术工人之间，焊接出最紧密的连心桥。

文|本刊记者 李瑾

当高凤林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名单里，常年跟踪关注这位中国顶级焊工成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干部梁文脱口而出，“属于高凤林的时代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尽管高凤林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大国工匠，却始终与各种政治身份无关。

2018年3月，《中国工人》杂志邀请出席全国两会的大国工匠小聚，共谋推广工匠精神的途径与方法。

当天晚上，许振超、李斌等悉数到场，从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到省级工会兼职副主席，可谓群星闪耀。

高凤林一个人搭乘地铁来到鼓楼大街的聚会地点，刚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结束一天的忙碌，脸上带着几丝难以掩饰的疲惫。

但是，高凤林的出现显然让聚会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兴奋起来。年龄大一轮的许振超把高凤林拉到身边，窃窃私语，亲密无间。

在中国乃至世界焊接领域，高凤林都是几乎没有争议的“第一人”。

今年56岁的高凤林，曾为北斗导航、嫦娥探月、载人航天以及长征五号新一代运载火箭焊接发动机，并接受丁肇中的邀请，成功解决反物质探测器项目难题。

除此之外，这位焊接火箭“心脏”的首席技能专家，还有更多的显赫业绩不能公布。不过，即便以现在可以公开报道的故事，高凤林依然可以堪称中国技术工人的

传奇。

就在高凤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之前，由他编著的《高凤林工作法——典型金属材料复杂结构手工焊接》已经交付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希望藉此帮助更多一线产业工人提高技能。

责任编辑习艳群告诉《中国工人》杂志：“高凤林的这本书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准，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国工匠工作法》丛书的扛鼎之作。”

在一直跟踪关注高凤林的梁文看来，4位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里，高凤林的“出道”其实更早。

22年前，当时只有34岁的高凤林便获得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年以后，《实话实说》在“五一”期间推出一期“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节目，高凤林被邀请亮相，受到社会火爆追捧。带女儿去书店买书，都会被人认出来。二三十位观众甚至找到高凤林的单位，只为一睹“偶像”真容。

在多位大国工匠相继当选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省级工会兼职副主席的时候，高凤林心如止水，依旧平静地握住手里的那杆焊枪。

今天，作为最新当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高凤林一定能在中国工会和技术工人之间，焊接出最紧密的连心桥。（注：梁文为化名）



伟大的故事总是具有现实意义，
能在长时间里不断获得新解释，
因为其中的人性是那么丰厚，
每一个新的一代
都能够从中观照到自己。

摘自 NO.11 2018《讲好中国工人故事》



改革 时间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采写 | 本刊记者 李瑾
图片 | 于文国







1986年10月，宝钢一号高炉炉前工在炉前合影

1978 年1月，北京的深冬。凛冽的西北风夹杂着纷飞的雪花，扑向灰蒙蒙的低矮楼群。破旧不堪的四合院里，炊烟伴随着煤饼燃烧的味道，弥漫在行人寥寥的陋巷。

这一年的《人民日报》，继续接连不断地刊登着“抓纲治国”的报道。甚至在它刊登的北京电视台节目预告表里，依然不乏这样政治化的词汇。

依照这份提前刊出的节目安排，1月21日18时35分，北京电视台——4个月后的5月1日，它才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

坚冰尚未解冻，贫瘠的中国大地显得焦躁不安，仿佛在等待着梦醒时刻。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石破天惊，桎梏思想的樊篱溃决了第一道关口。

12月18日，北京。历时5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悄然开幕。

同一天晚上，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里，18户没有外出要饭的农民秘密集会，决定包产到户，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和丈量土地。17个农民的指印和3个图章落在保证书上——“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新中国成立2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由此

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打破坚冰正在让中国的发展面临“惊险的一跃”。无论是吴运铎、戎冠秀、马恒昌还是张秉贵,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一次伟大的革命正在慢慢发生。

开启。

浪潮席卷而来,没有谁能够置身其外。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就这样进入波澜壮阔的改革时间。

假如还有来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曙光照亮祖国的山河。

这一年,吴运铎回到了自己钟爱的工作岗位,担任五机部第二十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工程师。党组织给他的政治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一切罪名纯属陷害”。

炸断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让这位“中国的保尔”放弃为党工作的执念,忙碌起来依然像战争年代一样“疯狂”。

这一年,82岁的戎冠秀第五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得知消息的那一晚,老人激动得彻夜难眠:“我还不老,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一起建设四个现代化。”

在戎冠秀的心中,永远不会缺少革命者的激情。每天清晨,这位全国劳动模范都会背起粪筐去拾粪。在她看来,“劳动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个大事情”。

这一年,71岁的马恒昌还是住在那处灰白外墙的平房里。紧邻公共厕所和垃圾堆,下水道常常堵塞,雨天泥泞不堪,冬天污水成冰。

此时,马恒昌已经担任了13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但是,在这位曾经叱咤中国工业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身上,工人阶级的本色依然生动而鲜明。

这一年,张秉贵还站在他最钟爱的糖果柜台。

从“一抓准”到“一口清”,这样的“一团火”成为北京百货大楼的传奇,如同春风传递给南来北往的每一个人。

在北京,张秉贵是最受尊敬的人。公共汽车上,买过糖的乘客主动给他让座。公共浴室里,素不相识的人主动为他搓背:“我是您的顾客,今天就让我为您服务一次吧!”

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打破坚冰正在让中国的发展面临“惊险的一跃”。无论是吴运铎、戎冠秀、马恒昌还是张秉贵,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一次伟大的革命正在慢慢发生。然而,他们都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继续着对祖国的忠诚。

1985年5月,马恒昌第一次抗拒了组织上的决定,坚持离开友谊医院,乘上北京到齐齐哈尔的火车。他说:“北京不能再呆了,花钱太多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啊!”

两个月后,马恒昌因癌症医治无效去世。临终时,他的眼角流出两颗热泪,没有遗言。

1987年5月,张秉贵胃穿孔大出血,被紧急送进医院,诊断发现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他说:“我这一辈子,在柜台上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可以画个圆满的句号了。”

139天后,张秉贵去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8年1月,戎冠秀病重住院。康克清赶到病床前执手相望,聂荣臻专门送去一束蓝色的勿忘我。弥留之际,老人神志恍惚:“孩子们,好好养伤,养好了消灭敌人。”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去世。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句——“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因肺心病复发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几个小时前,他还接待了三批来访者。在与死神抗争的最后日子里,他无比眷恋着

党和祖国：“假如我有来生来世，我还要把一切献给党！”

今天，戎冠秀的故事依然在被人们传诵，张秉贵的半身铜像静静伫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以马恒昌命名的班组始终是劳动者的标杆和旗帜。当然，还有吴运铎留下的那一句话——“在困难面前退却的人，从来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强者。”

这些感动中国的劳动榜样，就这样离开了沸腾的生活。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开往富强美好的列车，他们已经无缘欣赏愈加绚丽的风景。

但是，所有前行者的精神财富，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勇气，迎接改变中国的凤凰涅槃。

做最好的工匠

1980年，技校毕业生李斌成为上海液压泵厂的一名青工，最大的梦想就是“学一手好技术，当一个好工人”。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憨厚的小伙子能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更没有人想到，23年后会有“李斌技师学院”的诞生。

这时的中国，“喇叭裤”已经悄然流行。每个傍晚，提着录音机的青年人涌进公园，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起迪斯科舞。美国合众国际社发自广州的报道说，中国人开始关心如何得到手表和电视机。澳大利亚旅行者对于中国的感受是，“简直像回到20年代，他们太穷了”。

所有的这些——物欲和时尚——似乎都与李斌无关。就像一颗螺丝钉，李斌牢牢地钉在生产第一线，成为驯服进口机床的优秀技术工人。老厂长禁不住连声夸赞：“有一个李斌，工厂就可以起步；有十个李斌，企业就能振兴。”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会场，全国人大代表李斌第四次和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斌说，“提升技术工人的技能刻不容缓”。习近平回复，“我们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

5个月后，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牵头相关部委开始研究制定《新



1991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门外，一位股民用望远镜隔着玻璃远眺大厅内电子屏幕上随时更新的股票交割信息

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由此变得更加光明。

在上海，包起帆的名声丝毫不逊于李斌。他的左手大拇指有一道深深的伤疤，那是在上海港务局码头当装卸工时被钢丝绳留下的印记。中国工业水平的整体落后，使得成千上万的一线劳动者只能直接用手去进行危险的操作。

李斌走进工厂的那一年，在连续14个小时飞行1.1万公里后，一架巨型蓝白灰三色宽体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后来的报道说，“这是中国以每架1.56亿美元购买的3架波音747SP巨型喷气式客机中的第一架”。

腾空而起的波音747客机，让包起帆和每日劳累的工友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目瞪口呆，深切感受到落后生产力带来的刺痛。1981年，亲眼看到3位



1992年2月16日，上海柴油机厂举行签订劳动合同大会



1994年5月22日，上海第一家民企工会在一片爆竹声中正式挂牌亮相

工友死在木材装卸作业现场后，30岁的包起帆暗下决心，要靠科学文化知识把工友的生命从“虎口”里夺回来。

3年以后，一套完整的木材抓斗装卸工艺系统成功诞生，从此不再需要工人直接捆扎木材，包起帆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抓斗大王”。

1994年，包起帆报告会走进中南海，这位工人发明家的名声愈加爆红中国。千般显赫，他的创新之路却从不停歇。他用自己的17项发明金奖，去鼓舞每一位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可以没有学历、资历和背景，但只要努力学习、用心做事，照样能够取得成功。”

包起帆名扬中国的时候，窦铁成还只是中铁一局电务公司一名普通的电务工。初中文化程度的“先天障碍”，丝毫没有影响他最终成为技术的强者。

1999年，单位财务部门配备了办公电脑。窦铁成请求财务人员，“晚上帮你们看着办公室”。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后，他终于学会了直接用电脑设计绘制技术图纸。

2008年，窦铁成的事迹传遍中国。人们记住了这位饱经沧桑的汉子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人永远在超越自身，奉献他人。在生命本质的最高层面上，工人和哲学家没有差别。”

7年以后，中央电视台播出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这部充满主旋律的电视专题片所展示的劳动者们，没有进过名牌大学，没有拿过显赫文凭，只是在平凡的岗位默默坚守，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普通劳动者的极致精神和非凡技艺，令人折服，并迅速引发社会巨大关注，热度持续不退。

2018年，在工会组织的全力推动下，“大国工匠”成为中国社会最耀眼的“劳动明星”。打开人们常用的那款浏览器，“大国工匠”可以搜索到149万个网页。改革开放40年造就的诸多新词汇中，它属于最耀眼的那一个。

为爱义无反顾

改革开放首先意味着思想的解放，意味着旧有的价值体系必然遭遇汹涌的冲击。

1979年3月，《诗刊》杂志公开发表北岛的朦胧诗《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身影。”

这段诗句中的叛逆意识，震撼着正在学习思考和判断的一代人。他们尝试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在黎明初现的天空发现答案。

这一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3周年纪念日前夜，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1956年8月24日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全文。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学习外国的东西，“非驴非马也可以”。

不同思想的碰撞，让容易躁动的年轻人陷入迷茫。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直言“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

生活简陋少人问津，理想依旧无比坚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孤傲地挺直脊梁。

人”。6万多封读者来信涌入北京，引发一次人生真谛的大讨论。

远在长春的蒋筑英显然没有参加这次讨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时间已经全部填满了科研工作，更因为他早已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要看到国家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的春天里，蒋筑英的理想展翅翱翔。作为长春光机所的业务骨干，他接连被派往欧洲学习。第一次出国，他把半年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外汇，为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和20部电子计算器。他似乎忘记了，他的家只有14平方米，挤着两代四口人。当然，他更忘记了自己一直梦想有一张书桌，这样就可以不用再趴在床板上研究课题。

生活简陋少人问津，理想依旧无比坚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孤傲地挺直脊梁。

当蒋筑英的名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颂扬榜样时，邓稼先依旧在罗布泊过着枯燥的科研生活，日复一日。这位最终签字确定中国原子弹设计方案的人，在学术刊物和科研联络中消失，甚至连妻子也不知丈夫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保密任务。

空投预试，降落伞没有打开，弹体摔碎了。邓稼先在荒漠中找到残骸，仔细检验碎片。然后，他拍下了第一张自己的工作照。他知道，严重的放射性侵害已经发生。

1985年7月，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被确诊为直肠癌。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平静地告诉妻子：“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

1986年7月16日，邓稼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3天后，他全身大出血，不幸去世，终年64岁。张爱萍将军赋词悼念：“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1995年1月，从5万名纺织女工中脱颖而出的18名女工被培训后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登机仪式

此时此刻，蒋筑英已经离开人世4年了。4年前的一次科研出差，让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倒在了成都。离开长春的时间是凌晨5点，即便这样早的行程，他还是没有忘记给妻子煮好早饭的粥，没有忘记为孩子煮好两个鸡蛋。

成都医院持续20个小时的抢救，没有挽回蒋筑英的生命。医生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位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急性肺水肿的危重病人，竟然刚刚没日没夜连续工作了两天。

27年后，93岁的吴大观开始了同死神的最后抗争。依靠视力只有0.3的右眼，这位中国航空工业和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制事业的主要创始人，研发成功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和第一台涡扇发动机。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水平，终于穿越黑暗、迷雾和险滩，站到了世界的前台。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永远闭上了眼睛。生前，他用10万元积蓄交了最后一次党费。他当年的

办公室被保留下来，一张老式的写字桌，一个放大镜，一把计算尺，一幅巨大的发动机研制图。它们默默地停留在那里，留住了那段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征。包括邓稼先、吴大观、蒋筑英在内，每一位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着现代化的未来拼命奔跑。当他们最终无力倒下的时候，依然化成一座精神的丰碑，默默伫立在这个国家的来路，深情地祝福着我们，祝福着之后的时代。

底层的清贫者

中国社会的很多进步，尽管属于历史的必然，却往往显现为源自偶发的人物和事件。

1982年的蒋筑英之死，让更多中国科研工作

者的生存状态得到强烈关注。人们惊呼，“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得到稍微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聂荣臻、方毅、胡乔木先后公开表态，呼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一束无声的永恒之光，带来了有声有色的世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开始拥有平等、体面的生活。

1984年，带着中科院计算所的20万元，柳传志创立联想公司。如今，这位74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依然名震江湖，“大概拥有联想集团不到1%的股份”。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联想集团排名第240名。

但是，生活的路途不会让所有勤奋的人都得到财富的成功。志向，能力，承担一切苦难的坚持，拥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远离清贫。

1981年，马永顺从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退休。伐木33年，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一共放倒了3.65万棵大树。



1997年4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代表，列队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砍倒了多少棵，我就要补种多少棵”，这是马永顺的目标。到了退休的时候，还差8000多棵树没有栽上。没有二话，这位退休工人回到工作过的林场，10年义务栽树7000棵。

这时，马永顺已经78岁了，生怕有生之年栽不完最后的1000多棵树。于是，他组织全家19口人一起上山植树。进山路远，他从每月357元的退休工资里，大方地拿出200元租车费。到了山上，老人兴奋地喊起了伐木号子。

同样有着造福自然理想的退休工人，还有在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一辈子的李双良。1983年，当他退休回家的时候，放心不下的是公司南门外那座足有5个天安门广场大小的渣山。

600多人，300多辆小平车，65部手扶拖拉机……当年“五一”劳动节，李双良没要国家一分钱，带着这支队伍冲向7层楼高的渣山。第一个月，8万多吨废渣清走了，近4000吨废钢铁回收了。整整50年来，这座渣山第一次开始变矮变小。

治渣第10年的时候，渣场总资产达到2亿元。李双良放弃了2000万元的政策奖励，依旧领取每个月800元的退休工资。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内心安宁快乐。

和马永顺、李双良同样立志恢复自然的，还有远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王有德。

1985年，王有德来到宁夏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被沙漠吞噬良田、房屋和公路的景象深深震惊，由此立志，“要让沙漠绿起来”。

治一亩沙需要180元，国家拨款的补助费只有60元。每亩120元的缺口，王有德带着工友挣钱去弥补。在20多年人进沙退的搏斗中，每年治沙造林3万亩，一道45公里长、10公里宽的绿色屏障，出现在毛乌素沙漠的西南边缘。

昔日那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了，今天的王有德双手黝黑粗糙，老茧丛生，指甲缝里钻满了抠不出、洗不净的泥土。但是，他用自己的青春留住了绿色，留住了春光。

马永顺、李双良、王有德默默造福自然的那个年代，空气污染指数还远远没有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北京街头的落叶被扫在一起随手烧掉。华北大地的“五小作坊”扩散着毒气浓烟，洁净的河流呜咽着混入掺杂有害成分的生产废液。享乐的欲望



1996年1月17日，辽宁鞍钢下岗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



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离不开那些底层的清贫者。他们把自己羸弱的肩膀挨在一起，挺起脊梁和胸膛，支撑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根基。

像沙漠一样吞噬着躁动的人们，清贫者在世俗的眼光中成为无能的象征，占有财富、放纵欲望的冲动无法控制。

1984年4月，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开业，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汉堡包、热狗和法国炸土豆条。

4个月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从中国各地奔向佛山，抢购佛山信托投资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以求从中国的最新一次资本实验中分得一份好处。

1985年2月，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照片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4月，英国最著名的威猛乐团亮相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首曲目的名称是《在你摇摆起舞前请叫醒我》。

1988年8月，中国先后发生3次抢购商品和提兑存款的风潮，一些地方的日用百货、粮油食品 and 金银首饰几乎被一抢而空，惶恐不安的银行储户则争相提取存款。

1990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日在上海正式对外营业，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提醒世界，应当从这里感受到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1992年3月，广东珠海率先重奖科技人员，高级工程师迟斌元获得100平方米住房、26.7万元奖金和一辆奥迪轿车。继1984年和1987年以后，中国第三次经商浪潮动地而来。

.....

这些时代的喧嚣，走在悬崖峭壁间的邮差王顺友无从知晓。从接过父亲传给自己的马缰绳开始，这位四川凉山马班邮路的乡邮员就安心于一个人、一匹马的生活，默默行走。

孤身上路，没有人能分担近乎残酷的艰苦。山洞，牛棚，树林，雪地。每一年，王顺友独自行走的日子，都要超过330天。20年，他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挂失过一个邮件，相当于在雪域高原上走了21次“二万五千里长征”。

人们总是惊讶于明艳的鲜花，却习惯忽略那些默默无闻的绿叶和土壤。

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离不开那些底层的清贫者。他们把自己羸弱的肩膀挨在一起，挺起脊梁和胸膛，支撑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根基。

恪守初心之辈

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宗庆后从农村回到杭州，在校办厂做推销员，郁郁不得志。

1986年，42岁的宗庆后开始创业，承包一家校办工厂。有报道说，“在被命运遗弃了大半生之后，宗庆后这次紧紧抓住了命运给予的一丝可能”。白天，他骑着三轮车送货。晚上，他给员工煮饭煲汤。

2007年，宗庆后登上《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以11亿美元位列第840位。2010年，更以70亿美元位列第103，位居中国内地第一。

今天，尽管互联网的神话已经把所有凭借实业起家的“首富”打落宝座，宗庆后的财富却依然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在娃哈哈的王国里，宗庆后还是那个为员工盖楼买房的“家长”，继续保持着每年除夕夜与员工共餐守岁的习惯。

宗庆后说过，他最看重的荣誉是全国劳动模范。从为自己创造财富，到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才是每一位成功者最清晰的前路。

改革开放给每一个人带来了不同的可能。这种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选择性，显然容易让人陷入迷失，忘掉了自己的初心。唯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们，才能始终恪守着初心的方向。

1980年，杨怀远主动辞去上海海运局轮船政委的职务，回到船上担任服务员，重新扛起那根服务乘客的扁担。

1997年11月，杨怀远退休，留下的是6000多首服务顺口溜，40多万字的服务经验，还有天南地北的乘客写满47根扁担的赞誉。

17年间，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持续下滑。面对这些，杨怀远对于自己当年的选择，后悔过吗？迷茫过吗？失落过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人们可以相信的是，35个在轮船上度过的春节，1360个放弃的休息日，足以让一颗不忘初心的心，独自快乐满足。

同样经历过岗位转换的，还有那位名声显赫的“铁姑娘”。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即日起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这一刻，她默默地哭了，默默按照组织安排来到山西晋中果树研究所。

1991年，郭凤莲重新回到大寨，成为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

第二年年底，“中国大寨羊毛衫厂”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郭凤莲说，经受时代浪潮冲击的大寨，不会忘记昨天，也不会看不到大寨的今天和明天。

这是社会转型的时代。欢呼与喧嚣，兴奋与躁动，眺望与迷惘，前行与阵痛……猝不及防，骤然而至。40年恪守初心之辈，在官衙，在乡野，是“居之不倦，行之以忠”，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79年，33岁的邱娥国从部队转业，成为南昌市广外派出所的一名户籍民警。他把100多位居民的户口迁进南昌，却把80岁的母亲、5个兄弟和16个侄儿、侄女的户口留在农村。在户籍警的岗位上，他穿街走巷的行程达到12万公里，日复一日，风雨如常。

1983年，从海军退役的张云泉进入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从此把爱和同情送给上访群众，把恨和愤怒泼向霸道之徒。22年间，他的手指被咬得露出骨头，他的鼻腔被拳击到喷射鲜血，他的左眼视力更从1.5被打成0.15，但是，这位“一号接待员”却成了泰州的青天。

1988年，44岁的孔繁森准备第二次进藏工作。告别家乡的时刻，他为母亲梳完头，跪倒在地

号啕大哭。他不知道这一走，快90岁的母亲还能不能等到他再回来。

6年以后，孔繁森在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遇难。噩耗传来，一直神志不清的母亲忽然对家人说：“俺三儿回来了，快点香！”

8.6元，这就是孔繁森给母亲留下的财产。然而，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1999年，桂希恩走进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带走了11支试管血样。回到武汉，11支血样中，竟然有10支被确认为艾滋病。顶住压力，他秘密前往北京报告真实状况。很快，中央派出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文楼村，这里成为中国第一个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村庄。

200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官方表态，“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钟南山直言：“什么现在已经得到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SARS的真相由此揭开，这位从医几十年的中科院院士用讲真话的勇气，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初心的力量，就这样鼓舞着那些有志者，传递温暖的善意，唤醒社会的良知。它让中国改革开放航船上的每一个人，彼此忠诚相拥，融合你我，永远相亲相爱。

跨世纪的迁徙

1995年1月，苏北睢宁。18岁的朱雪芹扛起铺盖，与家乡渐行渐远。

这一年，发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农民工流动大潮，已经进入到了第17个年头。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正在希冀中经历磨难，在嬗变中等待淬火重生。

这一年，广东珠海一家外资企业里，韩国女老板咆哮如雷，120多位农民工含泪跪倒一片。来自南阳的打工者孙天帅宁死不跪，在辱骂声中丢掉了工作。

朱雪芹来到上海的11年后，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1.3181亿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2005年5月15日，武汉长江五桥桥顶正在休息的农民工。《经济日报》高级记者邓维问：“参加过五座大桥建设的请举手！”结果，他们全都举了手

他们就像大草原上迁徙的野马，奔向每一处哪怕只闪烁着最微弱希望之光的角落。

2007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正在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过3天，已经从缝纫工成长为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的朱雪芹，和习近平一道出

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当朱雪芹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时，老人喜极而泣。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农民工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温家宝总理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忍不住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胡小燕在农民工眼里成了更耀眼的明星，甚至有人找她索要温家宝的电话。在北京开会的十几天里，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胡小燕，竟然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她说：“我感觉全世

界都在看着我。”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5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开幕。这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工代表，从上一届的3人增加到31人。朱雪芹当选连任，胡小燕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康厚明则出现在全国党代会的会场。中国“草根阶层”的权利保障，日显高层次和多样化。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毫无疑问，利益群体多元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诉求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一旦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真正成长起来，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天平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倾斜，法律和决策的制定将会进一步公平和公正，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

今天，胡小燕落户佛山，康厚明落户重庆，朱雪芹落户上海。在人生发展的通道上，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型。在不远的历史转角处，千百万农民工都将像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一样落户城市，成为中国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中国农民工群体从产生、发展到融入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2.8亿中国农民工的未来，正在徐徐拉开新时代的大幕。

走向光明未来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80岁的邓小平身旁，簇拥着头发花白的老



2006年5月28日，夜战中的北京鸟巢工地

战士，他们和50万北京市民一起注视着6000名军人和武警从眼前走过，洲际弹道导弹和新型坦克首次亮相，94架军机在空中呼啸飞过。当群众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时，大学生们用竹竿挑起这样一幅横标——“小平你好！”

2013年4月28日，北京，复兴门外。

这是中国工运历史的璀璨时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走进全总机关大楼。习近平总书记向会议室里的65位劳动模范挥手致意，郭凤莲、窦铁成、郭明义等激情澎湃。

听完9位劳模代表的发言，习近平充满感情地说，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

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6个月后，中国工会十六大在北京举行，许振超、郭明义顺利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中国政治的历史格局里，中国工人阶级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来自青岛港的“金牌工人”许振超，吊车司机的岗位很普通，吊装货物的工作很单调。

然而，机会来了。2002年4月27日晚上，装载3400个集装箱的地中海法米娅货轮靠港，8台桥吊一字排开。在许振超的指挥下，桥吊队以339箱的出色成绩，一举打破了单船自然小时内336箱桥吊装卸的世界纪录。15个月后，这一记录再次被刷新为381箱。

另一位全总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同样有着自己的人生传奇。

1982年，郭明义复员转业，进入鞍钢矿山公司齐大山铁矿。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纪念品，就是一本《雷锋的故事》。

27米高的牙轮钻，20米高的电铲车，6米高的电动轮汽车，这就是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他的抽屉里还有140多张汇款单，那是寄给180多个希望工程孩子的学费。这些年来，他累计无偿献血近6万毫升，相当于一个正常人全身血液的十多倍。

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后，郭明义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没变，每天提前2个小时上班的习惯没变，住房依然只有60平方米，女儿结婚时没有办一桌酒席。

郭明义不抽烟，不喝酒，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然，他也会玩麻将，也会玩“斗地主”。家人聚会，他也要跟着摸上几把。从1984年通过干部考试，他的行政级别长期不变，一直是最普通的科员。但是，付出的幸福，他自己知道，自己享受。

在许振超和郭明义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那一年，51岁的巨晓林还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一位技术员。

1979年，巨晓林高考落榜，在家务农。8年以后，他成为工地上的一位农民工，开始面对纵横交错的电杆和接触网，还有犹如天书的图纸、70多本

工作笔记，230多万字的学习记录，最终让他成为电力接触网施工的“工人专家”。

2016年1月，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的浪潮，把54岁的巨晓林推上历史的前台，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其时，北京市人大会议正在举行。丰台区代表团的讨论会场上，巨晓林被请到最中间的位置。

直到今天，巨晓林还是更习惯被称为“巨师傅”，丝毫没有“巨主席”的架子。作为兼职副主席，他没有秘书，没有司机，工资、奖金仍由企业发放，和过去一样还是6000多元。

2018年10月，“大国工匠”高凤林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他要用手里的那杆焊枪，在中国工会和技术工人之间，焊接出最紧密的连心桥。

高凤林的“出道”时间，其实远远早于许振超、郭明义和巨晓林。1996年，34岁的高凤林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年以后，高凤林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特别节目亮相，广被追捧。2006年，丁肇中教授主持的世界反物质探测器项目受困低温超导磁铁的制造，高凤林出手相助，难题迎刃而解。如今，他更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为火箭焊接心脏的人。

40年，多少人无而有，生而死。

40年，多少事小中大，盛而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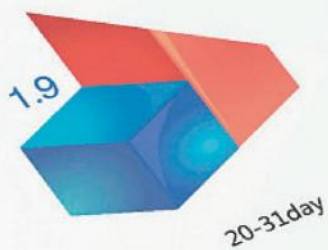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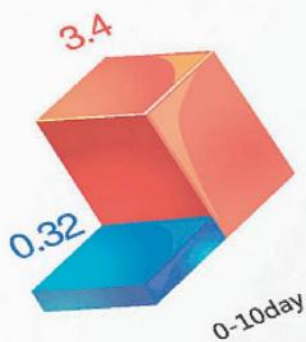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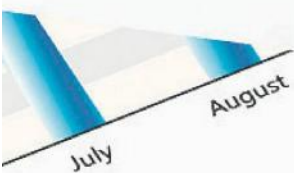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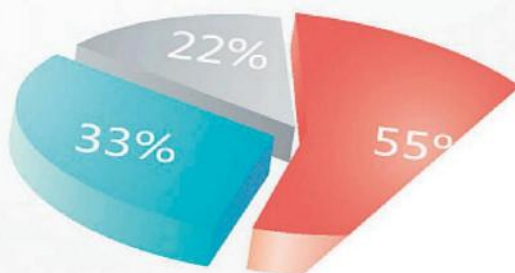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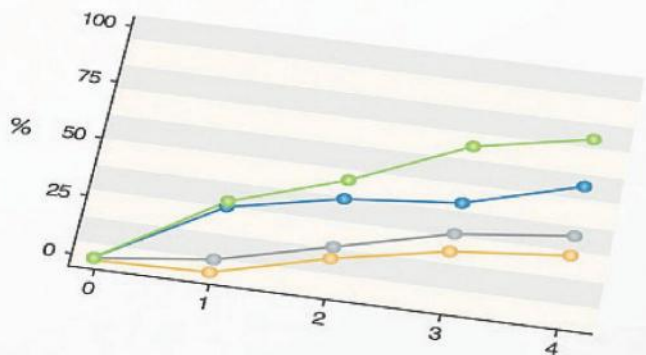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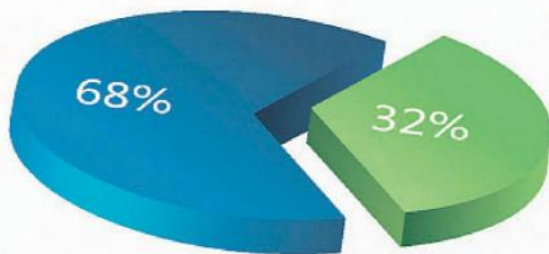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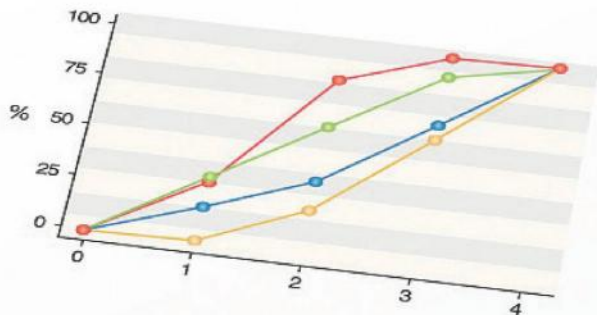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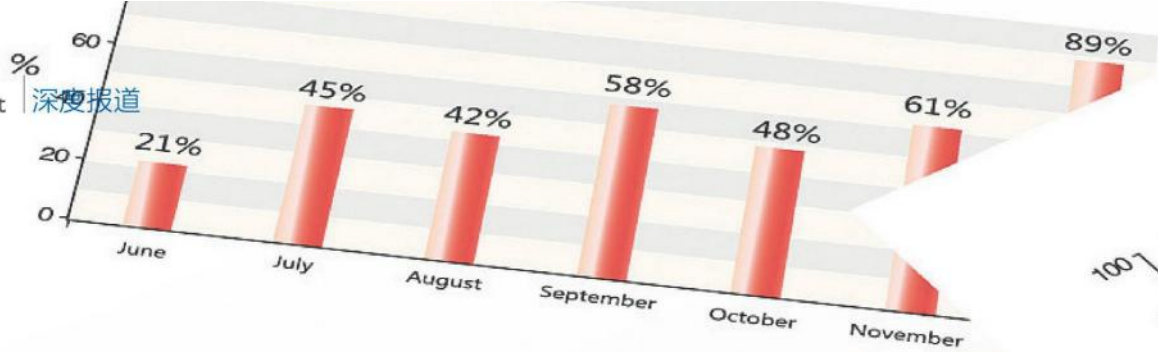
40年改革开放，就这样改变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奋斗的样子，我们散发职业魅力的瞬间，我们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刻，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印记。所有的细节汇聚起来，融合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成为中国故事足以打动人的情节。

2003年10月15日，长征二号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总重487吨的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腾空而起，中国人第一次飞向太空。有记者问：“你在太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杨利伟回答：“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帝。”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上帝之手”。

这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时间，已经开始，永不结束。

这是写入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我们和我们的时代，致敬来路，再次出发。📌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image is a collage of various financial charts, including bar graphs, pie charts, and line graphs. A black tablet is centered in the foreground, displaying the main title and subtitle. The title is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and the subtitle is in smaller, black characters. Below the subtitle, there is a line of text indicating the planning and writing credits. The background charts include data for months like November and December, and a line graph with a value of 187.

咱们的 “钱袋子”

——2019: 工薪阶层迎接“政策大礼包”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采写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8年6月20日，河北张家口，北汽福田汽车公司宣化雷萨泵送机械厂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岁

月不居，时节如流。”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开始。

6年前的新年贺词，一句“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让多少劳动者心潮起伏，把情感辐辏于为梦想打拼的每一个场景。

6年后的今天，新年贺词里出现了“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的郑重承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继续深化，提高技术工人收入呼声四起，平民创业环境日趋改善……

所有这些，又让多少一线职工充满了新的渴望——2019年，咱们的“钱袋子”会不会变得更鼓一些？

减税降费：利好工薪阶层

新年前一天，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手机APP的远程办税端正式开放，接受纳税人申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至此，新一轮个人所得税“减税行动”正式全面实施。对于那些上有老下有小、承受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重压的工薪阶层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大礼包”。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40年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8倍，2017年更是达到了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收入比40年前增长18倍，

毫无疑问，这是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40年。跨越人均收入“万元大关”，整整用了31年。跨越“两万元大关”，仅仅用了5年。今天，“三万元大关”已经越来越近。

然而，与工薪阶层对于提高收入的渴望相比，怎么让他们的“钱袋子”更快地鼓起来，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

由全国总工会完成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

此次个税起征点调整以后,所有取得工资薪金的纳税人,都可以扣除5000元/月的基本减除费用并适用新税率表。仅此一项,大部分工薪阶层的个税均有下调,中低收入人群减税幅度更为明显。

状况调查显示,尽管职工全部货币收入平均值比2012年增长了40.8%,但只有32.2%的职工对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满意”或“比较满意”。

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个人所得税法,自然成为工薪阶层增加收入的最大“政策利好”。

此次个税起征点调整以后,所有取得工资薪金的纳税人,都可以扣除5000元/月的基本减除费用并适用新税率表。仅此一项,大部分工薪阶层的个税均有下调,中低收入人群减税幅度更为明显。

当然,更让工薪阶层享受到优惠的还是“个税抵扣”。依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办法,超过个税起征点的收入还可以享受6类支出的专项扣除。包括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子女教育支出、纳税人本人的学历继续教育支出、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子女的大病医疗支出、纳税人或配偶名下的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纳税人的租房资金支出和纳税人赡养老人支出。

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减税大礼包”,税务部门还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服务。在上海,新的个税政策被“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广泛推送,上海税务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均在其列,确保传播到位。与此同时,税务部门还推出12366智能咨询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的咨询方式,开展“靶向型”智能一体化个税改革宣传服务。

随着办税流程的简化,纳税人不光享受个税征收优惠,还能享受很多从未有过的便利。比如,只要申报个人信息就能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资料不用报送,自己留存备查即可。除了单位发放工资时扣减,还可以在第二年汇算清缴时,自行到税务机关申报信息办理扣除。

从2019年1月起,那些提前在个人所得税

APP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纳税人,当月领取的工资就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实发工资的数额出现明显上升。即便忘记申报或者申报延误,都可以随时继续申报,享受一次性补扣。

2019年,工薪阶层迎来的政策利好中,个税优惠仅仅是其中的一项。诸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的财政措施,亦将在推进企业向好发展的同时,惠及生产一线的劳动者。

2018年12月下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宣布我国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开年第一周,李克强总理在一天内连续考察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同样特别强调要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当天下午,萎靡多时的沪深股市即时普涨。

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在一个月内批复了8个城市及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区域铁路建设规划,总投资约为8600亿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经济展望报告预测说,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达1.5万亿元至2万亿元,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有望从二季度开始逐步回温,全年经济有望走出低迷,实现平稳增长。

这份报告同时预测,增值税或从三档合并为两档,企业所得税有望下调2个百分点以上,从而有效刺激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

事实上,财政部部长刘昆描述的路径图里,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将共同发力,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对于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更将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刘昆表示将“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包括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和整治力度。加强收费项目清

单“一张网”建设。

这些看似与普通劳动者相距甚远的降费措施，恰恰是在不断夯实工薪阶层增加收入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就此分析说，大规模减税降费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为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降费将切实减轻负担，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显然，打破成本过高这一制约企业主体活力的瓶颈，降低企业基础性成本和经营成本，必然可以提高企业对未来投资发展的信心。企业活了，就业自然稳定，工薪阶层的收入才能增加。

国企工资：改革决定机制

伴随着2019年的新年钟声，青海省国有企业职工迎来了又一个好消息。

依照《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2019年1月1日起，全省国有企业决定机制将发生变化，工资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同单一的经济效益挂钩，而是通过一揽子因素综合确定。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工资分配宏观政策、企业发展战略及薪酬策略，也包括劳动生产率 and 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

几乎同一时间，不同版本的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措施，在全国不同省市分别开始实施。

在北京，“效益增工资增、效益减工资减”的同向联动成为实施原则，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可在不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范围内确定。

在福建，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开始全面实施，工资总额实行可升可降，津贴和补贴被纳入工资总额进行管理。政府明确提出，要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工资水平要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岗位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

……

这些地方实施意见的出台，源自于国务院2018年5月发布的《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

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的这份《意见》不到5000字，却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国企职工的“钱袋子”。

《意见》明确指出，现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中，还存在市场化分配程度不高、分配秩序不够规范、监管体制尚不健全等问题。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事关国有企业职工切身利益。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效益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统筹处理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企业内部不同职工之间的工资分配关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此次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牵涉面广，重点是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在他列举的改革主要目的里，包括“调动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此间人士向《中国工人》记者透露，《意见》的改革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明确工资与效益同向联动，企业经济效益增则工资增；二是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促进强化工资总额预算执行；三是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规范企业工资列支渠道；四是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制机制，健全国企工资内外收入监督检查。

邱小平表示，通过此轮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工资水平是否合理将更多交由市场决定，企业的工资分配管理权得到进一步落实，有利于切实扭转部分企业工资与效益增长不匹配的状况。同时，在解决目前存在的职工工资该高不高、该低不低问题的基础上，既保证国有企业职工更好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和改革红利，又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工资分配秩序。

依照《中国工人》的统计，截止发稿时止，包括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和青海在内，全国已有18个地方出台国企工资改革意见，工资总额增长或下降的条件得到明确。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济界人士普遍对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表示赞赏和肯定。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分析说，《意见》提出的“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和“劳动生产率挂钩”概念，



2019年1月7日，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工人在生产车间内组装新车

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旨在保障普通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合理收入。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企业薪酬研究室主任刘军胜也认为，鉴于工资性收入属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主要部分，企业工资改革将成为未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风向标。

对于国有企业里的普通劳动者而言，改革带来的是更加向好的预期。集团本部工资大大高过一线职工，企业领导人收入不透明……这些困扰工薪阶层的烦恼有望得到解决。

依照云南发布的《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企业集团应合理确定集团本部工资总额预算，集团本部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原则上应低于本企业全部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企业负责人工资收入情况，则被要求定期向职工公开，接受职工监督。

《中国工人》记者特别注意到，云南版《意见》在提出建立健全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时，特别强调工资水平要向生产一线岗位和高技能人才倾斜。在其他省份出台的《意见》里，类似表述几乎成为“标配”。

事实上，国有企业一直是就业市场的大热门。智联招聘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应届毕业生中，31.71%的人把国有企业排在期望签约单位第一位，比上一年提升1.53%。同时，2018年秋季国企平均薪酬为8466元，同比2017年上涨6.25%；全国平均招聘薪酬则为7850元，同比2017年上涨3.3%。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的结果，同样证实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增速，持续超过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过去三年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全国 7.7 亿就业人员中,技术工人的比重仅占 20% 左右,高技能人才更是只占 6%,技术工人收入不高、待遇保障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

从2019年开始,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将与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挂钩。这将为那些肯付出、能创造的一线劳动者打开收入增长的空间,有望比以前“挣的更多一点”。

技术工人: 绘就增收蓝图

3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包括许振超、李斌、高凤林、徐强在内,几位名声显赫的技术工人曾经有过一次“夜聚”,“技术工人收入不高”成为共同话题。

其时,《中国工人》记者亦在讨论现场,印象最为清晰的是李斌回忆自己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发言。当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面,这位来自上海电气的高级技师直言,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这说明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需要提高。

沈阳鼓风机集团高级技师徐强则说,“同在一个单位,我是工人,他是干部,身份背后是三四倍的收入差距。工人地位高不高,这不就是最明显的实事吗?”

“总是这样,谁还愿意当工人?”坐在一旁的高凤林回忆,当年他参加工作时,还有干部把子女安排到企业当工人。“现在呢? 还有多少工人愿意自己的孩子继续当工人?”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许振超更是一语中的: “用什么来激发工人的工匠精神? 光靠嘴上说是不行的。我们还要继续呼吁, 让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早日出台。”

就在这次大国工匠“夜聚”两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对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术工人,鼓励企业实行协议工

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激励方式,促进长期稳定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如今,经过8个月的“发酵”,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已经成为2019年的大趋势。全总经济和技术工作部副部长姜文良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逐渐认识到工匠人才的核心价值,优秀技术工人提高工资的问题广受关注。

2019年1月8日,中车集团高级技师罗昭强赶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领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迎接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此前,罗昭强刚刚结束在美国波士顿的20天培训工作,培训的对象则是中车集团波士顿工厂的美国工人。在中美贸易冲突起伏不定的背景下,面对“我们被什么卡住了脖子”的尴尬境况,这位中国优秀技术工人的美国之行更有特殊分量。

2019年的新年,罗昭强是在美国度过的。或许是为了表达对远在长春照料家庭的妻子的感谢,他在波士顿专门买了一件赫赫有名的羽绒服,折成人民币大约花掉了6000元。

在接受《中国工人》记者采访时,罗昭强大方地透露了自己目前的工资水平,超过50万元的数字让同时在场的国家机关部门负责人、新闻出版工作者相形见绌。

在中车集团长客股份公司,像罗昭强一样享有这样水平年薪待遇的技术工人,还有李万军、谢元立、胡俊祥。此次进京领取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除了那块金光闪闪的奖牌,还有依法不需缴纳个税的15万元奖金。

更早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公开谈起自己在国外考察时的一段经历,一家大企业的董

事长告诉他，这家企业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高级技工，拿的工资和企业总经理一样高。

李克强当时这样问在场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我们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格局和气魄？”

今天，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包括罗昭强在内，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相信自己正在迎来又一个春天，重新享受当年“八级大工匠”的荣耀时刻。

所谓“八级大工匠”，与我国从1956年开始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有关。以当时的沈阳市重工业企业为例，一级工33元，二级工38.5元，三级工45.8元，最高八级工108元，这一水平超过99元标准的企业中层正职。加上公众补贴和高温补贴，一位六级铸造工每月工资能有八九十元，在8元钱就可养活一口人的年代，自然广受艳羡。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

数据显示，全国7.7亿就业人员中，技术工人的比重仅占20%左右，高技能人才更是只占6%，技术工人收入不高、待遇保障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坦率承认，很多青年不愿意在技术工人岗位就业。人社

部门将加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推进校企合作培养技术工人，鼓励企业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为技术工人的成长搭建平台。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阎京华则表示，高技能人才对于科技创新及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全国总工会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动落实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建立针对技术工人的辅助性津贴制度。

目前，各地政府对于技术工人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乐于掏出“真金白银”招徕和培养“技工人才”。

在南京，2017年以来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分别获得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纳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还可以上浮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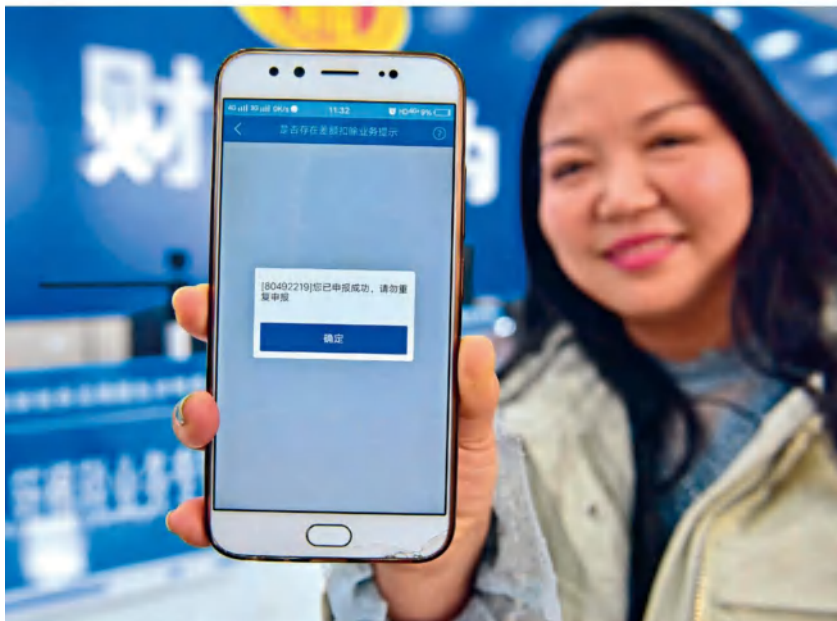
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位大工匠的年薪超过100万元，最高达到300多万元，是总经理的4倍。400多位“华翔工匠”成为企业的栋梁，其中三分之一是年轻技术工人。

“培养一位机加工人员需要三年，培养一位好的铸工却可能需要一辈子。毕竟，铸造必须根据经验、缩尺和变形量，推测铸件的理想形状，这是学不完的现场应用问题。”这种对于培养铸造工种技术工人的描述，同样是培养每一个一线工种技术人才的共同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国家政策正接连推出，技术工人亦被列入重点群体增收的范围。随着顶层制度设计的溢出效应逐渐影响基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改进技工待遇机制，推出“真金白银”的薪酬激励。

可以相信，在充满更多希望的2019年里，技术工人的收入增长会有更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技术工人的“钱袋子”一定会越来越满，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19年1月11日，石家庄，在新乐市税务局办税大厅，纳税人展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用手机APP完成个人所得税申报

工人议政 简史

民主的细节和劳动者的力量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9

年3月，北京。

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场。

在连续四年不懈呼吁为职业技能培训立法以后，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终于不用再提这个“老建议”了，因为此前的建议“有了实质性回应”，全国人大将就《职业技能开发法》的立法工作开展调研。

同样不用再继续再提“老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连续6年呼吁修订《职业教育法》的赵郁。就在此次人代会召开前5天，他应邀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有望在年内实现上报。

尽管大名鼎鼎，许振超的身份依然是青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队队长，赵郁的身份依然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高级技师。

四年，许振超，《职业技能开发法》制定。

六年，赵郁，《职业教育法》修订。

在中国最高层级的民主政治殿堂，两位一线工人代表为劳动者权益的执著表达，留下了又一段工人议政的故事。

民主的细节，劳动者的力量，每一年，每一天，都在改变中国。

议政 1980 为改革助威

65年前的1954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期14天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同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5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中国工人》记者查询史料发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有1210人，其中包括孟泰、马恒昌、马万水、马六孩、梁军等开国劳动模范。



限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当时的新闻媒体鲜有人大代表议政的细节报道。来自基层的一线工人代表，往往出现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中。

时光荏苒，“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间”。

1980年8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但是，与今天的全国两会“新闻大战”相比，当时的新闻报道总量不多，且多为程序性报道。

为期12天的这一次人代会，《工人日报》仅在会期最后3天开始出现有关工人代表的报道。其中，记者陈蓓、铁英采写的通讯《人代会上气象新——访五届人大辽宁工人代表》里，出现了多位工人代表的名字。

闭幕次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陈蓓采写的另外一篇报道，题目为《“三废”不处理，四化难建设——湖北省工业战线的人大代表吁请有关部门解决污染问题》。

在这篇报道里，陈蓓记录了江岸车辆厂工人副总工程师范忠志代表的小组发言——我是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讲话，为人民办事。“在他（范忠志）面前，摆着数封群众寄来的挂号信，是委托他向大会反映情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线工人代表参政议政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报纸”上。从这一年开始，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逐渐从无到有。

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2月15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了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部分劳模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南京师院附小特级教师斯霞代表建议“为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河南郑州国棉六厂挡车工孙景荣代表建议“抓好对青工的传帮带”，木工出身的重庆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荣昌代表建议“技术改造要走自己的路”。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当日，湖南涟邵矿务局采煤工易政求头顶矿灯的照片，刊登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此后的十余天里，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被大量传递出来，密集程度前所未有的。



第一屆人代會部分代表合影

“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这是云南一家两代工人代表的“交接嘱托”，也成为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一段佳话。

火车司机尹自昌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22岁的女儿尹丽凡是楚雄丝绸厂的青工，这次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女儿来京之前，父亲“嘱咐又嘱咐”——咱一家两代工人，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只有在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人才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啊！你一定要虚心向其他代表学习，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让革命长辈们看到，你们不愧是新中国的新一代主人。

这是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利益在调整，阻力在出现。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开幕。12位一线工人代表的图片和发言，同时出现在中央报纸的第一版上，并被冠以“站在时代前列，做改革的主力军”的总栏题。

从“改革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到“养路工完

全可以搞承包”，从“上海工人在盼望改革”到“搞改革更要重视技术创新”，从“工人要尊重知识分子”到“工人要关心生产和经营改革”……来自改革最前沿的一线工人代表发出的声音，成为支持改革的最强烈呐喊。



在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场上，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老工人**王学礼**发出了更强烈的改革呼声——“改革要彻底，一定要同步进行！”

尽管大家都说好，六建公司的改革方案一直批不下来，这是让王学礼“皱起眉头”的事情。在进行承包试点的装修队，原本一个半月的活儿，不到一个月就按质按量完成，却因为管理制度还没有改革，工人积极性仍然受到影响。

王学礼直言：“我们这个有一万多人的公司，连买茶叶的自主权都没有，开竣工更没权了，都得等着总公司批……捆着这么多绑，这能搞好承包吗！”

……

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工人议政的声音逐渐强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带着火热的激情和梦想,直击繁冗的拖沓和束缚,粗朴而有力,为正在进行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线工人代表的比例问题浮出水面。

议政 1993 为企业呐喊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来自大会新闻中心的数据显示,人民选举出的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身份是工人的代表有300多人。他们带着身边工友的重望,踏上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40级台阶。

在北京的每一天,侯振清都处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之中。胸前的那张红色代表证,让这位开滦赵各庄矿回柱班班长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之重。

毫无疑问,壮观的万人大礼堂让那些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工人代表震撼不已。扇形面的礼堂分为三层,坐在哪一层的哪一个位置,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主席台。穹窿形的会场顶部,红宝石般的巨大红色五角星灯置于中央,周围是镏金的70道光芒线和40个葵花瓣。

此前,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党的发展历史上的伟大

创举。

这种彻底突破思想藩篱的巨变,让刚刚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一线工人们挣脱了拘谨。

在北京的每一天,侯振清都处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之中。胸前的那张红色代表证,让这位开滦赵各庄矿回柱班班长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之重。

出发之前,工友们送给侯振清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第一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认真讨论国策”6个字。这些在井下摸爬滚打的兄弟们说:“你放心去开会吧,把我们的呼声反映上去。你的工作量,大家帮你赶出来!”

从轰鸣的机器旁边走来,从遥远的矿井深处走来,每一位工人代表都觉得自己的身后,有千百双工友的眼睛。

“为企业松绑”,这是这一届一线工人代表共同的呼声。从宏观调控到微观调控,从转换机制到转变职能,从产权理论到股份模式,多年服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工人代表参政议政能力越来越强了”。

一到北京,来自淮北煤矿建设公司30工程处的陈登明代表就整理出一份建议书,希望政府为“国家队”走向市场创造条件。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陈登明发出这样一连串的诘问——“14项企业自主权,现在到底落实了多少?有的县长已经坐上了‘奔驰’,国家建设资金为什么却不能按时到位?企业贷款生产,工人们劳作一年的利润都交给了银行,企业发展从何谈起?”

引人注意的是,包括陈登明在内,细心的工人代表注意到人大代表构成百分比的变化。他们在翻阅名册后直言不讳:“工人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了。”

1993年3月20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的通讯《工人代表在想什么》,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

1978年的五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26.7%。

1983年的六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4.9%。

1988年的七届人大,工农代表合计比例占23%。

1993年的八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1.15%。



从26.7%到11.15%，15年里形成的这条下降曲线，让工人代表们感到困惑和忧虑。

在经济体制改革渐成风尚的时代，他们支持扩大企业经营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比例，但同时反复强调工人代表的比例不能继续降低，“否则，来自生产一线的真实呼声会越来越弱”。毕竟，如果职工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发展动力。

尽管这一届工人代表的比例有所下降，他们所展现出的议政能力却赢得了广泛赞誉。

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慈成禄一个人是养路工，代表着100多万养路工人群众。这位河北廊坊葛渔城道班班长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来到北京，但既然佩戴上鲜红的代表证，就要用好手中的政治权利。

第一次参会，慈成禄就要给《政府工作报告》提一条意见。他说：“报告有关公路建设的段落，只讲了‘修’，没有提‘养’。这种投资取向需要仔细研究，应该是‘修养并举’啊！”

慈成禄用葛渔城道班的“小账”算起国家的“大账”。他和24位工友养护的公路中，有7.8公里路段已经“超期服役”15年，因为养护得力没有每隔5年进行翻修。仅此一项，就为企业节约300多万元。“如果全国的公路养护工作都搞好了，至少要节约几十个亿！”

或许在有些人眼里，工人议政不过是提出几份意见和建议。然而，恰恰是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声音，往往更符合企业发展和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2007年3月20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刚刚闭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不会有多少人想到，这家最终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的金融机构，与一位工人代表提出的议案有过交集。

14年前，吉林省汪清县邮电局揽储班班长李桂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人代会，这位普通的一线工人便大胆建议成立邮政系统专业银行。为了这份议案，她专门跑到北京的邮电网点征求意见，四处游说人大代表签名响应。

今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标识散布在城市和乡村，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正式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近4万个营业网点，5.65亿个人用户，电子渠道与实体网络互联互通，线下实体银行与线上虚拟银行齐头并进，全业态的金融服务格局让这家银行生机盎然。

今天，借助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依然无从查找李桂菊的下落。剔除同名同姓者，她的名字仅仅出现在百度百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词条中。当然，26年前已经泛黄的报纸上，留下了李桂菊的议政故事，成为一段显示劳动者智慧的传奇。



2008年3月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会后，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自左至右）在一起交流

议政 2008 为群体亮相

当李桂菊庄重地提出自己的第一份议案的时候，17岁的朱雪芹还在苏北睢宁的一处农家，好奇地观望着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

一年以后，这位倔强的女孩子决然地扛起铺盖，在父母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乡野，走向全然陌生的城市，成为浩荡流动大军里的一名农民工。

此时，发源于17年前的人口流动大潮，已经孕育出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的标签背后，不仅是身份、岗位和生活上存在的不平等，更是四处可见的



2013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

使用歧视、管理歧视、经济歧视和人格歧视。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农民工就成为资本和劳动力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合法权益接连不断地受到侵害。由于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工作地分离，他们的公民权利无处行使，政治权利和话语平台陷入盲区，无从依靠政策博弈改变自己的弱势命运。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架构无法忽略这样庞大的群体。尽管此时的朱雪芹还在生产线上劳作，工人议政的大门却已经悄悄地向她打开。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用2000字的篇幅，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

盛华仁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8年1月，继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先后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朱雪芹的名字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从苏北到上海滩，农民工朱雪芹用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逆袭。消息传到老家，她的父母喜极而泣。

3名农民工代表，成为2978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耀眼明星。

2008年3月，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聚光灯前，多少有一点忐忑。讨论会上，难免有几分稚嫩。但是，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依然努力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

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工友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同样有趣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认真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后，转头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农民工养老及完善劳务派遣等，“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成色十足。



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党和人民的大考”。面对中国农民工阶层日益壮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普遍共识。

5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

彼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相对弱勢的群体，在收入、住房、社保、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障碍，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距。

完成一届任期后，3位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

代表去路迥异。

康厚明落户重庆，完成了自己人生通道上的身份转型。但是，按照他的表述，“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很快，康厚明有了另一个身份——党的十八大代表，他也是26位农民工身份党代表中的一位。

胡小燕落户佛山，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打开。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落户上海并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

环卫工王月清，保安员朱良玉，保洁员陈腊英，营销员张晓庆，物业管理员曾香桂、洗脚妹刘丽……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今天的中国，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成为重要社会特征，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平衡。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参与，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

新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上，依然保留着朱雪芹当选那个年代的印记——出身农村，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岗位起步，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

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议政 2010年代 走向利益表达……

“仿佛春风拂过的劲草，扎根‘中国式民主’的大地，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国家通讯社发出的这一段评论，恰恰也是工人议政的生动

写照。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几近一个甲子，民主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根深叶茂。

从“拥护报告”到“建言献策”，越来越多的工人代表不仅关心国家和企业，更开始直视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表达。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五位一线工人代表自曝“生活压力账本”，疾呼“职工收入增长提速不能一拖再拖”，把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端向前台。

3月6日，前来参加人大会议的内蒙古包头交通运输集团驾驶员张凤霞，无意中露出袜子上的破洞，让在场采访的记者顿时愕然。

这是利益表达时代下的一次典型性工人议政。5位工人代表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愿意直观描述自己略显尴尬的生存状态，用来凸显千百万工友共同的呼声和期盼。

随后，张凤霞、康厚明、王艳斌、杨晓霞、代朝霞等5位工人代表晒出了各自的家庭收支账，坦言“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

农工班班长康厚明16岁外出打工，31年积攒的钱，因为儿子上大学就接近“归零”。他直言发问：“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教育收费增长的速度？”

王艳斌最担心家人生病，因为生一次病就能花光她一年的收入。她直言发问：“环卫工人的收入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医疗收费的增幅？”

张凤霞荣誉等身，工资却月月花光。她直言发问：“公交职工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物价的

增长速度？”

代朝霞每天重复分拣2万个弹簧的动作，花26万元买下一套二手房，负债13万元。她直言发问：“机械工人的工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房价的飞涨速度？”

杨晓霞每年为企业创效几百万元，工资依然还是2000多元。她直言发问：“纺织工人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一连串的发问之后，这些工人代表“议政有方”。康厚明建议，要像城市职工那样，通过立法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利益。杨晓霞提出，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就是从另一个渠道提高了一线工人的收入。“辣妹子”性格的代朝霞索性发出警告：“再这样下去，谁还愿意当工人？！”

这一次工人议政，把收入分配问题推上了前台。依照当时媒体披露，短短3年时间里，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6.72倍扩大到17.95倍。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就业人员仅为62%和60%，农民工不足20%和31%。

5位一线工人代表的“生活压力账本”，不仅在人代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同时引起全国政协委员的强烈共鸣。来自全国总工会界别的张世平委员称：“5位代表的‘账本’，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收入和生活状况。”全国政协常委张俊九更是直言不讳，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问题长期被忽视。

5天以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乔传秀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低收入职工工资增长。

同日，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士透露，全总正在积极影响决策，推动相关立法，以有利于广泛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促进包括工资条例在内的相关政策出台。

这是利益表达时代下的一次典型性工人议政。5位工人代表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愿意直观描述自己略显尴尬的生存状态，用来凸显千百万工友共同的呼声和期盼。

与此同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建设性，不仅符合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更和那些“雷





2010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人雷语”形成鲜明反差，淳朴、真诚、奉献的阶级品质赢得了社会广泛尊重。

事实上，及时表达亿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紧密相连，始终是工人议政的鲜明特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来自煤炭行业的多位一线工人代表形成接力式“建议”，持续呼吁“免征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个人所得税”。对于相关部委的回复，井下掘进工董林代表无论是书面和电话口头反馈中，都明确表示“不满意”。

人代会上，董林直言：“煤矿工人平均每人要承担3.5人以上的生活费用，家庭人均收入微薄，因此哪怕几十元的个税，都会是一个负担。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都可以免征个税，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却非要计入纳税总额？”

当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时候，平衡不同社会群

体的利益直接关联发展与稳定的大局。让底层利益诉求得到公平表达的机会，是社会公正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工人议政则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同群体充分实现利益表达的生动缩影。

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改变着每一位有幸进入议政殿堂的劳动者。他们也把自己的执著和坚守，融入这份为亿万职工代言的事业。

从2015年起，进京参加人代会的许振超都是“工人代表聚会”的主角。每年一次，早已相熟的工人代表们抽时间交流，已成惯例。

2015年的聚会者是许振超、李斌和王钦峰。李斌是上海电气首席技师，王钦峰是山东豪迈机械公司技工。三位一线工人代表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技工、技术和中国工业制造。

这是许振超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8年，他的角色代言人意识已经非常明确，围绕着工人合法权益每年都有相关建议，批评起来也不留情面。



“职业教育看上去很受重视，好几个部门在管，但最后都没管好。”

这一年，上海技术工人李斌带来的建议是加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工人和农民的名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劳动者的创新积极性。”

2016年3月，沈阳鼓风机集团高级技师徐强和“火箭焊心人”高凤林，成为“工人代表聚会”新面孔。今天已经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高凤林，当时在政治场合寂寂无闻，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的呼声完全可以经由其他4位工人代表进行转达。

这次人代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审议。李斌在8分钟的发言里，引用了“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的数据，满座震惊。

李斌告诉大家：“我发言时，总书记用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新华网的报道则显示，习近平当场表示，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5个月后，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牵头相关部委开始研究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可惜，李斌再也不能出现在这样的聚会上了。2019年2月21日，58岁的李斌在上海徐汇中心医院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

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开始，李斌一直连选连任，先后11次参加人代会，参加各类履职活动280多次。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因为他的奔走呼喊变得更加光明。

“还在老地方吗？”

“还在老地方。”

“不容易啊，还继续在基层技术攻关。”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人代会上与李斌握手时的对话。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斌，依然是一位一线技工。

李斌走了，“工人代表聚会”还将继续下去。工人议政，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工人代表



2013年3月13日，全国劳模李斌、许振超、王钦峰（从右至左）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油、鼓劲 杨登峰/摄

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 * * * *

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工人代表的又一个“人代会经典时刻”——

高级工人技师徐强告诉习近平：“几年前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没有被选上，很多人安慰我说，人家没喝你一口酒，凭啥选你？后来，我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间正道是沧桑。”

习近平回应，“没有基层一线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怎么体现”。

毫无疑问，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人代表最懂得民生疾苦，最知晓政策得失，最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最能反映社会基层的呼声。国家高层只有听到更多、更真实的民间声音，才能够真正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事业。

聚沙成塔，涓流汇海。

今天，来自一线工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国人大代表，已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议政故事，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今天，工人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不同社会阶层的政策博弈，正在因为他们的出现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 





劳动教育需要更多的仪式感

无论是鸟巢的刻柱留名，还是伦敦的护送圣火，都是对劳动最好的尊重。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北京，CBD商务区。

随着528米的“中国尊”全面封顶，中国最壮观的城市天际线横空出世。

这是北京市最高的地标建筑，地上108层、地下7层，可容纳1.2万人办公。

从2012年9月打入第一根地下桩开始，“中国尊”突破的每一米新高度都全城瞩目。从世界上第一个在抗震设防烈度8度区建造的500米以上超高层大楼，到世界首创的服务高度超过500米的跃层电梯，“中国尊”的每一个“世界之最”都成为劳动改变世界的最好诠释。

“中国尊”的建设过程中，全国政协委员、全总经费审查委员会原主任李守镇不止一次登上过这处超高建筑工地。为劳动者创造奇迹倍感骄傲的同时，他的内心也有深深的遗憾。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尊重劳动，加强劳动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重要课题。如果青少年的成人仪式放在‘中国尊’工地举行，或者把产业工人的入职仪式放在这里，这样的‘仪式感’是不是更有助于树立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社会风尚？”

2019年全国两会上，李守镇说的这一番话，引起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的积极响应。

“鸟巢模式”需要广泛复制

11年前，北京城建集团国家体育场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李久林的一段讲述，曾经让很多普通的技术工人热泪盈眶。

总用钢量11万吨的鸟巢工地，焊接成为关键

的控制环节。薄板焊接变形大，厚板焊接熔敷量大，加上高空焊接和冬雨季焊接的防风雨防低温难题，需要最优秀的焊接技术工人。

当时，全国1000多名优秀焊工接受培训，优中选优，闯过淘汰环节的人才能进驻工地。

鸟巢构件巨大，只能靠焊工调整姿势，在狭窄空间内进行操作。夏天，钢板要加热到150摄氏度以上，焊工穿着厚实的工作服，最长的焊接工序达到17个小时，技术、体力和责任心都面对挑战。

鸟巢建成了，这些焊工的名字被镌刻在钢柱上，四人一列，留下了自己的微痕。也许不会有多少游客注意到这个细节，但它日久天长地就在那里，仿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依旧守护着这幢世界级地标建筑。

在李守镇看来，这样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劳动教育。这样庄重的仪式感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全社会都要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

李守镇说：“近年来，港珠澳大桥、丹昆特大桥、舟山港、‘复兴号’高铁等一大批超级工程震惊世界，神舟、天宫、蛟龙、天眼、北斗等一大批大国重器竞相问世。所有这些重大工程，无不体现着一线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遗憾的是，一些重大工程在成功验收后，大多数参与建设的劳动者与这些壮丽工程就不会再有交集。”

让李守镇记忆犹新的是，不仅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刻有焊工名字的鸟巢钢柱，还有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欢迎火炬的建筑工人。

当时的电视转播画面上，作为英国的骄傲，五

届赛艇奥运冠军雷德格雷夫举着火炬，在万众欢呼声中跑进主会场。这一刻，通道两侧迎接火炬的500名“黄色安全帽”同样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他们正是参与伦敦奥运场馆建设的工人代表。

场馆建成以后，建筑工人早已撤离工地。然而，人们没有忘记这些无名之辈，在开幕时刻把他们请了回来，迎着全场艳羡的目光护送圣火进场。

李守镇说：“无论是鸟巢的刻柱留名，还是伦敦的护送圣火，都是对劳动最好的尊重。我们设立国家公祭日和烈士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举行纪念仪式，让爱国主义教育入脑入心。倡导全社会‘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也同样需要更多的仪式感，‘鸟巢模式’需要广泛复制。”

让劳动教育的仪式感多起来

2018年12月31日晚7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2019年新年贺词。

习近平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他向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向还在辛勤工作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

习近平的深情话语，让全国劳动者感到无比温暖。“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他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中的谆谆嘱托，更是为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提出了方向和目标。

在出席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时，李守镇提出《切实增强劳动教育的仪式感》的提案，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共鸣。

家住北京冬奥会主场馆旁的李正荣教授就深有同感。冬奥会场馆施工的过程，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每天亲眼目睹着。他也曾为工人们需要精准对接钢材构建的技术惊叹过，也曾因为施工的噪音而心烦过。直到有一天，场馆围挡拆除，过去繁忙嘈杂的工地安静下来，他才突然意识到，“工人们撤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李正荣教授告诉《中国工人》记者，“正因为目睹见证过工人们夏日骄阳、冬日雾霾里从不间断的辛勤劳作，才从内心对劳动伟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是，社会上很多人并没有崇尚劳动的意识，

还是对劳动没有基本的认识和尊重。”

在接受《中国工人》记者采访时，李守镇坦陈这个提案的由来是生活中的感受。

两会前夕，李守镇委员到首都新机场建设工地，再次被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所震撼。“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去过很多气势磅礴的世界级建设项目。工人们像养活一棵树苗一样，把那么恢弘的建筑盖起来，竣工的日子，就是他们离开的日子，一点点劳动者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更别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纪念馆或纪念牌了。”

李守镇介绍说，国外很多工地虽然也有围挡，但都会留下一处通透的观察口，社会大众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透过窗口观察劳动建设的情景，其实也是一种寓于平常的劳动教育。相比之下，我们的工地围挡往往是严严实实，路过的人们根本看不到工地里辛苦劳作的场面。

从工地的围挡延展开来，李守镇认为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切实增强劳动教育的仪式感。比如，在开学第一课、入团仪式、成人仪式、毕业典礼、校庆典礼等常规性仪式中，应当增加和突出劳动元素，邀请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先进人物参加，引领青少年学生感悟劳动的魅力和意义，用劳动教育“立德树人”。

与此同时，劳动建设领域同样需要增加仪式感。李守镇建议，应当鼓励在新员工入职时增加爱岗敬业的宣誓仪式环节，从劳动者职业生涯的起点就增强职业认同，坚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在重大工程竣工等仪式中，应当留出专门环节聚焦参与工程建设的普通劳动者，并在相应位置设立纪念墙、纪念柱等，铭刻参建劳动者的信息，甚至可以为重大场馆参建者发放纪念铭牌，作为优先进入或减免票费的凭证。

尊重劳动不是纸面上的字眼。科学研究早已证实，生活中的仪式感容易让人刻骨铭心，特别是对于缺少劳动教育的青少年和青年工人而言，充满仪式感的场景更能触动他们心底的柔软，从而对劳动和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感激与敬意。

或许，即将在2022年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也会像伦敦奥运会一样，在开幕式上增设劳动者亮相环节，更可以邀请场馆建设者免费观看赛事。这个时刻，就是劳动和劳动者最有仪式感的“高光时刻”。



在中国最高层级的民主政治殿堂，
两位一线工人代表
为劳动者权益的执著表达，
留下了又一段工人议政的故事。
民主的细节，
劳动者的力量，
每一年，每一天，
都在改变中国。

摘自 NO.2/3 2019《工人议政简史》

平凡者的史诗

那些逝去生命留给我们的爱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中建五局员工代表为陈超英扫墓

湖

南,长沙。

清明。野花开遍山坡。

“大姐主席”陈超英的墓地,翠柏默默地守护着墓碑,几样精致的贡品陈列在台阶,寄托着绵绵无尽的思念。

这是工会干部陈超英离开的第7年。她曾经深爱和服务的工友们,依然记得她的笑容和声音。她的故事和情怀,依然打动着每一位工会干部的心灵。

在为职工服务的漫漫长路上,一个人的灵魂究竟能走多远?陈超英用自己的生命给出的答案,7年后依然清晰地触摸着我们内心深处某个柔软的角度。

当然,这不是陈超英一个人的回答。

徐梅、余剑、林维勇、郭起森、陈小星、李斌……假如命运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时光,他们都会像陈超英一样,继续深爱着身边的每一位工友。

那些逝去生命留给我们的爱,永远感动着千千万万生产一线的劳动者。

平凡者的史诗,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脊梁

时光倒流,2014年7月20日是送别工会干部郭起森的日子。

全国总工会送别的花圈,静静地摆放在追悼会场。500多名干部群众哀默伫立,发出不舍的呜咽。

3天前,51岁的海南省昌江县总工会保障部部长郭起森走了。一起离开的,还有比他年长6岁的昌江县总工会财务部部长林维勇。

当时,强烈台风袭击昌江。县总工会干部郭起森、林维勇、李仁坚冒雨进驻包点村——乌烈镇白石村,走村串巷查看村庄情况,协助群众加固低处房屋,转移安置危房户。

送温暖的慰问路上,遇到不属于工会救助的孤寡老人,郭起森常常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塞过去,有时三十五十,有时一百二百,全然忘了自己属于“经费自筹人员”,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

7月18日,受灾群众安全转移了,饮用水和食物却配备不足,3位工会干部决定连夜返回县城拉运。

四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家人至今依旧牢牢地记得林维勇、李仁坚最后的模样和声音。

那天早晨,林维勇抱着7天前出生的外孙女,笑得合不拢嘴,然后赶去上班。

那天晚上,郭起森的儿子还在叮嘱父亲“注意安全”,一句“明天见”成为郭起森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从此阴阳两隔再也无法相见。

和林维勇、郭起森一起遭遇山洪的李仁坚,当时是昌江县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他从山洪中幸运生还,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瞬间发生的一切。

赶往县城为受灾群众补充物资的路上,山洪骤然袭来,林维勇驾驶的汽车一下子就漂了起来。坐在后排的李仁坚迅速推开车门,拼命跃出车外。车门被迅疾的水流推拢,夹住了他的一只脚。凭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强行挣脱,死死抓住了路边一株苦楝树旁的荆棘。

几乎就在这一瞬间,汽车被湍急的激流冲进没有尽头的黑暗。李仁坚绝望地大喊着林维勇、郭起森的名字,风雨中没有一丝回声。

郭起森走了,带着对昌江县1.6万名职工的牵挂。

作为工会的保障部部长,郭起森同时担任着帮扶中心主任。每年春节的送温暖活动,郭起森都要加班到大年三十,走村串巷把物资送到职工群众手里。

因为国企改制,张居南成了下岗职工,平日靠开摩的维持生计。一个偶然的机,郭起森在县总工会门前搭上了张居南的摩的,得知他是失业职工后,详细了解家庭情况和生活困难后,千叮万嘱要他去工会申请补助。

送温暖的慰问路上,遇到不属于工会救助的孤寡老人,郭起森常常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塞过去,有时三十五十,有时一百二百,全然忘了自己属于“经费自筹人员”,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

林维勇走了,30年的工会工作经历,留下的是被职工们称为“活雷锋”的夸赞。

工会财务工作繁琐忙碌,林维勇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下班回家。遇到同事家里操办“白事”,他从来都是主动上门帮忙。职工王翠兰的丈夫过世,因为本地亲戚不多,没有什么帮手。手足无措之际,林维勇闻讯赶来,为逝者洗澡更换寿衣。

那一年,昌江南华糖业有限公司进行改制,由于工资保险和受益分配不均,400多名职工情绪激动。林维勇和同事迅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与资方进行沟通交涉,10项职工诉求得到基本满足,一场上访风波由此平息,让职工们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和力量。

在常人眼中,工会工作从不惊天动地,也谈不上有什么风险和危险。然而,一旦面对职工群众的危险急难,更多像郭起森、林维勇一样的工会干部,总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最前面。

事实上,平凡人并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次意外,便有可能让一段激情的人生猝然结束。即便如此,那些逝去生命的爱依然留存下来,成为粘连工会与职工最坚实的力量。

2018年1月2日下午,贵州遵赤高速公路大坝路段,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夺走了工会干部徐梅的生命。

25岁的花样年华,就此骤然枯萎。因为设置了“三天可见”,徐梅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条浅浅的横线,如同她生命的休止符。

一年以前,徐梅从西南大学毕业,以笔试、面

夜幕慢慢降临，陈超英从衡阳返回长沙。途中，暴雨骤降。22时30分左右，汽车突然打了好几个滚，跌落到了路基边……一切戛然而止。

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遵义市总工会劳动人民文化宫。9个月后，她被抽调到遵义市脱贫攻坚督导组。那场夺命车祸，恰恰发生在这位90后扶贫干部赶往习水县的扶贫路上。

虽然是城里姑娘，徐梅却并不娇气。走访贫困户的时候，无论路途多么泥泞崎岖，她总是婉拒大家的关心，一起走到目的地。贫困户家里条件差，凳子上满是泥土灰尘，她从不嫌脏，随便啃一根烤包谷就算是吃了午餐，走时还要坚持留下“午饭”钱。

就在徐梅去世前的4个月，陕西省佛坪县总工会副主席余剑也在扶贫路上遭遇意外，抢救无效，离开了他深爱的世界。

这一天，挂职草林村第一书记的余剑去看望贫困五保老人。不料，就在离开村委会只有400米处的地方，一块近2吨重的巨石突然砸在公路内侧，撞上了余剑乘坐的面包车。

到这一天为止，余剑驻村工作刚刚4个月。4个月里，39岁的他仅仅回了3次家。简陋的宿舍里，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两个手电筒，几个药瓶，成为余剑驻村生活的写照。

几年前，严重的胰腺炎曾经让余剑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驻村期间，病情时有发作。他总是吞几片药对付一下，忍着病痛继续工作，实在疼得受不了，才勉强去汉中的医院就治，病情稍有好转便连夜赶回村里，继续工作到深夜。

躯捐风雨路，情暖百姓心。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徐梅和余剑生如夏花，仿佛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播撒下爱与善良、牺牲与力量的种子，为大写的“工会”两个字填涂上更鲜丽的一笔亮色。

在工会干部的岗位上，平凡亦是英雄。

温暖

这是2011年的夏天，郭起森、林维勇还在文昌工会为职工奔忙，履行着最基层的工会干部的职责。徐梅还是一个刚刚考上高中的女孩子，生活的图景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远在湖南的“大姐主席”陈超英，却遽然离去。

2011年6月13日，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工会主席陈超英进入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8时30分，长沙，湖南省总工会。陈超英早早赶到法律保障部，为《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审批表》盖章。

10时许，省总工会干部罗华接到陈超英的短信：“我们好久没聚了，晚上一起吃饭。”

12时许，陈超英忙得错过食堂的饭点，从同事碗里匀出一坨米饭，凑合着吃了午餐，匆匆上车离开长沙。

大约1个小时后，罗华再次接到陈超英的短信，“晚上聚餐要改期”，因为一位分公司同事的母亲去世，“正赶往衡阳”。

15时许，丈夫宁建国接到陈超英从衡阳打来的电话。听到丈夫说儿子学车的手续已经办妥，陈超英一遍一遍地说，“太好了，以后可以坐儿子开的车了”。

夜幕慢慢降临，陈超英从衡阳返回长沙。途中，暴雨骤降。22时30分左右，汽车突然打了好几个滚，跌落到了路基边……一切戛然而止。

第二天，中建五局办公大楼前一片肃穆。灵车缓缓绕过这里，让53岁的陈超英再“看”一眼她生前热爱的同事和工友。

作为第一个深度报道陈超英的媒体人，《工人日报》记者方大丰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历的一幕又一幕。上万名工友的眷恋与不舍，让“大姐主



扶贫工会干部徐梅

席”这个称呼名副其实。

方大丰说：“‘大姐主席’就是陈超英的独特LOGO，内涵就是真诚与善良。她是在用命工作，用心履职，用细碎而平凡的爱，汇聚员工和企业的鱼水深情。”

每年，陈超英都会去看望退休职工张木生。2010年那次看望，张木生的小孙子恰巧在爷爷家。陈超英记下了孩子的生日，说“明年一定来庆贺”。2011年儿童节，陈超英真的来了，给小孩子买了5套漂亮衣服。

1984年，土木公司职工刘助友病故，农村来的妻子刘爱云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被丢在城市的角落，靠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维持生计。从那时起，陈超英不声不响地照顾着她的生意，时常抱来一堆旗帜、横幅请她加工，就连刘爱云住的地方，“都是陈主席帮忙租的”。

1999年春节前，长沙市慈善总会送来100多份大米、食用油慰问下岗职工。可是，当时土木公司的下岗职工有200多人。看着大家为难的样子，陈超英眼圈红了：“我保证，有工会在，你们都能过好年。”经过她的紧急“化缘”，第二天，每个人都分到了一袋米和一瓶油。

盖“农民工公寓”，办农民工夜校，组建农民工工会联合会，春节前后到农民工输出地送温

暖……土木公司的农民工们觉得自己有了温暖的家，亲热地把陈超英叫做“陈姐”。

听到陈超英离世的消息，48岁的农民工周祥明悲痛欲绝。就在上个月，陈超英刚把他列为帮扶对象，带头捐款募集了6万多元。按照这位“大姐主席”的帮扶计划，6月14日——陈超英殉职的第二天，她将要带“队伍”去周祥明家开工修房，帮他的孩子重新入学。

“一个人要对一两个人好并不难，难的是对所有人都那么好。”在土木公司职工心里，陈超英就是最有爱心的“天使”。

担任工会主席的8年时间里，陈超英有一半时间在外边奔波。从2011年年初到殉职那天，一共164个日夜，她在外地工作的时间竟有89天。一张婆婆的嘴，一颗妈妈的心，一双跑不累的腿，她就像一位“邻家大婶”出现在职工眼前，把“工会主席”和“温暖”连在一起。

同样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还有江苏省仪征市总工会主席陈小星。就像“大姐主席”一样，在陈小星病逝9年以后，仪征的职工们依然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许下“永远做职工知心兄长”的诺言。

作为副手，仪征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光清知道，陈小星是被忙碌的工作“累死的”。

“2009年10月18日20时45分，发热伴咳嗽……”陈小星的病历本上，清楚地记录着他这一次到医院看病的记录。

此前，感冒多日的陈小星一直在带病工作。10月18日是星期天，他结束加班后走进医院，39.5摄氏度的体温让护士惊讶地叫出声来。

19日，陈小星一早骑车离开了家门。20日，陈小星走进市政府大院。21日，陈小星出现在妇代会现场。22日，陈小星主持会议。23日晚上，陈小星终于倒下了，被送进医院。

一切都晚了！11月12日，陈小星悄然离开了人世。

曾经相识的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聚集到陈小星家中：“你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走了呢？！”

在工会主席岗位上的两年，陈小星把闲置的舞厅改造成了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爱心超市”成了特困职工家庭的温暖港湾。生活困难的劳模，得到了工会送来的特殊津贴。

在陈小星简朴的办公室，看不到任何奖杯和奖状。他用淡泊名利的一生，践行着自己常说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追求。

真诚与善良，这是陈超英、陈小星留给工会会员们最温馨的记忆。总是想着职工，总是被职工想起，深情和友爱互相感染，搭建起连接心与心的桥梁。

英雄的一生，充满了惊天动地的故事，留下豪言壮语，任由后人缅怀传说。

平凡者的一生，更像是苍茫草地深处的一朵小花，静静生长，淡淡开放。

力量

“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自己。”这是徐梅的微信签名，再也没有办法更换了。

其实，即便还有机会，徐梅也不会换下这句话。和千千万万奔走在服务职工第一线的工会干部一样，她的人生已经和工会的天职牢牢牵系在一起。

2019年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李斌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去世。

在北京，“李斌走了”的消息当天下午由《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播报出来，悲伤怀念的留言迅速涌向后台。

“去年8月第一次听到李斌老师得了严重的病，忍不住落泪。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泪崩。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声音柔和，却一直坚定而执着地为提升技术工人地位、提高技术工人待遇而奔走呐喊。”

“每年都是全国两会时在北京见他，聊的都是建言献策的事儿。他说的不多，会聊他去德国参观学习，希望把培养技术工人的模式搬到中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他站在机床前的模样。去年两会见面后还送他回驻地，今年两会马上要开了。”

.....

在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李斌是液压泵厂的数控工段长。全国劳模和大国工匠的双重身份，让他成为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的不二人选。

2014年7月21日，在上海市总工会第十三届四次全委员（扩大）会议上，李斌当选兼职副主席。

从那时起，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市总办公大楼，为劳动者权益发出更多的鼓与呼。

谦和的姿态，永远牵挂着劳动者的未来，李斌始终这样保持着工人的本色。每年全国人大会议的小组审议现场，他发言时的开场白，第一句都是“我是一个工人”。他曾这样说过，“我这辈子最大的志向，就是当好一名工人”。

李斌是100万元都不换的技术工人，是企业在技术谈判时的“王炸”。然而，在他的心里，始终牵挂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只要能有机会发声，就是要为产业工人群体代言。

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人大会议分组审议，李斌被安排在第二个发言。8分钟的发言里，他引用了“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的数据，满座震惊。

李斌后来说：“我发言时，总书记用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新华网的报道则显示，习近平当场表示，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5个月后，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开始牵头相关部委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有评论称，“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由此变得更加光明”。

从李斌确诊患病的那一天起，关爱和牵挂便



李斌与同事在一起

从陈超英到李斌,这些工会干部的故事历久弥新。给予身边每一个人最多的温暖,让自己的生命融入更多的生命,平凡者同样可以赢得英雄一般的怀念和敬仰。平凡者的史诗,同样可以感动天地。

从四面八方涌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专门派人前往上海探望,联系组织最好的医学专家研讨医疗方案,华山医院、伽玛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进行全力救治。

病重期间,李斌仍然念念不忘工匠馆的筹建,乐观地表示还要继续去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为技术工人发声”。

李斌去世的第二天,举办“上海劳模风采展”的展馆成为悲伤与怀念的海洋。上海市总工会的职工自发来到展馆,献上一朵又一朵黄色康乃馨,叠上一只又一只千纸鹤。

大大的展板上,李斌一身蓝色的工装,平和地微笑着,目光真挚温暖。他的那句“做工人要做一个好工人”的格言,让每一个前来瞻仰的人肃然起敬。

2月25日,李斌的追悼会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慰问哀悼和敬献花圈,1500多名生前亲友和职工群众到现场送别。“平凡中包孕伟大,朴实间天成不朽”的挽联,痛心、扼腕、悲伤、不舍的泪水,就是人们对这位上海千万产业工人的代言人、优秀工会工作者的最高评价。

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土一如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李斌走了,陈超英走了,徐梅走了,余剑走了,林维勇走了,郭起森走了,陈小星走了……但是,他们把最珍贵的人生品质留了下来。他们在工会岗位上奉献到最后一刻的故事,诠释着有一种善良叫“操劳”,有一种牺牲叫“坚守”,有一种力量叫“温馨”。他们把生命融入为职工服务的行动,回答了这样一道人生的考题——一个人的灵魂究竟能走多远?

直到今天,中建五局土木公司的档案柜里,依然珍藏着陈超英个人借出的18张收条和借据。

这些收条中,有6张是同一位职工遗属写的,有的2000元,有的3500元,加起来超过1.7万元。然而,公司的人们都知道,没有写下借据的,要比写了借据的多得多。

在陈超英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工友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她的墓前,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早早站在那里,三炷清香青烟缭绕,一堆纸钱化作灰烬。这是从山东赶到长沙的一位退休职工,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怀念帮助过自己的“大姐主席”。

直到今天,陈超英的名字依然牢牢驻留在工友们的心中。2018年6月13日,陈超英的第七个“祭日”,土木公司遍布全国各地的工地,依然是怀念的海洋。

在长沙,学习“超英”精神再起高潮;在张家界,大家集体观看《身边的感动》;在益阳,年轻员工夜读《大姐书记陈超英》,重温这位工会主席的故事;在南宁,纪录片《陈超英》再一次催下感动的泪水……暗夜里摆成“7”字形状的根本蜡烛,把人们的思念随着烛光缓缓融入天空。

从陈超英到李斌,这些工会干部的故事历久弥新。给予身边每一个人最多的温暖,让自己的生命融入更多的生命,平凡者同样可以赢得英雄一般的怀念和敬仰。平凡者的史诗,同样可以感动天地。

又一个清明到来。

而这,不是清明的时节祭奠,这是爱与温暖留在时间长河里的记忆涟漪,平和到没有浪花,却有着在人们心底掀起巨澜的力量。

假如有来生,陈超英还会是那位善良温暖的“大姐主席”,李斌还会是那位情系技术工人的“知心兄长”,徐梅、余剑、林维勇、郭起森、陈小星还会是深爱职工群众的工会干部。

不同的是,我们一定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与疼爱,珍惜和他们相濡以沫的分分秒秒。

阅读 点亮世界

全国职工读书活动重回鼎盛时代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上海市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深受职工欢迎。图为1983年，企业组织智力竞赛，提高职工的读书兴趣 上海画报-IC PHOTO

2019 年4月23日，第24个“世界读书日”。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南侧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这一天成为书香洋溢的海洋。

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和阎京华、李晓钟、魏地春、巨晓林等全总领导同志，共同用洁白的盐注满职工书屋的标识容器，正式启动第三届“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全国工会职工书屋主题阅读交流活动。

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罗昭强、梁晓声、萨日娜、雷海为……11位各界知名人士志愿为全国职工阅读活动公益代言，向全国职工推荐《习近平在正定》等11部经典好书。

在这场由全国60多家工会新媒体同步网络直播的仪式上，全国职工阅读交流活动“六个一”行动计划发布——联合1000个职工读书组织，动员1万个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带动10万个各级工会自建职工书屋，全年开展100万场形式多样的阅读学习活动，吸引1000万名职工现场参与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宣传覆盖影响1亿职工。

智慧改变人生，阅读点亮世界。

顺应全民阅读的时代浪潮，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辉煌一时的全国职工读书活动，如今又一次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亿万职工思想引领和素质提升的知识平台。

80年代：曾有诗书育新人

结束十年动乱，干涸已久的文化沙漠开始泛出嫩绿的希望之芽。

在上海工人作家管新生的记忆里，40年前开始的那一次上海职工读书浪潮恍如昨日。

1979年，上海举办图书夜市，4天接待读者1.2万人次，销售图书5万多册。在排队购书的长龙里，普通工人占据了相当比例。

“虽然条件简陋，像个大卖场，但整个社会都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图书资源紧缺。”管新生说，高考恢复以后，许多职工复习功课参加考试。幸运儿实现了大学梦，落榜者还是要继续学习，

上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席卷全国,参加有组织读书活动的职工达到1350万人,读书小组、知识竞赛、演讲团、书评小组及个人自学等学习形式多样纷呈。

通过读书自学成才,进而带动成千上万的普通职工成为读书积极分子。

1982年3月,上海市总工会、解放日报社、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出版局共同酝酿组织读书活动。两个月后,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市总工会牵头发起的读书活动反响强烈,20余万名职工踊跃参加,1万多个读书小组建立起来,利用晚上或厂休日捧起书本。

这是时代的呼唤。绝大多数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特别是年轻工人,没有为了一张文凭的功利目的,也没有为了摆脱生产一线的换岗诉求,有的只是对知识的向往,甚至只是对曾经荒废时光不读书的日子的反叛,用阅读来灌溉滋润自己荒芜已久的心田。

在上海各级工会的主导组织下,职工读书活动成为上海职工踊跃投入、自我教育的全新平台。在官方推荐的阅读书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占据了相当比例,《高山下的花环》等一批具有爱国情怀的文艺作品和修养读物更受到职工欢迎。

读书,明理,求知,成才,奉献。发轫于上海的群众性业余读书活动,一直得到各级工会组织的高度关注,并且迅速点燃了全国职工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学习热情。

1983年4月21日至24日,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经验交流会,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16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上海经验”获得积极评价。

随后,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报告团应邀赴京,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并听取汇报。

5月21日,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决定》。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报告》。批复明确指出:“上海工人首倡并正在向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展开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是群众自觉进行自我教育,掌握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好方法,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形式。”

由此开始,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席卷全国,参加有组织读书活动的职工达到1350万人,读书小组、知识竞赛、演讲团、书评小组及个人自学等学习形式多样纷呈。

就在全总做出《关于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决定》的第二天,北京市总工会牵头发出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倡议。短短一年间,45万名北京职工参加读书活动,知识竞赛组委会收到近20万份答卷,6万多名职工在不同场合进行读书演讲。

北京工会组织开展的读书活动,是全国各地工会倡导职工“多读书、读好书”的生动缩影。1983年和1984年连续举办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则将全国职工读书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1983年8月2日,《工人日报》公布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推荐书目,同时刊发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为这次知识竞赛撰写的文章《发奋读书,振兴中华》。从9月2日公布试题到10月2日截止收卷,来自全国各地的102万份答卷堆成一座“小山”。

这一年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武汉5714厂女工王素华获得第一名。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发布命令,授予她“振兴中华刻苦读书标兵”的光荣称号,号召空军全体同志学习她刻苦读书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

在首次知识竞赛获得成功的基础上,1984年

2006年,我国第一家工会职工书屋在河南内黄县正式落成。很快,全县相继组建100家职工书屋,藏书总量超过56万册,内黄职工可在任何一家职工书屋借阅图书。

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规模更大,影响更广。这次竞赛由全总宣教部、工人日报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共同领导,周培源、于光远、钱伟长、胡绳、王力、白寿彝、姜椿芳、唐弢等8位学者担任顾问。

引人注意的是,这一次被列入知识竞赛推荐书目的15本图书,既有《邓小平文选》和《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也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纵横谈》《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些图书依然具有足够的阅读深度。

经过各级工会组织的强力发动,全国有800多万名职工参加了知识竞赛活动。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颁奖大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到会祝贺。60名特别优秀奖获得者除了获得荣誉证书外,还分别获得一台收录机。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改变着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在获得1984年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第一名后,湖南长沙医用设备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伍蔚滇好事连连,不仅被长沙市医药公司记大功一次,晋升两级工资,还被湖南省总工会授予“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标兵”称号,更当选为长沙市总工会副主席,又被调动担任长沙市老干部局局长。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的第一次高潮,直接带动了千百万职工走上自学成才的发展之路。1985年2月,全国总工会颁布《职工自学成才奖励暂行条例》,为职工读书活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从中培养出的众多优秀劳动者成为企业发展的栋梁之才。

职工书屋: 且让知识护净土

让更多的职工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一直是

工会组织的良好愿望。

1997年1月,全国总工会等九部委发出通知,提出在全国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

2002年,全国总工会启动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号召广大职工读书成才、知识报国。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经济效益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一部分企业经营者急功近利,不愿为职工读书活动投入时间和资金,原有的企业图书馆逐渐停摆,职工文化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与此同时,面临网络、影视和其他休闲方式的冲击,公共图书馆门可罗雀,新华书店的图书销量大幅下滑,读书功利化和读书无用论日益侵蚀着青年职工的思想。除了应对考试的教材教辅,有限的书单大多被庸俗小说、厚黑成功学和所谓人生指南所占据。

目睹这一切,河南省内黄县总工会主席邵敬春忧心忡忡。摆在她面前的内黄县职工状况调查情况,清晰地显示着缺少职工读书活动的严重后果。

这是2006年的调查结论——内黄县职工队伍“三低三多”,即职工文化水平低、技术水平低、整体素质低,喝酒的多、打牌的多、混日子的多;“一少两难”,即职工学习平台少,职工读书难、学习难。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阅览室里,充斥着假书、伪书和内容不健康的书刊。

2006年8月,邵敬春赶到北京向全国总工会求援。中国工人出版社决定,在内黄县总工会建设工会职工书屋,赞助4万册图书,其余部分图书让利销售。

3个月后,我国第一家工会职工书屋在河南内黄县正式落成。新建的书屋窗明几净,藏书种类涉及社科、文艺、经管、励志、时尚、休闲、少儿、美



2006年，全国第一家职工书屋在河南内黄县落成

术等门类。很快，全县相继组建100家职工书屋，藏书总量超过56万册，内黄职工可在任何一家职工书屋借阅图书。

邵敬春和内黄县总工会的大胆尝试，无意中打开了一扇惠及亿万职工阅读服务的大门。

2007年4月，全总宣教部提出在全国建设工会职工书屋的具体方案和实施办法。时任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作出重要批示：“此项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要深入细致研究，精心筹划安排；要办就办好，办成品牌，不作权宜之计。”

5月，全总宣教部召集八省市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进京研讨，职工书屋建设工作方案受到普遍赞同。随后，分管宣教工作的全总领导带队前往内黄县专题调研，进一步明确了开展职工书屋建设的基本思路。

11月，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从2008年至2010年，全国总工会连续三年每年投入专项资金2000万元，重点援建3000个职工书屋示范点。各省、市（地）、县（区）三级工会按照与全总出资规模1:1的比例筹措资金，支持基层单位职工书屋建设。

2008年1月3日，全总机关大楼，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在举行。孙春兰

同志为职工书屋揭牌，标志着由全国总工会主导推动的这项职工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工会组织将在职工身边打造一方阅读知识的净土。

这年夏天，100多万册、总价值3200余万元的图书从北京发出，1000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在各地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正围绕职工书屋蓬勃开展。职工群众骄傲地说，“又有了属于咱们的学习站和活动站”。

至此，曾经低迷的职工读书活动触底反弹。在全国总工会10年建设超过1万家示范性职工书屋的带动下，各地工会相继投资建设不同规模的职工书屋达10万家，覆盖6000余万职工和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一线职工、农民工阅读学习条件不足、读书难、读书贵等问题。

依托职工书屋，一些企业开展“读书提素质”评选、“学习型家庭”评选、“优秀读书笔记”评选，成立职工知识大讲堂和职工文学社，推进职工素质提升工程。许多职工书屋不再仅仅是读书的场所，还是企业开展文化活动和职工泼墨挥毫、吟诗作赋的港湾。

重回鼎盛：正是阅读好时光

阅读是最基本的国民文化权利，也是最为普遍的文化需求。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会快速增长。这意味在中国人均GDP超过7800美元以后，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必然进入一个旺盛的时期。

今天，全民阅读活动渐成风尚。这一活动最初的五年里，成年人图书阅读率由52.3%增长到58.0%，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由4.25本增长到4.56本。在广州，13家国家一级图书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总藏书量达1871.14万册。读书，让一座城市的人们慢下来、静下来，书香的因子已经融入市民的生活方式之中。

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成为工会组织的重要任务。

《中国工人》记者获悉，继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先后3次提到职工书屋以后，此次集体谈话亦有提及职工书屋，明确要求发挥好职工书屋的

宣传阵地作用。

2019年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到中国工人出版社调研，充分肯定了职工书屋建设取得的成绩，并对打造职工书屋品牌、更好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伴随着职工书屋建设进入第11个年头，适应数字化阅读趋势的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已经全面建成。它集阅读网站、APP、微信端、数字一体机等多种软硬件终端于一体，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特色阅读资源动态更新，广大职工开始享受“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的工会文化服务，迄今已覆盖职工700余万人。

同样令人欣喜的是，职工书屋正在与职工服务中心、职工之家（职工小家）、劳模创新工作室、农民工服务站等工作阵地相结合，融合读书、学习、培训、休息、用餐、交流、沙龙、业务洽谈等多种功能，逐渐开始面向职工家属以及社区居民开放，增强了职工归属感，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形象。

让阅读成为职工的福利和企业文化的港湾，这是职工书屋在新时代的自我定位。

无论是车间休息室、宿舍区还是餐厅食堂，无论是班组书架、读书角、流动图书室还是图书漂流箱，曾经参与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老职工们惊喜地发现，当年那种感染千百万劳动者的读书氛围，正在悄悄回到自己的身边。

从经典诵读、文化沙龙、道德讲堂到读书论坛，从好书分享会、诗词创作大赛、知识竞赛到读书征文，从读书俱乐部、书香班组、读书兴趣小组到网上阅读交流群，依托职工书屋蓬勃开展的阅读活动，日益彰显特有的文化魅力，激活着千百万劳动者干事创业的热情。

2019年4月24日，中铁十六局北京城市副中心管廊项目部工地上，“与共和国同行——全国职工主题阅读活动中国铁建专场”正在举行。

“书是一辈子的朋友，天下故事写在心头，书里藏着忘年交，隔着年代也握手……”伴随着象征书海无涯的水墨画在现场大屏幕上铺陈展开，夺得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的快递小哥雷海为，巨晓林新书《咱们为什么要入会》的责任编辑李素素，以及来自中国铁建的劳动模范、优秀农民工、书香家庭代表，共同感悟读书真谛，相



合肥市职工在书屋中阅读

互分享阅读体验，整个工地书香浓郁，书声琅琅，俨然成为文化和智慧的知识海洋。

以此为标志，中国工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70场职工主题阅读交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总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晓钟表示，70场职工主题阅读交流活动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带动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开展诵读、征文、演讲、讲座、沙龙、文化创作和知识竞赛，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

35年前，习仲勋同志曾经这样深切寄语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成千上万的职工参加读书活动，自觉地学政治，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互助互勉，来提高觉悟，丰富知识，增长才干，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35年后，全国职工读书活动重回鼎盛时代。不同的是，与上一次读书热潮相比，职工书屋让职工阅读更接地气。从乌苏里江畔到帕米尔高原，从内蒙古草原到五指山下，从首都北京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鹏城，数字化阅读更让千百万劳动者便捷享受读书带来的文化滋养。

今天，阅读点亮亿万职工的精神世界，劳动者的美好生活充满袅袅书香。

今天，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的黄金岁月，正在祖国大地徐徐展开魅力四射。📖

人的记忆需要锚点。
外人看来的艰苦时光，
他却自有一番精神世界
旁人无法体会，
只需要一首歌作为引线，
便可以瞬间唤醒、
筑牢日日在这震撼、
辽阔、愉悦中，
构建起的价值观世界观。

摘自 NO.6 2019《见山见水见人》



工会出版简史

1949—2019

与党同行
70年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1952年，全国总工会撤销了上海劳动出版社、中南工人出版社、东北工人出版社，将三个出版社的骨干人员调到北京，以加强初建的工人出版社。这是上海劳动出版社部分人员，离沪前留影

——套分为上下两卷的厚重回忆录，静静地摆放在人们面前。70年的坎坷与荣耀，浓缩在每一个重新被打开的历史细节。

作为中国工人出版社建社70周年纪念文集，这部回忆录的书名最终被确定为《走向辉煌》。它所记录的充满沧桑和变革的岁月之痕，正是工会出版事业与党同行70年的发展之路。

致敬历史，拥抱未来。

今天，充满朝气活力的工会出版人站在新的起点，为亿万职工提供全方位文化服务的美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创建沧桑

1949年1月31日，北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1师队列整齐，从西直门进入城区。工人、学生高举五颜六色的小旗，高呼着欢迎口号。

两个月后，西苑机场。500发照明弹高挂空中，毛泽东身穿棉大衣，头戴解放帽，站立在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缓缓穿过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队列。

从进城到阅兵，象征着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这一年7月15日，前身为《大众日报》的《工人日报》在北平创刊。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日子最终会同样成为中国工会出版史上的“原点”。

其时，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发表15天。这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重

刚刚创建的工人出版社,赵树理成为首任社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这家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本书便是赵树理的《天下工人是一家》。

要文稿,论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

正是在这篇文稿里,毛泽东显示出夺取政权后的清醒和理智。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在地学。”

依仗报社具有的编辑、排字、印刷条件,《论人民民主专政》被印成了书籍,自然洛阳纸贵。这直接催生了工人出版社的创建,并且把创建时间同样确定在1949年7月15日。

这一年,赵树理43岁,刚刚从天津来到北平。这位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的革命作家,因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两篇小说,声名响亮。

刚刚创建的工人出版社,赵树理成为首任社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这家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本书便是赵树理的《天下工人是一家》。

这一年,姚汝勤刚刚15岁,在东单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参加工作。70年后的今天,这位离休老人身体康健,思维敏捷,住在已经加上“中国”两个字的出版社大楼对面,继续关注着工会出版事业的发展。

在姚汝勤老人心里,往事就是自己“心中的一泓甘泉”。他在《走向辉煌》中回忆说,他刚一到出版社,首长便找他谈话,告诉他扫地也是革命工作,他就这样当上了一名革命的勤务员。直到1950年8月,他被调到出版社门市部去当见习生。

门市部是一座米黄色的二层街面楼,坐落在东单北大街路西。每天早晨,姚汝勤要把书架上的书码放整齐。他回忆,当年书架上主要是马列著作、斯大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也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及识字课本,还有不少苏联的文艺作品和思想教育丛书。

这个火热的年代,工会出版事业甫一起步,便

成为影响成千上万劳动大众的“知识明灯”。

1951年初,工人出版社正式建制,组织编辑队伍,独立经营,成为全国总工会主管的司局级事业单位。随后,全国总工会撤销了上海劳动出版社(上海市总工会主办)、东北工人出版社(东北总工会主办)和中南工人出版社(中南总工会主办),抽调编辑人员、管理干部进京,集中力量办好工人出版社。

接到停办命令的时候,中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半年左右,分成编辑和出版两大部门。依照负责人胡甫臣的回忆,他们选了几位中南地区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剪刀加浆糊,把报刊上的通讯报道汇编在一起,就成了一本可以尽快出版的书。

停办以后,胡甫臣带领十来人的队伍来到北京。“到中央一级大出版社的魅力”,让大家克服了“北方好冷好冷”的胆怯。

接着,上海劳动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也来到工人出版社,受到接替赵树理担任社长的陈用文的热烈欢迎。

胡甫臣一直记得,前门外便宜坊烤鸭店的全鸭席也是“欢迎项目”——先是参观焖炉怎样烤鸭,再看服务员怎样片鸭,然后便是品尝鸭肝、鸭舌、鸭四宝。同样让他一直记得的还有工人出版社的两栋三层新楼,在当时的老北京城里十分引人注目。

尽管刚刚创办,工人出版社已经在北新桥骆驼胡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印刷厂。《走向辉煌》记述称,“工厂里有严格的纪律,干活儿有定额,货量有标准,考工有级别”。胡甫臣所说的两栋新楼,东楼是编辑部,西楼则是印刷车间和装订车间,甚至添置了彩色胶印设备。

从合唱团到京剧团,从打篮球到练双杠,工人出版社的员工业余生活“健康精彩”。姚汝勤回忆说:“这样一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在党的关怀

工人出版社老员工周道非回忆,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中国工人》,全国总工会甚至停办了同样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学文化》杂志和《工人》半月刊。

下渐渐地成长起来。”

工会出版事业的漫漫长路,就这样悄然奠基。

初心使命

从工人出版社成立的第一天起,“工人”就是工会出版念念不忘的“根”。

1950年2月,全国总工会决定《中国工人》杂志复刊,并交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同时,以中、俄、英三种文字出版发行彩色印制的《中国工人画刊》,介绍中国工人的政治、生产、学习和生活。直到今天,这种规模的以工人为主题的对外宣传,再未出现。

事实上,这已经是《中国工人》的第四次启动出版。革命斗争时期的艰难困苦,让这份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历经坎坷,注满了红色基因。

1924年10月,《中国工人》创刊,没有发刊词,甚至没有主办者的粗略描述。第1期杂志共36页,定价铜元4枚。按照当时的物价,4枚铜元可以买1斤青菜。

从第1期开始,《中国工人》的撰稿人就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工运领袖,包括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刘少奇、瞿秋白、项英、林伟民和李立三。

出版5期后,《中国工人》失去了消息。直到1928年12月复刊时,这份杂志把自己定位为“全中国工人的灯塔”,并新设“镰刀与铁锤”栏目,记述各地工人生活、工运动态。

这一次,《中国工人》连续出版了8期。最后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征求编辑工人读物文稿的启事,包括征集工人补习学校课本和工人教育小丛书。

11年后——1940年2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在延安第二次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并亲自撰写发刊词。

1941年3月,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国工人》在延安停刊。但是,这篇《〈中国工人〉发刊词》最终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文献。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工人》杂志设立了时事政治、思想修养、文艺和群众工作四个组和一个办公室,共约50人。工人出版社老员工周道非回忆,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中国工人》,全国总工会甚至停办了同样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学文化》杂志和《工人》半月刊。

地方工会出版机构停办和《中国工人》杂志复刊以后,工人出版社成为工会出版的唯一重镇,编译出版有关工人运动、工会工作、工运历史、劳动经济、人物传记、工人文艺、工人画报等书籍,每年出书150多种。

今年已经90多岁的胡甫臣老人,当时在出版工会读物的第一编辑室。年轻编辑冲劲十足,写信联络苏联工会出版社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请



1950年《中国工人》复刊



《把一切献给党》封面(1953年版)



吴运铎与工人出版社职工合影



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采访赵一曼的姐姐

求尽早提供选题计划和样书，以便尽快翻译出版。得知苏联出版过《马恩列斯论工会》，工人出版社也选编起来，找到全国总工会翻译组帮助翻译，再去请马恩列斯编译局帮助校核，出版后受到工会干部的欢迎。

让工人出版社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还有吴运铎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的出版。

邓颖超曾经这样说：“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有谁没有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红岩》等书中汲取过力量源泉，找到人生的路标？”

能够与这两本经典红色图书相提并论，足见《把一切献给党》分量之重。在曾经担任过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赵长安看来，它的出版过程，凝结着老一辈工会出版人的心血。

4次负重伤，身上有200多处炸伤，4根手指被炸断，左眼被炸瞎，一条腿被炸断，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他的巡回报告感动了每一位听众。

时任全总主席赖若愚找到吴运铎，要他把自已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吴运铎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五年级，不知道写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写。于是，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成了这位特殊作者的影子，甚至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教他如何回忆，哪些要重点多写。

从白天到夜晚，吴运铎写完一页，何家栋就修改一页。慢慢地，吴运铎有些入门了。他后来回忆说：“我幸运地遇上了何家栋这位呕心沥血的编辑。”

只有6.8万字的《把一切献给党》出版后，在中华大地产生了巨大冲击波，震撼着千千万万读

者的灵魂。根据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史料记载，这部自传体小说累计发行超过700万册，被译成俄文、乌克兰文、蒙古文、朝鲜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出版。

将近30年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2年再次播出《把一切献给党》，当年读过此书的老读者激动不已，奔走相告。更多的年轻工人给吴运铎写信，表达自己虔诚的崇敬。1983年3月，张海迪第一次见到吴运铎，请求老人能够送一本《把一切献给党》，因为自己就是把它作为精神支柱“才活到今天”。

整个上世纪50年代的工会出版，充满活力与激情。工人出版社的革命回忆录轰动社会，除《把一切献给党》外，《我的一家》发行441.95万册，《狱中纪实》发行215.85万册，《老共青团员》发行137.93万册。《中国工人运动文献汇编》和《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的出版，更为中国工会保留了工人运动的珍贵史料。

思想飞扬

1959年，宋庆龄为《中国工人》撰写文章，题为《马列主义的胜利万岁》。同一年，工人出版社推出了夏衍的著名作品《包身工》。

然而，众所周知的政治时局风云变幻，让工会出版陷入坎坷。

1961年，《中国工人》停刊。工人出版社对外保留牌子，没有出版新书。

1962年，工人出版社组织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写完第五稿。依照《中国工人出版社大



1983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工人出版社恢复建制，从《工人日报》独立出来，这是恢复建制时，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胡甫臣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事记》的记录，当年夏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诬蔑《刘志丹》是“替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耸人听闻地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1966年年底，在《工人日报》被造反派查封的同时，工人出版社也停止运行，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

工会出版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当拨乱反正的改革春天到来之时，工人出版社重新迎来了自己的生机。

1978年10月6日，《工人日报》复刊，工人出版社作为报社的出版部同时恢复。

随着工会出版再入发展航道，小说《刘志丹》的命运引人关注。在中共中央批复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以后，全国总工会召开平反大会，胡耀邦审定了报道稿件的内容。全总党组决定，为因《刘志丹》小说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档案中存有的有关结论、个人检查等材料一律

撤回销毁，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更多的发展机遇接踵而来。

1983年7月，胡乔木致信郝建秀和倪志福，提出“团中央能把中国青年出版社办好，何以全总竟不能把工人出版社同样办好呢？”他要求工人出版社必须大大加强，充实人力，立即“完全独立出来（包括党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成为工人出版社恢复建制后的第一年。当年年底，再版的《中国工人阶级》（原名《本色·传统·使命》）累计发行580万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发行370万册，《中国近代史》发行190万册。

工人出版社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便是1987年夏天出版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至少整整5年时间，杨沫之子马波（老鬼）四处奔走，寻求出版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八年》。这部45万字的书稿在各个出版社和文学刊物间辗转流传，皆被拒绝。当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面对职工群众发展变化形成的新需求，工会出版必须顺应时代，确立自己新的目标和方位。

上门讨要书稿时，老鬼几乎是抱着绝望的心态与他见面。

30年后，岳建一这样回忆自己当年读罢《八年》的感受——“已难言清，只记得被震撼得昏天黑地”。最终，书名确定为《血色黄昏》。

1987年6月的一天，岳建一骑着自行车去找老鬼，送去20册样书。俩人在长安街边碰面时，华灯已经亮起。老鬼翻看《血色黄昏》，激动到语无伦次，把岳建一紧紧抱住。随后，《血色黄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工人出版社连续7次印刷，达40余万册。

开放的大门打开了，工人出版社成为现代文化思潮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者。从《美国人谈生活艺术》到《中西500年比较》，从《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艺术哲学译丛》到《生命哲学译丛》，这些书籍都深深影响着一代读者。《编辑人的世界》引进以后，成为中国出版业与世界出版理念接轨的“教科书”。

与此同时，面向亿万职工群众的思想引领需求，政治理论读物成为工会出版的重中之重。

1993年1月，《中国工人》杂志再度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之题词：“坚持党的基础路线，为职工群众服务。”

一年以后，《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进入出版程序。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批复要求，“认真审核书稿，做好编辑出版工作，保证出书质量”。

此时，工人出版社已经改名为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在筹划建造自己的综合业务楼，规划总建筑面积8724平方米。在丢掉了闹市中心的办公楼和印刷厂之后，工会出版的阵地建设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截止到1998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先后组织出版了《邓小平同志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邓小平治国艺术》《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邓小平工人阶级与工会思想研究》和《邓小平

理论研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光辉的旗帜，行动的指南——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职工读本》的出版，更为出版社首次摘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改革时间

12年前，吕厚燕成为重大选题《中国工会读本》的责任编辑。这本以图文形态呈现出的中国工会历史图书，试图绘制中国工运史的壮阔画卷，打造成为工会图书的扛鼎之作。

从2007年到2008年，吕厚燕“恶补”工会知识，走访各地工人运动纪念馆，遍访工运史专家学者。在她的工作电脑里，“工会读本”的文件夹存入了上千个文件，总量将近50G，编辑笔记亦有几万字。为了确保出版进度，她甚至错过了陪着女儿观看北京奥运篮球决赛。

作为中国工会十五大的献礼出版物，《中国工会读本》正式出版。5000余幅老照片里遴选出的645幅图片，让这部厚重的中国工会历史图书真实记载了岁月的沧桑。

2014年，吕厚燕病逝，享年43岁。在她的遗物中，还有那张北京奥运篮球决赛的入场券。一代又一代工会出版工作者，就是这样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从举办“中国劳模——时代领跑者”大型摄影展到为汶川地震灾区赠送防疫减灾读本，从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指定教材丛书（45本）到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系列教材（20本），工会出版围绕工会工作大局精准发力，受到各级工会组织的良好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面对职工群众发展变化形成的新需求，工会出版必须顺应时代，确立自己新的目标和方位。

2008年1月3日，全总机关大楼，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在举行。时任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同志为职工书

屋揭牌,标志着由全国总工会主导推动的这项职工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工会组织将在职工身边打造一方阅读知识的净土。

这年夏天,100多万册、总价值3200余万元的图书从北京发出,1000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在各地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正围绕职工书屋蓬勃开展。职工群众骄傲地说,“又有了属于咱们的学习站和活动站”。

至此,曾经低迷的职工读书活动触底反弹。在全国总工会10年建设超过1万家示范性职工书屋的带动下,各地工会相继投资建设不同规模的职工书屋达10万家,覆盖6000余万职工和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一线职工、农民工阅读学习条件不足、读书难、读书贵等问题。

2019年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到中国工人出版社调研,充分肯定了职工书屋建设取得的成绩,并对打造职工书屋品牌、更好地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以职工书屋建设快速推进为标志,注入新动能之后的工会出版事业呈现勃勃生机。

2019年2月,新一年度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公布,中国工人出版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职工状况丛书》和《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研究丛书》双双入选。

从2015年起,《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丛书》(18种)、《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20种)、《大国工匠工作法丛书》(6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丛书》(7种)和《转型闯关》相继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形成高水平文化方阵。

今天,以图书出版为主体,以职工书屋和《中国工人》杂志为两翼,中国工人出版社的“一体两翼”发展布局已经形成。《走向辉煌》里描绘的工会出版蓝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正在加快建设。它将集阅读网站、APP、微信端、数字一体机等多种软硬件终端于一体,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特色阅读资源动态更新,越来越多的职工开始享受“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的工会文化服务。

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正在加快建设。它将充分利用工会出版的知识资源和作者资源,推进



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中国工人出版社展台为读者带来一场知识盛宴

工匠精神传播和工匠技能传授,构建集在线教育和技能课程开发、协作式学习社区于一体的交流平台,为产业工人提供“线上+线下双向链接”的智慧学习空间。

全国工会网上练兵平台正在加快建设。它将把海量的工会工作知识、流程和方法进行题库化,通过游戏闯关、仿真模拟、网上比武等形式,搭建起工会工作者储备知识、提升技能的“指尖竞技场”。海量工会图书资源,就是海量题库的重要支撑。

中国工会数字资源总库正在加快建设。它将自主研发大国工匠工作法视频课程,加工制作工会知识有声资源体系,组织录制职工思想引领“微课堂”,进而整合工会和企业制作生产的数字资源,探索共建共享,努力打造最大的工会数字资源图书馆。

70年前,草创而生。

70年后,根深叶茂。

今天,工会出版事业正以全新的面貌,以文为魂,点亮亿万职工的精神世界,让亿万职工的美好生活充满知识书香。

今天,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深情嘱托和殷切期望,努力用更优质的图书文化产品,在担当作为中做出工会出版工作的新贡献。

时间都知道，
初心永远在那里，
使命永远在那里，
信仰的灯塔永远在那里。

摘自 NO.7 2019《时间都知道》





新中国 班组简史

1949—2019: 当历史撞见未来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世纪60年代末，马恒昌小组根据管理工作实践，提出了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的新思路，开创了我国班组建设之路

1949年4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155天。解放半年的沈阳城，依然还有国民党军机的骚扰轰炸。

这一天，刚刚赢得的一面“生产竞赛模范班”红旗，让39岁的马恒昌和工友们骄傲自豪。沈阳第五机器厂（现中捷友谊公司）的这个小组，正在用完成一批批军工生产任务，实践着马恒昌“带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言。

18个月后，五星红旗早已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正在出席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马恒昌，应邀来到国庆招待会现场。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将马恒昌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与马恒昌热情握手，举杯示意，声音洪亮：“为了工人阶级幸福干杯！”

正是这一次来到中南海怀仁堂，马恒昌小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小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班组。

以马恒昌小组为标志，蓬勃兴起的班组建设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生产一线，掀开了新中国班组辉煌发展的浩瀚篇章。

1949

历史选择

拉动共和国列车的火车头

结束连年战乱，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脆弱若蝉翼。但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绘就了充满想象的未来图景，千百万中国工人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以主人翁的姿态冲在经济生产的第一线。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刚回到沈阳的马恒昌，带领小组工友第一个报名，北迁齐齐哈尔建设新工厂。79天以后，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开工生产，弹头机、火帽机等军工设备源源产出。

就在马恒昌小组忙于北迁的时候，“毛泽东号”机车组正在李永的带领下鸣响汽笛，为祖国建设多拉快跑。背不靠座椅，眼不离前方，手不离

闸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铁路运输业，就这样有了新的精神标杆。

这是激情飞扬的年代。作为最具活力和凝聚力的企业“细胞”，成千上万个基层班组团结工人群众，“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超先进”蔚然成风。从工厂到矿山，从车间到巷道，从纺机到油井，先进班组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1951年1月，马恒昌小组向全国班组和工人兄弟发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迅即得到全国1.8万个班组300多万职工的热烈回应，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的班组和员工。这场围绕班组开展的劳动竞赛影响广泛，不仅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更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人代表团来华考察的“必修课”。

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带动全国各行各业班组频创佳绩。在炮火硝烟的朝鲜战场上，200多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士写信支持和响应“马恒昌小组运动”，有的甚至写了血书。

就在马恒昌小组和“毛泽东号”机车组为抗美援朝竭力奉献的时候，16岁的赵梦桃从河南来到陕西，筹建中的西北国棉一厂多了一位细心聪颖的学徒。没有人想到，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子，生命只有短短的28年。但是，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赵梦桃的名字能够成为新中国班组建设

历程的重要地标，在她离世56年后依然被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提起。

1952年5月，西北国棉一厂正式开工，赵梦桃当上了细纱挡车工。像马恒昌一样，她无时无刻不在和时间赛跑。别人一个巡回3至5分钟，她只用2分50秒。当她扛起班组长的责任，更是喊出了“不让一个姐妹掉队，不让周围有一个小组掉队”的誓言。

岁月沧桑，厂房变了，纺机变了，班组员工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但是，赵梦桃当年的这一句誓言，始终被历任班组长牢牢恪守，成为赵梦桃小组永远高擎的精神旗帜。

赵梦桃第一次站在纺机旁边的那一年，王进喜已经是玉门油田老皂庙钻探大队1205钻井队的队长。他做事勤快，特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远赴萨尔图，硬是凭借人拉肩扛，把沉重的钻机从车站运到井场，仅用4天时间，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井喷的危急关头，王进喜带头跳进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被房东大娘称为“铁人”。

彼时，中国面对天灾人祸正在苦苦支撑。大庆油田喷薄而出的石油，极大提振了共和国的经济底气。同时，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声名远播，成为上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班组榜样，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企业班组严格执行生产计划，运行体系以行政权力为中心自上而下。一个优秀班组的出现，往往直接带动整个行业企业众多班组的效仿和追随。

以马恒昌小组为例，他们第一个试行的班组成员民主管理分工，第一个组织的工人技术研究会倡导班组技术革新，第一个倡议开展的全国劳动竞赛，第一个制定和完善的班组管理制度，第一个实行的岗位责任制，都成为工业战线班组建设的领跑者。马恒昌小组的名字，也由此和“中国班组建设的摇篮”紧紧相连。

1963年春天，28岁的赵梦桃身患绝症住进医院。她劝退了赶来护理的姐妹，挣扎着自己洗脸



18世纪80年代

以机械化为主导，建立现代工厂，班组孕育产生

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程。蒸汽技术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班组进化的影响因素

技术要素

1. 蒸汽机的诞生，突破了人的动能极限，极大释放了生产力；
2. 单个手工艺人的生产演变成大型工厂的批量生产；
3. 珍妮纺纱机使大规模生产实现突破。

管理要素

1. 亚当斯提出了早期的劳动分工学说，孕育早期的班组；
2. 工厂和班组多停留在经验管理阶段；
3. 管理意识进入启蒙阶段，有意识地探索劳动力管理、薪酬和绩效管理。

“人”的认知

1. 工厂中的工人没有地位，与传统的奴隶管理方式类似；
2. 童工普遍存在于早期的工厂；
3. 工人的地位还不如机器的地位。

班组进化·班组1.0

倒水，帮助别的病人洗脚擦澡。护士劝她休息，她总是回答说“我能动，就要干”，直到青春的生命在初夏的日子凋零。

1970年国庆节刚过，47岁的王进喜病情急剧恶化。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一分钱也没有动。他说：“请把这些钱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

1985年5月，马恒昌第一次拒绝了组织决定，坚持离开北京友谊医院。他说：“花钱太多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啊！”两个月后，78岁的马恒昌在齐齐哈尔去世。临终时，他的眼角流出两颗热泪，没有遗言。

赵梦桃走了，她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却由赵梦桃小组代代传承。“铁人”走了，铁人精神的旗帜却留在了1205钻井队，在每一处钻井上高高飘扬。马恒昌走了，他的孙子马兵成为第18任马恒昌小组组长，接过了爷爷留下的那把千分尺，也接过了带好一支队伍的使命和担当。

从马恒昌小组、赵梦桃小组到1205钻井队，正是这些先进班组持久流传的力量，激励着更多的班组向榜样看齐，争当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彰显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本色，成为拉动共和国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1978

改革担当

聚合改变历史的劳动力量

十年内乱，亿万中国工人用自己的肩膀，撑住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大厦。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一个又一个优秀班组站在排头不让，把住红旗不放，用铁锤撞击出全国纪录，用钢钎搭建起沸腾人生。

冬天总会过去，春天悄然来临。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徐徐拉开帷幕，新中国班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0年，技校毕业生李斌进入上海液压泵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学一手好技术，当一个好



19世纪70年代

以电气化为主导，管理日益丰富，班组管理日趋规范

电的发明，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电气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生产更加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班组进化的影响因素

技术要素

技术发展推动形态更加多样，劳动分工更加明确，工作任务更加细化。

1. 西门子制成发电机；2. 内燃机的产生；3. 火车的出现；4. 电报的产生；5. 美国制造系统。

管理要素

丰富的管理理论为班组进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1.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则；2. 泰勒的科学管理；3. 韦伯的科层制管理体系；4. 甘特图的流程管理；5. 福特的流水线生产管理；6. 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7.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认知

1. 人事管理与工业心理学的发展，意识到要关注“人”的影响因素；2. 霍桑试验提出“社会人假设”，推翻了“经济人”的班组管理前提。

班组进化·班组2.0

工人”。

一年以后，30岁的包起帆亲眼看到3位工友死在上海港码头木材装卸作业现场，暗下决心要靠知识把工友的生命从“虎口”里夺回来。

再过3年，许振超成为青岛港第一批桥吊司机，他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立志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

时光荏苒，沿着不同的成长路途，李斌、许振超和包起帆最终会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工人的楷模和榜样。他们的奉献品格、管理方法和创新精神，鼓舞着千百万一线班组投身改革的洪流，迸发出新的活力。

班组是企业的细胞，班组有活力，企业就有生命力。当企业发展需要攻坚克难的时刻，优秀的班组总会冲在最前面。

1989年8月，为了适应设备引进和技术攻关的需要，黑牡丹集团的3名技术工人组成了设备科电子组，这便是如今声名显赫的邓建军科研组的雏形。以技艺为骨、以匠心为魂，他们用30年的接力奔跑，把50多个世界级和行业性重大技术难题甩在身后，骄傲地跑进新的时代。

1998年，王涛班成为东风汽车公司历史上第一个以员工姓名命名的班组。从那时到现在，一代又一代班组用艰辛付出和团队协作，践行着“当工人，就得好好干活，干出点名堂”的



20世纪50年代末

以信息化为主导，班组建设精益求精

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与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班组进化的影响因素

技术要素

1. 信息技术的产生；2. 互联网发展；3. 飞机、火箭、通信卫星的发明；4. 通信娱乐技术的发展；5. 水电/风电等电力技术的进步。

管理要素

注重长远性与全局性，以工作流程为中心的“再造工程”，形成班组管理的经典管理模式。

1. 组织文化理论；2. 精益生产理论；3. 后福特主义；4. 阿米巴模式；5. 人力资本理论。

“人”的认知

1. 重视“人”的因素；2. 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3. 把“效率”和“效果”结合起来；4. 强调不断创新。

班组进化·班组3.0

“班训”。

30年，邓建军科研组始终挺举一面旗帜。21年，王涛班始终传承一种精神。在这样充盈红色基因的班组里，一位又一位优秀产业工人脱颖而出，成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时代表率。

改革意味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由此带来的是班组结构、班组运行和班组管理方式的改变。当班组建设不再单纯以工作计划为唯一导向，人们开始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一线班组在经济核算和控制成本之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四块石头夹块肉”，这是矿井深处最形象的描述。地下几百米凿开的岩石缝隙里，间或传来碎石和水滴溅地的声音。从地下水、岩壁到瓦斯，事故的阴影似乎无处不在。

红色的班令旗，橙色的安全帽，蓝色的矿工装，黑色的橡胶靴。1987年，18岁的白国周成为一名煤矿井下的班组长。在最危险的开拓掘进岗位上，他不仅做到了自己22年没有一次磕伤和碰伤，先后带领230名矿工同样没有发生过工伤或事故。

资料显示，我国接近90%煤矿安全事故的原因，都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有关。在白国周的班组里，“安全第一”始终是不可

触碰的第一原则。班前会上，安全宣誓年复一年，看全家福日复一日。从“三勤”到“三细”，从“三到位”到“三不少”，从“三必谈”到“三提高”，在白国周班组管理法面前，每一个细小的安全隐患都无处遁形。

如果说白国周班组守护的是安全生产的底线，江苏连云港的雷锋班组则是用真诚的微笑和热情，让金钱浪潮冲击下的社会道德保持着温度。

时光倒推回56年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让新浦汽车总站民兵班的女工心潮澎湃。从那时到现在，她们成千上万次往返于火车站和汽车站，累计免费运送老弱病残旅客超过26万人次，义务运送行李22万余件。

有一种品德，用微笑传递。有一种精神，用崇高诉说。“宁愿自己千般苦，不让旅客一时难”的温暖承诺56年不变，大爱的能量56年不减，时代的责任56年不懈。雷锋班组留下的无形车辙，在人们的心中永不消逝，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光芒绽放。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感慨万千：“老班长没有走，他还活着！”

改革开放转动起商品经济的魔方，跃跃欲试者冲入湍急的市场洪流，成功者拥有了从未想象规模的财富。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基座，轰鸣的机器总是需要有人维护，平凡的岗位总是需要有人坚守。千百万班组把亿万劳动者的心凝聚在一起，就像默默无闻的绿叶和土壤，又像挺起脊梁和胸膛的苍天大树，聚合成改变历史的巨大力量。

2019

撞见未来

做好智慧世界的时代答卷

70年前，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70载光阴，70年奋斗，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从载人航天到深海探测，从青藏铁路到港珠澳大桥，都离不开亿万劳动者的勤劳奉献，

千百万个班组更为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作出重大贡献。

2019年12月30日,北京日坛宾馆,新中国70年最具影响力班组发布仪式暨第一届新时代班组高峰论坛隆重举行。

余梦伦班组的名字,不出意料地出现在“新中国70年十大经典班组”的名单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想到,83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竟然来到了会场。他以一个老班组长的身份勉励年轻的班组长们:“世界发展很快,新的成果不断产生。低潮不会阻止热爱,差距更能明确努力的方向,我们要考虑如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班组发展的历史上,新中国70年最具影响力班组的发布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象征着在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趋势里,发轫于工业革命前近现代工厂里的班组,即便是承受技术迭代浪潮的汹涌冲击,依然是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优秀班组的影像。那些浓缩在经典班组的传统,那些浓缩在最具影响力班组的精神,那些浓缩在特色品牌班组的智慧,无不显示着新时代继续推进班组建设的重要价值。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张奕群班组来了。千里穿针,万里引线,他们为导弹设计“最强大脑”。千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是空天防御的中流砥柱,用坚韧和执着接近完美,让新时代的中国仗剑前行。

吉林大学黄大年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团队来了。像浪花撞击着梦想的礁石,像熔岩冲出地壳奔涌燃烧。黄大年用生命留下的四射光芒,照亮黑暗的地表深处。他的团队追寻着他的光亮,继续探索未知的地下世界。

国网湖北电力鄂电铁军带电班来了。在旷野或沟涧,在崇山与峻岭,他们以铁塔的雄姿融入自然。渡过河流和阴云,忍受孤独和寂寞,他们以银线的温情弹拨光明。他们用内心最虔诚的信念,铸造着一支铁军的灵魂。

……

面对云集北京的优秀班组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晓钟一再提到“创新”两个字:“面对时代和科技的挑



2014年

以智能化为主导,人类进入工业智能时代,班组具备自驱管理特征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举行,“工业4.0”概念为大家所知,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有力推动,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典型特征。

班组进化的影响因素

技术要素

1.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2. 工业智能化; 3.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终端; 4. 光伏发电、特高压。

管理要素

1. 自组织理论; 2. 平台战略与生态战略; 3. 工厂智能化; 4. 互联网产业化; 5. 柔性管理。

“人”的认知

1.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2. 重视人的价值和能力; 3. 以感情调动人、激励人。

班组进化·班组5.0



2017年5月

人类进入人工智能初级阶段,班组向具备“生命体”特征演化

“一只狗”(AlphaGo)引燃了第五次工业革命;我国颁布《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第五次工业革命到来。

班组进化的影响因素

技术要素

1. 人工智能; 2. 微电网; 3. 量子通信; 4. 无人驾驶、超级高铁、飞行器。

管理要素

1. 更加注重内外协调; 2. 推行信息化作业; 3. 加强数据化分析; 4. 实施智能化作业。

“人”的认知

1. 情感是人类独有优势; 2. 进化是人类不变的主题; 3. 超人类的诞生。

班组进化·班组5.0

战,必须深化班组创新活动,加快探索现代班组由末端业务执行单元向前端价值创造单元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驱动、知识驱动型组织转变,由专业精细化分工向一专多能、高效协同化组织转变。”

同样让李晓钟再三叮嘱的,还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他说:“班组是诞生劳模、工匠的沃土,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形成发展、代代传承的园地。要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领新时代班组文化,培育越来越



已经成立21年的王涛班，是东风汽车公司历史上第一个以员工姓名命名的班组

多的企业工匠乃至大国工匠。”

进入新的世纪，“以人为本”成为班组建设和班组管理的战略支点。伴随着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经久不衰，打造学习型、团队型、创新型、安全型、自我管理型的高效能班组渐成风尚，班组建设更加注重科学化、制度化和人文化，一大批以班组长姓名命名的品牌班组，直接带动了整个班组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

班组正处于信息时代和智慧时代的转换地带，开始由单一功能的执行单元，快速转向兼具决策功能的价值创造单元。多中心、分布式、去权威，以班组能力优化来配合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的优化，成为新时代班组建设的关键环节。

毫无疑问，站在变革的时代节点下，现代班组自我进化的智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成的网络世界，连同协作机器人、工业4.0的发展，都将促使未来的班组形态发生巨变。

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衍进，人的因素永远还是决定性的。对于中国而言，没有具有全球竞

力的世界一流的劳动者大军，就难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职工强，班组强；班组强，企业强；企业强，国家强。”这样的道理颠扑不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小组全体成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将“梦桃精神代代相传”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桃小组亲切勉励，希望大家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一刻，赵梦桃已经离开人世56年了。她的生命没有足够的长度，她的班组却成为新中国不可磨灭的精神品牌，和马恒昌小组、王进喜1205钻井队一样，在历史的深处熠熠生辉，相伴新时代的劳动者走向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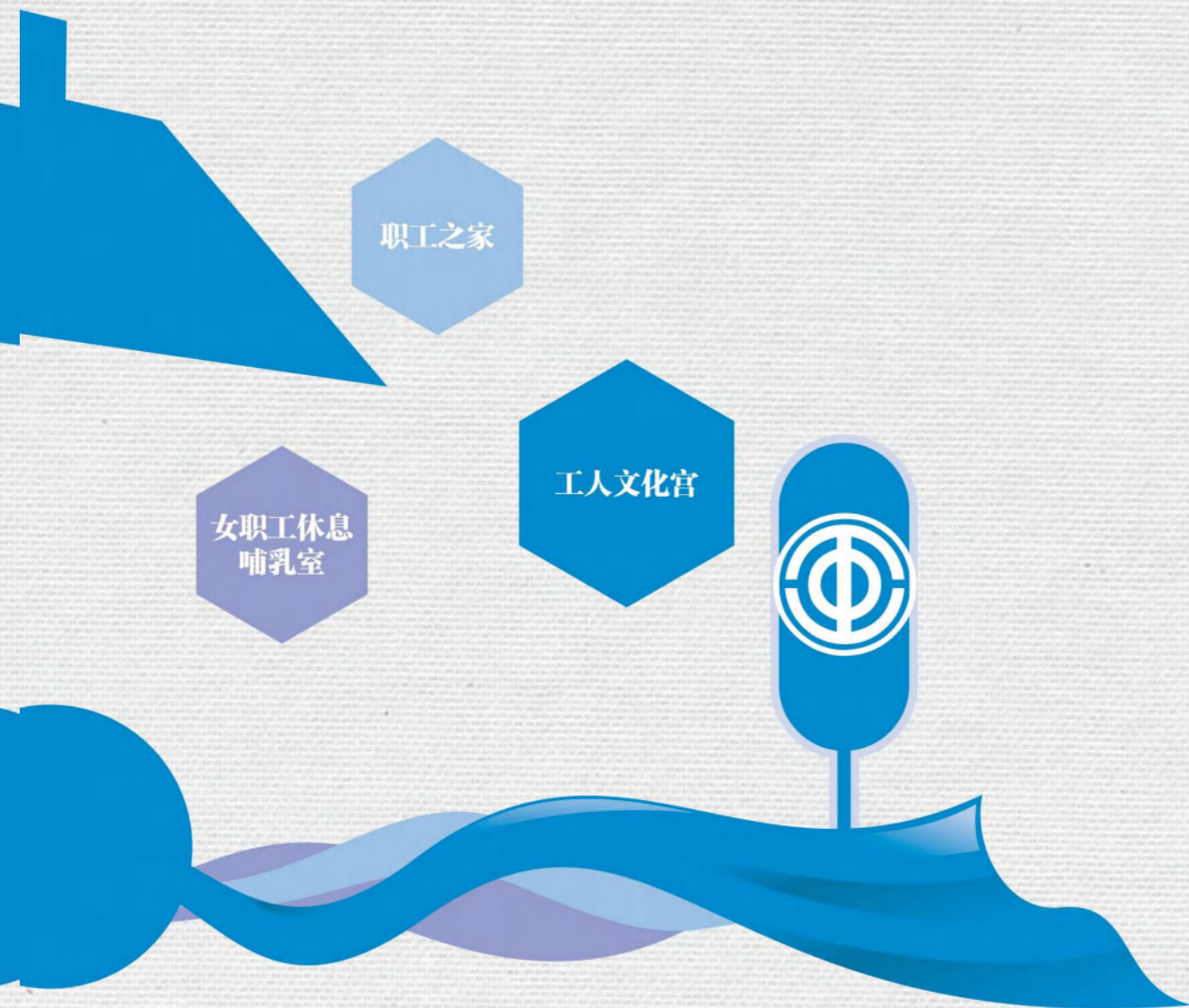
时光就是这样，永远不会辜负每一个人。无论是祖国的天南海北，还是海外的建设工地，在油田，在灯塔，在机器旁边，在矿井深处，在横跨山岭的输电线路路上，在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里，千百万个班组和亿万中国工人正在忘我劳作，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奔跑。🇨🇳



以职工为本

中国工会服务站点建设纪事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到职工服务中心，从爱心妈咪小屋到女职工休息哺乳室，顺应职工群体状况的变化，工会服务职工场所服务职工的宗旨始终不变。

当下，无论是“劳动者港湾”还是“爱心驿站”，无论是“暖心驿站”还是“爱心接力站”，职工在哪里，工会服务职工的重要平台载体就出现在哪里。

2021

年1月18日，北京。

苏宁小店新街口西里店，一块标有“暖心驿站”四个大字的告示牌摆放在橱窗内，红黄两色的中国工会会徽醒目地显示在左上角。

休息区、WiFi、手机充电、饮水、食品加热、针线包、应急药品、测量血压、打气筒、卫生纸、家政服务折扣、工会京卡优惠活动等12项服务内容逐一在告示牌上列示出来。

当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走进这家北京工会建设的“暖心驿站”，调研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情况。年前刚刚到任的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陈刚也同行参加调研。

《中国工人》记者注意到，王东明用“服务职工的重要平台载体”定位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明确提出要加大投入力度，推动实现在各地全面开花，努力使工会的维权服务工作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广大职工群众。

今天，有25987个这样的“暖心驿站”散布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每一处“暖心驿站”的中国工会会徽，都在24小时默默温暖着户外劳动者的心。

历经十余载不懈耕耘，中国工会服务职工的场所建设持续迭代铺开，正在向“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广大职工群众”的目标迈进。

发轫：打造“救助港湾”

时光倒流回18年前的那个冬天，天津工会紧急推出的一项举动感动了整个社会。

2002年1月14日，天津市委召开关心困难群众生活专题会议，提出下力量构筑社会保障的三道防线，以企业为主体落实“两个确保”，以街道为主体落实“低保”，以工会为主体构筑“第三条保障线”，发挥监督保障作用，真正做到不丢一户，不落一人。

会议刚刚结束，天津市总工会立即研究落实措施。临界“低保”的困难户怎么办？未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患大病职工双困怎么办？夫妻同时下岗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单亲子女上学交不起学费怎么办？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时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散襄军果断拍板，建立困难

职工救助中心，直接面对困难职工提供救助。

从选定一站式服务大厅到购置快速救助车，从制定救助资金管理办法到文明服务标准公开上墙，仅用了三天时间，天津市困难职工救助中心正式打开大门，公开承诺特困救助能当天核实的一律当天解决，需要多方协调的要责成专人帮助解决。

大年三十傍晚，中心工作人员接到下岗职工王惠芝的电话，立即派人登门探望。王惠芝的丈夫瘫痪在床，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破旧的临建房里，仅靠每月100多元的“低保”和临时打工收入维持生活，家中没有一点过年的样子。工作人员当即决定帮扶400元。王惠芝夫妇热泪盈眶：“真的没想到，大年三十打个电话，你们就能马上登门……”

或许散襄军自己都没有想到，天津市困难职工救助中心最终成为中国工会服务职工站点建设的开端，并由全国总工会统一更名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由此开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在全国各地工会“遍地开花”。

短短5年时间，全国各级工会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2602个，覆盖98.5%的地市和78%的县镇，地市级以上帮扶中心累计发放帮扶款物22.6亿元，帮扶困难职工1546.9万人次。

显然，在社会转型时期，工会理当承担起更多维护职工权益、稳定职工队伍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服务职工的场所，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提供一站式救助、援助和服务，进而依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构建工作网络，在城区设立帮扶站，在街道、社区、乡镇和大型企业设立帮扶点，全域覆盖、上下联动、资源共享，让困难职工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自己的“家”。

就在天津市困难职工救助中心成立5年以后，工会服务职工站点建设收到了中央财政的“大礼包”——2007年，拨付给工会帮扶中心的专项资金比上一年整整翻了一番。

2007年12月11日，全国总工会公开征集选定的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标识正式启用，迅即出现在全国各级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标识由太阳、双手组成，太阳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红日映衬下的“双手”紧紧相扣，体现“帮扶”主旨，同时巧妙地构成了汉字“工”，寓意工会发挥着联系职工群众的桥

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相比,职工书屋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建筑工地上有“工地微吧”,加油站网点有“流动书吧”……哪里有职工阅读需求,工会就把职工书屋建到哪里。在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升级为职工服务中心之后,职工书屋又承担起职工文化服务的重任。

梁和纽带作用。

这一年,全国所有地市级工会全部建立了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此后,全国总工会继续关注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建设,打造充满爱心、充满阳光的“救助港湾”。各地工会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包括全天候开通12351职工热线电话,做到困难职工随时求助,随时帮扶。

“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带头鼓掌。”曾经被这个“顺口溜”描绘的工会活动形式,就这样不断以服务职工的新形态取而代之。

嬗变: 打造“精神港湾”

毫无疑问,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是工会打造服务职工场所的新模式,它创新了以文化宫、俱乐部为标志的固有工会阵地建设,努力延长工会救助、维权、服务职工的手臂。

在广泛建设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之后,中国工会启动了职工书屋建设工程,倾全会之力为亿万职工打造“精神港湾”。

2008年1月,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时任全总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为全国工会“职工书屋”揭标揭牌,宣布将用5年时间开办5万个“职工书屋”,逐步形成阅读条件比较完备、广泛覆盖职工群众的工会读书设施网络。

孙春兰同志为职工书屋揭牌,标志着由全国总工会主导推动的这项职工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工会组织将在职工身边打造一方阅读知识的净土。

这年夏天,100多万册、总价值3200余万元的图书从北京发出,1000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在各地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围绕职工书屋蓬勃开展。职工群众骄傲地说,“我们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习站和活动站”。

至今12年间,全国总工会已建成1.32万家全

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带动各地工会建设不同规模的职工书屋超13万家,覆盖8000余万职工和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一线职工、农民工阅读学习条件不足、读书难、读书贵等问题。

此后,为适应广大职工数字化阅读需求,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上线。历时6年建设,至今已覆盖网站、APP、微信、数字阅读一体机等终端,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特色阅读资源动态更新,真正实现了“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

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相比,职工书屋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建筑工地上有“工地微吧”,加油站网点有“流动书吧”……哪里有职工阅读需求,工会就把职工书屋建到哪里。在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升级为职工服务中心之后,职工书屋又承担起职工文化服务的重任。

作为服务职工的文化站点,职工书屋成为推动工会改革创新响亮品牌。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将职工书屋列入公共文化设施。如今,职工书屋示范点更是出现在第二批全国创建示范活动保留项目目录,成为迄今为止全国总工会被纳入的唯一一项保留项目。

就在职工书屋的牌匾公开亮相5年以后,上海市总工会启动了“爱心妈咪小屋”建设行动,试图为职场“四期”女性提供一个私密、干净、舒适、安全的休息场所。第一批200个“爱心妈咪小屋”的建成,迅即引起全国总工会的高度关注,首先在省会城市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小城市普及推广。

时光荏苒,“爱心妈咪小屋”的名称变更为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但是,为广大女职工提供孕期休息和产后哺乳的宗旨没有改变。2020年三八妇女节前,全国已经有28.6万个基层企事业单位建



山东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 3860个

山东省各级工会累计建设各类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3860个,向所有户外劳动者开放,其中相对固定服务覆盖35万余人。

· 关键词: 管理

山东省总工会在全国率先开发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网上管理系统,实现了“一张图”显示、查询和手机导航、服务评价等功能,方便了户外劳动者查询、使用和评价。



江苏 安康爱心驿站

· 5213家

江苏省各市累计建设“安康爱心驿站”5213家,直接服务36万人,基本上覆盖全省户外劳动者工作范围。

· 关键词: 激励

江苏省总工会每年评选30家五星“安康爱心驿站”,每家给予2万元的现金奖励,有效地激励了各市“安康爱心驿站”建设。



安徽 幸福驿站

· 1968家

安徽工会累计建立县级以上“幸福驿站”1968家,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114.8万人次。

· 关键词: 服务

“幸福驿站”在服务对象上逐渐由户外劳动者向一线职工群众拓展,服务项目上日益丰富多元化。如铜陵、安庆等地“幸福驿站”为环卫工人购买了意外伤害险,组织他们免费带薪疗休养。亳州市将工会职工书屋建设与“爱心驿站”建设有机结合,丰富了户外劳动者的精神生活。合肥市要求有条件的站点设置储物柜、维修工具箱、电视机、无线网络等。



湖北 户外职工爱心驿站

· 813家

湖北省各地累计建成“户外职工爱心驿站”813家,基本形成了一张覆盖全省大中小城市主要城区的爱心驿站服务网络。

· 关键词: 监督

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湖北省工会户外职工爱心驿站工作被省委列入立行立改、为民服务解难题“百件实事”项目。湖北省总工会按照主题教育活动要求,对全省户外职工爱心驿站进行全面整改提升。省总主要负责人到武汉市督办整改,分管负责人带领工作专班明查暗访,加强督导调研。全省工会积极行动,集中两个月时间开展整改提升工作,全省户外职工爱心驿站普遍进行了一轮以上的自查整改。

立了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覆盖哺乳女职工1857.1万人。

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一样,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离不开规范化的管理和操作。数字显示,迄今至少有27个省级总工会设立专项资金推进女职工哺乳室建设,16个省级总工会制定了管理办法,统一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的标识和色调,统一配备设施、配送物品、专人管理。

在南京,工会推动质监部门制定了《工作场所爱心母婴室建设与星级评定规范》,成为首部面向职工的公益服务类地方技术规范标准。

在贵州,全省已经建成的“母婴温馨小屋”均在工会云手机APP进行了精准定位,形成直观可见的“小屋地图”,定期发布母婴育儿和孕产期哺乳期的知识资讯。

职工书屋和女职工休息哺乳室遍布全国,成为各级工会打造服务职工场所的缩影。顺应职工群体状况的变化,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变成了职工服务中心,扶贫超市、农民工夜校、工会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心理咨询室等服务场所,它们如同中国工会延长的手臂,守候在职工身边,随时提供贴心服务。

今天,从乌苏里江畔到帕米尔高原,从内蒙古草原到五指山下,从首都北京到海外工地,职工在哪里,工会的贴心服务场所就出现在哪里。

聚力: 打造“暖心港湾”

时代快速向前发展,新经济浪潮催生了大量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和出租车司机,他们和环卫工人一样,风雨无阻地出现在城市街头巷尾,保障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

工会组织的关注点,这一次聚焦到庞大的户外劳动者群体。依然涉及一连串的问题——他们渴了到哪里去喝水?他们热了到哪里去乘凉?他们冷了到哪里去取暖?他们累了到哪里去歇脚?户外作业时突然下雨,到哪里能借到雨衣雨伞?

2016年,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并在南宁召开现场观摩会,要求各地工会建立以户外劳动者为主要对象的服务站点体系,配备卫生间、桌椅、饮水机、微波炉、应急医药箱等基本设施设备,重点解决饮水、就餐、如厕和休息等实际问题。

47岁的韦小娇是南宁市青秀区的环卫工人,

每天带着饭盒出门，中午只能蹲在街边，草草吃上几口冷饭。直到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了一间向自己敞开的小屋，里面不光有饮水机、空调、电视机、微波炉和雨伞雨鞋，还贴心准备了清凉油、创可贴、碘酒和棉签。

从此，韦小娇每天结束上午的清扫后，都会来到这间工会爱心驿站。她终于可以安心地坐下来，用微波炉加热自己带来的饭菜，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就像在家里吃饭一样。

全国总工会发出的通知和南宁会议推出的典型经验，显然得到了各地工会的广泛呼应，为正在应运而生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助烧了“一把火”。

在北京，“暖心驿站”成为首都户外劳动者站点的专属品牌，统一的标识安装在每家驿站的门口，成为工会组织暖心服务的醒目符号。依照“工会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务实高效”的工作理念，“暖心驿站”在中石化加油站、苏宁小店等商业网点全面铺开，至今已经建立了25987家，其中近700家户外劳动者密集区的“暖心驿站”定位上线，职工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找最近的驿站及其服务功能，24小时均可享受贴心服务。

在上海，工会强力推动创设“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依托银行、超市、药房、快捷酒店、企事

业单位门卫室挂牌设立，沿街设置，方便户外劳动者就近就便使用。这些站点全部配备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茶桶）、充电排插和桌椅等基础设施，同时增加个性化服务。如今，市级站点已经超过1100家，其中322家升级站点新增健康、生活娱乐、政策咨询等服务项目，进一步提升了户外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江苏，“安康爱心驿站”是众多户外劳动者最青睐的地方，“清凉一夏，供一片清凉，送一杯凉茶；温暖一冬，辟一处歇脚，送一杯热水”。从职工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职工书屋、爱心母婴室、阳光心灵工作室、爱心医院到爱心超市，江苏工会创造性地把这些场所的服务功能延伸进“安康爱心驿站”，把5000多家驿站打造成关爱户外劳动者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富有工会温度的常态化服务。

职工有所呼，工会有所应。正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强调的那样，无论是“劳动者港湾”还是“爱心驿站”，无论是“暖心驿站”还是“爱心接力站”，这些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都是服务职工的重要平台载体。

表面上看，每一间亮出中国工会会徽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都不起眼。但是，一处又一处红黄两色的标识正在让城市街头充满了浓浓暖意。

感人心者，莫过于情。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凉，冷了能取暖，户外劳动者实现着小小的心愿，工会组织则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广大职工群众。

在2019年的新年祝词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问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和出租车司机，称赞这些户外劳动者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这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又特意走进北京前门石头胡同的快递服务点，看望正在工作的“快递小哥”。

今天，中国工会正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落实王东明主席提出的具体要求，坚持以职工为本，坚持因地制宜，建设更多符合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的服务站点，推动实现在各地全面开花，切实帮助改善户外劳动者的工作休息条件，让更多劳动者享受便捷性、精准性、常态化的工会暖心服务。📺



2019年12月5日，青岛市北区金华路户外劳动者驿站正式启用

收入分配

劳动关系

尊重劳动

职工素质

生命安全

世续世享



工匠精神

产业工人队伍

工声嘹亮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表达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21

年3月,北京。

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但中国已经正常进入了自己的“两会时间”。

就像以往每一次全国两会一样,一个又一个维护亿万劳动者的话题,再一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的关注焦点。

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当天上午,“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发布“两会同期声”,聚焦全国人大代表、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的审议发言。

依照“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的报道,陈刚在审议发言中表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工会要“站出来”,维护这些互联网衍生职业者的合法权益。

“北京时间新闻”从属于北京官方新媒体“北京时间”。截至本期《中国工人》杂志发稿时,陈刚发言的这条短视频获得的“点赞”,至少高出“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发布的其他“两会同期声”6倍以上,转发量更是达到18倍。

《中国工人》杂志记者同时注意到,此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总工会界别提案亦是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显然,对于这一数以千万计劳动者群体的强烈关注,将会成为中国工会下一步的工作重心。

事实上,回看近年全国两会的议政焦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表达一直引人注目。从工资增长、安全生产到大国工匠……工声嘹亮,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每一份提案 每一次维护

就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召开的当天上午,全国总工会官微发出热文——《你还记得这些工会“好声音”吗?》。

源自全总办公厅和媒体公开报道的这篇热文,回顾了近年与职工生活息息相关的总工会

界别提案,赞扬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发挥贴近职工、贴近基层、岗位专长等优势,为职工发声,为改革建言,唱响了界别“好声音”,凝聚了职工正能量。

《中国工人》记者搜索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录信息时发现,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当年开放了“代表委员联络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要求报考人员应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要求为法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社会学类和公共管理类。

当时发布的“职位简介”显示,这一岗位的主要职责包括做好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工会执委(代表)提案相关工作,同时包括做好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服务工作。

在接受《中国工人》记者采访时,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代表处工作人员证实了上述岗位职责。每年政协大会召开前,代表处会协助工会界委员汇总梳理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口头发言、大会发言和委员提案。

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每年都要提交大量提案。其中,由总工会界别统一提交的界别提案,显然分量最重。

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总工会界别提交了《关于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提案》,聚焦全国8400万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直言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在发言中表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工会要“站出来”,维护这些互联网衍生职业者的合法权益。

扫码观看



整体上十分薄弱,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些新业态企业刻意规避劳动法律,借助自身强势地位,使用各种方法避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将相当一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置于“裸奔”状态;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难以被直接界定为劳动关系,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突出困难;

——由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未能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面临很大的职业风险,尤其是从业过程中发生伤害时无法享受工伤待遇;

——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普遍存在,大多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中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担和精神压力;

——平台企业借助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优势单方制定修改接单规则、提成比例、奖惩规定等,致使相当多的劳动者被“困在系统里”,民主管理权利无从体现。

在这份界别提案里,总工会界明确提出完善法律政策、加强执法监管和强化行业自律三点建议,呼吁立法机关消除适用劳动法律上的现实困难,人社部门尽快研究完善适应新就业特征的参保缴费政策,切实加强政府对新业态企业的执法监管。

此间人士分析,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劳动权益陷入盲区的窘迫境遇,显然开始受到中国工会的高度关注。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在北京代表团的发言,总工会界为“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提出的界别提案,清晰地显示出“站出来”已经在工会系统形成广泛共识。

此前,全国政协总工会界提出的多项界别提案,相继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同,提案里的意见和建议,迅速在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中得到落实。

2018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收到总工会界提交的界别提案——《加大城市困难职工帮扶解困力度,推动困难职工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一界别提案由总工会界63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将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纳入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通盘考虑,着力解决社会救助“碎片

化”“断崖式”和“低保捆绑式”问题,进一步重视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产业、经营困难的沿海出口加工产业、“僵尸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

当时,覆盖城市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政策仍然较为薄弱,对城市贫困人口特别是困难职工群体考虑不够,城市扶贫制度对困难农民工和支出型贫困群体覆盖不足,国家针对厂办大集体企业、资源枯竭城市、独立工矿区等区域性职工困难出台的政策,没有形成有效合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界别提案的主要建议很快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加大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帮扶和保障力度确定为工作要点,“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度”被写入第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全国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表彰了100件有影响力的重要提案,《加大城市困难职工帮扶解困力度,推动困难职工同步迈入小康社会》榜上有名,彰显工会为劳动者权益表达代言的力量。

每一次发言 每一次表达

2021年3月3日,李守镇委员赶到驻地宾馆报到。从2013年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算起,这已经是他第9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尽管已经过去了4年,依然有熟悉的政协委员向李守镇提起他的大会发言。在作为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过程中,2017年的那一次发言无疑是李守镇的高光时刻。

2017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按照当天的大会发言安排,代表全国总工会界别发言的李守镇委员排在第一位。

至今可以在互联网上回看的现场视频中,李守镇大步走上主席台,站立在发言席,面前一字排开5个麦克风。会场两侧的大屏幕上,显示出他的名字和发言题目——《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打造更多“大国工匠”》。

“我这里有两组数据……”李守镇用一串令

人深思的数据开始了自己6分45秒的发言。

“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1个美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我们13个人创造的财富。”

当时在现场旁听大会发言的媒体记者普遍认为，正是这种注重数字化呈现的表达方式，让李守镇代表全国总工会界别提出的三点建议更具力量——

第一，切实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举措落实到位。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和主抓手，尽快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第二，构建高素质产业工人培养体系，依法保障产业工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

第三，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切实畅通产业工人发展通道，叫响做实“大国工匠”品牌，培育尊重劳动尊崇技术的文化土壤。

当时，李守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这一次大会发言产生的社会反响，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从那时到现在，全国总工会界别2017年推出的政协大会发言里提出的建议，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推动职工技能提升的文件，国家各部委和全国总工会陆续出台了60多项政策文件，至少有143个国家技能职业标准正式颁布，专业技术人才的发展贯通试点政策亦已出台，“大国工匠”成为最受社会尊敬的劳动者。

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中，大会发言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反映不同党派界别声音的重要形式，一直有“群言堂”的美誉。李守镇委员在2017年代表全国总工会的大会发言，更严格的说法应当是“大会口头发言”，以便与“大会书面发言”有所区别。不过，由于口头发言都是在政协大会上进行，人们通常把“大会口头发言”简略为大会发言。

当李守镇委员在政协大会打响“大国工匠”品牌之前，全国总工会推出的另一次大会发言

《关注生命安全 筑牢安全红线》，直接触碰事关劳动者人身权益的核心问题，同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2014年，全国发生各类安全事故29.8万起，死亡6.6万人，数字触目惊心。随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总工会代表广大职工群众振聋发聩，围绕安全意识淡薄、安全责任不落实、管理监督不严格、“打非治违”不得力、安全培训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发出警告。

2015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的李世明委员，代表全国总工会界别进行大会发言。

作为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李世明参与了众多重特大事故的处理，惨烈事故现场的绝望哀号和骤然消失的劳动者生命，让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安全”两个字的分量。

6年以后的今天，李世明依然认定他的大会发言主题是最正确的选择。“安全工作最大的困惑是，血的教训为什么要用人的生命去验证？！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得不到保证，我们党就没有力量，工人阶级就没有力量。没有生命权和健康权，就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像李守镇一样，李世明在人民大会堂的政协会场表达自己的主张。他的发言里，一连串的排比句让会场变得更加寂静。

“尽管我国已有许许多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但单位知道不等于社会知道，专家明白不等于群众明白，内行害怕不等于外行也害怕，政府担心不等于公众都担心。那些不知道、不明白、不害怕、不担心的人，最容易触动事故扳机或受到事故伤害。”

李世明代表全国总工会提出筑牢安全红线的四点建议，在国家层面，将安全工作提升为国家战略；在企业层面，强化安全立法、严格执法；在社会层面，开展全民安全素质提升运动；在个人层面，大力提倡主人翁精神，发现安全隐患，制止安全事故。

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里，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一共进行了7次大会发言。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次大会发言外，其余5次大会发言亦在人民大会堂里赢得热烈掌声。



2015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李世明委员代表全国总工会作《关注生命安全 筑牢安全红线》的发言 王晔/摄



2017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李守镇委员代表全国总工会作《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打造更多“大国工匠”》的发言

每一项使命 每一次担当

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安排了一系列大会发言。其中，黄炎培发言11分钟，84岁的司徒美堂发言连同翻译用时13分钟。文革时期，政协大会发言制度中断。直到1983年，这一民主形式才重新恢复。

全国政协大会期间举行的大会发言，被称为“协商民主的讲坛”，在政协委员的各种参政议政方式中，最具影响力，“争抢”相当激烈。每年三四十个登台发言名额的分配，遵循“质量第一、统筹兼顾、党派优先”的原则。

显然，每一次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都是中国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有力表达。为争得这样的机会，全国总工会相关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

李守镇委员进行大会发言的那一年，政协会议一共收到437份发言稿，最终能够入选的发言仅占十分之一。只有问题抓得准，建议提得实，说真话，谏诤言，才能进入遴选者的视野。

工人家庭出身，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再加上大量日常调查研究，李守镇积累了丰厚的发言素材。但是，真正开始动手准备1400字的发言稿，他还是慎之又慎。特别在发言的前两天，大会通知自己是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于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高度重视，每一字都要再三斟酌，唯恐辜负了这一次为劳动者发声的机会。

李世明在大会发言前，也曾经担心安全话题能不能引起会场的关注，能不能达到想要的发言效果。刚刚说了前几句，他就知道这一次的话题选准了。因为问题和建议烂熟于心，他几乎不用去看讲稿，东北口音所特有的生动，更把会场的每一个人都带进触目惊心的安全问题之中。

如今，李世明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也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对于安全与职工生命的关注程度，依然没有半点淡漠。作为中国职工技术协会理事长，他正在新的领域里继续为劳动者的权益孜孜耕耘。

李世明告诉《中国工人》记者，全国两会是

2010年和2014年，张世平分别作了《坚持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职工收入分配权益》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广大职工共享发展成果》的大会发言。

2011年，徐振寰作了《以劳动关系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在推动科学发展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大会发言。

2012年，张鸣起作了《依靠劳动尊重劳动倡导劳动 充分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的大会发言。

2013年，段敦厚作了《大力提高职工素质 助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大会发言。

历史的印记里，工声嘹亮，留下了中国工会为劳动者利益仗义执言的坚定表达。

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必须努力发出工会的声音。工会的声音越响亮，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工会的每一次发声都要有立足工会自己的特点，不能离开工人和企业，进行的调研要落到基层，拿出的数据要有影响力，表达时要用工人语言，提出的问题首先要自己抓好，再去推动各个部委落实。

除了大会发言，书面发言、界别提案和委员提案同样重要，都是政协委员代表民意、务实建言的途径。如果问题和建议具有现实针对性，同样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反响。

来自全总办公厅的信息显示，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聚焦不同时期职工队伍、权益保障、经济发展和工会作用发挥等，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大量的提案建议，涉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职工分流安置等重点难点问题。

201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总工会向大会提交界别提案，建议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时间恢复到3天，拼接上双休日，组成一个5天小长假，从而更好地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9年1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明确规定了2020年劳动节的放假调休日期——5月1日至5日放假调休，共5天。2020年1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里，继续沿袭了“五一”5天小长假的做法。

另外一个得到快速采用的提案，同样来自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

2020年5月21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全体与会人員首先默哀1分钟，对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这样的特殊安排源自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冯丹龙的一份提案。2020年2月19日，冯丹龙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默哀的提案》，全文不足130个字——

2014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全体委员曾为在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



2021年两会期间总工会界别分组讨论会

遇难的群众默哀。为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和去世的群众表示哀悼，建议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上，全体委员默哀一分钟。

2月20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明确答复“急事急办”。大会正式召开前15天，冯丹龙接到通知，确认大会议程有1分钟的默哀仪式。

“每一个字，都要对劳动者负责”，这是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的共同心声。他们充分酝酿、深入调研、反复论证，交出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提案，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反映职工群众的诉求，努力推动解决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实际问题。

今天，由于受到全球疫情冲击，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所有这些，都对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出了挑战。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展望“十四五”，各级工会要团结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功立业。

毫无疑问，为劳动者代言发声，这是中国工会必须继续承担的历史重任。

每一份提案，每一次维护。每一次发言，每一次表达。每一项使命，每一次担当。

两会会场，工声嘹亮。

那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表达。

那是亿万劳动者信赖的未来和希望。📺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每一个温暖的细节
都会被沉淀下来，
留在历史的深处，
默默记录着曾经的那份柔情。

摘自 NO.3 2021《“站出来”》



蹲点百日

一场从50人开始的改变

天津、河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云南、陕西……15个蹲点工作组，就像是15支先锋队和突击队，更像是15个直接交壤劳动关系敏感地带的前沿哨站。一场从改变50人到改变更多工会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蹲点实践，就这样拉开了大幕。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采访 | 本刊蹲点采访组 执笔 | 李瑾





河北工作组
钟扬



河北工作组
景思詹



黑龙江工作组
郝仲明



黑龙江工作组
陈佳



黑龙江工作组
井立滨



江苏工作组
段新



浙江工作组
王强



浙江工作组
胡出水



浙江工作组
周元



安徽工作组
武建光



安徽工作组
任迎春



安徽工作组
田育婧



安徽工作组
孙文常



江西工作组
孙涛



江西工作组
李学敬



江西工作组
邢艺



河南工作组
刘小琴



河南工作组
伍德道



河南工作组
崔征



河南工作组
石晶晶



湖南工作组
谢永胜



广东工作组
刘建新



广东工作组
刘世超



广东工作组
李琦彦



广东工作组
韩建旭



云南工作组
刚小宝



云南工作组
袁朝辉



陕西工作组
姜文良



陕西工作组
江鲁川



陕西工作组
高瑶瑶

2021

年8月,南京、郑州、扬州等地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骤然紧张。

此刻,《中国工人》从北京派出的七路采访小组,正在赶往深圳、西安、抚州、宁海、合肥、石家庄和天津,实地探访全总机关干部基层蹲点的真实场景。

3个月前,全国总工会正式启动全国工会系统机关干部蹲点活动。全总机关直接派出15个蹲点工作组,深入劳动关系情况比较复杂的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和县级以上区域性、行业性工会,推动工会工作和探索蹲点长效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中国工会最高领导机关罕见地同时派出50人规模的“蹲点大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和担当——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变成“浮桥”“断桥”,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变成“空中飘带”。

《中国工人》采访小组从不同蹲点现场发回的报道显示,正在继续进行的蹲点活动,为参与其中的全总机关干部注入了新的“速度与激情”,努力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新挑战,新风险

时光还记得那个秋天。

2018年10月29日,北京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当天播发的2200余字消息,集中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其中,“职工”先后出现34次,“基层”先后出现4次。

从“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到“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从“把力量和资源向基层倾斜投放”到“深入基层一线”,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勉励工会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把群众观念牢牢根植于心中。

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工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守正创新、积极作为,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推进工会改革创新,职工队伍的基本面总体稳定,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与此同时,随着外部内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我国劳动关系领域面临新的矛盾和风险,引起中国工会的高度关注。

2020年4月10日,全总十七届三次执委会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强调,劳动关系协调面临新问题、新难度、新挑战和新风险。疫情促进了共享用工、平台用工等灵活用工方式加快发展,也出现了更多非合同制或自雇劳动者及临时性劳动关系,传统的劳动关系规制难以适应。

11个月后,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履新不久的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表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工会要“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应对新的形势变化,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工会工作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对暂未建立工会组织的重点劳工领域和矛盾频发的企业所在区域,各级工会要上门督导,探索派工会干部到基层蹲点,接受问题反映,帮助解决困难。

随后,王东明同志对开展全总和工会系统机关干部蹲点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全总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实施方案》迅速制定出来。

依照这一实施方案,全总党组决定选派50位机关干部,分为15个工作组赴基层蹲点,重点赴劳动关系矛盾突出、工会工作薄弱和未建会企业所在地区开展工作,“宣讲一次政策、提出一批建议、制定一项制度、形成一份报告”。

消息传出,全总机关干部热情高涨、踊跃报名。最终选定的50位蹲点干部里,局级14人,处级22人,科级14人。15个蹲点工作组,就像是15支先锋队 and 突击队,更像是15个直接交壤劳动关系敏感地带的前沿哨站。

2021年5月11日,全总机关大楼六层,蹲点活动动员大会会场。天津、河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云南、陕西……15个蹲点工作组的名单逐一



天津蹲点工作组慰问快递员



湖北蹲点工作组参与武汉经开区商务城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

公布，人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这些勇敢迈向基层的前行者致敬。

一场从改变50人到改变更多工会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蹲点实践，就这样拉开了大幕。

近距离，零距离

由北京南下1500余公里，D739次动车开行13个小时后，经停王安石、汤显祖的家乡江西抚州，停车时间2分钟。

58岁的江西蹲点工作组临时党支部书记、组长孙涛，带着工作组成员李学敬、邢艺，正式入驻

这座城市西北部的抚北工业园区。

如果说全总机关大楼到抚北工业园区的距离是1500公里，那么蹲点工作组到园区职工的距离则是7个小时——7时26分走下动车车厢，14时30分出现在职工座谈会现场。

“离一线职工的距离越近，我们的心里就越踏实。既然是蹲点，就要蹲出禾苗扎根沃土的感觉，这样才能有思想收获饱满麦穗的金色秋天。”作为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孙涛更习惯于用禾苗和麦穗去描述自己的“蹲点观”。

近一点，再近一点。全总机关第一轮派出的15个蹲点工作组，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沉下去，沉到最基层的职工群众中间。

就在江西蹲点工作组到达抚州的那天，浙江蹲点工作组王强、胡止水、周元同步抵达宁波市宁海县。在一次次走访和一次次座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与职工之间，还带着隔阂的距离感。

当时，工作组居住的地点距离蹲点目的地高坛工业园区25公里，单程通勤需要1小时20分钟。王强说：“一线职工对我们太客气了，这样不行。我们要搬家，搬到职工宿舍区！”

到达宁海的第11天，王强带领工作组撤离了县城旁边的驻地，搬进了高坛工业园区龙头企业华英伦公司职工宿舍。他们穿上蓝色工装，吃起职工食堂，住进职工宿舍。周元说：“距离近了，我们与职工之间出现了微妙变化，他们慢慢开始信任我们，愿意沟通和倾诉。”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实现人与人的“近距离”，只是蹲点工作组走出的第一步。真正考验50位蹲点干部的难关，还是如何与职工们实现心与心的“零距离”。

从“近距离”到“零距离”，看上去只有一字之差，做起来却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广东蹲点工作组进驻的是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要想在美团（深圳）公司的眼皮底下推进外卖骑手入会，“难度系数”可想而知。当地工会干部想去站点开展工作，被当成推销人员拒之门外；想带着清凉饮料到骑手晨会地点宣传入会，却因为站长告知的假地址扑了个空。

同样的困难，出现在一位又一位蹲点干部的面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放下身段，用真诚

去打动心存戒备的企业主和劳动者。

进驻合肥的第二个星期天，安徽蹲点工作组悄悄来到新桥高速服务区。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在货车司机每隔四个小时必须强迫休息的20分钟里，尽快与司机成为能够交心的朋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组长武建光说，“这么短的时间里，有的司机要去洗手间，有的司机想要睡上一小会儿。不先做好功课，根本没人愿意多聊几句。”

“离开家几天了？”“孩子谁来照料？”“买车的贷款什么时候才能还完？”精心准备的话题，猝然打动了货车司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甚至有人在蹲点干部面前放声大哭：“没想到，还会有人这么关心我们的生活。”

心与心的“零距离”，让蹲点干部在生活的大课堂里，开始与一线劳动者同频共振，思想意识里有了更多的温情，工作规划里有了更多的责任。

“劳动情怀”的种子，就这样在每一位蹲点干部的心里生根发芽。

每一个蹲点的日子，都是一次淬炼，都是一次陶冶，都是一次升华。

苟日新，日日新

3个月至6个月，是全总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工作手册里标注的时间。

《中国工人》记者采访时发现，不止一位蹲点干部在默默计算着天数。当然，这种计数并不是焦灼地苦候归期，而是提醒自己还有多少在基层做事的日子。

6月12日至14日，端午节小长假。如果蹲点在十一黄金周以前结束，那么这就是唯一的一次小长假。

这三天，陕西蹲点工作组组长姜文良选择留在西安。从早到晚，他在房间里反复盯看自己绘制的那张逻辑思维导图，蹲点重点工作和主要项目被列成不同板块，每个板块细分成一个又一个层级，落实到小项、要点、步骤和责任人。事实上，这张思维导图，随着蹲点工作的持续，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从抵达西安开始，蹲点工作组就没了上下班和节假日的概念。睁眼就是工作，躺下才算下班，每天固定的学习结束已是凌晨。他们采用

“地毯式调研”的方式，走遍了1000平方公里的西安高新区，包括12个街镇和7个产业园区，一个不漏。

腰病复发，姜文良不得不绑着护腰止住疼痛。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去组织一个重要的“饭局”，被邀请的人是西北雄鹰卡友会渭南合阳分支的“领导层”，影响着近400位货车司机。“饭局”过后第二天，“领导层”给蹲点工作组发来“一定建会”的承诺。

不让每一个蹲点的日子虚度，同样是河南蹲点工作组的心声。那场震动整个中国的特大洪涝



湖南蹲点工作组与货车司机交流



云南蹲点工作组到饿了么站点了解外卖员工作情况

心与心的“零距离”，让蹲点干部在生活的大课堂里，开始与一线劳动者同频共振，思想意识里有了更多的温情，工作规划里有了更多的责任。“劳动情怀”的种子，就这样在每一位蹲点干部的心里生根发芽。

灾害，考验着刘小琴、伍德道、崔征和石晶晶。入驻新郑市华南城工会联合会的4位蹲点干部，勇敢地冲在前面，成为工会防汛救灾的先行者。

未等暴雨停歇，组长刘小琴带着大家蹚水查看华南城商户的灾情。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一边参与统计受灾职工情况，一边直接向全国总工会和省市工会报告灾情。很快，310箱应急物资送到华南城行政中心，工会系统的5万元慰问金同时到位。

深入基层蹲点，磨炼提升的是工会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真正俯身生产第一线，他们猛然发现，工会工作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对象、领域、任务、方式和环境，传统的线下型、单向型工作方式逐渐落后于时代，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需要由更长的工会手臂延伸过去。

在大庆，黑龙江蹲点工作组在被拒绝沟通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沟通联系，好不容易走进一家科技公司的大门。通过敞开心扉的对话交流，他们和企业经营者首先围绕困难职工帮扶达成共识。两个多小时以后，这家公司终于表示愿意尽快成立工会组织。

在陆家嘴，上海蹲点工作组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聚焦快递员群体进行个案访谈。为了方便快递员同时分拣投送物品，访谈地点就在堆放着货物的货架旁边。站着提问，站着回答，被尊重、被倾听的这一刻，让那些每天负重前行的劳动者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在苏州，江苏蹲点工作组走进木桥公寓集宿区联合工会开设的新市民夜课堂，和外来务工人员一起学习水彩画，互相展示作品，开心合影留念。正是在这样水乳交融的气氛里，他们更加明晰了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路径和服务方式。

在重庆，重庆蹲点工作组熬了几个通宵，准备

了一份“接地气”的工会专题宣讲。从受众角度找切入点，把大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只为让宣传内容讲到企业管理方和职工的心坎上。推进会召开仅1周后，两家“难啃”的非公企业工会筹备组同时成立。

根基在职工群众，血脉在职工群众，力量在职工群众。

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全总机关蹲点干部，就这样读懂了“一口热饭、一张床铺”对劳动者的珍贵，书写着“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全新答卷。

蹲下去，站起来

全国总工会启动机关干部基层蹲点活动，骤然引爆了各级工会选派优秀干部沉入基层的热潮。

就在全总机关15个蹲点工作组离开北京的一个月后，便有23个省级总工会制定蹲点活动方案。最新统计显示，截至8月13日，全国31个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均制发工作方案，部署开展蹲点活动，除江苏因疫情影响，其余30个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本级蹲点工作组已进驻基层。

规范基层工会建制，这是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聚焦点——

辽宁省总工会第一蹲点工作组入驻沈阳市大东区汽配行业工会联合会，把蹲点工作任务与当地工会相关工作进行融合，全面宣传工会组织职能和工会工作内容，很快便和3家企业达成建会意向，同时为企业工会兼职工会干部的工作补贴等共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这是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发力点——

在安徽芜湖，市总工会机关组成4个蹲点组，县市区工会组成17个蹲点组，摸底排查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推进楼宇工会、市场工会建设，推动

50位蹲点干部好比50粒种子,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好比土地。他们用自己的蹲点实践生动彰显着,工会干部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合起来,在火热劳动的沃野上生根开花,去奋斗,去奉献。

网约送餐员和护工护理员等八大群体入会,为他们送上2645份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险和3000份关爱慰问礼包。

推动企业依法建会,这是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关键点——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蹲点干部自我加压,走访调研72家基层企事业单位,围绕建会入会、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和职工互助保障问题进行政策宣讲和专题培训,先后与19家企业达成建立工会的一致意见,有的已经完成了依法建会。

这些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丰硕成果,印证着全总机关率先启动的基层蹲点活动正在产生功效,推动工会工作和探索蹲点长效机制的双重任务明显推进,解决了一批问题,办成了一批实事,形成了一批成果,锻炼了一批干部。

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高度重视此次蹲点活动,一直密切关注各蹲点工作组的进展情况,分别下到工作组所在街道社区,了解蹲点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态势,虚心向基层工会干部学习,多深入基层和一线职工了解情况,找准问题,提出对策,保证蹲点活动取得实效。

当基层蹲点的日子行将翻过100天的时候,每一位蹲点干部都找到了自己的骄傲时刻。

让刘世超、李琦彦、韩建旭开心的是,深圳美团的大楼里挂上了工会的牌匾,淮安航道一站的67位骑手全部成为工会会员,“从一个不入,到一个不剩”,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让胡止水、周元开心的是,冰箱、微波炉、净水器已经放进了宁海县高坛工业园区户外劳动者驿站,新建的影音室已经成为职工休闲娱乐的场所,园区工会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推出就业、订餐、交友的新服务模式。

让李学敬、邢艺开心的是,江西工作组确定的“我是工人”实践活动,不仅把汗水留在了生产流

水线和餐具清洗车间,更让自己当了一周工人的两家企业打开了同意建立工会的心扉。

让时银龙、何紫凌、闭柳萍、李珊珊开心的是,借助基层工会劳动争议调处的亮点工作,终于敲开了一家十年拒绝建会的企业大门,用服务先行的理念和行动取得外商独资企业对中国工会的理解与认同。

让姜晓捷、景思詹、钟扬开心的是,新建会的企业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四有”要求建会,配备职工小家。其中一家企业还率先组织了一场职工趣味运动会,找到了开启员工内心之门的“金钥匙”。

* * * * *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蹲点的每一天,同样是全新的每一天。

姜文良一直记得7月18日这一天。70岁的“抓斗大王”包起帆长途奔波,专程从上海赶到西安,慰问陕西蹲点工作组。每每想到老劳模风尘仆仆的身影,忍不住的关怀,忍不住的感动。

王强记得的则是7月24日,台风“烟花”经过宁波宁海的这晚,他和当地干部职工们一起“抗台”。大雨中,他们顶着大风,边撑伞边打着手电巡视园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强体会着基层工作的不易,也和当地职工的心贴的更近了。

时至今日,全总机关干部基层蹲点活动还在进行中。50位蹲点干部好比50粒种子,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好比土地。他们用自己的蹲点实践生动彰显着,工会干部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合起来,在火热劳动的沃野上生根开花,去奋斗,去奉献。

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就这样在基层蹲点的实践中又迈出了扎实一步。

中国工会与亿万职工更加水乳交融的时刻,就是更加充满活力的时刻,就是更加坚强有力的时刻。📺

50 位蹲点干部好比 50 粒种子，
在火热生活的沃野上生根开花，
从生产一线的劳作里汲取力量，
时刻鼓舞着自己去奋斗，去奉献。

摘自 NO.8 2021《这才是成长的样子》



2017年7月6日下午, 北京, 送餐员顶着瓢泼大雨出行

请让我来保护你

1993—202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困境与暖冬

入行门槛不高, 似乎成了新就业形态的标志特征。除了去产能行业的离岗工人, 外卖骑手成为进城打工群体的热门选择。一辆电动车, 一张健康证, 一部智能手机, 这就是全部的上岗条件和生产工具。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21年11月4日，北京。

西长安街边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里，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见证下，“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正式启动。

简短庄重的启动仪式上，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明确提出，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把党中央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从这一天起，依照全国总工会的统一部署，各地工会同步行动，送思想文化、送身心健康、送平安保障、送温暖关爱、送工作岗位、送技能提升，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听得见工会声音，看得见工会身影。

从这一天起，无论是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还是货车司机，这些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的进步，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的劳动者，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工会组织的温暖力量。

生长

这只是序幕的结束

时光回转到26年前。

北京中关村竖起了一块对大多数人来说似懂非懂的广告牌，却最终写入历史深处。那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大字——“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向北1500米，那里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此时，今天的互联网大佬们要么在摆地摊，要么在电信局工作，要么当程序员，要么在开发寻呼机。

比中关村那块广告牌稍早出现的，是现在已经深深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快递公司。

1993年，20岁的聂腾飞创办了“申通”。5年以后，聂腾飞因车祸离世，他的弟弟聂腾云离开公司，成立“韵达”。2000年，聂腾飞之妻兄的小学同学，劝木材生意亏损的丈夫喻渭蛟创办了“圆通”。2002年，与他们一同长大的赖海松成立“中通”。

由聂腾飞而起的这些快递公司不断创立的时候，同样是在1993年成立的“顺丰”藏在深圳的

一处小卖部后面，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旁边还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仓库。媒体后来描述说，仓库的窗户用砖头封得死死的，大照明灯常年亮着，两三百个小工忙得汗流浹背。

彼时，或许没有人能想到，这些看上去粗陋低端的快递业务，竟然能够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敲锣开市。

更没有人能想到，正是这些风扇下忙碌的“小工”，后来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主力——快递员。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经济业态攻城略地，迅速吸纳着成千上万涌入城市的劳动人口。

2008年，上海交大的一位在读研究生和朋友一道，创建了互联网订餐平台“饿了么”。随后几年，美团外卖、百度外卖迅速崛起。今天，那些蓝色或黄色的身影穿梭在城市街巷，早已促动了一个新兴职业的出现。

在另外一条互联网赛道上，庞大的交通出行需求成为新商机。2012年9月，滴滴打车上线。4年以后，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网约车”入选十大新词。与此同时，伴随着货运平台企业的出现，货车司机的概念超越了原有的汽运公司员工，开始有了互联网衍生从业者的新身份。

这是一次席卷城市劳动人口的变革。在数字



2010年12月2日，杭州萧山申通快递公司浙江总部，快递员正在仓库里分拣堆积如山的快件

技术的基础上,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快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生产模式,业务持续迭代更替,依托互联网衍生出越来越多具有第三产业特征的服务岗位。

2016年的“双11”,借壳上市的“圆通”就以8000万件的惊人数字,成为当年揽收包裹数量最多的快递公司。同一年,中国外卖市场的规模暴增到1800多亿元,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

此后,伴随着几何级数变化的加速度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军快速膨胀。从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到货车司机,最终形成了一个8000万人规模的就业群体。

2021年2月,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依据这一权威报告,在突发疫情冲击下,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表现出巨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2020年市场交易额超过3.37万亿元。中国就业形势能够总体稳定并好于预期,得益于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在滴滴平台的专职司机,超过20%是因为下岗、失业而开起了网约车。美团平台上,35.2%的骑手来自工厂工人,31.4%来自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

“共享经济”,这个曾经让人们感觉新鲜的词汇,如今,它已经和奔忙生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紧紧相连。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这句著名的英文演讲内容,或许更能生动描述澎湃而来的新经济劳动者。

是的,“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开始的开始,而只是序幕的结束”。

生 计

在看不见的“水面之下”

不断衍生的新经济就业形态,被罩上了“时间自由+收入高”的模糊光环,让千百万年轻人有

了“进工厂”还是“送外卖”的选择。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劳动力迁移显出几分沉重。普工、技工、班组长,一些好不容易实现了自己曾经憧憬的“从农村到工厂”跃迁梦的人们,向内看,满眼皆是工厂流水线的沉闷枯燥;往外看,平台经济里快速奔跑的新岗位充满新鲜和“自由”。重新选择成为潮流,他们的身份就这样变成了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

依据美团发布的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2018年的美团外卖骑手中,31%来自去产能行业的工人,16%来自餐饮从业人员,13%来自个体户,12%来自快递员,8%是其他平台的骑手。

《南方周末》则披露,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93万人是去产能行业的离岗工人。平台企业催生了大批门槛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种——开网约车、送外卖、送快递。

入门门槛不高,似乎成了新就业形态的标志特征。除了去产能行业的离岗工人,外卖骑手成为进城打工群体的热门选择。一辆电动车,一张健康证,一部智能手机,这就是全部的上岗条件和生产工具。

与相对较低的门槛相比,坊间传说的那些新就业形态的岗位收入,也吸引着年轻人的从业选择。《中国工人》记者在北京、西安等地采访发现,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的收入大多超过当地制造业的普通工人。至于那些即便是贷款买车的网约车司机,也往往对自己收入“比较满意”,何况“干上这行也算是进入了‘有车族’行列”。

然而,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职业,真的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面临的全部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2017年1月2日,上海。新年假期的欢快气氛,让整座城市盎然着生机。

14时15分,伴随着猛烈的撞击声,一辆小客车在同普路口与一辆电瓶车相撞,电瓶车上的外卖配送员被撞飞后翻滚倒地,送餐箱散落在洒满血迹的事故现场。

当地媒体发布消息称,这位25岁的外卖配送员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监控显示,他骑着电瓶车停在路口斑马线上等候,左右张望后开始穿马路,而此时,行人信号灯依然是红灯。现场目击

者则说，“机动车可能抢了黄灯的一两秒时间”。

这是一起不需要报道死亡者姓名的交通事故。人们在手机刷屏时一带而过，甚至还会不解外卖配送员为什么要争抢那几秒钟的时间。

4年以后，一篇引起社会震动的调查报道做出了回答，成千上万“困在系统里”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

依照《人物》杂志的描述，一家风头正劲的外卖平台在4年内加速了3次配送时间——同样的距离，包括取餐、等餐和送餐在内的配送时间，由1小时变成38分钟。另一个数字显示，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的单均配送时长，3年内减少了10分钟。

3年抑或4年，城市交通越来越拥堵，住宅楼、商务楼越来越高，人员进出管理越来越严苛，所有这些都在消耗着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时间。外卖配送员和实时智能配送系统的“作战”，就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役”，里面充满了无奈和悲壮，只能选择“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交通事故与超时压力，仅仅是外卖配送员所处困境的一个缩影。与以往工厂化生存截然不同的就业方式，把更多的问题埋潜在看不见的“水面之下”。更加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尽管呈现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外卖配送员所面对的困境，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同样都会遇到，看似自由中的无可选择，有时甚至还会更为窘迫。

互联网衍生出来的新行业新岗位，无论是劳动关系还是职业防护，往往都是规则和监管的薄弱之地。一旦出现摩擦和冲突，原本就处于裸奔状态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必然处在弱势的位置，几乎无力进行理性反抗。

权益

从下载APP到“下载劳动”

直到今天，很多老资格的外卖配送员还在回忆2016年的春节。

当时，几大外卖平台正在为了市场份额进行“死磕”，业务链条最末端的配送员骤然成了“香饽饽”。这家平台提供返乡补贴，那家平台报销返工车票，手握巨额融资的平台经营者“杀红



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作为快递行业的代表窦立国（右二）站在敲钟台上，见证历史性一刻

了眼”，配送员底薪和外卖配送费动辄就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数字。

连番对垒，市场份额格局渐成。挥金如土的浪潮退去以后，那些在厮杀血拼中存活下来的资本巨头，迫不及待地转头回来进行“收割”。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调研发现，超过70%的外卖员是无底薪计件工资。即便是一些配送站点所声称的底薪，也需要达到一定的单量才能拿到，否则依然是按单计价。最初平台为吸引从业人员给出的待遇，已经随着市场竞争和供需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调整。

显然，类似的变化不仅仅出现在外卖平台，而是普遍出现在几乎所有互联网衍生行业。包括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在内，成千上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踏入了一个劳动权益呈现不确定性的模糊地带，随着平台在某一领域的壮大并成为头部企业，数量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乎“权益”的话语权变得弱之又弱。

《中国工人》记者注意到，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学者观点日益增多，显示出相关问题已经在社会运行中频繁出现。不断披露的调查数据颠覆着人们的传统认知，水面之下的问题浮出水面，城市生活中，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所面临的困境，需要被看见被改变。

一份面向北京快递员和外卖配送员的调查报告披露,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7.62岁,但其中57%的人已经结婚,55%的人至少有一个孩子。

另一组关于外卖配送员的调查数据显示,38.8%的人每天工作时长达11个小时至12个小时,28%的人每天工作时长达12个小时以上。同时,56.58%的人没有从企业得到安全防护设备,39.47%的人没有接受企业定期安全培训。

一个又一个数字,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推到聚光灯下。

劳动合同订立权受到侵害,劳动报酬权益受到侵害,休息休假权益受到侵害,劳动安全权益受到侵害,职业培训权益受到侵害……在这些侵害的背后,同样严峻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维权组织和途径。在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完善的背景下,直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具体政策依然供给不足,互联网经济的特性往往成了资本漠视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

在互联网上,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配送员的时间不到10分钟,其中还包括将近5分钟的审核环节。注册页面的提示条款称,“当您按照注册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阅读并同意本协议且完成全部注册程序后,即表示您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本协议的全部内容”。

然而,那些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企业一方自行制定的“游戏规则”,排除了“劳动关系”的概念,表示劳动者与平台之间“不适用《劳动合同法》”。这些涉及权益和责任的关键信息埋藏其中,只要注册人随手点一下确认键,企业就轻松立于不败之地。

在社会学者看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可以被定义为“下载劳动”,下载APP的过程不仅是下载一个辅佐完成工作的工具,更是“直接进入了一套精密的劳动控制模式”。平台企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数据信息,传统的生产资料几乎完全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同时转嫁的,还有劳动权益的成本和社会原子化的代价。

所谓社会原子化,就是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独自面对整个社会。他们在算法和系统的控制下,忍受疲倦奔跑着以满足系统的要求。他们想不到的是,当算法发现原来可以更快的时候,系统也会再次加速。

温暖

获得感·保障感·归属感

有就业无门槛,有劳动无单位,有上班无下班,有报酬无工资,有风险无保险……互联网衍生产业失衡的劳资关系,引起党和国家决策层面的高度关注。

2018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快递小哥”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庄重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31天后,习近平总书记结束在北京市前门东区看望慰问乘车返回途中,特意走进位于前门石头胡同的快递服务点,看望仍在工作的快递小哥,了解他们工作和生活情况。

2020年5月2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联组会。习近平总书记听取相关发言后明确指出,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保障问题,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中国工会迅速行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等进行研究、提出要求;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等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建会入会作为工作重点,全力以赴、扎实推进。

进入2021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密集出现在中国工会的文件和活动中。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全国总工会直言,大多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中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担和精神压力,平台企业借助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优势单方制定修改规则,建议坚决制止刻意规避法律、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短期行为。

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正式印发,明

确要求加快推进建会入会，探索适应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不同职业特点的建会入会方式，主动参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制定，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开展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和劳动用工“法律体检”活动。

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积极回应地方和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围绕“怎么建”“入到哪”“怎么入”“怎么管”“如何吸引”等关键环节作出规定。

10月28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广东、海南等地的上百个分会场里，全国非公快递企业5万职工集中宣誓入会，同时获颁会员证和中国工会会徽。

与此同时，各地工会全面行动——

广东省总工会和广州市总工会等联合开展集中慰问活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服务，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态化送温暖专项资金，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疗休养活动；

江苏省总工会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四类群体，依托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建设职工书屋、读书角和流动书吧，向新就业形态群体赠送健康体检，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工会职工互助保障范围；

辽宁省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以“双11”为时间节点，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发放温暖大礼包，推进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

上海市总工会按照“条里牵头、块里兜底、属地建会、在地服务”的原则，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组织上扩大覆盖，在服务上实现平台企业工会和地区工会双重覆盖，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服务和保障。

……

时逢寒冬，那些奔忙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和货车司机，感受到来自工会组织的温暖。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知识50问》，成为他们随身携带的“权益指南”，获得感有了，保障感强了，归属感多了！

一切曾经的难点正在被一一不断打通。平台公司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比以前更明晰了，从不建



2019年12月6日，河北邯郸，外卖小哥们整装待发

会的平台企业终于有了工会主席，“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的空白点越来越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愁盼”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中国工会加快行动的同时，各个政府部门分别推出一系列制度措施，全力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保护伞”——网络餐饮平台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不得通过算法等手段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网约车平台企业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外卖配送员将获得政府主导的职业伤害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的基本权利。

无论互联网如何改变就业形式和劳动关系，平等的就业、良好的工作条件、相同的社会保障，都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互联网技术不能被无所限制地滥用，资本不能冷酷无情地把人变成奔跑的机器。

2021年，这个冬天的温暖和关爱，将会一直传递下去。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明天，幸福而美好。📺

每一段生命旅途中都会有风暴，
每一种职业尊严里都写满沧桑。
同样是命运打开的生活大门，
潦倒者看到残酷，
激扬者看到光明，
失意者看到败落，
乐观者看到希望，
畏缩者看到虚无
勇敢者看到未来。

摘自 NO.12 2021《为国牺牲，岂止在战场》

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



♥ 扫码打开电子版 ♥



♥ 探索更多可能
复制地址用电脑试试 ♥



流水不争先， 争的是滔滔不绝。

人生是自己书写的一本书。打开扉页，每个人的开始都大相径庭，却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拒绝平庸。你瞧，有梦想的人，人生何处不显峰。——2018·《人生何处不显峰》

见山见水见人，对劳动者来说，构建着个体通往伟大世界的道路；见山见水见人，对书写者来说，是看见平凡并体悟伟大的必经之路。——2019·《见山见水见人》

我们最大的媒体理想，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呈现更多元、更真实的中国工人形象，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有其所有，得其所得，被平等相拥，被温柔以待。——2020·《第三种面貌》

诚意值拉满，浪漫值拉满，氛围值拉满，温暖值拉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通过努力去增加自己的确定性。——2021·《奔跑吧，生活自有答案》

在疯狂追求成功的年代里，理想成为了社会的奢侈品，无时无刻不在面对世俗的侵蚀。因为如此，理想的守护者便是我们最需要的人。一旦承担起守护理想的使命，在璀璨辉煌的成功背后，大抵都会有理想的寂寞，理想的沧桑，理想的殊死挣扎，理想的永不言败。——2022·《冠军以下》

治愈苦难的从来都不是时间，内心的释怀才是真正的解脱。我们可以对压力和焦虑释怀，可以对冷漠和孤寂释怀，但在释怀一切之时，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自己的心，因为我们需要长出自己灵魂的牙齿。——2023·《听从你心》

时间都知道

2017—2026